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 发展问题

〔俄〕普列汉诺夫 著



B⁰
791-5

9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

〔俄〕普列汉诺夫 著

王荫庭 译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俄)普列汉诺夫著;
王荫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8775-9

I. ①论… II. ①普… ②王… III. ①历史唯物
主义—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4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

〔俄〕普列汉诺夫 著

王荫庭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775-9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¼

定价: 32.00 元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А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

本书根据前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6 年版《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五卷本)第一卷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1 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 5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 2012 年出版至 5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 月

译者序言

(一)

本书一般公认是世界哲学名著，事实上也是历史学名著，确切些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名著，尤其是至今少有的马克思以前唯物史观学说史名著。它和作者另一部著作《俄国社会思想史》（三卷本，中译本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同为思想史名著。从写作时间之长，收集资料之广，耗费精力之深，原创观点之多而言，《俄国社会思想史》大大超过本书，然而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就社会影响、发行数量、译成外文种类和知名度说来，前者又远逊于后者。本书也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整个说来是他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在这里他达到了自己一生理论水平的最高峰。

恩格斯和列宁对本书都曾给予很高评价。

1895年1月本书在圣彼得堡出版。很快普列汉诺夫的战友和信徒维拉·查苏利奇就把它送给了当时在伦敦的恩格斯。1月

30日,恩格斯给查苏利奇写道:“格奥尔基的书出得很适时”。^①2月8日,恩格斯在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又说:“维拉把您的书[按:指本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②恩格斯还没有看完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就给予它肯定的评价,这是因为他读过普列汉诺夫此前发表的其他著作,对它们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例如他对《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评价是:“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③又如普列汉诺夫的“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一文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后(1891—1892年第7—9期分三期连载),恩格斯写道,“普列汉诺夫的这几篇文章好极了”。^④他非常关心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外国文字,曾专门就此事写信给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丛刊编辑部,表示很希望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保加利亚文本问世。他还热情地帮助马克思幼女艾琳娜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英文本的出版。沃登回忆说:“恩格斯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也不亚于拉萨尔’),并且询问他的著作计划,认为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379页。以下凡引此书均指中文第1版。

② 同上书,第383页。

③ 同上书,第36卷,第301页。

④ 同上书,第38卷,第236页。

史的著作和俄国民粹主义美文学的论文都写得很中肯。”^①据说恩格斯曾经对查苏利奇讲过：“我知道只有两个人懂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②

列宁曾称本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有很好的论述”，又说它“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还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都“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③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曾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④，又说，列宁一直到晚年仍然“认为从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那里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言论，就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前进。”^⑤

本书出版后相继翻译成德、法、英、意、西、波、保、塞、日、中……等外国文字，在欧、亚、北美等广大地区风行一时，是普列汉诺夫所有著作中译本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

在中国，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规定本书为十几种“干部必读”书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开始为止），本书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必读参考书。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81 页。

② 转引自恰金：《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分析》，1977 年俄文版，第 7 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1 卷，第 66 页；第 16 卷，第 267 页；第 32 卷，第 84 页。

④ 《回忆列宁》，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48 页。

⑤ 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二)

为了争取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合法地公开出版这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普列汉诺夫不得不放弃正确反映该书内容的书名——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他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步》一文中写道:《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用的笔名是别尔托夫,“所谓‘一元论’历史观,我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我不想直呼其名,以免触犯书报检查机关。”^①但是他选用“一元论”这个“蹩脚的”名称却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普列汉诺夫认为,“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②,而且“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中的一个阶段。”^③他再三强调马克思实现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大大地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实质上一元论的性格。”^④同时一旦“我们站在一元论的立场上,经验本身一定会解决两种理论中哪一种——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将更好地说明我们在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所遇到的现象。”^⑤所以他说:“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⑥可见,所谓一元论历史观乃是“唯物主义历史

①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3页。

③ 《拉萨尔评传》,载《马列主义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5页。

⑤ 同上书,第154页。

⑥ 本书第656页。(以下凡标注的本书页码,均指本书边码。——译者注)

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代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以康·尼·米海洛夫斯基、瓦·巴·沃龙佐夫、塞·尼·克里文科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民粹主义。他们在《俄国财富》、《祖国纪事》等刊物以及本人的文集中，在理论上，大肆宣扬“主观社会学”，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把它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说这种唯物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联系；在实践上断言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等等。本来普列汉诺夫早就有意写一本正面详细说明马克思哲学——主要是历史哲学，即他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于是趁着反驳自由民粹派这些议论的机会写成了《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这样一本杰出的论战性著作。

本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至第四章，叙述十八世纪中期到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这一百多年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问题，即马克思以前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二部分，即第五章，详细论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最后，即“结论”部分，作者分析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在实践问题即俄国是否能够、是否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的错误。

对于今天我国广大读者说来最感兴趣、最有价值的自然是本书第一、二部分。第三部分内容则只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这部分的篇幅也远远少于前两部分，即从作者给本书所取的书名的观点看来，这部分也不是他的重点。

普列汉诺夫认为，“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在直接先行于出现马克思观点的时期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取得了怎样的成果。”^①于是他就用第一至四章有选择有重点地简要叙述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欧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种种重要的科学成果。通过叙述，他清楚地说明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派如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那里存在着唯物史观某些微弱的萌芽，这些萌芽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那里如何得到增长，后来十九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黑格尔使它们进一步发展壮大。但所有这些都陷入了矛盾，而从这些矛盾中得出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这样，普列汉诺夫在论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即论述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唯物史观发展史时明确地贯彻了两个基本思想。一个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唯物史观指凡从“物”出发而不是从“心”出发解释全部或部分历史现象。所谓唯物史观，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都属广义的唯物史观。因此，不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的理论，爱尔维修论人的学说，基佐米涅和梯叶里的历史著作，圣西门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等，这样一些多少“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就是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作家的某些观点也都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不仅希波克拉底和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霍尔巴赫的

^① 本书第 608 页。

“原子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就是十八世纪一系列先进思想家的人口理论也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所有这些“个别场合”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它们最终都“回到了唯心主义”。^①这种唯物史观只具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是“不连贯的、偶然的東西”，还没有形成严整的体系，^②而且顶多只能是“对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而狭义的唯物史观则指马克思的“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③

另一个基本思想：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历史观长期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即革命性）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科学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最伟大的革命”。^④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变革，就是质变。所以科学唯物史观的出现同样必须服从辩证法关于量变质变规律。没有充分的连续不断的量变，何来光辉的质变？没有先进人类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种种发现的那些长期的、深入的、多方面的积累继承和丰富扩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出现吗？脱离继承性的变革是抽象的、虚幻的，像所谓“轮不碾地”一样只是纯粹的诡辩。抽象的变革性其所以没有根据，因为它没有告诉人们究竟由什么变革到什么，也没有说明是怎样变革的，即没有说明这个变革的过程和方式是怎样的。不知道第一个“什

① 本书第 689 页注释。

② 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1 页。

③ 本书第 689 页注释。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507 页。

么”，第二个“什么”的变革性能讲得清楚吗？而且就是在论述由什么变革到什么时，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整体的历史观上，还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历史哲学各个组成要素即历史观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从什么变革到什么。所以只有承认并深刻理解科学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这个基本思想的人，才真正懂得马克思所实现的这场革命的意义。“被无知之辈认为‘狭隘’和‘片面’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事实上是历史观念若干世纪发展的合法产物。它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①

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先行者，不管他们如何博学，如何富于天才，他们的体系顶多也只能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十分机智和成功地解释了若干个别的历史现象”^②，从而“为马克思所建筑的理论大厦准备了某些——的确是极宝贵的——材料”^③。它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确切的科学，除了它们都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石和正确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原则之外，还因为所有这些学说内部都充满着各式各样无法解决的矛盾和令人迷惘的虚构。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以前至少一百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就不能弄清楚当时种种先进理论所陷入的那一切矛盾、一切虚构和一切迷惘，也就没有可能懂得马克思学说怎样结束了这一切矛盾、虚构和迷惘。而只要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先行者们在历史观各种问题上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2页。译文有改动。

② 同上书，第3卷，第581页。

③ 同上书，第664页。

如何不能自圆其说,如何不能正确概括纷繁庞杂、充满矛盾的历史现象,以及没有作出详细的、具体的、清晰的说明,马克思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就仍然不会有坚实的逻辑基础。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唯物史观的“萌芽”不是始于近代,早在古希腊就有了;不是零星的偶然现象,而是源远流长、支派繁衍、内容丰硕的必然结果。尽管和一般唯物主义哲学不同,唯物史观的理论在马克思以前的任何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唯心史观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必然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熟。在这个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之后,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十分有益、然而尚待进一步探讨和系统化的材料和线索。例如在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性论,阶级斗争、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学说,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式的相互关系,以及黑格尔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中的巨大意义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唯物史观发展的历史演进所作的精彩分析,确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对此拙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一书第九章逐一作了概要的评述。

(三)

本书前四章只是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主线(顺带涉及其他问题),说明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多年唯物史观的历史演变。

1901年3月,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就“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

四次演讲,通俗、概要、系统地叙述了从公元四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确切些说,是唯物史观从萌芽壮大到成熟的历史。其中第二至三讲的内容,与本书前四章基本相同,所以本书只选录了主要讲述神学史观的第一讲(见附录一)。

在这四次讲演中,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的五个阶段,而且明确指出区分这些阶段的标准在于如何回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即如何回答人类历史运动和进步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这五个阶段依次是:神学史观、理性史观、利益史观、辩证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什么是神学史观呢?神学史观就是用神的意志解释历史过程的理论。“这是一种最原始的观点:它同人类思想企图探明周围世界的最初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①它的特点是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意志和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来解释历史过程和评价社会现象。在它看来,一切历史事件都取决于天意。这种思想一直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十八世纪初才退位。这个阶段的代表是两位主教: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和波舒哀(1627—1704年)。他们各自代表一个历史时期。

历史哲学发展下一阶段即理性史观的主要代表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派思想家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他们的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是:观念的发展归根到底说明着整个历史的进化,或者说:“意见支配世界。”所以理性史观也可以称为意见史观。把意见看成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看成是历史过程最

^① 本书附录一第一讲。

基本最深远的原因,这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观点。何谓意见呢?“支配世界的意见的基础乃是民族内部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一定的总和”。^①过去,人类的一切道德的和政治的灾祸都是愚昧无知造成的。一旦理性发现了真理,这些灾祸立即可以免除。启蒙派思想家都深信理性终归会取得胜利。所以“意见支配世界”也可以说是“理性支配世界”。

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和圣西门等人的思想代表了历史观发展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和法国启蒙派相反,他们认为“不是意见,而是社会利益,或者说得更好一些,社会重大构成要素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这些利益的对抗性所引起的社会斗争,支配着世界并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因为“群众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创造的源泉和动力”。^②这里所说的“利益”,是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的利益”,首先和主要是经济利益。正是这些表现在人们的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在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看来,成了政治事变的主要发条,成了决定民族风习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因。

历史观发展的第四阶段,即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了充分准备的阶段,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发展史观或辩证唯心史观。这个历史观的最大特点是从现象的发展观点上,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的观点上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和一切历史事件,虽然黑格尔所说的发展归根到底只是绝对观念的发展。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普遍的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历史哲学——这是依照理性来考察历

① 本书附录二,第二节。又见本书第514页注释。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35、737页。

史。它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看待事实,它加给事实的唯一的思想,就是理性支配世界。”^①这里的“理性”不是指自觉的理性,而是指一般规律。理性是在规律性的意义上支配历史的,就像它支配天体运动一样。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马克思的理论。它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第一,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其他一切关系;第二,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

五阶段中的第二、三、四阶段,即理性史观、利益史观和发展史观都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以概括地说,历史观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即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神学史观,十八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近代唯心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②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最后的、绝对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古希腊罗马有没有历史哲学?如果没有,根据是什么?如果有,它究竟是属于神学史观还是自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特点是什么?等等。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所以他在上述讲演和本书中都明确申明,他仅仅谈到历史上的“某些历史哲学”。

(四)

普列汉诺夫在叙述历史观发展史时,清楚地说明了各个唯心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44页。

^②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5卷,第251—252页。

史观体系中唯物主义因素从萌芽壮大到成熟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

奥古斯丁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历史事件绝对取决于天意。但是他在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个基本原则的同时又一再声明：“天主的道路是不可吐露的。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又为什么提出探索这些‘道路’的徒劳无功的课题呢？而且为什么把这些不可吐露的‘道路’当作对人类生活的种种事变的解释加以援引呢？矛盾是明显的，而且正因为矛盾是明显的，所以就连有狂热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稍微尊重一点逻辑，只要他们不想硬说不可吐露的即不可说明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说明着一切并使一切成为容易理解的，也都不得不放弃用神学来解释历史。”^①换言之，提出研究“不可吐露的”“天主的道路”这一要求，就其是对神学史观的否定这个意义来说，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这是神学史观的第一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绝对的神学史观。

神学史观第二时期代表波舒哀否定了天主道路不可吐露的说法，提出了“人间万事皆空”或“人事无常”的神学。虽然这种否定总的说来仍然没有超出神学的范围，却是朝唯物主义迈进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事件特殊原因的分析上。“按照波舒哀的意见，历史中往往有一些事变，其中仅仅体现上帝的指示，或者换句话说，其中有上帝直接的活动。这类事变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迹。然而在大多数场合，在事物通常的流程中，每个特定时期发生的变动都是受先前各个时期产生的诸原因制约的。真正的科学

^① 本书附录一。

的任务是研究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东西的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原因仅仅依赖于人们的和各民族的本性。”^①和奥古斯丁的绝对神学史观不同，波舒哀的神学史观可以称为有限的神学史观。因为它给历史事件的自然的解说留下了广阔的地盘。用自然的原因，而不是用超自然的原因解释历史的自然过程，不正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么？不正是用自然解释自然这个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么？尽管“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他那里是同神学观念紧密联系着的”，但它毕竟“承认——自然是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承认——神学概念本身，即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来解释现象的那种方法本身是无能为力和徒劳无益的。”^②

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发展了波舒哀体系中的这个唯物主义因素。伏尔泰要求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仅考察第二性的即自然的原因：“让受到神圣托付的人去从事表示尊敬的神圣事业吧，我们自己所关心的只是历史事变。”^③这样他就一脚踢开了神学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第一次宣布了唯物史观对神学史观的彻底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初步的。“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是科学地解释历史的尝试。”^④因为伏尔泰以及后米的其他启蒙派代表都是用风俗和观念的发展，用意见的发展、理性的发展来说明历史的进化。

这无疑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但是在这种历史观体系内部存在

① 本书附录一。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着强大的唯物主义因素。所有的启蒙派在坚信环境(即人们的社会关系)为意见所决定的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对立的命题:意见为环境所决定。所谓“环境”在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同道看来主要是社会环境,主要是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这样,“社会环境决定意见、舆论”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科学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雏形,因为首先,作为“社会环境”概念主要内容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确是“社会存在”构成要素之一,虽然还有比它更为根本的要素。其次,即使在法国唯物主义的上述唯心主义命题本身中也存在着唯物主义因素。“意见万能”思想固然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但其中包含着真理的极小颗粒:意见对人、对历史进程有极大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思想对社会发展有巨大反作用。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得不承认法国唯物主义者上述对立的命题都是正确的。因为环境和意见、国家制度和道德风俗之间的确存在着相互作用,它们互为因果。这也是它们唯心史观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是: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和梯叶里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的历史观进一步大大地发展了法国哲学家历史动力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发展了法国哲学家关于社会环境是意见、舆论变化的原因,关于政治法律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思想。基佐等人认为,必须从新的观点去考察“环境”或“社会环境”,不能把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都归结为立法者的活动,归结为政治宪法,因为政治立宪、政治法律制度本身只是派生的东西。“政治结构在成为

原因以前乃是结果；(这些结构的)根源在于各民族的社会状况。社会状况决定于所有制状况。”^①反过来说,所有制状况或者叫财产关系,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甚至统治该国家的观点的最主要、最深刻的基础”。^②这样,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就在历史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而相对完整地提出了所有制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另一个要素,它决定着社会物质结构即社会存在的上层要素——政治法律关系,从而加深了“社会环境决定意见”这一原理的理解,缩短了“社会环境”过渡到“社会存在”的过程。

第二,论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至少是近代各族人民历史发展最主要动力的原理。阶级斗争是上述历史学家历史观的中心概念。在他们看来,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它遵循着这样一条进步公式:“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③他们清楚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同各阶级或阶层中间逐渐形成的思想潮流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就为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文明人类的思想史准备了很好的基础”。^④他们还善于追溯社会阶级或阶层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并且了解到国家政权是各阶级为实现自身经济目的而进行斗争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就是说,基佐等人对社会存在的两个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或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之间相互关系,即对政治以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已

① 本书附录三。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47页。

③ 同上书,第524页。

④ 同上书,第527页。

经有了初步的正确的观点。

第三,提出了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主人公的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既然认为理性支配世界,那么具有理性的杰出人物、立法者在他们心目中就成了决定历史命运的主要力量。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例如梯叶里)断然否定了这个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指出,“旧的学派对国王的世系注意过多。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立活动留下余地”。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在‘公民’群众中,有特权人物和贫苦百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后者的生活上。”^①

把圣西门与基佐等人放在一起,同属于利益史观的代表,因为圣西门是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老师和先辈。无论在所有制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问题上,还是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以及其他历史观重大问题上,基佐、梯叶里都应当把自己的基本观点归功于圣西门。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例如,圣西门超过了他的学生,他没有停留在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个结论上,而是继续前进,得出了产业发展的需要决定财产关系的状况和变化的结论。这就使他接近于生产规律实质上归根结底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当然他只是有些地方接近于这个原理罢了。而且和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一样,他也陷入法国启蒙派曾经陷入过的同一性质的矛盾。法国启蒙派哲学的基本矛盾是:意见决定于社会环境(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环境又决定于意见。复辟时代

^① 参见本书附录三。

的历史学家进一步认为,政治法律制度由所有制关系,由社会阶级和等级的现实经济利益决定。但产生社会阶级和等级的来源是什么?造成特定所有制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是征服。而决定作为政治行为的征服的又是征服者的意志和意见。圣西门更进一步,他说,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原因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但为了生产,必须有劳动工具,而工具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这样,启蒙思想家关于意见、“教育”完全支配世界的观点更牢固地得到了证实。

人们绕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圈子以后又退回到法国启蒙派原来的出发点。但他们毕竟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前进了。这个时期历史观的发展经过了一个螺旋式的历程。如果提出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政治制度是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前进的一大步,那么圣西门偶尔接近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思想就向最后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靠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只是圣西门这一步的跨度实际上是很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在叙述唯物史观发展过程时把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在基佐、梯叶里等人之后,尽管按年代顺序以及基本思想继承关系说,这些历史学家应在圣西门之后。

向科学的唯物史观靠拢的最大的一步是黑格尔迈出的。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关键的。普列汉诺夫在一系列哲学著作,特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就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而言,可以用以下三点来说明。

首先,黑格尔全面地制定了辩证法,并且开始用这个强大的认识工具去分析社会现象。他第一个试图阐明人类全部历史乃是一

种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对立面不断斗争的发展过程,它服从于某种必然的规律性。尽管他的一切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他的那些深刻的方法论原则为后人科学地考察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比方,如果没有谢林、黑格尔对自由和必然、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观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全面正确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黑格尔在说明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法权关系和国家形式对社会经济状况的依赖性的观点时,不仅继承了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和圣西门等人的基本思想,而且大大强化了他们的理论深度。圣西门和他的学生们主要研究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史,他们的那些历史哲学结论正是从概括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中得出来的。黑格尔则不同。他的《历史哲学》上起古代东方,下迄当代日耳曼世界,包括欧亚非各洲。“他在历史哲学上的不变手法开始时稍微模糊地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接着就更详细得多地、而且是自然更令人信服得多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②因此,他的历史观中的前述唯物主义因素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范围。加上黑格尔是作为哲学家,而不是作为历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提出这些思想的,这也就必然会使他的结论更有概括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② 本书第599页。

最后,黑格尔跟自己的前辈和同辈十八至十九世纪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力求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作用着和互相作用着的力量归结为普遍的和统一的源泉”。^① 这些前辈和同辈都是折衷主义者,始终在意见、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等互相作用着的诸社会因素的矛盾迷宫中困扰着。他们都不懂得,“互相作用着的双方不能当作直接的材料,而应该理解为某个第三者的、‘更高的’东西的因素。”^② 一旦这个既决定意见、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本身,又决定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三者”弄清楚了,归根到底引起人类历史运动的那个根本原因,即决定所有制状况的那个潜藏的力量也就揭示出来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当然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在物质生产中而是在绝对观念中去找这个“第三者”。过去的思想家们在上述因素相互作用的矛盾迷宫中折腾了一阵子之后都相继回到了意见决定一切的唯一主义人性论老巢。黑格尔的巨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明确提出弄清楚“第三者”这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课题,而且还在于正确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在人性之内,而在人性之外——尽管他看作“第三者”的这个绝对观念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即逻辑思维过程的抽象。

总之,普列汉诺夫在论述马克思天才地发现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时,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的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一百多年来西欧先进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合乎逻辑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95页。译文略有改动。

② 同上书,第3卷,第734页。译文略有改动。

必然产物。或者正如普列汉诺夫自己所说,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为什么必定要出现,它回答了直到这时为止尚未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①

(五)

普列汉诺夫在本书第五章中全面、系统、通俗地考察了社会外部和社会内部几乎所有要素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为了揭穿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主观”社会学的错误,驳斥他们攻击马克思历史观“狭隘”、“片面”的指责,以“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这一思想为中心,尽可能充分地逐个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各种原理。所谓以“真理的具体性”原则研究社会,意思是把社会当作一个具体的整体,而不是只强调、只考察某个或某些社会因素。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因素其实都是抽象的产物。站在这个观点上看社会,都是分析的、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在尽可能多地分析诸社会因素之后,把它们整合起来,这样来考察社会,才是综合的、具体的。他从类人的祖先进化为人开始自己的叙述。首先他说明工具的使用即人的劳动和生产活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指出地理环境对这一过程和早期人类社会演化的重大影响,然后谈到任何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力,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经济,接着从一般的人类社会转到任何社会的

^① 本书第 674 页。

周围环境即与周围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然后转到家庭、家族制度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到法和法的概念及其与社会需要和生活实践的关系,转到法、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转到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到社会心理,转到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特别是高级思想体系如科学、哲学、宗教、文艺、美学等等的关系。往下谈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最后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最懂得理性价值、最重视理性作用的哲学,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谈到它是“行动的哲学”,还谈到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发现新的更多的真理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

贯穿第五章的整个阐述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普列汉诺夫在每一个适当的地方都引证了马克思本人的原话,来说明某个或某些唯物史观原理,随即驳斥对手的歪曲或误解,并且对这些原理作出通俗的阐释和进一步的发挥,甚至提出了新的原理和命题。

第二,在许多地方他都引证了当时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学、法学、地理学、经济学、美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专门研究的成果和旅行家的证言来说明马克思历史观的正确。这是本书第五章另一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

第三,通过对上述专家的引证以及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有关错误观点的批判,使读者加深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

本书第五章主要是叙述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在叙述过程中顺带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主观社会学者”在各项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在“结论”中作者则用“比较—历史的方法”首先介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们在德国是否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如何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然后分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等俄国自由民粹派分子在俄国是否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同一问题上如何攻击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通过比较,作者发现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议论没有一点新东西,完全是重复此前德国人说过的思想。如果说在第五章中通过对俄国“主观社会学”的批判,切实详细具体地阐释了作者对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种种观点,那么在“结论”中,普列汉诺夫把重点完全放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主义者们在俄国资本主义命运这个“实践理性”问题的观点上。至于问题本身几乎没有多着笔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俄国是否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已经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详细批判过了,这里无须重复。二是本书的主题,正如书名所示,是论述“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的。过多的重复会干扰、冲淡主题。只要简单指出“主观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如何导致实践上有害的政治“结论”就足够了。

通观全书,凸显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原理的研究同对该原理的历史探讨融为一体。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把深刻的和多方面的研究人类思想发展过程同解决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结合起来。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一样,他力图通过分析哲学史上、思想史上种种学说或当今各派思想以便得出、验证、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批判自己所反对的理论观点,把哲学史、思想史过程的考察看成是自己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哲学史好比“真理的根”,“围绕真理的根挖掘总是有

益的”。在他那里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史问题仅只具有历史意义；他从来不作孤立的历史考证。在他那里也从来没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或原理不是通过对哲学史各派学说的辩证分析而得出的。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对他的“旁征博引”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显示他的博学，而是为了更鲜明有力地论证某个思想。可以说，包括本书在内的、他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史论结合的典范。

本书三联书店，1973年单行本的两篇附录，即《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和《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这里没有收入。但其中关系重大的三处论述，则完整地摘录，放在本书正文适当地方的注释中，并略作评论。

本书收录了四个附录。都是与唯物史观史密切相关的，是对本书前四章的重要补充。而且最后三篇（即附录二至附录四）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没有收进五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大概跟前苏联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们对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史和地理环境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认识不足有关系。我们在每篇附录前面都写了一段“译者按”语，对收录它的理由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书引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律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译文翻译，同时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卷次页码。所引其他文献，凡有中译本的也几乎全都注明了出处，以备查考。

本书重译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三联书店1973年单行本。这个译本虽然对博古的译文作过两次修改，仍然有不少误译、漏译和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对此我们尽可能作了补正。当然，学海无涯，译事艰难，本书译文难免不有错舛和不当的地方，敬请读者和方家不

者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为了帮助年轻读者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我们收录了“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本书注释有三种。一,作者原注;二,俄文版编者注;三,译者注。为使读者阅读方便,我们统一使用“①、②……”表示,并在每条注释后面标明注释的类型。正文和注释中方括号([])内的文字为译者所加。

为了便于读者查找,还编了“人名索引”,放在本书末尾。

本书全部文稿均由李清贤女士帮忙打印,谨致谢忱。

王荫庭

2010年11月于南京

目 录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二、三版序言	1
第一章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4
第二章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	17
第三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34
第四章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71
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	124
结论	255
附录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	292
附录二 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306
附录三 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观	350
附录四 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书	370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388
人名索引	395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①》

第二、三版序言

507

我在这里只改正了第一版中的笔误和排印错误。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对我的种种论据作任何修改,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的这本书是论战性著作。对论战性著作的内容作任何修改,都意味着用新的武器反对自己的论敌,迫使他用旧的武器作战。这种做法一般

① 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书《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起初题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以便非法发表。但是由于出现了合法出版该书的机会,书名《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就失去了意义,它会立即暴露出作者是谁。[1885年普列汉诺夫曾发表了自己著名的、反对民粹主义的重要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用别尔托夫的笔名于1895年1月出版。根据保存在普列汉诺夫档案馆中的原稿,根据已经在国外收集到的被发现的校样,以及根据其他至今不为人知的资料,揭开了这本书的历史(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然而颇有意思的是,普列汉诺夫第一个写成的是该书“结论”一章,它说明马克思主义可以适用于俄国的问题,以及马克思本人在其著名的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说过的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整理普列汉诺夫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一章的据所有材料判断写于1892年底并准备供合法期刊登载之用的两份原稿。普列汉诺夫希望在《北方通报》上刊登它,但未获成功。一份原稿上题为“奇怪的误会”,另一份则题为“小小的误会”,当时原稿都不曾问世,只是死后才第一次于1937年刊登在《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上。

本版《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这部著作是按照《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1925年)的原文刊印的,并根据1895年第1版和1905年第2版校正过。——俄文版编者注

说来是不允许的,而在当前的场合就更不允许了,因为我的主要论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已经不在人世。^① 批评我们观点的人们硬说,这些观点,第一,本身是错误的;第二,应用于俄国时特别错误,俄国在经济领域似乎注定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第三,它们之所以坏,因为它们预先就使自己的拥护者们无所作为,趋于“无为主义”。最后的这个责备现在未必有人敢于重复了。第二个责备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为最近十年俄国经济生活发展的全部进程推翻了。至于第一个责备,哪怕只是看一看近期的人种学著作,就足以深信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之正确了。任何关于“原始文化”的严肃著作,每当谈到“野蛮”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象的因果联系时,都一定要求助于这种解释。且举封登·施坦宁的经典著作《在中巴西原始民族中》(*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ziliens*) 508 为例。然而不言自明,在这里我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我的某些反对者,我在附录《对我的反对者们说几句话》一文中作了回答。这篇文章我是用笔名发表的。因此我在其中谈到自己的书时是当作别人的著作的,他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不过这篇文章丝毫没有反驳库德林先生,他在《俄国财富》上出来反

^① 1905年革命的临近使得在俄国有可能出版本书第2版。拟议中的本书第2版没有在国外出版过。这时(1904年)普列汉诺夫论战矛头首先指向的主要敌人米海洛夫斯基已经去世。和1905年第2版一样,1906年第3版出版时也没有作任何重大改动。然而对第1版作增补的必要性已经成熟,1904年2月9日普列汉诺夫在致伯尔尼支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体的信中就谈到这一点(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1937年版,第203页)。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件——这种增补的简要草稿、一系列的暗示,这些暗示理应在别尔托夫书中得到发挥。这份文件通过辨识发表在《普列汉诺夫遗著》第四册的第203—236页上。下面,在注释中引用了一些这种补充。——俄文版编者注

对时,已经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后了。^① 关于库德林先生,我在这里说两句话。

他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论据中最严正的,可能就是他指出那个事实,即同一个宗教(如佛教)有时为处在极不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各民族所信奉。不过这一论据只有初看起来才似乎是有根据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场合,“同一种”宗教相应于信奉它的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阶段本质地改变着自己的内容。

我想回答库德林先生的还有这么一点。他在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文原文上发现了我的一个错误(注意参看第 619—620 页),并且对它下了一些极为刻薄的评语。^② 不过实际上我对这个错误是“没有过失的”。我的书出版时我在旅行中,我把手稿寄给了彼得堡,其中引自普鲁塔克的文字没有写上,只是指出了该引用的那些章节。与出版有关的人士之一——大概是在博学的库德林先生曾经学习过的同一所古典中学毕业的——翻译了我指出的章节,并且……犯了库德林先生指出的错误。这自然是遗憾的。不过也应该说,这个错误乃是我们的论敌们能够捉住我们的唯一缺陷。他们本来就需要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所以我甚至对这一缺陷感到高兴。

① 恩·库德林的论文“在客观真理的高度上”,该文是对别尔托夫的书的评论,刊登在《俄国财富》1895 年第 5 期第 144—176 页上。——俄文版编者注

② 库德林指责别尔托夫(即普列汉诺夫),说他“引用的不是普鲁塔克的原文,而是在某个小册子中偶然碰到的拙劣的译文”。——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章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如果您现在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甚至有些过分性急地向您声明，他是‘唯物主义者’，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曾经是我国很早以前有过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崇拜者那种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是您的交谈者无论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还是科学方面都没有丝毫的兴趣，关于这些方面他所具有的甚至是极为模糊的概念。他想说的是，他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信徒，而且还是在特殊的、有条件的意义上……”^①

我们不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遇到过哪一类年轻人。不过他的话可能使人以为“经济唯物主义”代表们的学说跟“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否正确呢？“经济唯物主义”按内容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象的那么狭隘和贫乏么？

简要地概述这一学说的历史可以作为回答。

什么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呢？

510 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直接对应物。唯心主义企图用精神的这些或那些属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一切物质属性。唯物主义的做法恰好相反。它企图用物质的这些或那些属性，用人类的或一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98页。——作者原注

般动物的躯体的这种或那种组织来解释心理现象。所有那些把物质看成第一性因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阵营；所有那些认为精神是这样的因素的哲学家则是唯心主义者。这就是关于一般唯物主义，关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所能说的一切，因为时间在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上建起了最为各式各样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使得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具有跟另一时代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面貌。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包括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派别。的确，在它们旁边几乎始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承认精神和物质为单个的独立的本体的二元论体系。二元论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满意地回答关于这两种单个的彼此毫无共同点的本体怎么能够互相影响的必不可免的问题。因此最彻底最深刻的思想家始终倾向于一元论，即倾向于用任何一个基本原则（*monos*，希腊文的意思是统一的东西）来解释现象。任何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正如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是同等程度的一元论者。^① 在这方面，例如贝克莱和霍尔

^① 尽管《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的“一元论”是作者为了逃避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采用的一个“笨拙的”名词，但它的使用毕竟是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的。比如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折衷主义的二元论时写道：无论自然观或者历史观的二元论，都是根本上只对庸人才有价值。“哲学绝不能满足于类似的‘多面性’，相反，它力求从折衷主义人士如此珍视的二元论那里解脱出来。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3页）。而且“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普列汉诺夫：《拉萨尔评传》，载《马列主义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所以他再三强调马克思实现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大大地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实质上一元论的性格”（《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5页）。同时，一旦“我们站在一元论的立场上，经验本身一定会解决两种理论中哪一种——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将更好地说明我们在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所遇到的现象。”（同上书，第154页）——译者注

巴赫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个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另一个是同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然而两人都同样是一元论者;两人都同样清楚地懂得迄今为止几乎最为流行的二元论世界观是没有根据的。

在本世纪[十九世纪]前半期,唯心主义一元论在哲学中占了统治地位;后半期,在哲学其实已经完全与之融合的科学中,取得了胜利的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不过这种一元论远不是始终彻底的和公开的。

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叙述唯物主义的全部历史。考察一下上世纪下半期开始以来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①

^① 米海洛夫斯基曾指责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为了证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彻底胜利是由所谓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确立的,而这种理论和‘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有最密切的联系”,在哲学史中作了一次杂乱无章的和不充分的漫游。普列汉诺夫在回答这一指责时写道:“如果别尔托夫先生写过哪怕是哲学史的简要概述,那么他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转到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从这些历史学家转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到德国唯心主义者等等这样一种回顾,的确是杂乱无章的和不可理解的。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别尔托夫先生没有写过任何哲学史。他在自己的书的第一页上就声明过他打算把被不正确地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的那个学说作一简要的概述。他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发现了这一学说的某些微弱的萌芽,并且指明这些萌芽在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专家们那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然后他转向按其专业虽说并非历史学家可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毕竟作过很多思考的那些人,即转向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哲学家。他远没有列举十八世纪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所有的历史学家、这个时代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辩证法家。不过他指出了他们中间最主要的人物,指出了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比其他人作过更多贡献的那些人物。他证明了,所有这些禀赋如此之高、知识如此丰富的人都陷入了种种矛盾而不能自拔,从这些矛盾中得出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读过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论》和《反杜林论》,并且——最主要的是——理解了它们,那么他本人也就会懂得上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一辩证法家的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有过怎样的意义。别尔托夫先生突出地论述了这种意义,同时对这些人和另一些人、第三种人和第四种人在这种场合的最根本的观点作了简要的说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36、837页)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发展史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对包括上述四种人在内的先进思想家的历史观的合法继承和合理变革,即这种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译者注

而且在这里,对我们说来要紧的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它的一个——的确最重要的——派别即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同道们的唯物主义上面。

这派唯物主义者同当时官方思想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些思想家引证他们未必清楚理解的笛卡尔的话,硬说人身上有某些天赋的即不依赖于经验而出现的观念。法国唯物主义者反驳这个观点时,老实说,只是阐述了洛克的学说,早在十七世纪末洛克就已经证明没有天赋观念(no innate principles)。不过法国唯物主义者¹在阐述他的学说时曾赋予它更彻底的面貌,在洛克这位有教养的英国自由派不愿涉及的地方详细加以发挥。法国唯物主义者是无惧无畏始终彻底的感觉主义者,就是说,他们把人的一切心理功能都看作感觉的变形。这里来审查他们的论据在这一或那一场合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来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是无益的。不言自明,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熟知的东西中许多是法国唯物主义者所不知道的;只要提一提霍尔巴赫的化学观点和物理学观点就够了,虽然他精通自己时代的自然知识。不过法国唯物主义者有一项无可争辩和无法替代的功绩,就是他们都从他们当时的科学的观点彻底地进行过思考,而这乃是能够要求和应当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毫不奇怪,我们时代的科学远远超过了上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而重要的是,这些哲学家的论敌们在对待当时科学的态度上已经是落后的人了。的确,哲学史家们通常把康德的观点跟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对立起来,要责备康德缺乏知识不用说是奇怪的。然而这种对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不难证明,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本质上都持同一观点,不过不同地运用了它,因而按照

他们在其影响下生活和思想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属性中的种种差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知道,习惯于轻信哲学史家的人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怪诞的。我们没有可能在这里用详细的论据证实它,但并不拒绝这样做,如果我们的论敌希望的话。

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都看作感觉的变形(sensations transformées)。从这个观点考察心理活动,意味着认为人的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觉都是周围环境对人发生影响的结果。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他们不知疲倦地、非常热烈地和十分坚决地宣称,人及其一切观点和感觉都是由他周围的环境造成的,也就是由第一,自然界,第二,社会所造成的。“L’homme est tout éducation”(人完全依赖于教育),——爱尔维修反复地说,他把“教育”一词理解为全部社会影响的总和。这个把人看作周围环境的结果的观点曾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革新要求的主要理论基础。实际上,如果人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如果人的性格的一切属性都应当归因于环境,那么人的种种缺点也应当归因于环境;所以,如果您想同人的缺点作斗争,您应当用适当的方式来改变周围环境,而且正是社会环境,因为自然界不会使人变恶或变善。让人们生活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下吧,即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时他们每个人自我保存的本能便不再促使他同别人作斗争;协调单个人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吧,这样德行(vertu)便会自动出现,正如失去支持的石头会自动落地一样。德行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社会关系的合理制度的培育。由于上一世纪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始作俑,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道德迄今为止被视为利己主义的道德。当他们说道德在他们那里整个

地转变为政治时，他们自己正确得多地给道德下了定义。

关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周围环境的结果的学说，往往使法国唯物主义者得出了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论。比如他们有时说，人的观点对他的行为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在社会中传播这些或那些观念，丝毫也不能改变社会往后的命运。下面我们会指明这种意见错在哪里，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的另一方面。

如果任何一个人的观念决定于他周围的环境，那么人类的观念在其历史发展中就为社会环境的发展、为社会关系的历史所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想描绘“人类理性进步”的图景，而且如果我们在这里不限于“怎么样？”（理性的历史运动究竟是怎样完成的？）这个问题，而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它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完成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从环境的历史，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入手。这样，研究的重心至少在最初时期就会转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方面来。法国唯物主义者紧紧地接近了这一任务，然而他们非但不能够解决它，甚至未能正确地提出来。

当他们谈到人类的历史发展时，他们忘记了自己对一般“人”的感觉主义观点，而像当时所有的“启蒙派”一样反复地说，意见支配世界（即人们的社会关系）（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①。这就是折磨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这个

^① “我把民族中广为流传的大量真理和谬误的结果称为意见；这结果制约着民族的判断、它的尊敬或厌恶、它的爱或恨、它的喜好和习惯、它的缺点和优点，一句话，——它的风尚。这个意见也就支配着世界”。参见秀厄（Suard）：《文学杂录》（*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第3卷，第400页。——作者原注

矛盾在它的拥护者的议论中分解为整整一系列次要的、派生的矛盾，就像钞票对换成辅币一样。

命题。人及其一切意见是环境的结果，而且主要是社会环境的结果。这是从洛克的基本命题：*no innate principles*——没有天赋观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反命题。环境及其一切属性是意见的结果。这是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命题：*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意见支配世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这个根本矛盾中产生了例如以下派生的矛盾。

命题。人认为那些对他有利的社会关系是好的；他认为那些对他有害的关系是坏的。人们的意见决定于他们的利益。秀厄说：“*L'opinion chez un peuple est toujours déterminée par un intérêt dominant*”(一个民族的意见，总是由该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所决定)^①。这甚至不是从洛克学说中得出的结论，这是简单地重复他的话：“没有天赋的道德观念……德行为人们所赞许，不是因为它是天赋予他们的，而是因为它对他们有利。善与恶……无非是快乐或痛苦，或者是使我们感到快乐或痛苦的东西。”^②

反命题。人们觉得这些关系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这些人们的意见的一般体系。用同一位秀厄的话说，任何民族“*ne veut, n'aime, n'approuve que ce qu'il croit être utile*”(“都只喜爱、拥护和认可他们认为有益的东西”)。所以一切归根结底又归结为意见

① 秀厄：《文学杂录》，第3卷，第401页。——作者原注

② 《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1卷，第3章；第2卷，第20、21、28章。——作者原注

支配世界。

命题。那些以为宗教道德——例如爱邻人的说教——总算局部地曾经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精神的人是大错特错的。这类说教，正如一般说来观念一样，是完全无力影响人们的。全部问题在于社会环境，在于社会关系。^①

反命题。历史经验昭示我们“que les opinions sacrées furent la source véritable des maux du genre humain”（“宗教的意见是人类灾难的真正来源”），而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一般地说意见支配世界，那么错误的意见就像凶残的暴君一样支配着世界。

要延长法国唯物主义者这类矛盾的清单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当代许多“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从他们那里把这些矛盾继承下来了。不过这是多此一举。最好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矛盾的一般性质。

矛盾跟矛盾不一样。当瓦·沃先生[指瓦西里·沃龙佐夫]在其《资本主义之命运》或《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中每一步都自

^① 这个命题在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中不止一次地重复着。爱尔维修也这样表示过，他说：“假定我散布了从中引出最令人厌恶的结论的最荒唐的意见；如果我丝毫没有改变法律，我也就不会对风尚作出丝毫改变。”(*De l'Homme*, Section VII, ch. IV. 即《论人》，第7篇第4章)长期生活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队伍中间的格里姆和跟唯物主义者作战的伏尔泰，在自己的《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中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一命题。“费尔内的主教”在其《无知的哲学家》(*Philosophe ignorant*)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曾经证明，从来还没有过任何一个哲学家影响过自己亲人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中是以习惯为指导，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指导。——作者原注

相矛盾时，^①他的逻辑上的罪过仅仅作为“人类的文献”才可能具有意义：将来俄国的著作史家在指出这些矛盾时应当研究为什么最无可怀疑也最显而易见的这些矛盾，许许多多读瓦·沃先生著作的人却看不出来这样一个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极为有意思的问题。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位著作家的矛盾像著名的无花果一样不育子嗣。有另一类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像瓦·沃先生的矛盾一样无可怀疑，它们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们不毒害人类的思想，不阻碍它的发展，而是推动它前进，而且有时推动得如此有力，以致按其后果说来比之最严谨的理论原来更有成效。对于这样的矛盾，可以用上黑格尔的一句话：“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int”（矛盾引导着前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诸种矛盾正是属于这一类。

让我们着重研究一下它们的根本矛盾：人们的意见决定于环境；环境决定于意见。对此不得不像康德关于自己的“二律背反”讲过的那样说道：命题和反命题都是同样正确的。实际上，毫无疑问，人们的意见决定于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同样无疑的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与他们的全部观点相矛盾的那种社会制度。他们会起来反对这种制度，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它。因此意见支配世界也是对的。然而两个本身都正确的命题怎么会互相矛盾呢？事情的解释很简单。它们之所以互相矛盾，只因为我们是从不正确的观点去考察它们。从这个观点看会觉得——而且一

^① 瓦·沃(瓦西里·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出版于1882年。其文集《根据土地统计资料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农民公社》出版于1892年。——俄文版编者注

定会觉得——如果命题正确,那么反命题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然而,一旦您找到了正确的观点,矛盾就会消失,那时使您踌躇不安的两个命题,每一个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原来,一个命题补充着,确切些说制约着另一个命题,而完全不是排斥它;如果这个命题不正确,那么您以前觉得似乎是它的对抗面的另一个命题也会不正确。怎么找到这个正确的观点呢?

举个例子。特别在十八世纪,人们常常说,任何特定民族的国家制度都是受这个民族的风俗所制约的。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当罗马人旧有的拥护共和制的风俗消失了的时候,共和制就让位于君主制。然而另一方面,同样常常有人断言,特定民族的风俗受其国家制度的制约。这也是不容任何怀疑的。实际上,例如在赫里奥加巴尔时代,罗马人从哪里得到共和制的风俗呢?帝国时代罗马人的风俗理应是旧的共和制风俗的某种对立物,不是明白得显而易见么?而如果是明显的,那么我们就得出一般的结论:国家制度为风俗所制约,风俗也为国家制度所制约。但这本来是矛盾的结论。也许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命题中的这一个或另一个命题是错误的。究竟是哪一个呢?不管怎样绞尽脑汁,您都找不出这一个或另一个命题中的错误;它们两者都是无可指摘的,因为每一个特定民族的风俗确实影响着它的国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风俗是国家制度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看,风俗受国家制度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国家制度的结果。出路在哪里呢?通常在这类问题上人们满足于发现相互作用:风俗影响宪法,宪法影响风俗,——一切都明如白昼,而不满足于这类明白性的人们就暴露出应受一切责备的片面性倾向。在我们这里,现在几乎我们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议论的。他们从相互作用的观点看待社会生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影响所有其余方面，反过来又受到其余所有方面的影响。只有这样的观点才不愧做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社会学家”，而如果谁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去追问社会发展某些更深刻的原因，那么他就没有看出社会生活复杂到什么程度。当法国启蒙派感到需要整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点，解决使他们烦恼的矛盾时，就倾向于这种观点。他们中间最有系统性的人（我们这里不去说卢梭，一般说来他跟启蒙思想家们很少有共同点）并未走得更远。比如孟德斯鸠在其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①中就持这种相互作用观点。而且这当然是正确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相互作用。遗憾的是由于下面这个简单的原因，这个正确的观点所解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即：这个观点对相互作用的诸力量的起源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如果国家制度本身以它给以影响的那些风俗为前提，那么显而易见，这些风俗就不应把自己最初的出现归因于国家制度。对于风俗也应该说同样的话；如果风俗早就以自己给予影响的那个国家制度为前提，那么明显的是，不是风俗创造了国家制度。为了摆脱这一混乱状态，我们应当找出这样一个历史因素，它既产生了特定民族的风俗，又产生了它的国家制度，从而也创造了它们相

^① 霍尔巴赫在其《自然政治》(*Politique naturelle*)中站在风俗和国家制度相互作用的观点上。不过因为他在那里不得不同实际问题打交道，所以这个观点使他陷入没有出路的窘境：为了改良风俗，应当完善国家制度，而为了改善国家制度，应当改善风俗。使霍尔巴赫走出这个窘境的是想象的、合乎所有启蒙思想家愿望的 *bon prince* (好皇帝)，他，作为 *deus ex machina* (奇迹创造者) [直译：出自机械的神；意译：急救神]，解决了矛盾，既改善了风俗，又改善了国家制度。——作者原注

互·作·用·的·可·能·性·本·身。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要寻找的正确观点,那时我们会毫无困难地解决使我们犹豫不521安的矛盾。

应用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上,这意思就是:当法国唯物主义者违背自己通常的历史观而说观念是虚无,因为环境是一切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他们宣布意见是任何特定社会环境存在的主要的基本的原因时,他们这个通常的历史观(意见支配世界)也是同样错误的。在意见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相互作用。然而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承认这个相互作用上,因为相互作用远远不会给我们讲清社会现象。为了理解人类的历史,就是说,在这个场合,一方面理解人类意见的历史和另一方面理解人类在其发展中经历过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当超越相互作用的观点,应当发现——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既决定社会环境的发展又决定意见的发展的那个因素。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恰恰就在于发现这个因素。

世·界·为·意·见·所·支·配。然而要知道,意见不是始终不变的。什么东西制约意见的变化呢?拉·莫·特·勒·瓦·耶还在十七世纪就回答过:“教育的普及”。这是意见统治世界的思想的最抽象、最肤浅的说法。十八世纪启蒙派牢牢地坚持了这个说法,有时用关于教育的命运——可惜总的说来不大可靠的令人忧郁的议论来补充它。然而在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士那里已经可以看出对这种观点感到不满的意识。爱尔维修说,知识的发展服从一定的规律,因此存在着决定知识发展的某些隐秘的、未知的因素。他作出极有意思的、至今尚未给予正确评价的用人类的物质需要来解释人

类的社会发展和智慧发展的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了，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然而它给那些愿意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事业继续下去的下一个世纪的思想家们，似乎留下了一份遗嘱。

第二章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①

“根据历史研究能够作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这就是：政府是民族性格最真实的原因；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毅力和脆弱，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教育或他们的无知，几乎任何时候都不是气候或特定人种属性的结果；自然界给一切人以一切，而政府则保存或消除它管辖下的人们那些原始时期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品质。”在意大利，无论气候方面还是人种方面都没有发生过变化（蛮族人的涌入对于意大利性质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界对一切时代的意大利人都是一样的；改变的只有政府，——而且这些变化总是先于民族性格的改变或者伴随着它们。”

西斯蒙第这样驳斥了将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完全从属于地理环境的学说。^② 他的反驳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确地理远远解释不了历史上的一切，正因为这后者是历史，即因为按西斯蒙第的说法，政府变了，而地理环境却依然未变。不过这是捎带的话；我们这里

^①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包括 1814—1830 年，即从路易十八登基到 1830 年 7 月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② 《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新版(巴黎)，第 1 卷引言，第 5—6 页。——作者原注

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西斯蒙第把地理环境的不变性同各民族历史命运的易变性对比时,将这些命运归之于一个基本因素:“归之于政府”,即归之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的性格完全决定于政府的性格。的确,西斯蒙第断然说出这个命题之后立即作了极重要的淡化:政治上的变更,他说,先于民族性格的种种变化,或者伴随着它们。由此得出,政府的性质有时取决于民族的性格。不过在这种场合,西斯蒙第的历史哲学碰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使法国启蒙思想家感到困惑的矛盾:特定民族的风俗依赖于他们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依赖于风俗。西斯蒙第也像启蒙派一样很少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他不得不依次地时而把二律背反的一项,时而把另一项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然而无论如何,一旦选定两项之一,正是选定认为民族的性格依赖于他们的政府,他就赋予“政府”概念过于宽泛的意义:在他那里“政府”概念囊括特定社会环境的所有一切属性、特定社会关系的一切特点。更准确些说,在他那里特定环境的所有一切属性都是政府的事情,都是政治制度的结果。这是十八世纪的观点。当法国唯物主义者想简单有力地表示自己关于周围环境对人有无限影响力的信念时,他们说:c'est la legislation qui fait tout(一切依赖于立法)。而当他们谈到立法时,他们指的几乎纯粹是政治的立法、国家制度。在著名的乔·巴·维科的著作中,有一篇小小的短文,题为“试论以罗马人的政治革命说明他们的

民法的法律体系”。^① 虽然这篇“试论”写于十八世纪初,不过其中表达的对民法与国家制度的关系的观点一直统治到法国复辟时代;启蒙派把一切都归于政治。

不过“立法者”的政治活动在任何场合都是自觉的活动,虽然显然并非总是合目的的活动。人的自觉活动依赖于他的“意见”。因此法国唯物主义者^②甚至在他们想高调表示环境万能的思想的那种场合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意见万能的思想。

西斯蒙第还站在十八世纪的观点上。^③ 较年轻的法国历史学家们已经持有另外的观点了。

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以及它那些使最“有教养的”思想家不知所措的意外事变,是对意见万能的思想最明显不过的驳斥。当时许多人对“理性”的力量完全失望了,而另外一些不为失望所动摇的人则开始更加转而接受环境万能的思想,转而研究环境发展的进程。就连对环境,在复辟时代人们也开始从新的观点来观

① 我们从法文译出这篇短文的标题,在这里赶忙指出,我们只是根据从短文的若干法文摘录知道这篇短文的。我们无法得到它的意大利原文,因为据我们所知,它只刊登在维科著作的一个版本中(1818年);1835年6卷本的米兰版中就没有它。不过在这个场合重要的不是维科怎样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是他给自己提出的正是什么样的任务。

顺便说说,这里我们要预防机灵的批评者们也许会急忙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责备:“你们不加区别地使用词语‘启蒙派’和‘唯物主义者’,——他们对我们说,——但是远不是所有的‘启蒙派’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中间许多人,比如伏尔泰就激烈地奋起反对过唯物主义者。”这是对的;不过另一方面,黑格尔早就说过,起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启蒙派本身只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作者原注

②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中曾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俄文版编者注

③ 还在1796年他就开始了意大利共和国史的写作。——作者原注

察了。伟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嘲笑了“立法者”和政治宪法，以致把特定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归属于作为基本因素的立法者和宪法，现在看来已经是奇怪的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把政治宪法看成是某种派生的东西，看成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基佐在其《法国史概论》(*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①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曾企图用某一社会的政治设施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状态、它的文明程度或种类。若是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弄清和理解它的政治设施，会明智些。设施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在设施影响下开始变化之前，先创造出设施；而且应当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人民政府本来应该是怎样的和本来能够是怎样的，而不是根据人民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社会、它的成分、依其社会地位为转移的各个个人的生活方式、各阶级的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l'état des personnes*)——这无疑是把希望知道各民族曾经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和希望知道曾经如何管理他们的政论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首要问题。”^②

525 这是和维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维科用政治革命解释民法的历史，基佐用公民日常生活即民法解释政治制度。不过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成分”上走得还要远些。用他的话说，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一切民族那里，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是跟土地关系密切联系的，因此研究他们的土地关系

① 该书第1版出版于1821年。——作者原注

② 《概论》(*Essais*)，第10版，巴黎，1860年，第73—74页。——作者原注

应当先于研究他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为了理解政治设施，应当研究社会中存在的各个不同阶层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当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① 基佐就是用这种观点研究法国最初两个王朝的历史的。在他那里，这个历史乃是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斗争史。在其英国革命史中他向前迈进了新的一步，把这一事件描述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这样就是默认，为了说明特定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要研究它的土地关系，而且要整个地研究它的全部财产关系。^②

这种对欧洲政治史的观点，当时远非基佐独有的必具特征。许多别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其中我们要指出奥古斯丹·梯叶里和米涅。

梯叶里在其《英国革命概观》(*Vues des révolutions d'Angleterre*)中把英国革命的历史描述为资产阶级同贵族的斗争。他谈到第一次革命时说：“凡是其祖先曾经征服英国的人都离

^① 《概论》，第10版，第75—76页。——作者原注

^② “在十七世纪英国，各宗教派别和各政党的斗争掩盖了一个社会问题，各个阶级争夺权力和影响的斗争。的确，在英国，这些阶级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里那样如此界线分明和如此互相敌视。人民没有忘记，势力强大的男爵们不仅为自身的自由而且为人民的自由斗争过。乡村的贵族和城市的资产者三百年来一起以英国村社的名义在国会开会。然而在最近一个世纪中，社会各阶级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治制度中却没有相应的变化……资产阶级、乡村贵族、当时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对社会事务的进程没有与他们的社会作用的重要意义相应的那种影响。他们成长了，但是地位并没有提高。于是在这个阶层中，同样在地位低于它的其他一些阶层中，出现了强烈的自尊精神，决心抓住头一个遇到的借口，强烈地表现自己。”参见《英国革命史论丛》(*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柏林，1850年版，第9—10页。比较同一作者关于第一次英国革命史的全部六卷作品和当时各社会活动家生平的概述。基佐在那里很少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作者原注

开了自己的城堡，投入国王的营垒，在那里占有符合其身份的地位。城市居民成群地走进了对立的营垒。当时可以说集合了两支军队：一支为了安逸和政权，另一支为了劳动和自由。所有游手好闲的人，无论他们出身如何，所有只图生活上享乐而不劳动的人，都站到国王的旗帜下，保卫跟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似的利益；而相反的，以前的征服者的后裔中间那些当时经营工业的人则归附于公会的党派。”^①

按照梯叶里的意见，当时的宗教运动只是实际的日常生活利益的反映。“战争从两方面看都是为现实利益进行的，其余一切都是外表或借口。保卫臣民的事业的人大部分是长老会信徒，就是说他们甚至在宗教上都不愿意有任何臣服。参加对立党派的人属于英国圣公会^②或天主教；这是因为甚至在宗教领域他们也企图取得权力和向人们征税。”梯叶里在这里从福克斯的《詹姆士第二统治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James the Second*)中引用了他下列的话：“对于一切宗教意见，辉格党人^③是用政治家的眼光看待的。甚至他们对教皇统治的仇视，与其说是由于对这个不得人

^① 《历史研究十年》(*Dix ans d'études historiques*)，参见《梯叶里全集》，第10版，第6卷，第66页。——作者原注

^② 英国圣公会教会是英国国教，是十六世纪国王政权为控制教会和加强专制国家而实行的改革的结果。

长老会派是英吉利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教的信徒，站在反对英国圣公会教会的立场上。他们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俄文版编者注

^③ 辉格党，英国政党，产生于1679—1682年，依靠上层金融界、资产阶级化的农业贵族和商业资本，在1688—1689年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到十九世纪中叶改组为自由党。——俄文版编者注

心的教派的迷信或所谓偶像崇拜,不如说是由于该教派企图在国家内建立专制政权。”

按照米涅的意见,“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通过各式各样的障碍,这个运动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就停下来,并让位于另一运动,这个运动开始时看不出来,只有当它成为最常见的现象时才为人所瞩目。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发展进程。当封建制度事实上还不存在时,在人们的需要中就已经存在了,这是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它实际上存在了,于是逐渐不再符合需要,因此最后也就终止了它的实际存在。还没有任何一次革命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①

米涅在其法国革命史中正是从各社会阶级的“需要”的观点来观察事变的。^② 这些阶级的斗争在他那里成为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因。自然,这种观点甚至在那美好的旧时代也不可能适合折衷论者的口味,那时他们的头脑要比现在做更多的工作。折衷论者责备新历史理论的拥护者为宿命论,为体系迷(esprit de Systeme)。就像在这些场合经常有的情况一样,折衷论者完全没有看出新理论真正薄弱的方面,反而用更大的精力攻击他们的显然是强有力的方面。不过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就少有兴趣。更有兴趣得更多的是这种情况:当时社会主义最光辉的代表之一的圣西门主

^① 《论圣·路易制度的封建主义以及论这位君主立法的影响》(*De la féodalité, des institutions de St. -Louis et de l'influence de la législation de ce prince*), 巴黎, 1822年版,第76—77页。——作者原注

^② 弗·奥·米涅(F. A. Mignet):《1789—1814年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 巴黎, 1824年版。有几种俄文版本。——俄文版编者注

义者巴扎尔捍卫了这些新观点。

巴扎尔不曾认为米涅关于法国革命的书是无可责难的。这本书的缺点在他看来主要是它把所描绘的事件说成是同“随着旧的社会制度的推翻理应有助于建立新制度的那长长一连串努力”没有任何联系的个别事实。不过书中也有不可怀疑的优点。“作者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说明各个政党相继地指引着革命，揭示这些政党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联系，指出正是哪些事变线索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在运动的前头，以及最后它们怎样消失。”折衷论者提出来指责新派历史学家们的那个“体系迷和宿命论”，按照巴扎尔的意见，有力地把基佐和米涅的著作同历史家—文学家（即只关心“文体”之美的历史家）的作品区分开来了，这些作品尽管为数众多，却不曾把历史科学从十八世纪向前推进一步。^①

如果有人问奥古斯丹·梯叶里、基佐或米涅，是特定民族的风俗创造它的国家制度，还是相反，它的国家制度创造它的风俗，他们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民族的风俗和它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多么巨大和多么明显，然而归根到底两者都应把自己的存在归因于深藏的第三因素：“人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他们的财产关系”。这样，十八世纪哲学家们所纠缠不清的矛盾似乎解决了，而且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承认，巴扎尔是对的，科学通过新历史观点代表们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矛盾只是十八世纪社会观点下述根

^①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B IV. *Producteur* (“历史论丛”, 载《生产者》第4部中)。——作者原注

本矛盾的个别场合：(1)人及其一切思想和感觉都是环境的结果；(2)环境是人的创造、他的“意见”的结果。能否说新历史观解决了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矛盾呢？试看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是怎样解释那个公民日常生活、那些财产关系的起源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唯有仔细研究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

人们的财产关系属于他们的法的关系的领域；所有权首先是法的制度。说应当在人们的财产关系中去寻找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等于说这把钥匙就在法的设施中。然而这些设施是从哪里来的呢？基佐说得非常正确：政治宪法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首先创造了宪法，随后才开始在宪法影响下改变形态。可是难道不能对财产关系也说同样的话么？难道财产关系在成为原因之前本身不是结果么？难道社会不是在受到财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前本来就该先创造这些关系么？对这些完全合理的问题，基佐的答案极其不能令人满意。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于历史舞台的诸民族那里，公民日常生活跟土地占有制处于密切的因果联系中^①：人对土地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在整个封建时代的流程中，一切社会设施 529
归根到底是受土地关系制约的。至于这些土地关系，那么用同一

^① 这么说，只有在近代诸民族那里么？这个限制之所以更加奇怪，是因为希腊的和罗马的著作家们已经看到自己国家的公民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同土地关系的紧密联系。不过这一限制并没有妨碍基佐把罗马帝国的崩溃同它的国家经济联系起来。参看他的第一篇《试论》：“Du régime municipal dans l’empire romain au V-m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论耶稣纪元 5 世纪时罗马帝国市政制度”）。——作者原注

个基佐的话说,它们“最初,在蛮族入侵后的早期”决定于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土地得到这种或那种性质,要看土地占有者强大到什么程度”^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最初,在蛮族入侵后的早期”,土地占有者或多或少程度的自由、或多或少程度的强大,由什么决定呢?由蛮族征服者的社会中原有的政治关系么?可是要知道,基佐已经向我们说过,政治关系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为了理解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时代中蛮族人的政治生活,按照我们这位作者的建议,我们本应研究他们的公民日常生活、他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社会中各阶级的关系等等;而这种研究又会把我们带回到人们的财产关系由什么决定、特定社会中存在的所有制形式由什么造成的问题。如果为了解释不同社会阶级的地位,我们开始援引它们的自由和强大的相对程度,那么显然我们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这不是答案,这是在新的形态下稍微详细地把问题重复一遍。

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在基佐的头脑中作为严谨而确切地提出的科学问题,甚至未必产生过。我们已经看到,不考虑这个问题,对他说来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他对这个问题作出的那些答复的紊乱不堪就证明他的表达是模糊不清的。在最后的分析中,基佐极端模糊地援引人的本性来解释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毫不奇怪,这位被新折衷主义者指责为观点过分系统的历史学家,例如

^① 即土地占有之具有这种或那种法的性质,换句话说,土地的占有同或大或小的依附程度的联系,视土地占有者的力量和自由而定。参见《试论》,第75页。——作者原注

在其关于文明史的著作^①中,本人原来是个大大的折衷派。

从各社会阶级“实际利益”的观点考察宗教教派和政治党派的斗争,并极其热烈地同情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的奥古斯丹·梯叶里,用征服来解释这些阶级和等级的起源。他关于现代各民族的阶级关系和等级关系说道:“这一切都是从征服时代开始的;这一切的根基都是征服”。他所指的纯粹是现代各民族。这个思想不论是在政论文章中,还是在其后来的学术著作中,他都不倦地以各种不同方式发挥着。然而且不说“征服”这个各民族间的政治行为使梯叶里回到了十八世纪的观点,这个观点用立法者即政权的活动解释全部社会生活,任何进行征服的事实必然要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征服的社会后果正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日耳曼蛮族入侵前,高卢就经历过罗马人的征服。这次征服的社会后果很不同于日耳曼人的征服所引起的社会后果。蒙古人之征服中国,其社会后果跟英国被诺曼人征服的社会后果很少相似。这类差别从何而来?说这些差别是由不同时期互相冲突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之不同决定的,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仍然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决定这个社会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援引任何先前的征服,都无异于在没有出路的循环圈内兜来兜去。不管列举多少次征服,您最后还得作出这样的必然结论,说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某个X、某个未知的因素,它不仅不为征服所制约,而是相反,它本身制约着征服的后果,甚至常常、也许永远制约着征服本身,它是各民族

530

^① 参见弗·比·吉·基佐(P. G. Guizot)的《欧洲文明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和《法国文明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俄文版编者注

冲突的根本原因。梯叶里在其《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中根据旧日的古代文献正是揭示出曾经引导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其争取独立的殊死斗争的那些动机。他们的一位公爵说：“不管有怎样的危险，我们都要斗争，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承认新的主人……而完全在于另外的东西。诺曼人的首领已经把我们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骑士和所有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已经为此承认自己是他的陪臣。如果这位诺曼公爵成为我们的国王，他们愿意享用这些赏赐的财物，而他则不得不把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妻女交给他们支配：这一切他早已答应过了。他们想毁灭的不仅是我们，而且是我们的后代，他们想从我们手上夺走我们祖先的土地”等等。反过来征服者威廉则对其左右说：“勇敢战斗吧，杀掉所有的人吧；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大家都会发财致富。我获得什么，你们大家都会获得什么，我占领什么，你们也会占领什么；如果我有土地，你们也会有土地”。^① 这里再明显不过的是，征服本身不是目的，“在征服之下”有某些“实际的”即经济的利益。试问，是什么使得这些利益获得它们当时具有的那种形态？为什么无论土著人还是征服者恰恰接受了封建的，而不是任何别的土地占有制？在这种场合“征服”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在同一位梯叶里《第三等级史》(*Histoire du tiers état*)^②中，以及在他关于法、英两国内部关系史的全部概述中，我们已经着到

^① 参见《征服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第1卷，巴黎，第296、300页。另见奥古斯丹·梯叶里：《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莫斯科，1900年版，第51、55页。——作者原注

^② 参看奥古斯丹·梯叶里：《试论第三等级产生和成功的历史》，载《梯叶里选集》，社会经济出版社1937年俄文版，第1—204页。——俄文版编者注

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历史运动的图景。只要了解一下这个图景，就足以明白把特定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归之于征服的观点是何等的不能令人满意：要知道这一发展同封建贵族即征服者及其后裔的利益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奥古斯丹·梯叶里处心积虑地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推翻了他本人对征服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①

在米涅那里有同样的混乱。他谈到土地占有制对政治形式的影响。然而土地占有制的形式依什么为转移，为什么会向这一或另一方面发展，这个道理米涅不知道。在他那里土地占有制的形式归根到底也是归之于征服。^②

他感到，在国际冲突的历史中，我们打交道的不是抽象的概念——“征服者”、“被征服者”，而是具有血肉之躯、有特定的权利和社会关系的人们，而且在这里，他的分析并不深入。他说：“当两个民族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互相混杂在一起时，他们就会失去自己弱的方面和相互传染自己强的方面。”^③

这不深刻，也不完全清楚。

直接面对着所提出的关于财产关系起源的问题，上述复辟时

532

① 有趣的是，圣西门主义者已经看到了梯叶里历史观的这个弱点。例如巴扎尔在上面引用的文章中指出，征服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比梯叶里设想的要小得多。“任何懂得人类发展规律的人都会看到，征服的作用完全是从属的”。然而在这个场合，梯叶里比巴扎尔更接近自己过去的导师圣西门的观点：在圣西门那里，十五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是从经济关系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的，而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则简单地解释为征服的产物。——作者原注

② 参看《论封建主义》(De la féodalité)，第 50 页。——作者原注

③ 《论封建主义》，第 212 页。——作者原注

代法国历史学家中间人人大概都会像基佐一样试图通过或多或少机智地援引“人的本性”来摆脱困境。

把“人的本性”看作解决法、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一切“棘手案件”的最高法庭的观点，十九世纪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启蒙派那里继承下来的。

如果人在他出世时并没有随身带来现成的一批天赋“实践观念”；如果善行之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而是因为，像洛克所断言的，它是有益的；如果社会利益原则像爱尔维修所说的那样是最高法则；如果凡是涉及人类相互关系的地方人都是衡量事物的标准；那么，十分自然地会得出结论说，人的本性便是我们应当据以判断利害、判断特定关系之合理或荒谬的那种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十八世纪启蒙派审议了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也审议了他们认为必需的那些改革。人的本性是他们跟反对他们的人进行争论的最主要的论据。在他们心目中这个论据的意义是何等的巨大，例如孔多塞的下述议论就有极好的供述：“正义和法的观念在一切天生就有感觉能力和获得观念的能力的生物那里，一定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它们将是相同的。”不错，有时人们会歪曲它们。“但是任何正确思维的人，道德上如同数学上一样，会不可避免地得出一定的观念。这些观念乃是从人们是感觉的和思维的生物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中作出的必然结论。”^①实际上法国启蒙派的社会观点当然不是从这个十分贫乏的真理中引

^①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观》(*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urque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第1—2卷, 巴黎, 1794年版)一书中发挥了这些思想, 普列汉诺夫在其他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引证了这本书。——俄文版编者注

申出来的,而是他们周围的环境提示给他们的。他们所说的“人”,其特点不仅仅在于具有感觉和思维的能力:他的“本性”要求特定的资产阶级制度(霍尔巴赫的著作,其中包含的正是后来由立法会议实现的那些要求);它规定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公民的财产关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①,以及诸如此类。启蒙派是通过特定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关系的棱镜来看人的本性的。不过他们并没有料到历史在他们眼前放置了某种棱镜;他们以为他们嘴里所说的正是终于得到人类有教养的代表们的理解和评价的“人的本性”。

并不是所有十八世纪著作家对人性都有同样的概念。有时他们对这个问题相互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然而他们全都同样坚信,只有正确理解这个本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现象的钥匙。

上面我们说过,法国启蒙派中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人类理性发展中的某种规律性。引导他们产生这种规律性思想的首先是著作史。他们问:“哪个民族不是先有诗人,然后才有思想家?”^②究竟用什么东西来说明这种先后顺序呢?启蒙派回答说,用社会需要,

^① [自由放任]诚然不是永远的。有时哲学家们以同一本性的名义建议“立法者缓和财产的不平等”。这是法国启蒙派为数众多的矛盾之一。不过对我们说来这里跟它没有关系。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抽象的“人的本性”在每个特定场合,都是用来证明这些或那些社会(而且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十分具体的意图的论据。——作者原注

^② 格里姆:《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1774年8月号。格里姆提出这个问题时只是重复着天主教修道院院长阿尔诺的思想,阿尔诺在法国科学院发表的演说中阐述了这个思想。——作者原注

社会需要甚至决定语言的发展。阿尔诺院长在我们刚才在注释中提到的演说中曾经证明：“说话的艺术，也和所有的艺术一样，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的产物”。^①社会的需要变化着，因而“艺术”发展的进程也在变化。然而又是什么决定社会的需要呢？社会的需要、组成社会的人们的需要，决定于人的本性。所以也就应当在这个本性中去寻找对智慧发展这一进程而非另一进程的解释。

为了起最高标准的作用，自然应当把人的本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启蒙派确实是这样看人的本性的，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上面引证的孔多塞的话中看出来。然而如果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那么怎么能够用它解释人类智慧发展或社会发展的进程呢？任何发展的这种进程是什么呢？是一系列的变化。可不可以用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来解释这些变化呢？变量之变是因为常量始终不变么？

534 启蒙派认识到，不是，而且为了摆脱困境，他们指出，常量本身在一定范围内是变化无常的。人经历不同的年龄阶段：童年、青年、成年等等。在这些不同年龄阶段中人的需要是不同的：“童年的人身上活跃着感觉、想象和记忆；他寻求的只是游戏，只需要歌谣和故事。接着开始激情的年龄；灵魂需要震荡和激动。后来思维能力发展了，理性发展了，这理性本身又需要练习，练习活动扩展到求知欲所能达到的一切方面。”

单个的人是这样发展的：这些过渡受其本性的制约；而且正是因为它们是在人的本性中，它们也就表现在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

^① 阿尔诺院长(F. Arnaud)：《1771年5月13日阿尔诺院长参加法国科学院会议时的演说》(Discours, prononce dans l'Academie francaise le 13 mai 1771 a la reception de M. l'abbe Arnaud)，巴黎，1771年。——俄文版编者注

中；它们、这些过渡，说明各民族始于史诗，而终于哲学。^①

容易看出，这类“说明”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只是给描述人类智慧发展的进程增添了一定的生动性（比喻总是更鲜明地突出被描述对象的属性）。同样容易看出，十八世纪思想家们作出这类说明时便回到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循环圈内：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实际上，一方面结果是人类的智慧发展，换言之，即人的本性的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说明，而另一方面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发展由人的本性的发展来说明。

这个矛盾，如我们看到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也没有排除掉：在他们那里，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态。^②

① 秀厄，前引书《文学通讯》，第383页。——作者原注

② 关于梯叶里等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发展中的意义，更详细的论述参看本书附录三。——译者注

第三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如果人的本性是不变的,以及如果知道了它的基本属性,便可以从中像数学那样地在道德和社会科学领域引申出可靠的原理,那就不难构想出这样的社会制度,它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它将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早就乐意着手研究完美的立法(*legislation parfaite*)这个题目。这些研究乃是启蒙文献中的空想成分^①。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全部心思都投入到了这种研究。

这个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赞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人类学观点。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也认为人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结果,^②而且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也陷入循环圈中,用人

^① 在爱尔维修《论人》(*De l'Homme*)一书中就有这种“完美立法”的详细方案。拿这个乌托邦跟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乌托邦对比一下,会是极为有意思和极为有教益的。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史家迄今为止都根本没有想到去作类似的对比。只拿哲学史家来说,顺便讲一句,他们以最不能容忍的方式轻视爱尔维修。甚至安详而温和的朗格,除了“肤浅的爱尔维修”之外没有为他找到别的特征。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比所有的人都更公允地对待了绝对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作者原注

^② “是的,人是由万能的社会或万能的教育造成的,教育这个词取其最广泛的意义,即不仅指学校的或书本的教育,还包括人们和事物、事变和环境给予我们的教育,教育对我们的影响从襁褓时就不会停止任何一分钟。”参见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中译本可参阅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二、三卷,第129页]。——作者原注

性的不变属性来解释环境的变化无常的属性。

本世纪前半期为数众多的所有乌托邦,都无非是企图用人的本性作最高标准来构想完善的立法。例如傅立叶拿分析人的情欲作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理性社会制度论纲》(*Outline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中从“关于人性的基本原则”(first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出发,并且断言,“理性的政府”应当首先“确定人的本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哲学建立在关于人性的新概念之上^①;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说,他们的导师所构想的社会组织乃是从人性的不变规律中得出的一系列无可争辩的结论。^②

自然,把人的本性看作最高标准的观点没有妨碍不同社会主义学派在确定这个本性的属性上相互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例如按照圣西门主义者的意见,“欧文的计划跟人性的种种性情相违到如此程度,以致这些计划现时(写于1825年)大概享有的那种声望,初看起来似乎是无法解释的事”。^③ 在傅立叶的论战性的小册子《应允联合和进步的两个宗派——圣西门和欧文的狡计和骗术》(*Pieges et charlatanisme des deux sects Saint-Simon et Owen, qui pronettent l'association et le progrès*)中,可以找到不少地方尖锐地指出,圣西门主义者的学说同人性的一切倾向相矛盾。现

① 参看《生产者》(*Le Producteur*),第1卷,巴黎,1825年版,序言。——作者原注

② “我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从人类天性的规律推导出来的社会组织作一个简明易懂的扼要陈述。”参见维·孔西得朗(V. Considérant):《社会命运》(*Destinée Sociale*),第1卷,第3版,宣言“最后,该是对以下一点取得一致的时候了:在创立法律之前,是否应该探问一下人的真正本性,以便使本身能够变化的法律同不变的和独立自主的本性协调起来呢?”参见《关于傅立叶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亨利·高尔塞著,巴黎,1844年版,第35页),作者写这本书是捍卫傅立叶主义。——作者原注

③ 《生产者》,第1卷,第139页。——作者原注

在,也像孔多塞时一样,在人性的定义上取得一致,比确定这个或那个几何图形,要困难得多。

就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人性观点而言,他们只是重复了十八世纪思想家的错误,——不过他们当时的整个社会科学都犯了这个过失^①。然而在他們那里可以看出从这个抽象概念的狭窄范围内挣脱出来并且依靠具体基础的有力的追求。在这方面圣西门的著作比其他人更加引人注目。

法国启蒙派最频繁地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系列或多或少凑巧造成的偶然事件^②,然而圣西门在历史中则首先寻求规律性。关于

^① 我们讲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要在经济学家身上也指出这一点,那是很轻而易举的。当经济学家捍卫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反对反动派和社会主义者时,他们正是把这个制度当作最符合人性的制度来捍卫的。寻找抽象“人口规律”的努力,不管这些努力是来自社会主义者阵营还是来自资产阶级阵营,都是同把“人的本性”看作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的观点紧密联系着的。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把与此相关的马尔萨斯学说同葛德文或注释约·斯·穆勒著作的作者*的学说这两方面加以对比就足够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反对他的人,都同样在寻求统一的所谓绝对的人口规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则不同:它知道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人口规律。不过这是后话了。——作者原注

* 约·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写了一系列的文字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49年俄文版,第251—334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在这方面,爱尔维修对孟德斯鸠提出的责备是极有特征意义的:“孟德斯鸠在其关于《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没有充分估计种种幸运的偶然事件在这个国家历史中的作用。他陷入了想对一切都作出解释的思想家最常犯的错误,陷入了忘记人的本性而给人民代表以不变的政治形态和划一的原则的书斋学者的错误。而事实上常常是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裁定领导着这些称为元老院的重要会议”。(参见《思想与沉思》,载《爱尔维修全集》,第3卷,巴黎,1818年版)读者,这是否使您想起现今在俄国时兴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呢?*请等一等,往后的叙述还会不止一次地指出,俄国“社会学”中原创的东西多么稀少。——作者原注

* “英雄与群氓”一词是米海洛夫斯基在他写于1882年的同一标题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此文的中译全文刊登在《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3—906页。]——俄文版编者注

人类社会的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如此严格的科学。我们应当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种种事实,以便在其中发现人类生活进步的规律。只有理解了过去的人才有能力预见未来。当圣西门这样地提出社会科学的任务时,他特别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历史上。他的观点是何等的新颖和广阔,可以从他的学生奥古斯丹·梯叶里能够在法国史研究中差不多实现了完整的革命这一点上看出来。圣西门坚持认为,基佐抄袭了他的观点。暂且摆下理论的所有权这个问题不谈,我们注意到,跟 538 与他同时的历史学专家比较起来,圣西门善于更深入地探究欧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因。比方,如果梯叶里、米涅、基佐,他们都曾指出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那么,极有说服力地而且首次阐明了这些关系在近代欧洲的历史的圣西门,就走得更远,他向自己提出问题:究竟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任何别的关系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按照他的意见,答案应当在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去找:“十五世纪以前,世俗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而且这曾是有好处的,因为贵族当时是最有能力的实业家。他们领导了农业劳动,而农业劳动当时是唯一的一种重要的实业活动。”^①[参阅《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第304页]对于究竟为什么实业的需要人类历史中有如此决定性的意义的问题,圣西门的回答是,因为生产是任何社会组织的目的。他认为生产具有

^① 《文学的、哲学的和经济的观点》(*Opinions littérai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 巴黎, 1825年版, 第144、145页; 又比较《实业家的政治问答》(*Catéchisme politique des industriels*)。——作者原注

这样的意义,以致把有益的跟生产的等同起来^①,并且断然声称,生产是政治和科学的目的。^②

看来这些观点的逻辑发展本应引导圣西门得出结论说,生产的规律也就是归根到底决定社会发展的那些规律,而且研究这些规律应当成为力求预见未来的思想家的任务。有些地方,他似乎在接近这个思想,然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而且也只是接近而已。

要生产就必须有劳动工具。这些工具不是自然界以现成的形态给予的,它们是人的发明。特定工具的发明,而且就连工具的简单使用,也都必须要求生产者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发展。因此“实业”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智慧发展的必然结果。看来意见、“教育”就在这里也是独自而排他地支配着世界。而且实业的重要作用搞得越清楚,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这个观点看来越是得到证实。圣西门比法国启蒙派还要彻底地坚持这个观点,因为他既然认为观念起源于感觉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更少有理由想起环境对人的影响。知识的发展在他那里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③。他力求发现这个发展的种种规律;例如他确立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个三阶段规律,正是后来奥古斯特·孔德极其成功地冒充为

① 有益的东西——这就是生产。——作者原注

② 政治……这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作者原注

③ 圣西门把唯心主义历史观推到极端。在他那里,不仅观念(“原则”)是社会关系的最后基础,而在诸观念中则让“科学的观念”即“世界的科学体系”起主要的作用,从科学的观念中产生宗教的观念,而宗教观念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这是同一时期也在德国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唯理智论,不过它在德国哲学家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形态。——作者原注

他本人的“发现”的规律。^① 不过就是这些规律在他那里归根到底也是用人性的属性来说明的。他说：“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社会理性的发展只能是个人理性发展在较大规模上的再现”。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每当他得以在个人发展中找到证实社会发展“规律”的合适的比拟时，他便认为自己的这些“规律”是彻底地弄清楚了并且被证实了。例如他断言，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缩减为零。^② 这个作用的逐渐的、然而不断的减少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之一。他究竟是怎样证明这一规律的呢？对它有利的主要理由是援引人们的个人发展：在初等学校，孩子必须绝对听从长者的话；在中等和高等学校，听话的成分逐渐退到次要的地位，以便彻底让位于成熟年龄的独立行动。不管谁来观察“权力”的历史，现在任何人都同意，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比喻都不是

① 李特列强烈地反对雨巴，当后者提到这个抄袭时，他认为圣西门只有“两阶段规律”，即神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弗林特引用李特列的这一意见时指出：“当他谈到圣西门著作的任何一篇都没有提到三阶段规律时，他是对的”。（《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nce and Germany*，爱丁堡和伦敦，1874年版，第158页）我们且从圣西门那里摘引以下的话来同这个见解作一对照：“哪个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不知道长期以来当人类理性尚未从纯粹神学观念过渡到实证观念以前，就在每一个科学部门使用了形而上学？凡是研究过科学史的人，谁不确信这种中间状态对于过渡是有用的和绝对必不可免的呢？”[*Du systeme industriel*，即《论实业体系》，可参看《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3页。]三阶段规律在圣西门心目中曾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致他准备用它来说明纯粹政治现象，比如法国革命时期“法律家[指西欧中世纪那些主张实行罗马法，反对教会法，支持王权的一批人]和形而上学家”的统治。弗林特如果仔细读读圣西门的著作，是不难“发现”这一点的。然而遗憾的是，写出人类思想的学术史比研究人类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要更容易得多。——作者原注

② 后来蒲鲁东从他那里借用并歪曲了这个思想，根据这个思想创立了自己的无政府理论。——作者原注

证明。任何特定不可分者的胚胎发育(个体发育)同这个不可分者所属的那个种的历史有许多类似:个体发育提供关于系统发育的许多重要指示。然而如果有位生物学家突发奇想,硬说应当在个体发育中寻找系统发育的最后解释,对于这位生物学家,我们现在怎么说呢?现代生物学的做法恰恰相反:它用种的历史来解释不可分者的胚胎史。

向人的本性求助,使得无论圣西门本人还是他的学生们所表述的一切社会发展“规律”都具有十分独特的面貌。

这种求助把他们带进了循环圈。——人类的历史由人类的本性来解释。可是我们从哪里得知人的本性呢?从历史中。——显然,在这个死胡同里兜圈子,无论对人的本性还是对人的历史都是无法理解的,而只能就某一社会现象领域提出某些个别的、或多或少深刻的见解。圣西门提出了好些精辟的、有时真正天才的见解,不过他要为“政治学”发现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一主要目的却始终没有达到。

圣西门说:“人类理性进步的最高规律支配一切,应当统治一切;人们在它面前只是一种工具……虽然这种力量(即这一规律)来自我们,我们同样不能避免它的影响或者使它受我们支配,就像不能随意地改变使地球绕日而行的力量的作用一样。我们仅仅能够在弄清楚这个规律要求我们遵循的那个运动以后,自觉地服从该规律(即服从我们真正的天意),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它。附带指出,这恰恰将是我们世纪的哲学意识注定要实现的前进步伐”。^①

^① 《组织者》(*L'organisateur*),第119页,构成《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20卷中《圣西门著作集》第4卷。——作者原注

总之,人类完全服从自己固有的智慧发展规律;甚至在他们想要避免这一规律的影响时他们也无法避免。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论点,而且为了明显起见,我们举三阶段规律为例。人类从神学思维走向形而上学思维,从形而上学思维走向实证思维。这种规律像力学规律的作用那样发生影响。 541

很可能这是对的,可是试问,怎样理解人类即使愿意也无法改变这一规律的作用这个思想呢?这是否意味着,即使人类还在神学时代末期就已经意识到实证思维的优点,他们也无法避免形而上学呢?显然不是的;然而如果不是,那么同样明显的是,正是在圣西门对智慧发展规律性的观点中有某种模糊的地方。这种模糊之处究竟在哪里呢?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它就在于把规律同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愿望对立起来。在人类身上一旦出现类似的愿望,它本身便成为人类智慧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于是规律就应当包括这个事实,而不应跟它发生冲突。当我们容许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时,我们就还没有弄清规律概念本身,于是我们一定会陷入两个极端之一:或者我们放弃规律性的观点而站在合乎愿望的东西的观点上,或者从我们的视野内完全忽略合乎愿望的东西——更正确些说,特定时代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从而使规律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使它变为某种宿命。在圣西门那里,以及一般说来在空想主义者那里,当他们说到规律性的时候,“规律”正是这样的宿命。顺便指出,当俄国的“主观社会学家”奋起捍卫“个性”、“理想”和其他美好东西时,他们正是同关于“事物自然进程”的空想的、模糊的、不完全的、因而站不住脚的学说作战。我国的社会学家甚至似乎没有听说过关于社会历史过程规律

性的现代科学概念是什么。

规律性概念中空想主义的模糊之处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空想主义者们（当然并不只有他们）所持有的那个人类发展观的根本缺点。人类的历史由人的本性来解释。既然有了这个本性，也就有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像黑格尔会说的，那样有了全部历史本身（an sich）。人之不能干预自己发展的进程，就像他不能不再为人一样。发展的规律是作为天意出现的。

542 这是历史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乃是把知识的成就，因而把人的自觉活动视为历史运动基本动因的那种学说的结果。

不过让我们往下讲。

如果理解历史的钥匙是由研究人的本性提供的，那么对我说来重要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实际研究，不如说正是对这个本性的正确理解。既然我掌握了正确的人性观，我就会失去对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几乎一切的兴趣，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社会生活应当如何符合人的本性上面。历史上的宿命论丝毫无碍于实践上对现实的空想主义态度。相反，它是这种态度的帮手，因为它割断了科学研究的线索。一般说来宿命论常常是跟最极端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的。宿命论经常把自己的情绪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正是对于宿命论者，可以用一位诗人的话说

他们所谓的历史精神

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的精神。

圣西门主义者断言，他人的劳动落入剥削者手中的那份社会产品在逐渐地减少。这种减少在他们心目中是人类经济发展最重

要的规律。作为证明，他们援引了利息和地租水平的逐渐降低。如果他们在这种场合坚持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本该发现他们所指出现象的经济原因，而且为此他们本来需要仔细地研究产品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要是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也许就会看到，利息水平或者甚至地租水平的降低（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还完全证明不了私有者的份额的减少。那时他们的经济“规律”自然就获得完全不同的表述。不过他们顾不到这一点。深信来自人的本性的神秘规律的万能，使他们的思想工作完全集中到另外的方面。迄今为止历史上占优势的倾向未来只会加强，他们说：剥削者的份额的不断减少，必然以这一份额的完全消失，即剥削阶级本身的消失而告终。预见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应当构想出社会制度的新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已经完全不会有剥削者的地位。根据人性的另一些属性，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当是如此这般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很快就会制订出来：关于社会现象规律性的极其重要的科学思想，就靠两个空想主义药方来解决……

类似的药方被当时的空想主义者视为思想家最重要的任务。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原理本身并不重要。它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从中引出的那些实际结论。让·巴·萨伊跟李嘉图争论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什么决定。很可能，从专家的观点看来这是重要的问题。不过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价值应当由什么决定，而这一点，遗憾的是专家们并没有想到。我们替专家们想想吧。人的本性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正是那个东西。一旦我们开始听从人性的声音，我们便会惊讶地看到，专家们心目中的重要争论，其实并不很重要。可以同意萨伊，因为从他的原理中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人

性的要求。也可以同意李嘉图，因为他的观点一旦正确加以解释和补充，也只会加强这些要求的分量。因此空想主义思想放肆地干预他们始终不理解其意义的那些科学争论。这样，有教养而且有很高天赋的人们，例如安凡丹，就解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上有争议的诸问题。

安凡丹写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不能算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但也不能予以忽视，就像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史家和社会主义史家的做法那样。安凡丹的经济著作，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是有其意义的。然而他对经济学家们的争论抱怎样的态度，下面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

大家知道，马尔萨斯固执地和（顺便说说）很不成功地反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安凡丹以为，真理其实在前者而不在后者一边。然而他并不反驳李嘉图的理论：他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关于地租的性质以及关于私有者从劳动者那里夺取的那部分东西的实际的相对的提高或降低的议论，本应归结为一个问题：为了社会的利益应当存在于脱离经营的生产者（安凡丹这样称呼土地占有者）和积极的生产者（即农场主）之间的那些关系的性质是怎样的？当这些关系成为已知时，就足以弄清导致这些关系的建立的那些手段；在这里应当加以考虑的还有当时的社会状况；而其他任何问题（即除上面提出的问题之外）毕竟都是次要的，并且只会妨碍应当有助于实际使用上述手段的那些组合。”^①

^① 参见《论动产和不动产的租金之逐步降低》（*Considérations sur la baisse progressive du loyer des objets mobiliers et immobiliers*），载《生产者》，第1卷，第564页。——作者原注

安凡丹宁愿称之为实业哲学史的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任务，在于同时说明不同生产者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生产者阶级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这些说明应当建立在对实业阶级历史发展的研究之上，而且这种研究的基础应当是“关于人类的新概念”，换言之，即关于人的本性的新概念。^①

马尔萨斯之反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同他反驳很著名的——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劳动价值论紧密联系着的。安凡丹很少深入争论的实质，就急急忙忙用对李嘉图地租学说的空想主义补充（正如我们这里现在所说的——修正）来解决争论。他说：“如果我们好好地理解这个理论，那么看来似乎应该给它补充说……劳动者为了使某些人尽情休息以及为了得到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而给这些人付款（即以地租形式支付）”。

安凡丹这里所谓劳动者同样是，而且甚至主要是指农场主——企业家。他关于他们对土地占有者的关系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他的“修正”中，一切只归结为更尖锐地表述李嘉图也很好知道的⁵⁴⁵现象。况且这个尖锐的表述（亚当·斯密有时表述得还更尖锐）不仅既解决不了价值问题，也解决不了地租问题，而是从安凡丹的视野中把这些问题完全排除了。对他说来这些问题也果真不存在：使他感兴趣的唯有未来的社会制度；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使读者相信，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应存在。安凡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这类实际问题，那么关于价值的全部学术争论

^① 特别参阅论文《论进步与政治经济学》（*considerations sur les progres de l'conomie politique*），载《生产者》，第4卷。——作者原注

都会是单纯的文字之争。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所谓主观方法。

空想主义者任何地方都没有直接介绍过这个“方法”。不过例如安凡丹曾经指责马尔萨斯(!)过分客观一事就证明他们是很喜爱这个方法的。客观性似乎是这位著作家的主要缺点。凡是熟悉马尔萨斯著作的人都知道,正是(比如李嘉图所固有的)那个客观性确实同这位《人口论》的作者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知道安凡丹是否读过马尔萨斯的原著(一切都使人不得不认为,比如李嘉图的观点,安凡丹只是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们从马尔萨斯原著中所作的摘录才知道的),然而即使读过,他未必会根据李嘉图观点的真正优点来评价它们,他未必能够指出,现实是同马尔萨斯矛盾的。安凡丹忙于考虑的问题是事情本来应当如何,他既无时间也无兴致仔细地深入思考实际情况是什么。他情愿对任何一个诽谤者^①说:“您是对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正是像您描述的那样,不过您太客观了;请您从人道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时您就会看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应当重新加以改造”。

空想主义的华而不实的作风,不得不向任何或多或少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制度辩护士作理论上的让步。空想主义者为了冲淡他心目中产生的自身虚弱无力的意识,在安慰自己的同时指责自己的对手有客观性:据他说,即令您比我有学问,可是我更善良。空想主义者不是去驳斥有学问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他只是给他们的理论作“注释”和“修正”。

^① 诽谤者、告密者,指古代雅典职业的爱打官司的人和告密者。——俄文版编者注

这类对社会科学完全空想的态度,在“主观”社会学家们的著作的每一页上,对于用心的读者都是很显眼的。对此我们还得有许多话要讲。暂时且举两个鲜明的例子。

1871年出版了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学位论文:《论在最新补充和解释下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序言中作者善意地、然而只是附带地谈到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经济科学中的斯密派和实证主义》(该文还在1864年就刊登在《现代人》上)。对于这一顺便的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我愉快地回想起,在《论尤·哈·茹科夫斯基的著述活动》一文中,我很公正地评价了我们这位经济学家的功绩。我正是指出了,茹科夫斯基先生早就说过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史家们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有正确解决科学诸基本问题的一切材料,这些材料被现代的书生气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歪曲了。不过我当时便已指出,‘头一个取得’这个后来在卡尔·马克思强有力的双手中变得如此富有成果的思想的权利的光荣,在俄国著作中不属于茹科夫斯基先生,而属于另一位著作家,即论文《经济活动和立法》(《现代人》,1859年)、《资本与劳动》(1860年)、穆勒著作注释等等的作者。^①除了按时间顺序外,这位著作家和茹科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区别可能显著地这样表现着。如果说,比如,茹科夫斯基先生详细地和严格科学地,甚至有些学究气地证明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一切价值由劳动产生,那么,上述诸文的作者并没有忽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是主要强调从其中得出的逻辑的实践的结论:作为由劳动产生的和测量的一切价值都应

^① 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文版编者注

该属于劳动。”^①为了了解穆勒著作注释的这位作者完全没有理解后来在“马克思强有力的双手”上获得了如此辉煌发展的那个价值理论,并不需要很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而且任何一个知道社会主义史的人都懂得,为什么这位作者,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劝人信服的话相反,正是“忽视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是醉心于考虑在设施良好的社会中产品应该以怎样的标准进行交换。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是从空想主义者的观点看待经济问题的。这在他的时代是完全自然的。然而很奇怪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都未能同这种观点割断联系(而且后来也没有割断联系,否则在自己著作的新版中他就会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时甚至从通俗著作中都很容易领会对事物的正确观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理解“穆勒著作注释”作者关于价值说过的话。这是由于他也“忽视了事情的理论方面”,而醉心于“从其中得出的逻辑的实践的结论”,即醉心于考虑“任何价值都应当属于劳动”。我们已经知道, 547 醉心于实践结论对空想主义者的理论论述的影响始终是有害的。而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搞糊涂的“结论”是何等的陈旧,下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空想主义者^②早已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作出了这个“结论”。不过作为空想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对空想的历史也不感兴趣。

另一个例子。瓦·沃先生 1882 年这样说明自己《资本主义在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 2 卷,圣彼得堡,1888 年俄文第 2 版,第 239—240 页。——作者原注

^②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罗伯特·欧文以及他的学生汤普逊、托马斯·霍吉斯金、约翰·格雷等人。——俄文版编者注

俄国的命运》一书的问世：

“本论文集是由各家杂志上刊登的文章编成的。我们以单行本出版这些文章，只作了外在的统一，稍微不同地编排了材料，删除了重复（远非全部；在瓦·沃先生的书中仍然很多重复——普列汉诺夫）。文章的内容仍然是以前的；新的事实和论据引用得不多；而且如果我们仍然决定再次地把自己的著作提请读者注意，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以全副武装同时攻击读者的世界观，迫使知识分子去注意所提出的问题（图景是：瓦·沃先生‘以全副武装’攻击读者的世界观，而受到恐吓的知识分子就投降了，转变了注意力，等等。——普列汉诺夫），召请我国有学问的和宣过誓的、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论家们去研究俄国经济发展规律这个国家生活其余一切表现的基础。没有这个规律的知识就不可能有系统的和成功的社会活动，而我们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对最近未来俄国的观念未必能称为规律（观念……能够称为规律？！——普列汉诺夫），而且未必能够给实践的世界观提供牢固的基础。”（序言，第1页）

1893年，同一位瓦·沃先生已经成功地成了民粹主义“宣过誓的”、虽然——可惜！——还完全不是“有学问的”政论家，已经远远地离开经济发展规律乃是“国家生活其余一切表现的基础”的思想。现在他“以全副武装”攻击有这种“观点”的人们的“世界观”，现在他想，在这个“观点中历史过程不是人产生的东西，变成一种产生的力量而人则变成历史过程顺从的工具”^①；现在他认为

^① 《我们的方向》，圣彼得堡，1893年俄文版，第138页。——作者原注

社会关系是“人的精神世界派生的”^①，并且以极端怀疑的态度对待关于社会现象和规律性的学说，把它跟“历史学教授尼·伊·卡列也夫科学的历史哲学”对立起来（懂了吧，诸位，那就服从吧，因为教授先生与我们同在！）。^②

怎样一个借神灵帮助的转变啊！什么引起这种转变呢？原来是这样的。1882年瓦·沃先生找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这一规律只是瓦·沃先生他自己的“理想”的科学表现。他甚至确信他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即俄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的“规律”。不过此后他不是白白地生活了整整十一年。他本应，虽然不是公开地，认识到根本无法实现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在发展。结果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成了最无可争议的“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于是瓦·沃先生急急忙忙地彻底颠倒了自已的“历史哲学”：寻找“规律”的他开始说类似的寻找完全是浪费时间。俄国空想主义者倒是愿意依靠“规律”；不过只要“规律”跟不仅因为恐惧而且因为良心他应予支持的那个“理想”背道而驰，他立刻就会摒弃“规律”，就像彼得摒弃耶稣一样。不过瓦·沃先生就是现在也并非永远同“规律”闹翻了。“使观点系统化的天然的企图应该使俄国知识分子去建立适合我国发展的需要和条件的经济关系的进化的独立方案；而且这项工作无疑将在最近的将来完成。”（《我们的方向》，第114页）俄国知识分子，在“建立”自己的“独立方案”时，显然将醉心于瓦·沃先生在《资本主义之命运》中所热衷的那

① 《我们的方向》，圣彼得堡，1893年俄文版，第9、13、140页和其他各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143页以下。——作者原注

项工作,即寻找“规律”。当方案找到时,——而瓦·沃先生对天起誓,在最近的将来会找到方案,——我们的作者就会像福音书上的父亲跟自己的浪子和解同样郑重激昂地跟规律性和解。好逗趣的人!不用说,甚至当瓦·沃先生还在寻找“规律”的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弄清楚这个词应用于社会现象时能够具有什么意义。他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空想主义者看待“规律”一样看待“规律”。只有这才能解释他之希望发现一个国家即俄国的发展规律。然而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思想方式栽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头上呢?如果他以为他们在自己关于社会现象规律性的概念上没有超过空想主义者,他就错了。而他所有反对他们的那些意见都表明他就是这样想的。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历史教授”卡列也夫先生也这么想;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这么想。他们起初把对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空想观点栽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然后用多少可疑的胜利来打倒这个观点。真是同风车搏斗!

顺便谈谈这位有学问的“历史教授”。请看他用怎样的话来介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观观点:“如果在历史哲学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进步问题,那么这就可以成功地选择科学的极重要的内容、科学的种种事实以及这些事实的分类。不过事实不可能臆造,也不可能放在凭空虚构的关系中(这么说来,无论选择时,无论分类中都不该有任何任意的行为啰?这么说来,分类应该完全符合客观现实啰?对的!听吧!——普列汉诺夫),而且从一定的观点来描述历史的进程,在描述的忠实性意义上仍然是客观的。这里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另一类的主观主义:创造性的综合,可以造成完整的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与之相

比较的将是现实的历史,即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这种描述是从人类生活中重大变动的观点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归纳的。根据这种比较产生对历史过程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同样不应该是任意的。必须证明,被归纳的种种事实,像它们给予我们的那样,真正具有我们根据某种观点提出来,采取某种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的赋予它们的那种意义。”

在谢德林那里,“资望高的莫斯科的历史学家”夸耀自己的客观性时说:雅罗斯拉夫打了伊兹雅斯拉夫,还是伊兹雅斯拉夫打了雅罗斯拉夫,对我说来全都一样。给自己创造了“完整的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的卡列也夫先生同这类客观性是格格不入的。假定他同情雅罗斯拉夫,但毕竟不会允许自己把他的失败说成他的胜利(“事实不可能臆造”,不过他仍然有珍贵的权利,对雅罗斯拉夫的悲惨命运一洒同情之泪,不能不诅咒他的胜利者伊兹雅斯拉夫)。对这种“主观主义”作出任何反驳都是困难的。不过卡列也夫先生徒然用这种平淡无味因而没有危害的形态来描绘这种主观主义。这样描绘它,意味着不理解它的真正本性,将这种本性淹没在一大片多愁善感的空泛辞藻中,实际上“主观”思想家们的特点是,在他们那里,“应有事物的世界、真理和正义事物的世界”,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没有任何联系:在这里是“应有事物”,在那里是“现实的东西”,而且这两个领域是以整个一条鸿沟互相隔绝着。这条鸿沟在二元论者那里,把物质世界同精神世界分隔开了。^① 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其

^① 用米海洛夫斯基的说法,二元论的表现是肯定存在着两个真实者,即“真理——真实者”(现实的东西)和“正义——真实者”(应有的东西)。——俄文版编者注

其中之一就在于建立一座桥以通过这道表面上无底的鸿沟。当我们没有建好这座桥时,直到现在我们都必然对现实的东西闭上眼睛,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应有的东西”上(例如像圣西门主义者这样做的那样),因此自然只会延缓这个“应有事物”的实现,因为要获得对这个“应有事物”的正确观点变得更加困难了。

我们已经知道,和十八世纪启蒙派相反,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把任何特定国家的政治设施都看成该国公民日常生活的结果。这一新观点当时传播和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致应用于实际问题时达到了奇怪的、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无法理解的极端。例如让·巴·萨伊断言,政治问题不应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因为甚至在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下国民经济同样可以很好地发展。圣西门以赞扬的口吻提到萨伊的这个思想,同时的确给它注进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内容。除了极少数例外,十九世纪所有空想主义者都同意对“政治”的这种观点。

在理论上这个观点有两方面的错误。第一,抱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社会生活中正如我们同过程而不是同个别现象打交道的一切地方那样,结果反过来会成为原因,而原因却原来是结果;简言之,他们在这里很不合时宜地抛弃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的分析同样不合时宜地为之所局限的那同一个相互作用观点;第二,如果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结果,那么无法理解的是极其不同的结果(性质完全相反的政治设施)怎么可能由同一个原因即相同的“财富”状况所引起。显然,关于国家的政治设施同它的经济状况的因果联系的概念本身,在这里还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实际上,要指出在所有空想主义者那里这个概念是多么模糊,并不困难。

在实际上,这种模糊性本身导致了两类后果。一方面如此大谈劳动组织的空想主义者喜欢时而重复“自由,放任”这个十八世纪的古老格言。例如认为实业组织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任务的圣西门说:“实业需要尽可能少地对它进行控制”。^①另一方面空想主义者——同样有某些属于较后时期的例外——对待当前的政治,对待今天的政治问题,是完全漠不关心的。

政治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结果始终是结果,不会反过来变成原因。由此得出几乎直接的结论:“政治”不能成为实现社会经济“理想”的手段。因此空想主义者厌恶政治的心理就容易明白了。然而他们究竟指靠什么来实现其社会改造计划的事业呢?他们实际期望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一切与虚无。说一切是指这样的意思,即他们不加区别地期待来自各个最对立方面的援助。虚无的意思是他们的全部希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空想主义者自以为是异常实际的人物。他们痛恨“教条主义者”^②,而且他们把自己所有最轰动一时的原则都毫不犹豫地当作祭品贡献给自己的“固执的观念”。他们既非自由派,也非保守派,既非君主派,也非共和派;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君主派也好,共和派也好,只要能实现自己“实际的”、而且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异

^① 十八世纪启蒙派完全是同样自相矛盾的,不过他们的矛盾表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国家不进行干涉,然而有时又要求立法者制订微不足道的规章条例。启蒙派也不清楚“政治”(他们认为是原因)和经济(他们认为是结果)的联系。——作者原注

^② “教条主义者”,指在复辟时代法国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团体。这些“教条主义者”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凶恶敌人。他们否定革命原则本身以及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承认新的公民秩序,即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俄文版编者注

常实际的计划，他们都不加区别地准备与之一道行进。老一代空想主义者中间，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傅立叶。他像果戈里的康斯坦如格罗^①那样，企图把一切废物都利用起来。他时而拿高利贷者们的资本在未来社会中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息的前景诱惑他们；时而向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呼吁，用未来有极好的甜瓜和菜蓟来博取他们的好感；时而使路易·菲力浦相信，现在受到世袭亲王轻视的奥尔良王室的公主，在新社会制度下求婚者会多得应付不过来。他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呜呼！然而无论高利贷者，还是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或者“皇帝—公民”，对傅立叶那个似乎最令人信服的好处，都是正所谓充耳不闻，丝毫不加理睬。他的实际性原来是预先就注定要失败的、对幸运的偶然性的毫无乐趣的追逐。

十八世纪启蒙派早已卖力地从事幸运的偶然性的追逐了。正是由于指望这种偶然性，他们才不择手段地企图跟当时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立法者”和贵族拉关系。通常认为，一个人既然对自己说，意见支配世界，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沮丧：理性终归会胜利。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理性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胜利呢？启蒙派说，社会生活中一切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立法者”。因此他们就去笼络立法者。不过同一些启蒙派清楚地懂得，人的性格和观点依赖于教育，而且一般说来，教育没有使立法者预先就具备接受启蒙学说的倾向。因此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对立法者的指望不大。剩下来只有靠幸运的偶然性了。试设想，您这里

^① 康斯坦如格罗，果戈里小说《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俄文版编者注

有一个大箱子,箱子里有许多黑色球和两三只白球。您一个一个地把球拿出来。在每一个单个的场合,您取出白球的机会比取黑球要少得多。不过如果重复操作足够次数,最后您也就会取出白球。对“立法者”也是如此。在每一个单个的场合,极其可能的是立法者要反对“哲学家”,不过最终还是会出现同哲学家们意见一致的立法者。这个立法者会实现理性所指示的一切。比方爱尔维修就一字不差地这样议论过^①。表面上给人的自由划出如此广阔地盘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意见支配世界”),实际上把它看成偶然性的玩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观点本质上很不乐观的道理。

例如,我们不知道比十九世纪末空想主义者即俄国民粹派和主观社会学家的观点更不乐观的任何观点。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拯救村社以及和村社一起一般地拯救农民的现成方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进步公式”。然而,唉!生活依自己的进程进行,并不理会他们的公式,这些公式没有留下任何别的路,也只有在抽象、幻想和逻辑结论领域中为自己开辟自己的不依赖于生活的道路。这里我们听一听例如主观学派的阿喀琉斯^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

“工人问题在欧洲是革命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它要求把劳动条

^① “在或多或少遥远的未来,圣贤们说,一切可能性都必定实现:凭什么要对人类未来的幸福感到绝望呢?”[参阅《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33—534页。]——作者原注

^② 阿喀琉斯(Achilleus),荷马《伊利昂纪》中围攻特洛伊人最勇敢的英雄之一。他的母亲忒提斯女神希望他长生不老,把他倒浸在冥河的圣水中,只有忒提斯抓着的脚踵没有碰到水,因而该处最易受伤。后来阿喀琉斯因脚踵被帕里斯的箭射中而死。因此产生“阿喀琉斯的脚踵”一说,意为“致命的弱点”。——译者注

件(?)转交到工作者的手中,剥夺现在的私有者。工人问题在俄国是保守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只要求把劳动条件保存在工作者的手中,保障现在的私有者他们的财产。在我们这里,在彼得堡近郊……在布满工厂、制造厂、修理厂、别墅的地区,存在着乡村,乡村的居民靠自己的土地生活,烧自己的林木,吃自己的面包,穿着用自己的绵羊的毛自己做成的厚呢上衣和皮袄。结实地为他们保障自己的这个东西吧,俄国的工人问题也就解决了。而为了这个目的可以付出一切,如果好好地理解结实保障的意义的話。人们说:不能永远停留在木犁和三区轮作制经济状态上,停留在缝制厚呢上衣和皮袄的古老方式上。不能。摆脱这一困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实践观点所赞同的,很简单,而且方便:提高税率,解散村社,对,也许这足够使工业像英国工业一样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不过工业侵蚀工人,剥削他。还有另一条路,这条路自然更困难得多,然而问题容易解决还不等于正确解决。另一条路就是发展现实已经存在于不过是极其粗陋的、原始的形态中的那些劳动和所有制的关系。显然,没有广泛的国家干预,这个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国家干预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从立法上巩固村社。”^①

在尘世上,
给自由的心灵,
准备了两条道路。
衡量一下自豪的力量,
衡量一下坚定的意志,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俄文第2版,第102—103页。——作者原注

再选择你想走的道路吧！^①

我们觉得，我们这位著者的一切议论强烈地散发出甜瓜和菜蓟的气味。而且嗅觉大概不会欺骗我们。在涉及甜瓜和菜蓟的事情上傅立叶犯了什么过错呢？过错是醉心于“主观社会学”。客观社会学者会问自己：我描绘的图景有没有任何可能吸引甜瓜和菜蓟的爱好者？然后他会问自己：瓜蓟的爱好者能否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特定进程？毫无疑问，他会对自己否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因此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同那些“爱好者”谈话。不过这样做的乃是客观社会学者，即根据社会发展特定规律性进程建立自己全部计划的人。而主观社会学者则以“合乎愿望的东西”的名义赶走“规律性”，因而对他说来没有留下别的出路，只有指望偶然性了。于是就用棍棒去射击罪恶，——这就是善良的主观社会学者能够依靠的唯一可以慰藉的意图了。

用棍棒来射击罪恶。然而要知道棍棒有两头，不明白的是用棍棒的哪一头来射击。我们的民粹派和(如果可以这么说)主观主义者已经试用过大量的棍棒(甚至在村社土地占有制下便于征收欠缴税款的想法有时就以有魔法的棍棒角色出现过)。在绝大多数场合，棍棒是完全不能用作火枪的，而当偶然发射出去时，那么子弹就落到了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自己的头上。我们回忆一下农民银行。为了巩固“基础”，不是曾对它寄予了何等的希望么！在农民银行开业时，民粹派先生们是何等地兴高采烈，结果又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第4部第4章。[该书中译本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37页。]——俄文版编者注

怎样呢？棍棒恰恰射中了兴高采烈的人们；现在他们自己承认，农民银行^①——在任何场合都是很有益的设施——只是使“基础”瓦解；而这种承认等于认识到兴高采烈的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流程内——曾经也是说空话的人。^②

——不过要知道银行之瓦解基础只是因为银行的章程和实践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的观念完整地得到实行，那么结果就完全是另一样了……

——第一，绝非另一样：银行在任何场合都会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货币经济一定会破坏“基础”，而第二，当我们听到这无数的“如果”时，我们全都不知为什么感觉到我们窗下叫卖小贩喊道：“看哪，顶呱呱的甜瓜、菜蓟！”

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空想主义者已经不断地指出了他们所构想的改革的“保守”性质。圣西门直截了当地用人民起义来恐吓政府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指资产阶级]，这种起义当时在“保守派”的想象中必定表现为可怕的、人人都记忆犹新的无套裤党人^③运动的形态。然而这一恐吓自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而且如果历史真的会给我们任何教训的话，那么最有教益的教训之一

① 自由思想的民粹派分子曾寄予希望的农民土地银行，是沙皇政府 1882 年似乎为了帮助农民购买土地而设立的。事实上这个银行迎合贵族意旨，抬高地主土地价格，成了在农村中培植和加强富农分子的工具。——俄文版编者注

② “兴高采烈的人”和“说空话的人”两词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称雄一时的人物》：“让我离开兴高采烈的人、说空话的人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进入那些为爱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人的营垒！”——俄文版编者注

③ 无裤党人，一译长裤党人，或译无套裤汉、长裤汉。十八世纪法国，贵族穿丝绒短套裤，平民穿粗布长裤。起初贵族讥称平民为“无套裤汉”。后来革命时期就成了所有革命者、爱国者、共和主义者的代称。——译者注

原来是：证明所有似乎讲求实际的空想主义者的全部计划都完完全全是不实际的。

555 当空想主义者说明自己计划的保守性质，从而力求劝说政府去实现这些计划时，他们为了证实自己的思想，通常是把自己国家或多或少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作一番概述，通过概述可以看出某时某时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使得整个社会关系具有全新的和极其不合人意的状态。政府只要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天国几乎就会立即在地上建立起来。

例如，圣西门曾要波旁王朝相信，革命前法国内部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君主制同实业家的联盟。这个联盟对双方都是同样有利的。革命时期，政府由于误会出面反对实业家的合法要求，而实业家出于同样可悲的误会起来反对君主制。由此产生后来的一切灾难。然而现在，当灾难的根源已经发现，事情是很容易纠正的，因为只需要实业家在一定条件下跟政府妥协。这也会是使双方摆脱许多困难的最明智的保守的出路。现在不用多说，无论波旁王朝还是实业家，都没有听从圣西门美好的劝告。

“不再坚持我们古老的传统；不再发展我们继承下来的、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不再利用西欧科学的种种发明和使用它们来发展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实业形式；不再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农民手中的方法来增加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再利用的并非生产的形式，而是生产组织本身，就像它出现在西欧的那样……不再做这一切，我们开始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尽管资本主义的诸生产形式建立在剥削农民之上，我们不仅不阻碍它们的发展，而是相反，企图全力从根本上破坏我们的全部经济

生活，——这种破坏一直进行到 1891 年。”^①尼古拉-逊先生这样地忧伤，他建议“社会”改正这个错误，解决极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在这样的形式中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即生产力能够不为数目不多的少数人所利用，而为全体人民所利用。”^②全部问题在于改正“错误”。

有趣的是尼古拉-逊先生自以为同任何空想都绝无瓜葛。他时时刻刻都引证我们应该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批判归功于他们的那些人。^③全部问题在于国家的经济，他不管是否合乎时宜都跟着这些人后面重复地说，一切罪恶都从这里发生：“因此消除罪恶的手段，一旦发现了，应该同样恰恰在于改变生产条件本身。”在说明中又有对空想社会主义批评家之一的引证：“这些手段不应该是头脑发明的，而应当是借思想之助在现成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发现的。”

然而推动社会去解决或者哪怕是只是去理解尼古拉-逊先生给社会提出的任务的那些“生产的物质条件”到底是什么呢？这不仅对读者们，而且自然也对著者本人仍然是秘密，著者以自己的“任务”很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在自己的历史观点上他依然是纯血统的空想主义者，尽管从完全不是空想主义著作家们的作品中作

^① 尼古拉-逊：《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论》，圣彼得堡，1893 年俄文版，第 322—323 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 343 页。——作者原注

^③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尼古拉-逊（即丹尼尔逊），俄国民粹派分子，是第一个把马克思《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人，并因此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资本论》第 1 卷（他和格尔曼·洛帕廷合译）出版于 1872 年，第 2 卷出版于 1885 年，第 3 卷出版于 1896 年。因此尼古拉-逊与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了热闹的相互通信。——俄文版编者注

了引证。^①

能否说傅立叶的计划同他当时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矛盾呢？不能，不仅不矛盾，而且整个地，甚至包括计划的缺点，都是建立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傅立叶之为空想主义者，因为既然他是“借思想之助”才根据他当时生产的物质条件来论证自己的计划的，他就没有能够把计划的实现也归之于同一些条件，从而完全无益地将“伟大的任务”加在这样一些社会阶
557 层和阶级身上，它们由于同一些物质条件既不可能有承担解决任务的志趣，也没有解决任务的可能性。尼古拉-逊先生所犯的这个错误，跟傅立叶或他不喜欢的洛贝尔图斯所犯的是同等程度的错误：最可能，他使人想起的正是洛贝尔图斯，因为尼古拉-逊先生之引证古老的基础恰恰是根据这位保守的著作家的精神。

为了开导“社会”，尼古拉-逊先生举出西欧这个吓人的例子。很久以来我们的空想主义者就企图通过这类举例显示自己是讲求实际的人，并不醉心于幻想，而只是会利用历史的“教训”罢了。不过这种手法也完全不是新的。法国空想主义者已经企图拿英国的例子吓唬和开导自己的同时代人，在英国，“极大的差距把企业主

^① 与此相适应，尼古拉-逊的实践计划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例如以普鲁加文为代表的我国空想主义民粹派分子早已自然是毫无结果地提出的那些要求。“社会—国家活动（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这里既没有忘记社会，也没有忘记国家）在工厂经济领域中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应该是：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利益赎买一切劳动工具，并把它们提供给人民以作临时租用；另一方面，建立这样的生产条件组织（普鲁加文先生想简单地说：生产，可是按照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所有俄国著作家的习惯，他用了‘生产条件’一词，但并不理解该词的意义是什么），该组织的基础是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在国家经济力量的商品资本主义组织的条件下发生的市场、销售和竞争的利益。”（维·斯·普鲁加文：《展览会上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882年俄文版，第15页）让读者把这个地方同上面从尼古拉-逊先生的书中所作的引文比较一下。——作者原注

跟劳动者分离开来”，在英国，劳动者身上重重地压着特殊的专制主义枷锁。《生产者》(Producteur)^①说：“在实业发展道路上步英国后尘的其他国家应当明白，必须力图阻止这种制度在它们自己国土上产生”。^②能够成为阻止其他国家产生英国制度的唯一有效障碍就是圣西门主义的“劳动组织和劳动者组织”。^③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成了幻想绕过资本主义的主要舞台，以自己的空想主义者为代表的德国，长期固执地把自己同“西欧”对立起来。德国空想主义者说，在西方国家，新社会组织理念的代表是工人阶级，在我国则是有教养的阶级(即俄国称之为知识分子者)。正是德国“知识分子”被认为赋有使德国躲过资本主义灾难的使命。^④对于德

① 《生产者》，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25—1826年在巴黎出版。该杂志是圣西门去世前亲自创立的，由他的学生巴扎尔、安凡丹、罗德里格等人编辑。该杂志的题词是：“盲目的传统一直求之于过去的黄金时代就在我们眼前。”——俄文版编者注

② 《生产者》，第1卷，第140页。——作者原注

③ 关于这个组织，请看1831—1832年《地球》(Globe)。在那里甚至从预备的、过渡的种种改革方面对该组织作了详细的叙述。(《地球》，1824年由比埃尔·列卢所创立，1831年起是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作者原注

④ “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用全部力量企图把德国提高到英国现在还借以对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统治的那种工业发展水平。英国是他们的理想。自然，英国乐于自我欣赏；英国在世界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领地，它能够到处加强自己的影响，它有最丰富的商舰和军舰，它知道在缔结商约时如何哄骗立契约的人，它拥有最善于趁机谋利的商人、最大的资本家、最会发明的头脑、最好的铁路、最完善的工程设备。自然，如果从这个观点看英国，——它是幸福的国家，不过还有另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看这个国家的幸福大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它的不幸所掩盖。英国同时也是这样的国家，那里贫困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里大家知道，每年都有千百万人死于饥饿，那里成万的工人拒绝工作，因为尽管他们全力劳动和备受折磨，却得不到足以保障自己过最穷困生活的工资。英国是这样的国家，那里以捐税形式来救济穷人的慈善事业不得不变成徒具形式的法律。经济学家，看看摇晃的、弯曲的、佝偻的身影吧，看看苍白的、忧郁的、有痲病的面容吧，看看他们全部的精神贫乏和身体穷困吧，在这以后难道您还想要使德国成为第二个英国吗？也只有通过灾难和不幸英国才能达到这样的工业繁荣，也只有通过同样的牺牲德国才会达到类似的结果，换言之，达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态。”(《特里尔报》，1846年5月4日)——作者原注

国空想主义者说来,资本主义是如此可怕,以致为了避开它,他们宁愿在万不得已时容忍全面的停滞状态。他们议论说,立宪制度的胜利会导致财阀的统治。因此最好是不要有立宪制度。^①德国不曾绕过资本主义。现在谈论同样要绕过资本主义的是俄国的空想主义者。空想主义的理念就这样从西方旅行到东方,虽然到处都出现了这些理念加以反对并与之进行斗争的同一个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前兆。然而这些理念越是走向东方,就越是改变它们的历史意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在当时是果敢的、天才的革新家;德国人则比他们差得多;至于俄国的空想主义者,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拿自己古老的面孔来吓唬西方人士。

有趣的是还在法国启蒙派那里就已经有避免资本主义的思想。比方霍尔巴赫对立宪制度在英国的胜利导致卑污的商人利益的全面统治就十分伤心。很使他担忧的是英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市场这个情况。这种对市场的追逐使英国人脱离哲学。霍尔巴赫也谴责存在于英国的财富不平等。他,正如爱尔维修一样,想促成理性和平等的胜利,而不是商人利益的胜利。然而无论霍尔巴赫,还是爱尔维修,或者启蒙派中间任何一个人,除了对理性的颂词以及对“英格兰人民”^②劝谕性的教诲,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对抗当时事物的进程。在这方面,他们就像我们现代的俄国空想主

^① “如果立宪主义者成功地推翻了德国政府,并且建立起一般的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那么我们会像法国一样有金钱贵族,最好还是让它像至今以前的那样吧。”参看乔治·毕希纳(Georg Buchners):《全集》(sammtliche Werke),由弗兰佐夫编辑出版,第122页。——作者原注

^② Albion(阿尔比昂),古希腊人对不列颠群岛的称呼[即英格兰的古名]。——俄文版编者注

义者一样如此束手无策。

还讲一点意见,我们就结束空想主义者了。“人性”观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招致了生物学比喻的滥用,这种现象至今在西方社会学著作,特别是在俄国准社会学著作中还有很强烈的影响。

如果整个历史的社会运动的谜底应当在人的本性中去寻找,以及如果像圣西门早就正确指出过的,社会由个体组成,那么个体的本性也应当提供说明历史的钥匙。个体的本性是由广义的生理学即同时也包括心理现象的科学来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生理学在圣西门及其学生们心目中成了他们称之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学的基础的原因。圣西门生前并在其最积极的参与下早已出版的《论哲学、文学和实业》(*Opinion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et industrielles*)中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可惜没有完成的一位匿名医学博士的论文,题目是:“论生理学之应用于改善社会设施” 560 (*Dela physiologie appliquée à l' maélioration d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作者把关于社会的科学当作“一般生理学”的组织部分进行研究,这种生理学为“特殊生理学”对个体的观察和试验所充实,于是“醉心于思考高级的秩序”。对于一般生理学说来,个体“只是社会躯体的器官”,它研究社会躯体的功能,正如特殊生理学研究个体的功能一样。一般生理学研究(这位作者说的是——表述)社会存在的法则,而成文法则应当与这些法则相适应。后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例如斯宾塞,利用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学说作出了最保守的结论。然而我们所引述的这位医学博士却首先是改革家。他在社会改造的种种形态中研究“社会躯体”,因为只有“社会生理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卫生学”才会提供“能够据以建立文

明世界现代状况所需要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实际基础”。不过看起来社会生理学和卫生学给这位作者的改革幻想提供的精神食粮并不多,因为他终于认识到不得求助于医生,即求助于同个体有机体打交道的人们,请他们给社会提供“社会制度的体系”“作为卫生处方”。

这种对“社会物理学”的观点,后来为奥·孔德在其各种著作中反反复复地一再重述,或者如果您愿意说的话,为他所发展。这就是他还在年轻时代(当时在为圣西门主义者的《生产者》撰稿)关于社会科学所说的话:“作为人类现象的社会现象,无疑地应当属于生理学的现象。不过虽然社会物理学应当因此在个体生理学中有自己的出发点,并且同它有经常的联系,但仍应把它当作完全独立的科学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各个不同时代的人们互相间发生累进的影响。如果坚持纯粹生理学的观点,就不可能好好地研究这种影响,而在社会物理学中应当把理解这种影响的作用放在主要地位”。^①

请看,从这种观点来观察社会的人们会陷入怎样的没有出路的矛盾中。

561 第一,既然“社会物理学”有个体生理学“作为其出发点”,它就建立在纯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生理学中是没有唯心主义对象观的地位的。然而同一个社会物理学应当主要从事于弄清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累进影响的意义。这一代影响着下一代,他把自己

^① 《论科学与学者》(*Considération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savants*),载《生产者》,第1卷,第355—356页。——作者原注

从前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些知识以及他本人所获得的知识都传授给下一代。所以，“社会物理学”从知识发展的观点以及一般说来从“教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这已经是纯粹的十八世纪唯心主义观点：意见支配世界。当我们按照孔德的建议把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同对个体生理学的纯粹唯物主义观点“紧密联系”以后，我们原来是地地道道的二元论者，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比仔细研究这种二元论对例如同一个孔德的社会学观点的有害影响更为容易的了。然而这不是一切。要知道，十八世纪思想家们早已指出，知识发展中有某种规律性。孔德牢牢地坚持这种规律性，他把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个赫赫有名的三阶段规律提到首位。

然而究竟为什么知识的发展正是通过这三个阶段呢？人类智慧的本性就是如此，孔德回答说：“人类的智慧按其本性在其活动的一切地方都通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①很好；可是为了研究“本性”，我们必得求助于个体生理学，然而个体生理学却不会给我们提供充分的解释，于是我们重新援引“诸代人”，而“诸代人”则要我们去找“本性”。这自命为科学，可这里并没有科学的踪迹：这里有的只是在没有出路的圈子中永无休止的运动。

我国似乎独创的“主观社会学家们”整个站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空想主义者的观点上。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自己叙述说：“还在诺任的影响下和部

^① 《论科学与学者》，载《生产者》，第1卷，第304页。——作者原注

分地在他的领导下,我对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界限以及它们接近的可能性的问题感到了兴趣……与诺任的一类思想的交往带给我的益处我无法足够高度地评价,不过这些思想中毕竟有许多偶然的东 西,部分地因为它们在诺任本人那里还只在发展,部分因为他对自然科学领域不大在行。其实,我从诺任那里得到的只是向一定方向的推动,不过这种推动是强健的、坚定的和有益的。我并不想专门搞生物学,但是我按照诺任的指点以及似乎是按照他的遗嘱读了许多东西。这种新的读书气象对我以前搜罗的那大量不过是杂乱的、部分简直是无用的实际材料和思想材料产生了特殊的、使我异常着迷的影响。”^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集《交替》中假托布哈尔采夫之名描述了诺任。布哈尔采夫“幻想过借助自然科学来改革社会科学,并且已经制订了改革的广泛计划”。这一改革活动的方式如何,从下文可以看出。布哈尔采夫把广博的动物学论文从拉丁文译成俄文,并给译文加上自己的注释,在注释中他决定“放进自己全部独立工作的成果”,还对注释作出“社会学”性质的新注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热心地向读者介绍第二层的这些注释之一:“我一般地不能在自己对范-德尔-海文的补充中过分地醉心于对应用所有这些纯解剖学问题去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见解和理论结论。因此我只是再次请读者注意,我全部解剖学和胚胎学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社会生理学的种种规律,因之我以后的全部著作自然都

^① “文学与生活”,载《俄罗斯思想》,第4册,1891年版,第195页。——作者原注

将建立在我在这本书中所叙述的科学材料之上。”^①

解剖学和胚胎学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社会生理学的种种规律！”这个说法很笨拙，不过对于空想主义的社会学家仍然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建立起解剖学理论，他准备依靠这个理论，为他周围的社会写出一系列“卫生处方”。在他那里，社会“生理学”也归结为这些处方。布哈尔采夫的社会“生理学”其实不是“生理学”，而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卫生学”，不是关于现有事物的科学，而是根据同一位布哈尔采夫的“解剖学和胚胎学”理论本应所是的科学。

虽然布哈尔采夫是从诺任那里抄袭来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艺术创作的产物（如果应用于所引证的论文集时只能说是艺术创作的话）。因此就是他的笨拙的注释，也许实际上任何时候都不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注释就更可以说明用十分尊重的口吻说到它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特征。

“我有时还是在著作中遇到对这位难以忘怀的朋友兼师长的思想的直接反映”，用其名义进行叙述的特姆金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过去和现在都反映了布哈尔采夫和诺任的思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自己的“进步公式”。这个公式说：“进步是朝不可分的整体、朝各器官之间可能充分的和全面的分工和人们之间可能更少的分工逐渐接近。一切阻碍这一运动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有害的、非理性的。只有减少社会的不同种类性，从而加强社会各成员的不同种类的东西，才是道德的、正义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265—266页。——作者原注

的、理性的和有益的。”^①

这个公式能有怎样的科学意义呢？它是否说明社会的历史运动呢？它是否说明社会的历史运动是这样而非别样进行以及为什么这样而非别样进行呢？丝毫没有，而且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它说的不是历史曾是怎样进行的，而是它理应如何进行，以便值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赞许。这就是空想主义者根据“对器官发展规律的确切研究”臆想出来的“卫生处方”。这正是医生圣西门主义者发现了的东西。

……“我们说过，在社会学中唯一地使用客观方法，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等于把尺寸同斤两相加，由此得出的也并不是客观方法应当完全从这个研究领域离得远远的，而只是这里最高的监督应该属于主观的方法。”^②

“这个研究领域”正是合乎愿望的社会的“生理学”，即空想的领域。不用说，在这个领域使用“主观的方法”会使“研究者”的工作变得很容易。然而这种使用完全不是建立在任何“规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红色虚构的魔力”的基础上；谁一旦陷入这种魔力，他就甚至不会起来反对在同一‘领域’使用（诚然，根据不同的权利）两种方法，主观和客观方法，虽然类似的方法论上的混乱乃是真正的“尺寸和斤两相加”。^③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版，第186—187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185页。——作者原注

③ 其实词语“客观方法”、“主观方法”本身已经至少是很大的术语混乱。——作者原注

第四章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564

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们的坚决相信，他们确实给予了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们把唯心主义看成是过时的、永远被抛弃的理论。然而就在那个世纪的末期便开始了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动，而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唯物主义本身则陷于被大家看作过时的、遭到彻底埋葬的体系的境地。唯心主义不仅重新起死回生，而且得到空前未有的、真正辉煌的发展。这当然有其社会原因，不过我们这里不想涉及这些原因，只要考察一下十九世纪唯心主义有没有胜过前一世纪唯物主义的长处，如果有，这些长处又在哪里。

每当法国唯物主义势必遇到自然中或历史中的发展问题时，都暴露了令人惊讶的、现在简直难以想象的弱点。就拿人的起源来说吧。虽然这一物种的逐渐发展的思想看来似乎并不同唯物主义者们的“发生矛盾”，但他们认为这种“猜测”是很少可能的。《自然的体系》(*Systeme de la nature*) (参看第1卷第6章)的作者们说，如果不论什么人起来反对这类猜测，如果不论什么人辩驳说，“自然界凭着一定数目的普遍而不变的规律进行活动”，同时还补充说，“人、四足动物、鱼、昆虫、植物等等亘古以来就存在着，而且永远始终不变”，那么他们“对此也不会表示反对”。^① 他们要指出的只

^① 中译本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译者注

是,这种观点并不违反他们所阐述的真理。“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人不是生来就知道自己的起源”[参阅中译本《自然的体系》(上卷)第82页]——这就是《自然的体系》的作者们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归根到底所说的一切。

565 爱尔维修似乎更倾向于人的逐渐发展的思想。“物质是永恒的,而物质的形式则变化无常”,——他说,同时提醒道,就是现在人种也由于气候的作用而变异。^①他甚至一般地认为,一切动物物种都是变化无常的。不过他把这个健全的思想表述得很奇怪。他得出的结论是,动植物不同物种之间的“相异”,其原因或者在于它们“胚胎”的属性,或者在于它们周围环境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培养”的不同。^②

因此遗传性排斥变异性以及相反。如果接受变异性理论,我们就必定要从而假定,在适宜的环境下,从每一个特定的“胚胎”中可以产生任何动物或植物:比如从橡树的胚胎中产生公牛或长颈鹿。不言而喻,类似的“猜测”是不可能阐明物种起源问题的,即使爱尔维修本人也只是一度顺带地谈到这个猜测,此后就再没有旧事重提了。

法国唯物主义者解释社会发展现象的本领同样的不高明。他们把各种不同的“法制”体系仅仅说成是“立法者”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把不同的宗教体系仅仅说成是祭司们搞阴谋诡计的结果,等等。

法国唯物主义面对自然发展和历史发展问题的这种束手无

^① 《自然体系的真正意义》(*Le vrai sens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伦敦,1774年版,第15页。——作者原注

^② 《论人》,载《爱尔维修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Helvétius*),第2卷,巴黎,1818年版,第120页。——作者原注

策,使得它的哲学内容非常贫乏。在自然学说上这一内容归结为反对二元论者片面的物质概念的斗争;在人的学说上则只限于不断重复和稍稍变更洛克的下述命题:没有天赋观念。无论这种重复在反对过时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斗争中曾是何等的有益,它只有在唯物主义者成功地运用自己的思想来说明人类精神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具有郑重的科学的意义。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法国唯物主义者(更确切地说,就是爱尔维修)曾经朝这个方向做过某些非常卓越的尝试,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它们成功了,那法国唯物主义在发展问题上就会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唯物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历史观方面是站在意见支配世界这个纯粹的唯心主义观点之上的。唯物主义只是偶尔,只是极罕见地以下述见解的形式闯进了他们的历史议论:某个落入“立法者”头脑从而造成他的大脑功能失常的乖戾的原子,可以整整几个世纪地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宿命论,它没有为预见事变留下余地,换言之,就是没有为善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进行自觉的历史活动留下余地。

因此不足为怪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卷进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唯物主义是极左派可怕的理论武器)的、有才能和有天赋的人们说来,这个学说似乎是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例如歌德就这样评论过它。^① 为了使这一指责不再是公正的,唯

^① 歌德在《诗与真》(Wahrheit und Dichtung)中曾这样写道:“被判焚烧、当时曾引起许多热烈讨论的禁书,对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影响。我举《自然的体系》为例,由于好奇我们曾读过它。我们不能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是危险的;对我们说来它是那样的昏暗、死气沉沉,以致我们难以忍受它的内容,我们在它面前就好像在幽灵面前一样会发抖。”参见《歌德全集》,30卷本,第10卷,1937年俄文版,第48页。[中译本参阅《歌德自传——诗与真(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俄文版编者注

物主义本应抛弃枯燥的、抽象的议论，而力求从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和说明“活生生的生活”，理解和说明具体现象的各式各样复杂的链条。然而在自己当时的形态下，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一伟大任务，正是唯心主义哲学把它解决了。

这一哲学发展中主要的最后的环节就是黑格尔体系，因此在我们的叙述中，我们将重点说明它。

黑格尔把那些不善于理解现象发展过程，不由自主地把现象设想成和说成是僵化的、没有联系的、不能互相转化的东西的思想家（不分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的。他把这个观点跟辩证法对立起来，辩证法正是在现象的发展中，因而是在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研究现象。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辩证法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说出某个抽象的命题以后，情愿承认也许他们错了，也许正确的是直接对立的观点。这是些有教养的人，彻头彻尾浸透着“宽容精神”：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他们对自己的悟性说。辩证法跟世俗人士怀疑论的宽容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它也善于使直接对立的抽象命题调和一致。我们说，人都有死，把死看成是某种植根于外部情况和完全不同于活人本性的东西。于是，人就有两种属性：第一，是活人，而第二，也是死人。不过如果仔细地考察，原来生命自身中就包含死亡的萌芽，而且一般说来任何现象在该现象会从自身中发展出早晚要结束自身存在、使之变化为它自己的对立面的那些因素的那种意义上都是矛盾的。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这种不断的流逝，中止这个永恒的运动；没有力量可以抗拒现象的辩证法。歌德把辩证法具体体现为精神的形象：

In Lebensfluthen, in Thatansturm
 Wall'ich auf und ab,
 Webe hin und her!
 Geburt und Grab——
 Ein ewiges Meer,
 Ein wechselnd Weben,
 Ein glubend Leben,
 So schaff' ich am sausenden Webstuhl der Zeit
 Und wirke 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eid. ①

在给定的一分钟里,运动着的物体处在给定的点上,然而同时又处在这一点之外^②,因此如果它只是处在这一点上,它至少在这

① 生潮中,业浪里,
 淘上复淘下,
 浮来又浮去!
 生而死,死而葬,
 一个永恒的大洋,
 一个连续的波浪,
 一个有光辉的生长,
 我架起时辰的机杼,

替神性制造生动的衣裳。——作者原注[参看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② 普列汉诺夫这个说法直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在《大逻辑》中写道:“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那个‘此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重申了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但这个说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现代西方有些研究家指出:运动着的物体,在T时处在M的位置,在 $T+T\Delta$ 时则处在 $M+M\Delta$ 这个位置。这里 Δ 表示任何小的量。我们不能说该物体在T时既在M,又在 $M+M\Delta$ (参看邦格:“对辩证法的批判性考察”,载《哲学译丛》,1980年,第1期)。如果断定“X既是A,又是非A”或者说“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本书第584页)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推出任何假命题都是真的,就公然认可了逻辑矛盾,违反了形式逻辑常识。——译者注

一瞬间就会是不动的。任何运动都是辩证的过程,都是生动的矛盾,而因为在解释任何一种自然现象时我们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运动,所以应当同意黑格尔,他说,辩证法是一切科学认识的灵魂。而且这不仅适用于对自然的认识。例如“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summum jus summa injuria)这句古老格言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最正当的行为是在尊重法的同时也给非法以应有的尊重么?不,只有“庸俗的经验、愚人的智慧”才这样议论。这格言的意思是,任何抽象的法,一旦走到自己的逻辑终点,都会变成非法,即变成自己固有的对立面。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是这一格言的出色例证。^① 现在请看经济现象。“自由竞争”的逻辑结局是什么呢?每一个企业家都企图打败自己的竞争者,成为市场唯一的主宰者。当然,经常的情况是某个张三或李四得以幸运地实现这一企图。不过这表明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即导致对竞争的否定,也就是导致自己本身的对立面。或者请看看得到我们的民粹派著作夸耀的所谓“财产的劳动原则”会引导到什么。只有我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才属于我。这不可能再公正了。而且同样公正的是我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我创造的东西:我自己享用它,或者拿它去交

^①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夏洛克贷款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条件是如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从债务人靠近心脏的部位割下一磅肉。后来安东尼奥破产,夏洛克坚持要割肉以泄私愤,并诉诸法庭。安东尼奥朋友的情人鲍西娅装扮成律师,在法庭上根据夏洛克起诉状形式上的合法性发言支持夏洛克,但同时她强调,在割肉时必须严格遵守契约上的文字。她说:“契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一滴血,只是写着‘一磅肉’”,所以“不准流一滴血,也不准……割下来的肉,比一磅略轻一点或略重一点”,否则就违反了威尼斯法律,夏洛克的土地、财产就要全部充公。(《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1页)——译者注

换由于某种原因我更希望有的别的东西。最后,同样公正的是我仍然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换得的、我更喜欢的、更好的、对我更有益的东西。现在假定,我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换得金钱,又用金钱雇得工人,即买得别人的劳动力。使用别人的劳动力以后,我就成了大大超过我购买这劳动力时所花掉的价值的那个价值的占有者。这,从一方面说,是很公正的,因为其实已经公认,我可以对我更好和更有利地使用换得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剥削了别人的劳动,从而否定了作为我的公正概念之基础的那个原则。我个人劳动所得的财产,给我生出别人劳动创造的财产。“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而且这种 injuria[非法]以事物本身的力量产生于几乎每一个殷实的手工业者,几乎农村每一个勤劳的当家人的经济中。^①

总之,每个现象由于正是制约着它的存在的那些力量本身的作用,或早或晚然而必不可免地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面。

我们说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从现象发展的观点看一切现象的,这意思也就是说,辩证地看现象。需要指出,形而上学者也

569

^①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辩证法的这种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统治是不可理解的;一切都在变化,除了辩证运动的规律,他带着挖苦的怀疑神情说。对的,事情正是如此,我们回答说,而且如果这使您感到奇怪,如果您想反驳这个观点,那就请记住,您不得不去反驳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观点。为了确信这一点,您只要回忆起莱伊尔曾经拿来作为自己名著《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题词的普莱伊怀尔下面的那几句话就足够了:“在地球的种种变革中,自然界的构造是始终一致的,自然的各种规律是唯一能制约一般运动的东西。河流与岩石,海洋与大陆,它们的一切部分都有变化;然而支配这些变化的规律以及这些变化所遵循的准则却始终不变地是相同的。”[中译本参阅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卷首题词。]——作者原注

会歪曲那个关于发展的学说。他们反复重申,无论自然界还是历史中都不可能发生飞跃。当他们谈到任何一种现象或任何社会设施的产生时,他们都把事情说成似乎这种现象或设施某个时候曾经是很微小的,根本觉察不出,后来才逐渐长大一些。谈到同一现象和设施的消灭时则相反,认为可能是它的逐渐缩小,直到现象由于其规模小得微不足道而变得根本觉察不出。这样理解的发展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必须以它应当加以解释的那些现象本身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它只考虑到这些现象中进行的量变。形而上学思维的统治地位,某个时候在自然科学中曾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许多自然科学家除了把发展仅仅说成是被研究现象的规模如此的逐渐增大或缩小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虽然从哈维时代起大家业已承认,“一切生物都是从蛋中发展起来的”,可是来自蛋的这种发展,显然没有跟任何确切的观念联系起来,而精虫的发现立即成了下述理论产生的根据,按照这一理论,在含精子的细胞中已经有现成的、完全发育成熟的、不过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小生物,所以生物的全部“发展”都归结为生长。现在睿智老人,其中包括欧洲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进化论者,例如在谈到政治设施的“发展”时就完全是这样议论的:历史不作飞跃……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发展概念。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一概念,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无论在自然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正如逐渐的量的变化一样,飞跃也是发展同样必不可少的契机。他说:“存在的变化不仅在于一个量过渡为另一个量,而且也在于质过渡为量以及相反;每一次从量过渡到质都是渐进性的中断(ein Abbrechen des Allmahlichen),并且使现象获得

在质上和先前形态不同的、新的形态。例如水在冷却时不是逐渐地……而是一下子变成固态的；水已经冷却到冰点时，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它就仍然是液体，这时轻轻一碰就足以使它突然变成固体……在道德现象世界中……也发生同样的量到质的转化，或者换句话说，质的区别在那里也是建立在量的区别的基础上。比如，少一点点，多一点点都是一个界限，超出界限，轻率便不再是轻率，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变成犯罪……比如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大小的区别就有不同的质的特性。某些法律和某种国家制度，随着国家领土和公民人数的扩大，便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①

现代自然科学家都很好地懂得，量变如何常常引导到质变。570
为什么一部分太阳光谱使我们产生红色的感觉，另一部分产生绿色感觉？等等。物理学回答说，这里全部问题在于以太粒子振动的数目。大家知道，这个数目对于光谱上的每一种颜色都在改变，从红色增加到紫色。这还不是一切。随着对红色光带外缘的接近，光谱中的热度就增加，而且超出光谱外在离开红色光带的某个间距上热度达到最高。结果光谱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光线，它已经不发光，而只是发热。物理学在这里又说，光线的质随着以太粒子振动数目的改变而改变。

^① 《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第1部，第1篇，第313—314页。[中译本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04—405页。黑格尔实际上把质变跟渐进性的中断即飞跃混为一谈了。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证明质变有多种形式，飞跃是质变的一种形式。参看华国凡等著：《质变方式新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作者原注

不过这也不是一切。太阳光产生某种化学作用,就像例如物质因阳光而掉色所表明的。紫色光线以及在我们身上已经不产生光线感觉的所谓紫外线具有最大的化学力。太阳光线不同的化学作用仍然不外乎用以太粒子振动的不同数目来解释:量过渡为质。

化学证明同样的东西。臭氧具有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另一些属性。这个区别从哪里来的呢?臭氧的分子中具有原子数目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分子。试以三个碳氢化合物为例:CH₄(甲烷),C₂H₆(乙烷)和C₃H₈(丙烷)。它们全都是按照n个碳原子和2n+2个氢原子的公式组成的。如果n等于1,您就会有甲烷;如果n等于2,就得到乙烷;如果n等于3,则是丙烷。这样组成完整的系列,它们的意义,任何一个化学家都会告诉您,而且所有这些系列都一致地证明老辩证唯心主义者们的命题:量过渡为质。

571 现在我们已经真正了解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特征,^①不过读者觉得并不满足。他问,著名的三段式,众所周知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实质所系的那个三段式又在哪里呢?请原谅,读者,我们没有说到三段式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它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不是对这位思想家的哲学没有任何概念,而是根据例如斯巴索维奇

① 这里没有提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能不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叙述“辩证思维最主要特征”时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但是在包括本书在内的他的几乎全部哲学著作中,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或详或略分析论述过的成对的辩证范畴就多得不可胜数,如质和量、自由和必然、必然和偶然、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现实性和可能性、个别和一般……等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立面的斗争和互相转化问题是普列汉诺夫全部哲学著作的核心。——译者注

先生的《刑法教科书》来研究它^①的人们硬加在它身上的那种作用。这些极其天真而又轻率的人深信，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的一切论据都归结为引证三段式；老头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以安静的微笑让别人对困难去伤脑筋，自己则立即去构建三段论：一切现象都按照三段式进行；我打交道的是现象；因此我乞援于三段式。^②这简直是精神失常的荒诞念头，像卡罗宁的一位人物所说的，或者是不寻常的废话，如果您更喜欢谢德林的说法的话。在《黑格尔全集》十八卷的任何一卷中，三段式没有一次起过论据的作用，而且任何一个哪怕略知他的哲学学说的人都会懂得，三段式无论如何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三段式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它还在费希特那里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意义，而费希特哲学是根本不同于黑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说：“梦想着律师的前程，我热心地、但毫无秩序地读了各种法律著作。其中有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这本书中有对同犯罪侦查学相关的各种哲学体系的简要述评。我对黑格尔著名的三段式曾感到特别惊讶。由于三段式，惩罚就如此优美地成为法和罪之间矛盾的调和。在黑格尔三项公式各式各样的应用中，对这公式的魅力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足为奇的是我被斯巴索维奇先生教科书中的三段式俘虏了。不足为奇的是后来也就慢慢地倾心于黑格尔和其他许多人……”（《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88页）。可惜，很可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告知，他对自己之倾心于“黑格尔”满意到什么程度。从一切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走得并不远。——作者原注

②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坚信，已故的尼·齐别尔在自己同他争论中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时“使用了一切可能的论据，但为了最小的危险便隐藏在确定不移的和无可争议的三段式辩证发展的庇护下”（《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96页）。他同样深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全部（如他所说）预言都只是依靠“三段式”。关于马克思，我们下面再说，但对于尼·齐别尔，我们要指出，我们曾经有机会不止一次地同已故者谈过话，我们没有一次听他引用过“辩证发展”。他本人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完全不知道黑格尔在最新经济学发展中的意义。当然，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死者头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记述是驳不倒的。——作者原注

572 格尔哲学的。显然,只有十足的笨蛋才会把至少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所固有的特征看作一个哲学体系的主要的具有区别功能的特征。

我们很遗憾,“三段式”使我们偏离了我们的叙述,不过既然开始谈到它,就应当讲到底。让我们看一看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任何现象一旦发展到底,都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然而既然新的、跟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現象本身也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具有同第一阶段的形式上的类似性。暂时且将这种发展进程在何等程度上符合现实的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假定以为完全符合的人们错了;在任何情况下明显的是,“三段式”只是从黑格尔的一个命题中产生出来的,而它本身绝对不是黑格尔的基本命题。这是很重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三段式是作为基本命题出场的,那么认为它有这种重要作用的人们就真的可以在它的“庇护”下寻找保护,然而既然它没有以这种身份出场,所以只有那些听到声音却不知声音从何而来的人才会隐藏在它下面。

不言而喻,即使辩证法家不躲藏在“三段式”之后,而是“为了最小的危险”隐匿在任何现象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命题的“庇护之下”,情况实质上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做,是因为上述命题根本囊括不了他们对现象发展的观点。比如他们说,除此以外,在发展过程中量过渡为质,质也过渡为量。因此他们同时要考虑到过程的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而这必须以细心地对待过程的现实的实际的进程为前提;这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从抽象命题中得出的抽

象结论,或者至少不应当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希望仍然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的话。

“在自己著作的每一页上,黑格尔都经常不倦地指出了,哲学同经验的总和是同一的,哲学不像深入经验科学那样坚决地需要任何东西……事实上没有思想的材料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事实材料的思想乃是单纯的妄想……哲学是经验科学关于自身所达到的那个意识。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①

这就是拉萨尔从研究黑格尔哲学中得出的、对善于独立思考 573 的研究者的任务的观点^②:哲学家们应当成为他们想帮助科学达到“自我意识”的那些科学中的专家们。看来从对对象的专门研究到为了颂扬“三段式”而轻率地空谈,距离是很远的。请不要对我们说拉萨尔不是“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说他属于“左派”和尖锐地谴责过“右派”,说这些“右派”只研究抽象的体系。一个人明明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他自己的观点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

不过你们也许想撤销《既得权利体系》作者的供词,就像法庭上撤销亲属们的供词一样。我们不来争辩和反驳;我们请一位完全局外的人,即《果戈里时期概观》著者作证。

请注意:证人将说得很长,而且按照自己的习惯说得有道理。

^① 参看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s),载《拉萨尔全集》,第3卷,圆形出版社,第231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参看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第2版,莱比锡,1880年版,序言,第12—13页。——作者原注

“我们很少是黑格尔的信徒，就像很少是笛卡尔或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样。黑格尔现在已经属于历史，现在有另一种哲学，而且清楚地了解黑格尔体系的缺点；不过应当承认，黑格尔提出的原则确实是很接近真理，而且真理的某些方面，外表看来这位思想家是以真正令人惊奇的力量提出来的。从这些真理中对另一些东西的发现是黑格尔的个人功绩；其他的种种发现虽然并不纯粹属于他的体系，而是属于从康德和费希特时代开始的整个德国哲学，不过黑格尔以前谁也没有像在黑格尔体系中那样表述得如此清楚，说得如此有力。

首先我们要指出任何进步的最有益于发展的基础，这是一般说来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体系，如此显著如此优越地跟当时（十九世纪初）法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虚伪的和怯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找真理吧，因为真理中有幸福；无论真理是什么，它都比所有不是真理的东西要好；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是：不在任何结果面前却步；他应该决心为真理牺牲自己最心爱的见解。谬误是任何祸害的根源；真理是最高幸福和其他一切福祉的泉源。’为了估价从康德时代开始整个德国哲学所共有、而黑格尔特别坚决地提出的这个要求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回忆一下当时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们曾经用怎样奇怪和狭隘的条件来局限真理：他们从事哲学研究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所珍贵的信念是正确的’，就是说，他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对自己成见的支持；每个人都只从真理中拿取他喜欢的东西，而抛弃一切他不喜欢的真理，毫不客气地承认他觉得愉快的谬误比公正

的真理好得多。这种不关心真理只关心证实愉快的成见的习惯，德国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叫做‘主观思维’(老天爷!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观思想家责骂黑格尔是诡辩家呢?——著者),叫做为了个人的满足而不是由于对真理的痛切需要去研究哲学。黑格尔无情地揭穿了这一无聊而且有害的游戏。(听吧!听吧!)作为反对追求脱离真理以迎合个人的愿望和成见的心理的必要的预防手段,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辩证思维方法’。它的本质在于思想家绝不应满足于随便哪一个肯定的结论,而要寻找:在他所思考的对象中有没有跟初看起来被想象成这个对象的那个对象相反的质和力;这样,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切方面来观察对象,于是真理对他说来无非是形形色色相反意见斗争的结果。用这种方式取代以前关于对象的片面概念,渐渐地出现了完整的、全面的研究,并形成关于对象全部现实的质的生动概念。说明现实成了哲学思维极其重要的义务。从这里出现了对现实的异乎寻常的注意,以前对现实是不假思索的,毫不客气地曲解它以迎合自己片面的成见(寓言说的就是你!)。于是,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代替了过去任意的解释。然而现实中一切都取决于环境,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而且因此黑格尔承认过去用来判断善恶却不考察产生特定现象的种种情况和原因的一般的空泛辞藻——这些一般的抽象格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每一个对象,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本身的意义,而且应当根据它赖以存在的那个环境对它进行判断;这一准则表述为这样的公式:‘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就是说,只有考察了决定特定事实的全部情况以后才能对

该事实作出一定的判断”^①。

总之,一方面我们听说,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最仔细地研究现实;是对任何特定对象最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在对象活生生的环境中,在制约或伴随其生存的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条件下对它进行研究。在这种场合,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供词跟斐·拉萨尔的供词是同一的。而另一方面,人们想使我们确信,这个哲学是空洞无聊的烦琐哲学,它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诡辩地运用“三段式”。在这种场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供词同瓦·沃先生以及一大群现代俄罗斯其他著作家的供词是完全一致的。如何解释证人们的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译本参阅《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3页]在一个特别的注释中,《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出色地阐明对决定特定现象的全部情况进行的这种考察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注释也引下来。“例如:‘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抽象的问题: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有时下雨带来好处,有时即使较少也带来坏处;应当明确地问:‘谷物播种完毕以后,连续下5小时大雨,这雨对谷物有利吗?’——只有在这里回答才是明白的和有意义的:‘这场雨很有益。’——‘然而在同一个夏天,当谷物收割时期来临时,整个星期都下着倾盆大雨,——这对谷物有好处吗?’回答也是明白的和实在的:‘不,这场雨有害。’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有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战争是危害极大的还是起良好作用的?’一般说来不能对此作出断然的回答:需要知道指的是怎样的战争;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对于野蛮民族说来,战争的危害不那么明显,益处则更显著些;对于文明民族,战争通常带来较少的利益和较多的危害。可是,例如,1812年的战争对俄国人民是救命的;马拉松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益的事件。——这就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公理的意义;如果对象带来全部的质和全部特点并在它所存在的那个环境中加以思考,而不是脱离这个环境和自己种种生动的特点加以思考(如抽象思维所作的那样,因此抽象思维的判断对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关于对象的观念是具体的。”——作者原注

* 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的马拉松之战(公元前490年)以雅典人的胜利告终。这次会战预先决定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有利的结局,并且,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繁荣。——俄文版编者注

这种意见分歧呢？怎么解释，悉听尊便，不过请记住，拉萨尔和《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是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个哲学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瓦·沃先生一伙人大概没有费力研究过任何一本黑格尔著作。

而且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这位作者在说明辩证思维的特征时没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他怎么没有看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如此固执如此隆重地向所有爱看热闹的人展示的那头大象呢？再说一遍：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懂得黑格尔哲学，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对它却没有丝毫概念。 576

也许读者愿意回想起《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对黑格尔的另外某些评论吧？也许他会向我们指出著名的论文《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以下简称《对哲学成见的批判》）吧？这篇文章里说的只是三段式，而且看来它被说成是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然而这只是看来而已。作者在讨论所有制的历史时断言，所有制在其发展的第三的、最高的阶段时就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说，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让位于社会所有制。这种回归，他说，是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普遍规律。在这个场合，确实，作者的论据无非是援引三段式。这也就是作者论据的重大缺点：它是抽象的；所有制的发展没有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考察；因此，虽然作者的理由是机智的、出色的，却不能令人信服：这些理由只是使人惊讶、奇怪，而不是信服。可是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作者的论据中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如果作者正是像黑格尔劝告的那样，用他自己的话说，考

察一切对象,即坚持现实的基础,一切具体条件,衡量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情况,他的论据,像您以为的那样,会是抽象的么?看来不会,看来那时恰恰不会有我们所指出的缺点。然而在这样的场合,缺点是因何而产生的呢?是因为《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驳斥自己论敌们的抽象论据时忘记了黑格尔有益的劝告,结果没有忠实于他引证过的、这位思想家的方法。我们感到遗憾,在热情奋发的论战中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不过再说一遍,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不善于利用黑格尔的方法这种场合,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从什么时候起,哲学体系不是按照它们内在的内容,而是按照援引它们的人们偶然犯下的错误来评价呢?

而且,重复一下,不管上述论文的作者怎样固执地援引三段式,在那里他也并没有把三段式说成是辩证法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三段式在那里对他也不是基础,而只是毋庸争辩的结果。在他那里,辩证法的基础、主要特征是用以下的话表述的:“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某种追求的强化,由于某种内容的更高发展而为同一内容或追求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谁懂得这个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谁学会了把它运用于任何现象,他该会何等安详地召来其他人感到犹豫不决的种种机遇啊,”等等。^①

“形式的永恒更替,为某种内容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辩证法家们确实把这种更替、这种“形式的否弃”看成

^① 中译本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7页。——译者注

是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现在不赞成他们这一信念的只有社会科学某些部门的代表，这些代表没有勇气直接面对真理，哪怕是借助谬误也力图坚持他们珍惜的成见。我们尤其应当重视伟大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功绩，他们从本世纪一开始就已经不倦地肯定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产生这些形式的内容的加强而致形式的永恒否弃。

上面我们“暂时”搁置下来没有考察一切现象是否确如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所想的那样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希望，读者会同意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完全不加考虑。

当您运用辩证方法研究现象时，您必须记住，形式由于“其内容的更高发展”而永恒地变化着。如果您要彻底了解一个对象，您就应当全面充分地仔细研究这一否弃形式的过程。不过新形式是否与旧形式相对立，——这一点经验会告诉您，预先知道这个是完全不重要的。诚然，正是根据人类的历史经验，任何一个了解实情的法律学家都会对您说，任何法的设施早晚要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物：现在它有助于满足某些社会需要；现在正由于这些需要它才是有益的、必不可缺的。后来它开始越来越不能好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最后它变成满足需要的障碍：它从必不可缺的东西变成了有害的东西——那时它就被废除了。随便您举什么例子，文学史还是物种的历史，只要有发展的地方您都会看到类似的辩证法。然而无论如何，凡是愿意深入辩证过程的本质的人，如果他正是从检验关于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中并立的那些现象的对立性学说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

在选择进行这种检验的观点时，总会有许多任意的东西。应

578 当从这个问题的客观方面去观察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应当弄清楚,为特定内容的发展所制约的形式的这种必然更替是什么?这是同一个思想,不过是用别的话加以表达罢了。然而在检验这个思想时已经没有任何的余地了,因为研究者的观点是为形式和内容的本来性质所决定的。

用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从现象发展的观点,从现象产生和消灭的观点来观察一切现象。“他是否第一个这样做,可以争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不过无论如何不是最后一个,而且最现代的发展理论——斯宾塞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的发展观念都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①

如果现代自然科学每一步都证实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的天才思想,那么是否可以说现代自然科学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呢?的确,黑格尔不是“最后一个”说出这种转化的人,其原因恰如达尔文不是“最后一个”说物种可变的人,而牛顿不是“最后一个”牛顿主义者的那个原因一样。有何见教?人类理性发展的进程就这样!您说出一个正确的思想,而且您大概不会是“最后一个”捍卫它的人;您说了胡话,——虽然人们很喜欢它,不过您仍然有成为“最后一个”捍卫和传播它的人的危险。所以,按照我微不足道的见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有成为“社会学中主观方法”“最后一个”拥护者的危险。坦率地说,我们不认为有替理性发展这一进程担忧的理由。

^① 《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0页。——作者原注

我们建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他“对世上的一切以及其余许多东西都能争辩”)推翻我们以下的命题:凡是——“在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出现发展观念的地方,这个观念一定“同黑格尔主义”有许多“共同点”,就是说,在每一种关于发展的最新学说中都一定会重复黑格尔的某些一般性的命题。我们说某些,而不说一切,因为现代进化论者中间许多人缺乏应有的哲学教养,都抽象地、片面地理解“进化”。一个例子: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先生确信,无论自然界或者历史都不作飞跃。这些人如果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会获益良多。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反驳我们吧,只不过他别忘记,只按照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只按照刘易士的《哲学史》去了解黑格尔是驳不倒我们的。应当费些力气研究黑格尔本人的著作。 579

当我们说进化论者们的现代学说总是有许多“跟黑格尔主义的共同点”时,我们并不是断言,今天的进化论者们从黑格尔那里抄袭了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对黑格尔常常具有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具有的同样错误的观念。而且如果他们的理论,虽然是部分地但正是在这些理论原来是正确的地方,仍然是“黑格尔主义”新的例证,那么这种情况就只是说明作为德国唯心主义者思想的惊人力量:从来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人们,由于事实的力量,由于“现实”显明的意义而不得不像黑格尔说过的那样说话。对于一个哲学家说来,不可能设想更大的胜利了:读者们忽视他,生活却证实他的思想。

至今还很难说,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观点在何等程度上朝已经指出的方向直接影响了德国的自然科学,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本

世纪前半期甚至法国的自然科学家在大学讲课期间都研究过哲学,甚至像海克尔这样一些生物科学的专家现在也都以尊敬的口吻评论某些自然哲学家的进化理论。不过自然科学乃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薄弱方面。它的力量在于涉及历史发展各个方面的种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那就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记住,——如果他某个时候曾经知道过的话,——正是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了整整一辈光辉的杰出思想家和研究者,他们使宗教、美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等等的研究都具有崭新的面貌。在所有这些“学科”中,在某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中,没有任何一个杰出的工作者不应把自己对自己的科学所获得的发展和新颖的观点归功于黑格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以为,对此他也“可以争辩”呢?如果是,那就让他试试。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到黑格尔时就力图“这样做,以便不让‘哲学上头脑简单的人伊戈尔·费多洛维奇’知道秘密的人们也能懂得,像别林斯基举起反对黑格尔的义旗时不恭敬地说过的那样”。^① 他“为此”从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即《反杜林论》]一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为什么不从黑格尔本人著作中举例呢?对于“知道秘密”等等的作者说来,这样做会更方

^① 别林斯基 1841 年 3 月 1 日关于黑格尔哲学给鲍特金写道:“我十分感谢,伊戈尔·费多洛维奇,向您的哲学上头脑简单的人致敬;不过我有幸以适合于您的哲学庸俗作风的全部尊敬告诉您,如果我能够爬上发展阶梯的最高层,——在那里我就会请您向我说明生活和历史的条件的全部牺牲物,说明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所、腓力二世等等全部牺牲物;否则我就要从最高层头朝下地跳下来。”(《别林斯基通信选集》,第 2 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5 年俄文版,第 141 页)——俄文版编者注

便些。)

“燕麦的子粒在有利的条件下掉下：它生发幼芽，于是作为子粒的那个东西就被否定了；在它的位置上产生出麦秆，麦秆是子粒的否定；植物在发展，生出果实，即新的燕麦子粒，而当这些子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它，子粒的否定本身被否定了。而且以后，同一个‘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过程无数次地重复着。这个过程的基础是矛盾：燕麦的子粒是子粒，同时又不是子粒，因为它始终处于现实的或可能的发展中。”不用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可以争论”。下面就是这种有魅力的可能性在他那里怎样转变成现实性的。

“第一阶段，子粒阶段，是 thesis——命题；第二阶段，直到新子粒的形成，是 anti-thesis——反命题；第三阶段，是 sin-thesis[合命题]，或和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心通俗地写作，因此不留下希腊语词没有说明或翻译）；所有这些合成为三段式或三分法。而且一切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命运都是如此：它产生，发展，并为自己的重复奠定基础，然后就死去。这个过程的一大堆单个的表现自然立即出现在读者的记忆中，而且黑格尔的规律在整个有机界（我们现在还没有超出有机界）原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稍微仔细看看我们的例子，那么我们会看出我们的概括是极其肤浅极其任意的。我们拿子粒，麦秆，又到子粒，或者更正确些说，一堆子粒为例。不过要知道，植物在产生果实之前要开花。当我们谈到燕麦和具有经济意义的其他禾本科牧草时，我们可能指播下的子粒、麦秆和收割下来的子粒，然而认为这三个契机可以完全说明植物的生命，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植物的生命中开花这个契

机伴随着力量的一种极度的和特殊的紧张状态,而既然花不是直接从子粒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即便坚持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也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即分成四段:麦秆否定子粒,花否定麦秆,果实否定花。忽视开花这一契机在怎样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请看下面。在黑格尔时代,把子粒当作植物生命的起点也许是可以允许的,而从经济观点看来,现在这样做大概也是允许的:经济年度是从子粒播种开始的。然而植物的生命并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子粒按照结构是某种很复杂的東西,而且它本身是细胞发展的产物,而细胞增殖所需要的东西正是在开花时刻形成的。由此可见,在植物生命的例子上,581 [把子粒]当作起点乃是任意的和不正确的,而且全部过程被人为地和任意地塞进三分法的框框里。”^①结论:“该是·不再·相信·燕麦·按·黑·格·尔·方·式·生·长·的·时·候·了·。”^②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在我们的时代,即当写这几行字的人在自己学生年代研究自然科学时,燕麦曾“按黑格尔方式”生长,可是今天“我们·很·清·楚·地·懂·得·”这是胡说,现在“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然而对于“我们”所说的,“我们懂得”是否充分呢?是否清楚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的燕麦子粒的例子,完全不像恩格斯本人叙述的那样。恩格斯说:“麦粒本身就消

^① 《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4—157页。——作者原注

^② 此处和下面的引文都出自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文《论辩证的发展和三段的进步公式》,载《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俄文版,第758—780页。——俄文版编者注

失了，被否定了，占住它的位置的是从它中间生长出来的植物，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生命的正常循环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果，最后重新产生燕麦粒^①；当麦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就自我否定。作为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重又得到燕麦麦粒，不过已经不是一粒，而是自身的十倍，自身的二十倍，自身的三十倍。”^②对麦粒的否定在恩格斯那里是整个植物，然而进入植物生命循环的既有开花又有结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否定”植物一词，在它的位置上放着麦秆一词。如所周知，麦秆只是植物的一部分，它自然被植物的另一部分所否定：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然而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恩格斯的用语，用自己的用语取代了它：秆否定粒，他喊道，花否定秆，果实否定花；这里至少是四分法！当然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过这一切只是证明您在同恩格斯争论时甚至不放弃……如何说得温和些呢？——甚至不放弃……改变您的对手的话“这个契机”。这一手法有点儿……“主观”。

一旦偷换的契机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可恶的三段式就像纸糊的小房子一样化为泡影。您忽略了开花这个契机，俄国这位“社会学家”责备德国社会主义者说，而“对开花因素的忽视具有重要的意义”。读者已经看到，“开花的契机”没有被恩格斯忽视，而是被

① 其实恩格斯说的是大麦麦粒，而不是燕麦麦粒；不过这自然是不重要的。——作者原注

②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第一篇，第1版，第111—11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148页。以下凡引此书，均指中文第1版。]——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恩格斯的思想时忽视了；读者也知道，这类忽视在著作中具有重要的、虽然完全是否定的意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使用了不漂亮的“契机”。不过怎么办呢？“三段式”如此可恶，胜利如此可喜，而“完全不让”某个“头脑简单的人知道秘密的人们”却如此轻信！

我们生来全都没有过错，
我们对名誉都很宝贵；
然而冲突时常到来，
简直使我们不甘愿地犯了罪……^①

花是植物的器官，而作为植物器官的花很少否定植物，就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很少否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然而“果”，即确切些说，受精的卵，才真正是对作为新生命发展起点的特定有机体的否定。恩格斯就是从植物生命、由受精卵开始到它再生受精卵来考察植物生命循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很有学问的行家姿态指出：“植物的生命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等等——简言之，我们现在懂得卵是在开花时期受精粉的。恩格斯知道这个自然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然而这说明什么呢？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乐意的话，我们用受精卵代替子粒，不过这并不改变植物生命循环的意义，不否弃“三段式”。燕麦仍然“按黑格尔方式”生长。

顺便说一句。暂且假定“开花的契机”驳倒了黑格尔派的一切。

^① 阿芬巴赫小歌剧《美丽的叶莲娜》中的一节（歌词作者为梅里雅克和加列维）。——俄文版编者注

论据。对无花的植物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吩咐怎么办？难道把它们放在三段式的统治下么？这是徒劳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三段式将有大量的臣属。

不过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为了弄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思想。在这里我们自己始终确信即使用“花”也抵挡不住三段式。而且是否只有我们才这样想呢？请看例如植物学专家菲·旺-蒂耶盖姆说的话：“无论植物的形式怎么样，无论植物由于这形式而属于哪一类型，植物体从先于它而存在过的另一植物体中产生并且跟后者区分开来。反过来这个植物体在一定的时间内从自己的大批数量中分出一定的部分成为新植物体的起点、萌芽，等等。总之，它像生产一样进行再生产：分裂”。^① 请看！这位尊敬 583 的学者、研究院成员、自然史博物院教授，其议论就像名副其实的黑格尔主义者：他说，开始是分裂，又再回到分裂。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到“开花的契机”！我们自己也明白，这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该是很痛苦的，不过没有办法：大家知道，真理高于柏拉图。

再一次假定，“开花的契机”推翻了三段式。那时“如果坚持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四段划分”。黑格尔的术语使我们想起他的《哲学全书》。我们打开该书第一部，从那里我们得知，有许多场合三分法过渡为四分法，而且一般说来，三分法其实只在精神领域中占统治地位。^② 结果就是：燕麦“按黑格尔的方式”生长，像旺-蒂耶盖姆对此确信的那样，而

^① 菲·旺-蒂耶盖姆(Ph. Van-Tieghem)：《植物论》(*Traité de Botanique*)，第1卷，巴黎，1891年第2版，第24页。——作者原注

^② 《哲学全书》，第1卷，第230节，附录。——作者原注

黑格尔对燕麦的想法则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方式,像《哲学全书》(*Enz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①对此保证了的一样。奇迹,真是奇迹!“他来她处,她来我处,我却到小吃店主彼得老爸那里去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开导“不让知道秘密的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卢梭的学说。^②

“按照卢梭,人们在自然状态和未开化状态下是平等的,是动物的平等。然而人的特点是有完善的能力,这种完善开始了不平等的产生,而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是矛盾的:‘表面上,这是朝向单个人完善的步伐,实际上这些步伐导致了人类的衰落……冶金和农耕——这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产生了伟大的变革。使人们文明化和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③不平等继续发展,达到自己的顶点,而在东方专制制度中重又转变为普遍微不足道的普遍平等,即回到自己的出发点,然后往下的过程则以同样的次序引导到社会契约的平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转述恩格斯引用的例子。不言自明,他在这里也是“能够争论”的。

“对恩格斯的叙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重视的,不过对我们说
584 来重要的只要知道在卢梭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

① 指《哲学全书》的简要本。——作者原注

② 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中关于卢梭所说的话。[中译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2—153页。]——俄文版编者注

③ 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译者注

恩格斯珍视的正是什么东西。他不涉及卢梭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他感兴趣的只是卢梭是‘辩证地思维’的:他在进步的内容本身中看到矛盾,并把自己的叙述安排成这样,以便可以把它赶进黑格尔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公式。而且的确是可行的,虽然卢梭并不知道黑格尔的辩证公式。”

这只是对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第一次前哨攻击。随后便进行全线攻击。

“卢梭不懂黑格尔,却按照黑格尔方式辩证地思维。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所有的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但是选择的正是卢梭,此人不仅按其天赋(在这方面许多人并不亚于他),而是按其智慧的气质本身和世界观的性质,在同时代人中间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此例外的现象似乎不应当拿来据以检验普遍的规则。不过我们这里可以任所欲为。卢梭之使人感到兴趣和觉得重要,首先是因为他第一个十分突出地指明了文明的矛盾性,而矛盾乃是辩证过程的必要条件。但是必须指出,卢梭发现的矛盾同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黑格尔的矛盾在于每一个事物都处在经常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顺序地按三段式变化)过程中,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如果把发展的必需的三阶段放在一边,那么矛盾在这里简单地似乎是变化、运动、发展的根基。卢梭也谈到变化的过程。不过他决不是在变化的事实本身中发现矛盾。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其他著作中很大一部分议论可以这样概括: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这里没有‘否定之否定’,有的只是指出在

这类现象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而与辩证过程全部相似之处就在于保持‘矛盾’一词，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此外恩格斯在卢梭的议论中看到明显的三分法：跟在原始平等之后的是对它的否定——不平等，然后来了否定之否定——东方专制制度下所有人在汗^①、苏丹^②、沙赫^③的权力面前的平等。‘不平等的这个最后阶段也是终极点，完结了的圆圈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④然而历史并不停止在这上面，新的不平等在发展，等等。引号中引用的话是卢梭的原文，正是这些话作为卢梭按黑格尔方式思维的明显证据对恩格斯特别珍贵。”^⑤

卢梭“在同时代人中间是出类拔萃的”。这是公正的。什么地方出类拔萃呢？就在辩证地思维，而他的同时代的人几乎全都是形而上学者。他对不平等起源的观点正是辩证的观点，虽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卢梭只是指出了在文明的历史中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不，卢梭不仅指出了这一点。在他那里，智慧的进步是道德衰退的原因。对此，即使没有读过卢梭的著作也可以深信不疑：只要根据上面摘引过的话回忆一下在他那里实现伟大革命和破坏原始平等的金属冶炼和农业耕作曾起过何等的作用就足够了。不过凡是读过卢梭本人著作的人，自然都没

① 汗(可汗)，古代突厥和蒙古等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② 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③ 沙赫，波斯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④ 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45—146 页。——译者注

⑤ 所有这些引文均摘自上面引用过的《俄国财富》月刊。——作者原注

有忘记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以下的话：“我要做的只是对那些既使人的理性能够得到完善又给人类造成损害、既使他成为凶恶的动物又使他成为社会动物的不同场合做出评价和把它们互相联结起来……”^①

这个地方特别卓越，因为它出色地阐明卢梭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的观点。关于这个特点他的“同时代人”也说过不少话。不过在他们那里这一特点乃是一种从自身中自动造成理性胜利的神秘力量。按照卢梭，这种能力“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自动地发展起来”。为了自己的发展，它需要经常的从旁推动。这是辩证的智慧进步观较之形而上学观点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后面我们还得谈到这个特点。现在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引用过的这段话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卢梭对道德衰退同智慧进步之因果联系的见解。^②而这对于弄清这位著作家对文明进程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卢梭简单地指出了“矛盾”，而且也许对这矛盾流过几滴高尚的眼泪。实际上卢梭认为这个矛盾是文明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围起一块土地并且说“它属于我”的人，乃是市民社会的奠基人，因之也是原始平等的掘墓人。换言之，市民社会的基础是所有制，它在人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争论，在他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贪欲，这样毁坏他们的道德。不过所有

^① 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9 页。——译者注

^② 对于怀疑的人还有一段引文：“我把风俗败坏的这个最初阶段归于世上一切国家科学发展的最初时刻。”参见“致修道院长莱纳尔先生的信”，载《卢梭全集》，第 4 卷，巴黎，1820 年版，第 43 页。——作者原注

制的产生必须以“技术和知识”一定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原始关系的破灭正是由于这一发展;然而当这一发展导致了私有制胜利的那个时候,人们的原始关系自身就已经处在它们的继续存在变成不可能的那种状态。^① 如果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描述卢梭所指出的矛盾那样判断卢梭,可以认为这位著名的日内瓦人不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主观社会学者”,这样的学者充其量能够设想出道德高尚的“进步公式”,用它来医治人类的灾难。实际上卢梭最痛恨的正是这类公式,一有机会便加以攻击。

市民社会是在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原始关系的废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关系本身中包含着自己本身否定的萌芽。在证明这一论点时,卢梭似乎预先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形象说明:任何现象本身都要消灭,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卢梭关于专制制度的议论可以看作这一思想的新的例证。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天真地认为可能恩格斯把卢梭任意地编入辩证部门只是根据卢梭使用了“矛盾”、“圆圈”、“回到出发点”等等词语时,他暴露出对黑格尔和卢梭的理解有怎样的多。

可是为什么恩格斯就引证了卢梭,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要知道所有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

您错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远不是所有的人:恩格斯就

^① 参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篇开头。[中译本参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作者原注

决不会把您第一个当作辩证家。对他说来,读一读您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就足以义无反顾地把您列入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

关于辩证思维,恩格斯说道:“人们早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就辩证地思维了,就像远在散文一词出现以前人们已经用散文说话一样。既在自然中也在历史中的否定的规律,当它仍然未被认识时,就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存在着,黑格尔只是第一次对它作了清晰的表述。”^①就像读者看到的,这里说的是不自觉的辩证思维,它离自觉的辩证思维还很远。当我们说“两极相遇”时,我们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对事物的辩证观点;当我们运动时,我们仍然没有料到我们在从事实用的辩证法(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运动是实现了的矛盾)。然而无论运动还是辩证的格言还不会把我们在系统思想领域中从形而上学那里解救出来。相反,思想史表明,在长时期的流程中形而上学对原始朴素的辩证法,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必然理应要强大:“自然界之分解为它的各个个别部分,自然界各种现象和对象按一定等级分类整理,对诸有机体的内在属性根据它们有机构造的多样性进行的研究——这一切都是最近四百年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不过这个原因同时也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在自然现象和自然对象的孤立状态中,在它们总体的大联系之外,并且不是在运动中,而是在不动状态中,不是作为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作为永远不变的东西,不是作为活生生

^①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5页。——译者注

588 的东西,而是作为僵死的东西去把握它们。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的这种研究方式造成了最近几百年具有特征意义的片面性——形而上学思维。”

恩格斯这样说,从他那里我们又知道,“虽然近代哲学中辩证法也有光辉的代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然而,特别是在英国哲学的影响下,近代哲学越来越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几乎完全控制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至少是在他们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不过在这一领域之外法国人也会给我们留下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我们只要记住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够了]。”^①

看来很明显,为什么恩格斯谈到卢梭,而不说伏尔泰和随便什么人。我们不敢设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读过他引用的、从中取来作为研究“例子”的恩格斯的那本书。而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拿“随便什么人”纠缠恩格斯,那就只会有一种设想:我们这位作者在这里也使用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偷换的“契机”……合目的地曲解自己对手语句的“契机”。利用类似的“契机”对他可能觉得更为方便,因为恩格斯的书没有翻译成俄文,而对于不懂德文的读者这本书又不存在。^② 我们这里出现了“任所欲为”,这里有新的诱惑,并且又是“我们不甘愿地犯了罪”。

^①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23页。为什么恩格斯说卢梭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普列汉诺夫在本书附录二中有补充的说明。在那里作者还论述了卢梭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译者注

^② 《反杜林论》第一个俄文全译本出版于1904年。——俄文版编者注

啊，神啊，假如我们的名誉全不算数，

难道会使您愉快？^①

我们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回到“自在和自为的”德国唯心主义者。

我们说过，自然哲学是这些思想家的薄弱方面，他们的主要功绩应当到历史哲学各个领域里去寻找。现在我们补充说，这在当时也不能不如此。自称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总是包括许多“世俗的内容”，即总是研究许多本来意义上的科学问题。不过不同时期它的“世俗内容”是不同的。比方（这里限于近代哲学史的例子）在十七世纪哲学家们主要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十八世纪哲学 589 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前一时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理论，然而它本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只有康德；在法国，当时提到首位的是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继续从事的主要也是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研究罢了。例如谢林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一个历史问题的解决乃是先验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如果一切都在流逝，一切都在变化；如果任何现象都自己否定自己；如果最终不会成为有害的设施因而转变为自己本身对立物的那种有益的设施是不存在的，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寻找“完善的立法”是荒谬的，设想出对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都是最好的那种

^① 请我们的读者不要因为引证《美丽的叶莲娜》而责怪。我们不久前重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达尔文主义和阿芬巴赫的小歌剧》一文，现在仍留着它的强烈的印象。——作者原注

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位置上和在自己的时代都是好的。辩证的思维排斥了任何乌托邦。

它本来尤其应该排斥这些乌托邦，因为“人的本性”这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论十八世纪启蒙派还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始终加以利用的，似乎固定不变的标准，经历了一切现象都有的普遍命运：它本身被认为是变化无常的。

与此同时，无论启蒙派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坚持的那个朴素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消失了，这种历史观表现在这样的论断上：理性、意见支配着世界。当然，黑格尔说，理性支配着历史，不过是在它支配天体运动的那个意义上，即在规律性的意义上。天体的运动是合乎规律的，然而天体不用说是没有关于这个规律性的任何观念的。就人类的历史运动说，情况也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但这不是说，人们意识到这些规律，因此人类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哲学”是历史运动的主要因素。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里才开始飞行。^① 当哲学开始在灰色的背景上描绘出灰色的图案，当人们开始深入思考自己本身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制度过完了自己的时代，并准备让位于新的制度，而新制度的真正性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历史

^① 密涅瓦(Minerva, 一译密纳发), 古罗马女神, 司掌技艺和战争, 常被人们认为与希腊女神雅典娜为一体。她的足旁总是站着她的圣鸟——猫头鹰。“密涅瓦的猫头鹰到夜里才飞出来”这句话通常表示好主意夜里才想出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意思是：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 要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俄文版编者注

作用之后才会为人们所明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再一次只是夜间才飞出来^①[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序言第 14 页]。不用说，这只聪明鸟儿定期的空中旅行是很有益的：这些旅行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它们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它们本身就需要说明，而且一定会得到说明，因为它们有自己的规律性。 590

承认密涅瓦的猫头鹰飞行中的规律性，是对人类智慧发展历史的崭新观点的基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派别的形而上

^① 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 60 周年》一文中批评了黑格尔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他写道：“我们在《法哲学》序言中读到：‘至于世界应当怎样的教导，那么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世界的思想，只是在现实结束了其形成过程并且取得了已经完成的形态以后才出现的……当哲学在灰色的现实背景上用灰色涂料开始描绘的时候，青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只能去认识这个时代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黄昏时才飞出来’。

在这里，黑格尔无疑是走得太远了。完全同意，‘哲学’不能使衰老过时的社会制度复活，可以问问黑格尔，然而究竟什么东西妨碍他向我们指出——当然只是在一般特点上——行将代替旧社会制度的新制度的性质？‘哲学’是在现象的生成过程中考察现象的。而生成过程有两方面：产生和消灭。这两方面可以作为时间上分开的东西来考察。然而无论在自然中，而且特别是在历史中，生成过程在每一特定时间都是双重的过程：旧东西在消灭，而同时新东西从旧东西的废墟上产生。难道新东西的这一产生过程对‘哲学’始终必定是禁止接触的么？哲学认识的是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按照这个或那个人的意见本来应该存在的东西。然而每一特定时间究竟存在什么呢？存在的正是旧东西的衰亡和新东西的产生。如果哲学所认识的只是衰亡的旧东西，那么认识就是片面的，哲学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认识存在物的任务。可这是同黑格尔深信进行认识的理性万能的信念相矛盾的。

最新的唯物主义跟类似的极端性是格格不入的。它善于根据什么东西现在存在着以及什么东西已经过时来判断什么东西在生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关于什么东西在生成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关于应当的东西 (sein sollenden) 的概念的，引述过的黑格尔关于密涅瓦的猫头鹰的那句话就是反对后一概念的。对我们说来，在生成的东西乃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知道在生成的正是这个而非别的，那么我们为此应当归功于帮助我们认识正在生成的东西的社会发展客观过程。我们不把自己的思维同我们周围的存在对立起来。”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491—492 页。——译者注

学者,一旦接受了某种哲学体系,就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而一切其他体系则无条件地是错误的。他们只知道真理和谬误这两个抽象观念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思想史对他们只是部分可悲部分可笑的错误杂乱无章的交织,这些错误的那种狂乱可怕的情景一直延续到合乎真理的哲学体系终于被构想出来的那个最幸福的时代。让·巴·萨伊这位形而上学家中的形而上学家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科学的历史的。他不主张研究这个历史,因为其中除谬误外什么也没有。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看问题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理性反映;每一种哲学对自己的时代都是真实的,而对于其他时代却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理性只是在现象的规律性的意义上支配世界;如果不是观念,不是知识,不是“教育”在人们的可以说社会大厦的建设中以及在他们的历史运动中指导着他们,那么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呢?人在其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那个领域,而不是像儿童那样以无聊的嬉戏自慰,不作跟自己不相干的、虽然也许不是盲目的力量手中的玩偶的那个领域在哪里呢?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摆在了十九世纪唯心主义者的面前,就像它曾经摆在前一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面前一样,就像它毫无例外地摆在提出存在对思维的关系诸问题的所有哲学家面前一样。它像斯芬克斯^①一样对每一位这样的思想

^①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据说,它用女神缪斯传授的谜语作弄人,谁猜不着就把他吃掉。这个谜语是:今有一物,先是四足,后是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什么?谜语终于被奥狄浦斯猜中。他说,是人。人在婴儿时期是爬行,成年时步行,年迈时拄杖而行。结果斯芬克斯跳崖而自杀。——俄文版编者注

家说：揭示我的谜底，否则我便吞食掉你的体系！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也就是谢林认为把该问题的答案应用于历史是先验哲学最大任务的那个问题。这个哲学是否解决了它呢？怎样解决的呢？

请注意：对于谢林，正如对黑格尔一样，这个问题正是在应用于历史时才造成了困难。从纯粹人类学的观点上它已经可以认为是解决了的。

在这里作一番解释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就来解释，请读者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因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磁针指向北方。这种现象是由特殊的物质的作用产生的，这种物质本身服从某些规律：物质世界的规律。然而对于磁针说来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觉察不出来的；磁针对这些规律没有丝毫的观念。在磁针看来，它指向北方完全不依赖于任何非自身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它乐意指向那里。物质的必然性对磁针而言表现为它自己自由的精神活动。 591

莱布尼茨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斯宾诺莎则用类似的例子说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观点。^①

某些外部原因使石头发生一定量的运动。运动自然在一定时间进程内持续下来，而在原因不再起作用以后停止。这种运动的持续按照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必然的。但是试设想，石头在思考，它意识到自己的、使它感到满足的运动，却不知道运动的原因，甚至不知道一般说来运动有没有无论什么样的外在原因。在这种场合

^① 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231—234 页。——译者注

石头会怎样想象它自己的运动呢？必定看成它自身愿望的结果，看成它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会对自己说，我运动，因为我愿意运动。“所有的人如此夸耀的那种人类自由正是如此。这种自由的本质归结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却不知道引起这些意图的外部原因。比如小孩以为他是自由地想要成为他的食物的那个乳汁……”^①

甚至现代读者中间的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是“粗俗唯物主义的”，而且他们感到惊奇，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怎么会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还会说，一般而言比拟不是证明，而凭空把人比作磁针或石头就更不是证明了。对此我们要指出，只要我们想起每天在人的头脑中所发生的现象，这个比拟就不再是凭空虚构的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脑纤维的某种运动是同大脑中的每一个意志运动相适应的。就磁针或石头而言显现为虚构的东西，对于大脑就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按照命定的必然规律进行的物质运动确实是同大脑中被称为自由的思想活动那种现象同时发生的。至于对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唯物主义议论初看起来十分自然地感到惊奇，那么必须记住，正如我们业已说过的，一切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是一元论者，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根本没有为按照二元论者的观点把物质和精神分割开来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留下位置。按照二元论者的意见，特定的物质聚集体只有在其中移入精神粒子的条件下才会有思维能力：在二元论者的心目中物质和精神是两种完全独立、相互

^① 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232 页。——译者注

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实体。莱布尼茨的比喻在他看来之所以奇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磁针没有任何灵魂。然而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一个人,他这样议论:磁针确实是某种纯粹物质的东西。不过物质本身是什么呢?我以为物质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精神,而且不是在物质为精神所创造那个意义上,而是在物质本身乃是同一个精神的意义上,不过这精神存在于另一种形态中。这种形态不符合精神的真正本性,它甚至是跟这种本性直接对立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神存在的形态,因为精神按照自己的真实本性应当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物。——您可以对这种议论感到惊奇,但是您无论如何会同意,一个承认这种议论令人信服的人,一个认为物质只是“精神的异在”的人,是不会因为作出把物质说成精神的功能或者使精神的功能紧紧依赖于物质规律这样的解释而感到为难的。这种人可以接受对心理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而同时(勉强地或者不勉强地——这是另外的问题)赋予这种解释以严格的唯心主义意义。德国唯心主义者们正是这样做的。

人的心理活动遵循物质必然性规律。然而这一点也不伤害人的自由。物质必然性规律本身无非是精神活动的规律。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必然性整个地转化为自由,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实际上较之二元论者所认为的要广阔得无法比拟:二元论者们力求把自由活动从必然活动那里分隔开来,从而使自由王国脱离他们划给必然性的那个完整的——甚至按照他们的意见也是十分广阔的——领域。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就是这样议论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他们牢牢地坚持莱布尼茨的“磁针”,不过这根针完全改变了形状,

可以说,在他们手中变得有灵性了。

然而磁针的变形还没有解决同自由对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有联系的一切困难。比方说,单个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他服从必然性规律,甚至正是由于这种服从。可是在社会中,从而也在历史中,我们并不是同个人打交道,而是同整个一群个人打交道。试问:每个人的自由是否会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我想做某某事,譬如想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我的这个愿望是我自由持有的,我力求借以实现这一愿望的我的那些行动也同样是自由的。可是我的邻人们妨碍我追求我的目的。他们就如我持有自己的愿望一般,同样自由地起来反对我的愿望。而且他们的旨在反对我的那些行动,也是自由的。我怎样克服他们造成的障碍呢?自然,我将同他们争论,说服他们,也许甚至是央求他们或者恐吓他们。然而谁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法国启蒙派说过:理性终归总是对的。但是要知道,为了使我的理性取得胜利,我就必须使我的邻人承认我的理性同时也就是自己的理性。然而我有什么理由指靠这个呢?既然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而这种活动是完全自由的),既然物质的必然性通过我不知道的途径转化为自由(而这种必然性根据假定是整个地转化为自由的),那么我的同胞的行为就会摆脱任何预见。我要想预见它们,就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如果我能够像我之考察我周围世界所有其他现象那样,即像我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的特定的原因会产生必然后果那样考察它们。换句话说,我的自由只有在自由意识能够带来对于引起我的邻人的自由行动的原因的理解那个场合,即在我能够从这些行动的必然性方面考察这些行动那个场合,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我的邻人对我的

行动也可以说完全同样的话。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如果活动者的理解所能及的必然性没有成为人的自由行动的基础，在这种场合，任何特定人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的可能性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实质上导致了宿命论。的确，如果整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乖戾的原子，那么我们就只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无事可干了，因为我们完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预见和防止个别原子的这些行径。

现在我们看到，唯心主义能够引导到同样的宿命论。如果我的同胞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或者如果这些行动从它们的必然性方面说是我的理解力所不及的，那么我唯有指靠美好的神明了：我最明智的计划、我最高尚的愿望在千百万其他人们的完全预料不到的活动上砸得粉碎。那是，按卢克莱修的说法，从一切中可以产生一切。^① 594

而且有意思的是，唯心主义在理论上越是要突出自由方面，它在实践活动领域就越是不得不把自由化为乌有，在这个领域里它无法对付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所武装的偶然性。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中，必然性是最忠实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谢林说过，如果我的活动的结果仅仅取决于自由，即使是道德义务也不能使我对这些结果感到安慰。“在自由中应当有必然性。”^②

① 参看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 页。——译者注

② 参看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244 页。——译者注

不过在这种场合实质上究竟能够谈到什么样的必然性呢？不断重复某些意志活动必然适应大脑物质某种活动这个思想，未必会给我带来许多安慰。在这种抽象的命题上面，是不能寄托任何实际希望的，而往后我从这方面也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我的邻人的头脑不是玻璃制的蜂房，他的大脑纤维也不是蜜蜂，而且我并不可能观察它们的运动，即使我清晰地知道——然而我们毕竟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正是我同胞心灵中的某种意图紧跟在某种神经纤维的某种运动之后。因此应当从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人类活动的必然性。

其所以特别应当，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间才飞出来，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自觉活动的结果。人们自觉地追求自己特殊的、个人的目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自觉地力求，比方说，大大增加自己的财产，而从他们单个人的活动的总和中会产生他们也许根本不曾希望而且大概也没有预见过的某些社会后果。富裕的罗马公民购买了贫苦农民的土地。他们中间每个人自然都知道，由于他的活动，某个张三和李四会变成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但是他们中间谁预见过，大地产会毁灭共和国，而随之还会毁灭意大利？他们中间谁曾经意识到、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发财欲望的历史后果？没有人能够，没有人意识到。而事实上结果是：由于大地产，共和国和意大利都毁灭了。

从单个的人们自觉的自由的行动中必然产生出他们意料不到、不曾预见的、涉及整个社会即影响同一些人们相互关系总和的后果。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自由领域转入必然性领域。

如果人们的个人活动产生的没有被他们认识到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事情始终在发生着，不过远不是同样迅速地），那么人们面前就会出现新的个人目的。他们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必然会获得新的面貌。从必然性领域我们重又转回到自由领域。

任何必然过程都是规律性过程。不曾为人们预见然而作为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显然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理论哲学应当发现这些规律。

由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带进生活目的，带进人们自由活动中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也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能够而且应当为理论哲学所发现。

理论哲学一旦实现这个任务，它就会给实践哲学打下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既然我知道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我就能按照我的目的去影响这个运动，而不会因为乖戾的原子的行径感到惶惑不安，也不会因为我的同胞作为天生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每时每刻要给我制造一大堆最惊人的意外事件的那些意图感到惶惑不安。我自然不能替每一个单个的同胞的言行担保，尤其是如果他属于“知识阶级”，不过就一般特点说我将知道社会力量的走向，而且我只要依靠它们的合力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总之，如果我能够得到比如这样一种愉快的见解，即跟别的国家不同，在俄国，“道德基础”会取得胜利，那只是因为我确实把英勇的“俄罗斯人”的活动理解为合乎规律的活动，从必然的观点而不是从自由的观点考察这些活动。黑格尔说：“全世界的历史是自

596 由意识中的进步，这种进步，我们应当在其必然性中加以理解”。^①

接着讲吧。无论我们对“人的本性”研究得怎么好，我们毕竟还远远不会理解从单个的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那些社会结果。比方说，我们同旧派经济学家一起承认追求发财是人性的主要特征。我们是否能够预见这种追求采取的那些形式呢？在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下是能够的；不过这些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本身在“人性”的压力下，在公民发财致富活动影响下将发生变化。它们会朝哪个方面变化呢？对于这一点，正像对于追求发财致富在新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所采取的那个新方向，我们所知道的将同样是很少的。如果我们同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一起断言，人的本性不是仅仅只有发财致富的一个追求，人身上同时还有“社会感情”（Gemeinsinn，也译“集体精神”），我们就会完全陷入同样的境地。这将是旧调新弹。为了摆脱由或多或少深奥的术语掩饰的无知状态，我们应该从研究人的本性转过来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当把这些关系理解为合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这就使我们回到这样的问题：社会关系的本性依赖于什么，取决于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前一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是否成功地把它解决了呢？

没有，他们也没有成功，而且他们之没有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为了弄清他们的观点，让我们回忆一下上面提到的

^①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57 页。——译者注

关于宪法依赖风俗还是风俗依赖宪法的那场争论。黑格尔关于这场争论曾经公正地指出,在争论中问题提得完全不正确,因为在现实中,虽然特定民族的风俗无疑影响着它的宪法,而宪法也影响特定民族的风俗,但是不管风俗还是宪法都是某个“第三者”的结果,即某种既造成影响宪法的风俗,也造成影响风俗的宪法的特殊力量的结果。然而这个特殊力量、这个无论人们的本性还是社会关系的本性都以之为依靠才存在的最后基础,在黑格尔看来是什么呢?这个力量就是“概念”,或者说“观念”也是一样的,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这观念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在实现自己特殊的观念,而每一个特殊观念、每一单个民族的观念都是绝对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样一来,历史就似乎是实用逻辑:说明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出这个历史时代对应于绝对观念逻辑发展的哪一个阶段。然而这个“绝对观念”又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身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下面就是一位曾经正儿八经地亲自通过唯心主义学校、本人又狂热地醉心于唯心主义、不过早已看出这个哲学派别的根本缺点何在的人物关于绝对观念所说的话。

“当我根据对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的认识得出‘果实’的观念;当我接着进一步想象我的……抽象观念‘果实’存在于我之外,甚至成为梨、苹果等等的真正本质,那么用思辨哲学的语言说,我就是宣布‘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我说:对梨说来,梨以梨的形态出现这个情况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苹果之成为苹果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是……我从它们那里抽象出来的观念:‘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果实’的样态(modi)。诚然,我的有限的、基

于外部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差别是无关重要的、非本质的,它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果实’。思辨的理性把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只看作虚幻的果实,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实体’是‘果实’。

显然,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是不会获得特别丰富的知识的。一位矿物学家,如果只会重复说一切矿物本质上都是‘矿物’,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因此,从各个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统一的抽象的‘果实’的思辨哲学,为了达到任何积极的内容,应当力求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从‘果实’,从‘实体’转到各种不同的现实的罪恶的果实上去,即转到苹果、梨、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根据对现实的果实的认识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这个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抛弃抽象,是不可能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物的。因此思辨哲学家也就抛弃了它,不过是用特殊的、思辨的、神秘的₅₉₈方式抛弃的……他只是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他是这样议论的:

如果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实体’、‘果实’、那么,试问,究竟为什么‘果实’对我说来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实体’、关于‘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果实’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行发展的、能动的本质。现实的、罪恶的果实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有限的理智,而且对‘果实’本身,对

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千差万别的罪恶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在苹果中‘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梨、扁桃;这些果实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而且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果实才是‘果实’生命过程的不同环节……”^①

所有这些话都是很讽刺的,但同时又是绝对公正的。唯心主义把我们自身的思维过程人格化为绝对观念,并在这一观念中寻找一切现象的谜底,这样它就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只有抛弃“观念”,即告别唯心主义,才能够从死胡同里脱身出来。请看一个例子,谢林下面的话是否多少给您说明磁性的本性呢:“磁性是灵魂感应的一般动作,是统一性贯彻于多样性、概念贯彻于差别的一般动作。主观的东西之侵入客观的东西在观念中……是自我意识,这种侵入在这里是反映在存在中的东西。”^②这些话根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难道不对么?历史领域中的这类解释同样很少令人满意。由于什么原因希腊衰落了昵?原因是曾经构成希腊生命的原则、构成希腊精神的中心的那个观念(美的观念)只能是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很短暂的阶段。这类的回答不过是用正面的、并且高傲的、矫揉造作的形式把问题重复一遍。黑格尔这个对希腊衰落作过上述解释的人,似乎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于是急忙援引古代希腊的经济现实来补充自己的唯心主义解释。他说:“拉凯达伊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3页。——译者注

^② 参看谢林:《来自自然哲学领域中的观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兰茨胡特,1803年版,第233页。——俄文版编者注

蒙的衰落主要是由于财产的不平等。”^①而且不仅在问题涉及希腊时他是这样做的。可以说这是他在历史哲学中的不变手法：开始时稍微模糊地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接着就更详细得多地、而且自然是更令人信服得多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说实在的，在后面这一类解释中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唯心主义的东西，而且说“唯心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真理”的黑格尔采用这种手法时，就恰恰给唯心主义签署了贫困证明，他似乎已经默默地承认，实质上情况完全相反：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

不过黑格尔这里所接近的唯物主义是完全没有得到发展的、萌芽的唯物主义，一旦需要说明这些或那些财产关系从何而来时，便立即重又转回到唯心主义。的确，就是在这里黑格尔也常有机会说出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一般说来，他是把财产关系看成靠自己本身内在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法的概念的实现。

总之，关于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我们究竟了解了什么呢？

他们抛弃了人的本性观点，因此也就摆脱了对社会现象的空想观点，他们开始把社会生活看成是有自己固有规律的必然过程。然而通过把我们的逻辑思维过程（即人性的一个方面）人格化的迂回途径，他们回到了同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观点，而且因此他们就仍然不明白社会关系的真正本性。

现在再稍稍回到我们家里的、俄罗斯的哲学方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菲利波夫先生那里听说，而菲利波夫先

^①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308 页。——译者注

生又从美国人弗列泽尔先生那里听说，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归结为“流电学”^①的神秘主义。从我们关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说过的话中读者会看出，弗列泽尔的意见多么荒谬。菲利波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也觉得他们的美国人“太过分了”：“回忆一下从古代人，从赫拉克利特的以前的形而上学的传承进程就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但是，他立即又补充道：“然而弗列泽尔的说明在很高程度上是有趣的，而且无疑本身包含一定份额的真理。”应当意识到，虽然不能不承认，……谢林早就嘲笑过这个“公式”。可是，请问，您说，他以前的同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位要向“不让知道秘密的人”解释他只是听人家说才知道这个“公式”的哲学家，怎么办？你不由得要装出行家博学的样子重复着什么也不说明的空话……

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传承进程”。“流电学的试验对欧洲所有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其中也包括当时年轻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产生着影响，——米海洛夫斯基说，——黑格尔创造出名震全世界的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结果甚至莫斯科的河流两岸都因此让人不得安静”……这里事情被说成这样，似乎黑格尔从物理学家们那里直接传染了“流电学的神秘主义”。然而要知道，黑格尔体系不过是谢林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传染应当首先影响谢林。它也的确影响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或者菲利波夫先生，或者弗列泽尔镇静地回答：“谢林，特别是做过他的学生的一些医生，把关于极性的学说推到了最后的极端”。好。不过大家

^① 流电学，研究由化学变化产生的电流的学问。——译者注

知道,谢林的先行者是费希特。流电学的传染怎样影响了他呢?对于这个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说:大概他以为,什么影响也没有。而且他完全正确,如果真的这样以为:为了确信这一点,读一读费希特早期哲学著作之一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莱比锡, 1794年)^①,就足够了。在这本著作中任何显微镜都发现不了“流电学”的影响。然而在那里出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构成黑格尔哲学主要特征的同一个人臭名昭著的“三段式”,而且这个“三段式”的谱系,弗列泽尔似乎以“相当大的部分真理”上溯到“伽伐尼和伏特的试验”……应当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虽然不能不承认黑格尔毕竟……等等。

读者已经知道谢林怎样看待磁性。德国唯心主义的缺点完全不在于它的基础是多余的、毫无根据的、把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现的迷恋当作神秘的公式,而恰恰相反,乃在于他借助被他人格化的思维过程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

结束时讲一条令人愉快的消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互相之间有最紧密的联系;用经济唯物主义的语言说,形而上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的组成部分,不过同时,资本把敌视形而上学的建立在试验和观察基础上的科学的一切技术应用加以占有,收为己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答应什么时候另一次再来谈谈“这个引人入胜的矛盾”。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真的将是“引人入胜”的!你们自己想想吧:

^① 中译本参见《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译者注

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个东西在古代希腊以及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都得到了光辉的发展。至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古代希腊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上述时期的德国,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表明,从“主观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这根本不对,正是古代希腊和费希特——黑格尔时期的德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您看到,“为什么这是重要的”。让我们的著作家赶快发表自己卓越的发现吧。唱吧,可爱的人,不要羞羞答答!

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观点在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无能本应促使而且确实曾经促使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即不是折衷主义者,不是二元论者)回到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过新的唯物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简单重复了。唯物主义再生了,为唯心主义的全部成就所充实。这些成就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方法,即从现象的发展中,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中来考察现象。这个新的方向的天才代表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不是头一个起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人。义旗是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举起来的。随后,比费尔巴哈稍晚一些出现于文坛的是鲍威尔兄弟[即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他们的观点值得现代俄国读者特别注意。

鲍威尔兄弟的观点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回应。不过他们自己也仍然是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们并没有能够理解社会关系的真正本性和找到这些关系的现实的基础。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看到了必然的、合规律的过程,而且在这种场合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谈到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他们就乞援于绝对观

念,说绝对观念的属性一定会给这一过程提供最后的、最深刻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弱点就在这里,哲学革命的矛头首先也就针对这个弱点:黑格尔学派的极左翼断然抨击了“绝对观念”。

绝对观念存在于(自然,如果存在的话)时间和空间之外,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存在于每一个单个人的头脑之外。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再现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的进程,他们服从跟自己的历史发展格格不入的、站在这一发展之外的力量。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抨击绝对观念,首先是为了人们的主动性,为了有限的人类理性。

埃德加尔·鲍威尔写道:“思辨哲学在谈到理性时把它说成某种抽象的、绝对的力量,这是大错特错的……理性不是客观的、抽象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说来人似乎只是某种主观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不,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正是人自身、他的自我意识,而理性只是这一自我意识的力量。所以,没有任何绝对的理性,而只有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永远变化着形态的理性;它绝不存在于终极形态中,它永恒地变化着形态”。^①

总之,没有绝对观念,没有抽象的理性,而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只有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甚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曾进行争论,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对一切都“可以争论”……成功与否,多少令人怀疑。然而怪事!我们越是突出这个正确的思想,我们的处境就越是变得困难。

^① 埃德加尔·鲍威尔(Edger Bauer):《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伯尔尼,1844年版,第184页。——作者原注

在老一辈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自然中和历史中任何过程的规律性都被归属于绝对观念。试问:在摧毁这一规律性的载体即绝对观念以后,我们将把这一规律性归属于什么呢?假定说,对于自然界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把它归属于物质的属性。可是对于历史,事情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原来是人的自我意识、是永远变化着的、有限的人类理性。在这一理性的发展中有没有任何规律性呢?自然,埃德加尔·鲍威尔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对他说来,人,从而还有人的理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不是某种偶然的东西。然而如果您请同一位鲍威尔向您解释他对人类理性发展中的规律性的理解,如果您问他,比方说,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代理性是这样发展,而在另一个时代则另一样发展,那么老实说,您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回答。他会对您说,“永恒发展着的人类理性创造着社会的形式”,“历史的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只要理性在其发展中迈出新的一步,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都会成为自己时代的过时者。^①然而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都不会是对下述问题的回答,而是在问题周围彷徨徘徊:为什么人类理性在自己的发展中会迈出新的步伐,以及为什么这个理性会朝这方面而不是另一方面迈出步伐呢?您使埃德加尔·鲍威尔不得不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于是他急忙空空洞洞地援引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的属性敷衍一番,就像老唯心主义者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敷衍应付那样。

^① 埃德加尔·鲍威尔:《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伯尔尼,1844年版,第185页。——作者原注

认为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并且用某种特殊的、理性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把理性变成某种绝对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意味着在新的形态下复活刚才已经宣布被永远埋葬的那个绝对观念。这个复活过来的绝对观念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绝对观念同最绝对的二元论和平共处,确切些说,它甚至必定以最绝对的二元论为前提。既然自然过程不为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所制约,那么我们这里就存在着两种力量:自然界中是物质,历史中是人类理性,然而没有把物质运动同理性发展联结起来,把必然性王国同自由王国联结起来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鲍威尔的观点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道理。

意见支配世界,——法国启蒙派如是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抨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鲍威尔兄弟也如是说。然而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其思想批判旧意见并创立新意见的那些人便是历史的主要动力。鲍威尔兄弟实际上也是这样想的。对他们说来,历史过程的本质被归结为用“批判的精神”改造现存的全部意见和由这些意见所制约的社会生活形式。鲍威尔兄弟的这些观点被《历史书翰》的作者^①移载入俄文文献,不过他已经不说批判的“精神”,而是说批判的“思想”,因为《现代人》禁止说精神。

“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既然自以为是历史的主要建

^① 《历史书翰》的作者是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书翰》以彼·拉·米尔托夫的笔名于1870年出版于彼得堡。——俄文版编者注

筑师、缔造者,从而也就把自己和跟自己相类似的人划分出来,成为特殊的、高级类型的人种。这个高级人种同没有批判思想、只能在“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具有创造性的双手中起黏土作用的群众对立着,——“英雄”同“群氓”对立着。无论英雄多么热爱群氓,无论英雄对群氓的世代贫穷,对他们无休止的苦难怎样满怀同情,他都不能不用高高在上的目光俯看群氓,不能不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个英雄,而群氓则是没有任何创造性因素的群众,好像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们的头里宽容地摆放着慈祥的、“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单位那种场合下才会获得积极的意义。鲍威尔兄弟的折衷论的唯心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德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的、可以说非常丑恶的自命不凡之基础。而现在,这种唯心主义通过自己俄国信徒们的中介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同样的缺点。这种自命不凡之无情的敌人和揭露者是马克思,我们现在就转过来讲马克思。

马克思说过,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同“群众”对立起来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化,而黑格尔历史观本身又只是关于精神和物质对立的古老学说的思辨的结果。“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①就把群众当作材料对待,只有在哲学中才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表现。但是在他那里,哲学家不过是历史创造者、绝对精神到运动完结时为止用来达到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哲学家之参与历史也就限于到运动完结时出现的这种意识,因为

^① 就是绝对观念。——作者原注

现实的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① 所以哲学家是事后(post festum)才上场的。——黑格尔有双重的不彻底：第一，按照他的学说，绝对精神只有在哲学中才达到自我意识，从而只有在哲学中它才存在，他却拒绝承认现实的哲学家、个人是绝对精神；第二，在他那里绝对精神只是表面上创造历史。实际上，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作为哲学家，而且只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创造性的精神，那么它之制造历史就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意识中、意见和观念中，即只存在于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不彻底性。^②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 he 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接着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精神只在幻想领域和事后才创造历史的角色：他，跟大批其余的人类相反，自觉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人；他预先经过周密思考，按照成熟的方案发明历史和创造历史。一方面是群众这个物质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和非历史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

606

① 读者没有忘记上面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夜间才飞翔。——作者原注

② 布鲁诺·鲍威尔是上面提到的埃德加尔·鲍威尔的哥哥，是当时著名《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ihichte der Synoptiker*)的作者。[在宗教史著述中，通常把《圣经》“新约”前三篇福音(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统称为复类福音，因其内容类似。]——作者原注

归结为批判的批判大脑活动。”^①

这段话产生奇怪的错觉：似乎它们不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写的，而是不过一个月以前写的，并且不是反对德国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而是反对俄国“主观”社会学家。读了恩格斯文章中下面引用的一段话以后，错觉就更加增强了：

“自满自足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发展，因为这正是意味着承认卑贱的群众具有全部巨大显要性，然而事情恰恰在于抵消群众的巨大显要性。因此历史将从群众的巨大显要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对待自己对象的批判就向历史喝道：你应当如此这般行事！批判的法律具有回溯的作用；在批判的法律以前，历史完全不是像这些法令以后历史进行的那样行事的。因此，所谓现实的、巨大显要性的历史跟批判的历史是大有区别的。”^②

这段话说的谁呢？是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著作家呢还是
607 是以自负的态度议论这个题目即据说天主教徒把历史事变的进程想象成一种样子，清教徒想象成另一种样子，君主主义者想象成第三种样子，共和党人想象成第四种样子，因此好的主观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为自己心灵的日常生活设想出那完全适应于最好理想的那种历史的我国当代某些“社会学家”呢？难道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845年版，第126—128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该书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反对“批判的批判”所写文章的论文集。所引文字出自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上一章所引的一段话也出自马克思。——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3页。]——作者原注

预见了我们俄国人郑重说出来的蠢话？一点也没有！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些蠢话，而如果他的讽刺隔了半个世纪之后击中了我国主观思想家们的要害，那么事情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情况来解释，即我国主观主义者的胡说中根本没有任何独创的东西：这种胡说不过是从它如此不成功地与之战斗的同一个“黑格尔主义”的讽刺画那里描摹下来的浅陋的“苏兹达尔式的”^①拓本。

从“批判对批判”的观点看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冲突都不外是观念的冲突。马克思指出，每当观念同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进步的载体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现实的经济利益不相符合时，这些观念都“出了丑”。只有理解这些利益，才会提供理解历史发展现实进程的钥匙。

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法国启蒙派也没有对利益置之不顾，就是他们也愿意求助于利益来说明特定社会的特定状况。不过在他们那里，这种对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只是意见支配世界那个“公式”的变形：他们认为，人们的利益本身也依赖于他们的意见，并且随着这些意见的变化而变化。这样解释利益的意义，乃是唯心主义运用于历史时所取得的胜利。这种解释甚至远远超过德国的辩证唯心主义，在这种唯心主义看来，每当绝对观念在其逻辑发展中需要迈出新的一步时，人们那里都会出现新的物质利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意义理解则完全不同。

对于普通的俄国读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好像是对人类某种

^① 苏兹达尔，参看本书第275页注释^②。——译者注

卑鄙的诽谤。在格·伊·乌斯宾斯基那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破产》中——有一位官吏夫人老太太，她甚至在临终前的谵妄中都固执地重申自己毕生卑污的规则：“很想放进荷包，放进荷包！”俄国的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似乎马克思把这个卑污的规则加在整个人类的头上；似乎他断言，人类的子孙们不管干的是什么事，他们永远地、唯一地和自觉地“很想放进荷包去”。不自私的俄国“知识分子”自然是像某位九级文官太太之“不同情”达尔文理论，同样“不同情”这类观点的，这位太太以为，这个理论的全部意义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令人愤慨的论点，即据说，她，这位尊敬的官太太不过是戴着小包头帽的猴子。实际上正如达尔文没有诽谤九级文官太太一样，马克思也没有诽谤“知识分子”。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在直接先行于出现马克思观点的时期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公民日常生活”——“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我们又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它这样做是违背意愿，违反自己的精神的，实在是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能令人满意和经不起推敲。马克思吸收了自己时代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关于上述结论，他完全同意法国历史学家们和黑格尔的看法。他说，我确信，“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自己固有的本性来解释，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而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公

民社会’，而对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求。”^①

然而特定社会的经济又依赖于什么呢？无论法国历史学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黑格尔，都未能对此作出任何满意的答复。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全都援引人的本性。马克思的伟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从完全相反的方面去观察问题，他把人性本身看成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变化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则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必须维持他的身体，从他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活动的前提是人对这个外部自然的一定作用。然而“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②在字数不多的这句话中包含着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的本质，虽然不言而喻，这句话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能适当地说明这个理论，而是需要加以解释。

富兰克林曾称呼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使用和生产 609 确实是人的特点。达尔文反驳那种认为只有人才能使用工具的意见；他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在萌芽形态上使用工具是许多哺乳动物都固有的。而且不用说，达尔文就自己的观点而言，即在下述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声名狼藉的“人的本性”中没有任何一个特点不会在这种或另一种动物那里遇到，因此绝对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人是某种特殊的生物，可以把他划入特殊的“王国”。但是不应忘记，量的区别会转化为质的区别。在一种动物身上作为萌芽存在着的东西，可能成为另一种动物的特有的标志。关于工具的使用特别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有必要这样说。大象折断树枝,并且挥动树枝来驱赶苍蝇。这是很有意思的和大有教益的。然而在“象”种发展的历史上,使用树枝同苍蝇作斗争大概没有起过任何重大的作用:大象没有因为它们那些或多或少类似象的祖先曾经挥动树枝成为大象。人则不然。^①

澳大利亚的野蛮人的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他的飞旋镖^②,如同现代英国人的全部生活依赖于他的机器一样。从澳洲人手中夺去他的飞旋镖,使他变成庄稼人,他就必然会改变自己的全部生活方式、自己的全部习惯、自己的全部思想方式、自己的全部“本性”。我们说:变成庄稼人。以农作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对自然界的生产性作用的过程不是仅仅以劳动工具为前提。劳动工具只是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资料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准确些,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发展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或者至少迄今为止(在重要的化学生产出现以前)曾经是劳动工具。

610 人在劳动工具上所获得的是会改变他的解剖学结构的似乎新的器官。从人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就使自己的发展史面貌焕然一新:以前这种历史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那里一样,归结为他的自然器官的形态变化;现在它首先成了他的人工器官的改进史、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

^① “工具的使用到处都是人的仅有的特点,因此在冲积层,或者在角砾岩洞穴中发现哪怕是一块人工磨制的石头就被认为这里有人生活过的充分证明。”参见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an),第1卷,伦敦,1876年版,第151—152页。——作者原注

^② 飞旋镖,也译飞去来器。澳洲土人打猎时用的一种镰刀形木制器具,掷出后飞绕一圈,仍回到投掷者手中。后传播到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译者注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动物，他们的远祖许多世代都生活在或多或少规模巨大的群集中。为什么我们祖先开始过群集的生活，在这里对我们说来并不重要，——动物学家应当说明这一点，而且正在作出说明，——不过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非常重要的一项是指出，从人的人为器官开始在他的生存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他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开始随着他的生产力的发展进程而发生变化。

“人们在产品生产中发生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并不限于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生产只有在生产者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协调活动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相互的联系和关系，而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内部并通过这些联系和关系，才会产生人们对自然界的进行生产所必需的那些作用。”^①

因此，人为器官、劳动工具与其说是单个人的器官，不如说是社会人的器官。这就是人为器官的任何重大变化会引起社会制度更替的原因。

“由于生产资料性质的不同，生产者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他们的共同活动以及他们之参与整个生产进程都会变化。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发明，随着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以及作为成员参加军队的诸个人之间发生的并因之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所有那些相互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最后，各个军队整体间的相互关系也会变化。因此，生产者的社会关系、

^①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作者原注

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变化和发展即生产力的变化和
611 和发展而改变的。生产关系就其总和便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
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构成
具有特定性质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便是生
产关系的这样一些独特的总和,而这些种类社会组织中间每一个
反过来又与人类历史中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①

没有必要补充说,人类发展的更早阶段也是生产关系的同样
独特的总和。也没有必要重复说,在这些更早的阶段上,生产力的
状况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某些乍看起来足以令人信服的
反对意见。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这样的。

人们常常对马克思主义者说,谁也不否认人类历史运动中劳
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是劳动工具是人发明和
使用的。您自己也承认,工具的利用以相对很高的智慧发展水平
为前提。在劳动工具改进过程中每迈开新的一步,都需要人类智
慧作出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是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结果。就
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就是说,断言世界由意见支配,
即由人类理性支配的那些人是对的。

再没有比这种批评更合乎情理的了,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没
有充分根据的。

^①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487页。]——作者原注

毫无疑问，劳动工具的使用以智慧在作为动物的人身上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不过请看一看现代自然科学用什么原因来说明这一发展。

达尔文说：“如果不使用双手这个如此令人惊讶地服从人的意志的工具，人绝不会在世界上取得支配地位”。^①这不是新的思想，爱尔维修早就说出过这个思想。不过爱尔维修不善于坚持地站在发展的观点上，未能使自己的思想具有多少概然的形态。达尔文提出了大量论据来捍卫这一思想，虽然所有这些论据不用说只具有假定的性质，但它们总合起来却足以令人信服。达尔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在类似人的人那里，对人的“理性”的成就具有如此卓绝影响的、人现有的、完全人化的双手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的形成大概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前后肢之间的生理分工变成有益的。“理性”的成就便是这种分工的遥远的后果，而且也是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下，这些成就反过来又成了人类出现人为器官、使用工具的最近的原因。这些新的人为器官再次促进了人的智慧发展，而“理性”的成就重又影响了这些器官。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不断地变换位置。然而如果从单纯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那是错误的。要使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性”已经取得的成就来改进自己的人工工具，就是说，来增加自己对自然界的控制，他本应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这种环境能够给他提供：(1)为这种

^① 达尔文：《人的由来等等》(*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etc*)，巴黎，1881年版，第51页。[中译本参阅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作者原注

改进所必需的材料；(2)以经过改进的工具为前提而对之进行加工的对象。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社会人的自身的理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人带出“磨石时期”；同样，为了过渡到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必须有一定的动物群和植物群，没有这些动植物的存在，“理性”始终是停滞不动的。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各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越多，这些社会的智慧发展一定更加迅速，而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地理条件越是多种多样，即因此，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跟另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越是不相似，这些交往自然就越频繁。^①最后，大家知道，自然的交通道路在这方面是多么重要；黑格尔早就说过，山岳使人们隔离，河海使他们接近。^②

613 地理环境对规模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在原始氏族组织废墟上产生的国家的命运，有同样决定性的影响。“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

① 在冯·马尔齐乌斯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名著*中，可以找到若干有趣的例子说明各地区表面上最无足轻重的特点对于地区居民之间相互交往的发展是何等重要。——作者原注

* 普列汉诺夫指马尔齐乌斯的《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法律状况》(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② 不过关于海应当指出，它并不总是使人们接近。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Antropo-Geographie，斯图加特，1882年版，第92页)正确地指出，在发展的某种低级阶段，海是绝对的界限，就是说，海使得它所隔离的诸民族之间的任何交往都是不可能的。交往的可能性最初虽然完全受到地理环境种种属性的制约，但反过来，交往也给原始部落的面貌打上自己的烙印。岛上居民大不同于大陆居民。“栖息在岛上的民族在诸个别场合下完全不同于邻近大陆的民族或最接近的大岛的民族；即使在这些民族原本属于同一种族或民族集团的地方，这些民族仍然始终明显地不同于这一种族；我们要补充说，这些民族相互之间的差别，通常都要大于它们同这个种族或集团的那些生活在大陆上的相应支脉的差别。”(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96页)这里重复着动物物种和变种形成过程中的同一规律。——作者原注

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周围的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对某种自然力建立社会控制,以便通过有组织的人类努力而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使它服从于人,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埃及,在伦巴第、在荷兰或者在波斯和在印度的治水的意义就是如此,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生繁荣的秘密。”^①

由此可见,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我们的类人的祖先才能提升到使他们变成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需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完全同样的,也只有同一环境的某些特点,才会使实际运用和不断改善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有自由发展的可能^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版,第524—526页[中译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562页]。在注释中马克思补充说:“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自然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让我们拿下述最新研究的意见同正文中引述的马克思的意见比较一下:“在生物界给人的全部赠品中间,最有价值的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在于力量中的财富,或者说得更好些,在于激励力量的发挥。”(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343页)——作者原注

^② 解放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本书中译本都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根据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地理环境的错误论述,不顾普列汉诺夫的整体思想,断章取义地指责他有地理决定论倾向。其实,普列汉诺夫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说,还明确提出了这一学说的新的基本原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生产力的“函数”,或者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0页)参看拙文:“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等。——译者注

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必须看作常量，而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①

不同人类社会所达到的结果（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正是由周围的条件不允许不同的人类部落同样地运用自己的“发明”能力这样一种情况来说明的。有一派人类学者把上述结果的不同归之

^① 路·盖格尔说：“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过多地估计思考在工具起源中的作用。第一批极端重要的工具的发现，正如现代的许多伟大发现一样，自然是偶然地发生的。无疑，它们与其说是发明的，不如说是碰到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后来补充引证说：“普遍的比较表明，在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只有极少数的发明是按照预先设想的计划作出的，只有极少的发明追求着自觉的有益的目的。”参见格·潘可夫：《论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载《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11页。]“我得出这个观点，特别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的名称任何时候都不是从工具的制作中发生的，它们（即名称）任何时候都没有原生的性质，而是从掌握工具的那个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例如德语中的剪刀（Scheere）、锯子（Säge）、锄头（Hacke），都是剪（scheeren）、锯（sagen）、锄（hacken）的对象。语言的这个规律之所以尤其要加以注意，因为不是工具的日常应用品的名称是原生地、被动地通过它们所由以或所因以产生的那种材料或那种工作而形成的。例如作为酒具的皮囊在许多语言中最初都是指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皮：英语 slough（蛇皮）相当于德语的 Schlauch；希腊语的 ascos，同时是作为盛具的皮囊和兽皮。因此在这里，语言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称为皮囊的应用品是怎样制成的和由什么东西制造的。工具就不是这样；如果以语言为根据，工具最初完全不是制造好了的，比方偶然碰到的、而且我要说是毫不费力地加以利用的尖石，可能成为最先出现的刀子。”参见盖格尔：“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人类原始史，在语言中特别注意劳动工具的起源”（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m Licht der Sprache.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Entstehung des Werkzeugs），载论文集《论人类发展史》（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斯图加特，1878年版，第36—37页。[这里，正文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指人类刚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曙光期。说这个时期“人制造工具的能力必须看作常量”的道理，作者已在本注释中通过引文作了说明，见本注释中译者加了着重点的那些话。至于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因为这时期的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迁徙，因而必须不断地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地理条件。]——作者原注

于人类种族的不同属性。不过这一派的观点经不住批判：它不过是用引证“人的本性”（在这里就是用引证种族的本性）来解释历史现象的旧手法的新变体，而且按其科学的深刻性离莫里哀那位医生的观点不远，这位医生严肃地说，鸦片催眠，因为它具有催眠的属性（种族落后了，因为它具有落后的属性）。 615

人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也改变自己固有的本性。他发展自己的全部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然而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这种能力的水平取决于生产力业已达到的发展水平。

既然劳动工具成了生产的对象，制造工具的可能性本身以及改进制造过程的或高或低的水平，就完全依赖于借以造出工具的那些劳动工具了。这对任何人都是容易明白的，也是无须任何解释的。然而例如下面的情况可能初看起来完全不可理解：普鲁塔克谈到阿基米德在罗马人围困叙拉古时所作的发明时认为需要原谅这位发明者。哲学家干这号事自然有失体面，他评论说，不过阿基米德的祖国极端危急的处境说明他是正当的。试问：现在谁会想到要找理由来减轻爱迪生的罪过呢？我们现在都不认为一个人用他的才能去发明机械是可耻的，完全相反！而希腊人（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罗马人），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对这件事的看法则根本不同。因此机械的发现和发明在他们那里比我们这里必定进行得——而且确实曾经进行得——慢得多。这里似乎又可以得出结论说，意见支配世界。不过希腊人那里这种奇怪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起源不能用人的“理性”的属性来解释。只有记住希腊人的社会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社会和罗马社会曾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全部体力劳动、全部生产事务

都落在奴隶身上。自由人以这种劳动为耻辱，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甚至对涉及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发明，包括对机械的发明的鄙视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普鲁塔克当时看待阿基米德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待爱迪生的缘故。^①然而究竟为什么希腊建立了奴隶制

616 度？是不是因为希腊人由于其“理性”的某些失误而认为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呢？不，非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希腊人并没有奴隶制，那时他们根本不认为占有奴隶的社会制度是天然的和必然的。后来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并且逐渐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时希腊公民对奴隶制的看法也就改变了：他们开始把它作为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要的设施而坚持着。然而究竟为什么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和发展了呢？大概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这些国家之所以产生了和发展了奴隶制度的那个原因是一样的。而这个原因是已知的：它就在于生产力的状况。事实上，为了当时把被征服的敌人变成奴隶比吃掉他对我更有利，必须使奴隶的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仅能够维持奴隶本人的生存，而是至少部分地也能够维持我的生存，换句话说，需要由我控制的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奴隶制度正是通过这

^① “(这个力学的)创立者是爱夫多克斯和阿尔希塔斯，他们给予几何学更加多种多样的和有趣的内容，为了这门科学直接可触摸到的和技术上重要的应用，忽略了它的抽象的和不能绘图的问题……而当柏拉图愤然地向他们指出，他们毁灭了几何学的伟大，几何学在他们手上离开了无形体的和抽象的对象而转到可感知的、需要粗糙的工匠制作的对象，于是力学从数学中被赶了出来，离开了数学，并且长时期没有受到哲学方面的任何注意，成了军事艺术的辅助科学之一。”(普鲁塔克：《马赛鲁斯传》，泰布涅尔版，莱比锡，1883年，第14章，第135—136页)像读者看到的，普鲁塔克的观点当时远不是新的。——作者原注

扇门进入历史的。奴隶劳动很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前进得极其缓慢，不过它还是在前进，而且最后前进到这样的时刻，这时剥削奴隶劳动就没有剥削自由人的劳动那么有利。于是奴隶制度就被废除或者逐渐地衰亡。曾经把奴隶制引进历史之门的同一个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对它下达逐客令。^① 这样，当我们回到普鲁塔克时就可以看出，他对阿基米德的发明的观点是为当时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既然这种观点对发现和发明往后的进程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更可以说，在每一个特定民族那里，在它的历史的每一个特定时期，它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都取决于所考察的时期内生产力的状况。^② 617

不言而喻，凡是遇到发现和发明的地方，我们也会遇到“理性”。没有理性，发现和发明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地上出现人以前发现和发明之为不可能一样。我们叙述的这个学说一点也不忽视理性的作用；它只是力求说明为什么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理性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它并不藐视理性的成就，而只是力求为这些成就找出充分的原因。

① 大家知道，长时期以来俄国农民自己就能够拥有、而且常常拥有农奴。农奴的状况不可能使农民感到愉快。然而在俄国当时生产力状况下，任何一个农民都不会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积了几个臭钱的“庄稼人”同样自然而然地想起买农奴，就像罗马当年获释而自由的奴隶力求买到奴隶一样。在斯巴达克领导下起义的奴隶们同自己的主人进行了战争，但是没有同奴隶制进行战争；如果他们成功地夺得了自由，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心安理得地成为奴隶占有者。这里不禁想起谢林的一句有新意的话：自由应该是必然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自由只有在它成为经济的必然性时才会出现。——作者原注

② 在没有收进第2版的增补里，普列汉诺夫充分得多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1937年版，第209页）。——俄文版编者注

最近有人喜欢拿另一种理由来反对同一学说,我们且让卡列也夫先生来叙述这个理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作者一知半解地叙述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时说道,——恩格斯用新的看法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看法使得他的观点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以前他认为只有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才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研究家庭制度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这种变化是在婚姻家庭关系原始形式在新观念影响下发生的,这种新观念迫使他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人类世代的再生产过程。在这方面,影响正是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①,以及诸如此类。

总之,如果以前恩格斯“认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实在说来,他已经不再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了。卡列也夫先生以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的口吻叙述这一事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拿它作理由“跳着和玩着”,不过他们两人实质上说的是同样的内容,而且两人都重复着极其肤浅的德国著作家魏逊格伦在其《人类发展的规律》(*Entwicklungsgesetze der Menschheit*)一书中早就说过的话。

618 像恩格斯这样卓越的人物几十年来仔细地注视着当时科学的进展,因而给自己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补充”,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补充跟补充不同,就像“柴把儿跟柴把

^① 参看《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8月,第601页。——作者原注

儿不同”^①一样。在这个场合，全部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观点是否由于加进来的“补充”而变化了；他是否真的被迫承认与生产的发展同时还有似乎同它“势均力敌”的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任何一个稍微愿意仔细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人，都容易作出回答。

大象有时挥动树枝驱赶苍蝇，达尔文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这些树枝在大象生活中并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大象并不因为使用了树枝才成为大象。然而大象繁殖着。在雄象那里存在着同雌象的某种关系。在雌雄象那里存在着同子象的某种关系。显然，这些关系不是“树枝”造成的：它们是这一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造成的，在这些条件下，“树枝”的作用是如此的无限微小，以致可以毫无错误地认为它等于零。不过请设想一下，在大象的生活中，树枝开始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开始越来越影响到决定大象全部习惯的那些一般条件的结构，最后还影响到大象的生存本身。请设想一下，树枝终于获得了在创造这些条件的运作上的决定性影响，——那时不得不承认，它归根到底也就决定着大象同雌象和同子象的关系。那时不得不承认，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象的“家庭”关系是独立（在这些关系同树枝的关系的意义上）发展的，不过后来到了这样的时候，它们开始由“树枝”决定了。在这种承认中会不会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呢？根本没有，除了树枝意外地获得在大象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假设令人奇怪之外。我们自己也知道，对大象而言，这个假设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可

^① 语出莫里哀，参见《莫里哀喜剧选》（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译者注

是应用到人的历史上,事情就不同了。

人只是逐步地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我们的类人的祖先的生活中工具起着同样微不足道的作用,就像树枝在大象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过程中,类人的雄性同类人的雌性的关系,以及他们同他们类人的子女的关系曾经取决于跟劳动工具没有任何关系的该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那时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依赖于什么呢?这应当由自然科学家来解释。历史学家在这里暂时还无事可做。可是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生产力获得对社会关系(就是说也包括家庭关系)的全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这里就开始了历史学家的事业:他应当讲明,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随着他们的生产力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为什么变化,家庭是怎样依赖于经济关系而发展的。然而明显的是,一旦他着手从事这种解释,他在研究原始家庭时不得不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要知道早在劳动工具在人类生活中获得决定性意义以前人们就繁殖了;要知道早在这个时期以前由有智能的人(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生存的一般条件所决定的某种家庭关系就存在了。在这里历史学家究竟必须做什么事呢?第一,他必须问自然科学家要一张这个物种的履历表,把进一步研究人的发展亲手移交给他;第二,他必须“用自己的资料”来充实这张表。换句话说,他必须研究“家庭”,比如说,在人类发展的动物时期家庭是怎样造成的,然后再讲明,在历史时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由于经济关系的改变,家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恩格斯所说的也不过如此。我们要问:当他这样说时,他“最初”对生

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的观点是否有哪怕些微的改变呢？他是否除了这个因素的作用之外还认可了同它“势均力敌的”某个其他因素的作用呢？看来什么也没有改变，看来什么这样的东西也没有认可。不过如果没有，那么究竟为什么魏逊格伦先生和卡列也夫先生谈到他的观点改变了，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跳着和玩着呢？最可靠的原因是自己的轻浮。

我们的论敌们齐声喊道：“然而要知道哪怕在您所谓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把家庭的历史归结为经济关系史也是奇怪的。”也许是奇怪的，也许是不奇怪的：对此可以争论，我们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而且我们不反对同你们争论，先生们，但只有一个条件：在争论中要举止严肃庄重，认真地仔细思考我们的话的意思，不要把你们自己的虚构硬加在我们头上，也不要忙着在我们这里发现无论我们这里还是我们的导师们那里都没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的那些矛盾。同意吗？很好，请争论吧。

不能用经济关系的历史来解释家庭的历史，——你们说：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非科学的。我们的主张则相反，我们请几位专业研究人员来仲裁。

日罗-泰隆的书《家庭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你们自然是熟悉的吧？我们打开这本你们熟悉的书，在那里比如发现这样一段话：

“在原始部落内部(日罗-泰隆其实是说在游牧部落内部——*de la horde*)产生独特的家庭集团的原因，看来是同该部落财富的增长联系着的。任何谷类植物的使用或发现，任何新种动物的驯化，都能成为野蛮社会中使面貌根本改观的充分原因：文明时代的

一切伟大成就总是同居民经济生活中的深刻变化相一致的。”(第138页)^①

几页以后:

“看来,从女系亲族制度向男系亲族制度的转变,特别是以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性质的冲突为标志的”。(第141页)

再以后:“男权占优势的家庭组织,在我看来,到处都是由如此简单和如此自发的力量的作用所引起的……由所有权的作用所引起的”。(第146页)

你们自然知道麦克伦南认为杀死女性儿童在原始家庭历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大家知道,恩格斯对麦克伦南的研究的态度是很否定的;然而在这种场合了解一下麦克伦南关于引起似乎对家庭历史具有如此决定性影响的杀害女童现象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更为有趣。

“对于被敌人包围并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是艰难地维持其生存的部落说来,无论在防卫的意义上还是在谋取食物的意义上儿子都是力量的源泉,女儿则是虚弱的源泉。”^②

按照麦克伦南的意见,原始部落之杀害女童是什么引起的呢?生存资料不足,生产力低下,因为如果这些部落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大概不会由于害怕敌人有朝一日打来之后也许会杀害或俘虏他们的女孩而把她们杀死。

我们重申,恩格斯不同意麦克伦南对家庭史的观点,我们也觉

^① 我们据1874年法文版引证。——作者原注

^② 约翰·费尔格·麦克伦南(John Ferg. Mac-Lennan):《古代史研究——原始婚姻》(*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primitive marriage*),第75页。——作者原注

得这个观点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对我们说来这里重要的是，麦克伦南所犯的罪过就是人们责备恩格斯的那个罪过：他也是在生产力的状况中去寻找家庭关系史的谜底的。

我们是否继续我们的摘录，是否引证李佩尔特、摩尔根呢？我们看不到有这个必要：读过他们的著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他们犯了像麦克伦南或恩格斯一样的罪过。在这种场合，大家知道，就是斯宾塞也不是没有罪过的，但是他的社会学观点跟“经济唯物主义”毫无共同点。

后面这一情况，为了论战的目的自然可以利用，并且说：嘿，看看吧！这么说来，可以在这个和那个个别问题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而不同意他们的一般历史理论！当然可以。全部问题只在于在这里逻辑在谁一边。

继续讲下去。

日罗-泰隆说，家庭的发展取决于所有权的发展。他还补充道，文明的所有一般的成就都是同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变化相一致的。读者大概自己也看出来，日罗-泰隆使用着完全不确切的术语：在他那里，“所有权”概念似乎被“经济生活”概念所囊括。但是要知道，权是权，经济是经济，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特定的所有权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它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的影响下产生的（拉萨尔说，公民权始终只是经济关系的表现），然而也许它应把自己的起源归之于任何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这里应当继续进行分析，而不是恰恰在它获得特别深刻的、最为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刻中断它。

我们已经看到，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对所有权的起源问 622

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卡列也夫先生在其论文《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中提到德国的历史法学派^①。我们不妨也回想一下这个学派的观点。

下面就是我们这位教授关于这个学派所说的话：“当本世纪初德国产生所谓‘历史法学派’，开始把法不是看作以前的法律学家所以为的那种法律规范的不动体系，而是看作某种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着的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学派中就暴露出把对法的历史观点当作唯一完全正确的观点同这一领域所有其他观点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历史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科学真理的存在，即不允许用新的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的存在，甚至直接否定了这些规律，而和这些规律一起，用关于法对于各地条件的依赖性（即一切民族所共有的诸原则对各地条件的、自然是到处和永远都存在而并未删除的依赖性）的观念的名义否定了法的一般理论。”^②

在这些不多的几行文字中有很多——这怎么说呢？——比如，不正确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们和拥护者们会起来提出抗议的。比方他们会说，当卡列也夫先生把否定“用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加在他们头上时，那么他或者是故意歪曲他们的观点，或者是用对“历史学哲人”最有失体面的

^① 历史法学派——十九世纪主要法学流派，首先在德国兴起。开始时代表封建贵族利益，后来逐步演变成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维尼、普赫塔等。历史法学派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强调民族精神，主张继承历史传统，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译者注

^②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12页。——作者原注

方式混淆概念,把属于法的历史管辖的那些“规律”同决定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那些东西混为一谈:各民族历史发展顺序种种规律的存在,历史法学派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去否定,它正是力求发现这些规律,虽然它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它失败的原因本身却是极有教益的,而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费些力气对这原因仔细思考一下,那么——谁知道呢?——也许他最终会弄清“历史过程的本质”。

在十八世纪,人们曾经倾向于用“立法者”的活动来解释法的历史。历史法学派猛烈抨击了这一倾向。萨维尼还在1814年就这样表述了新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总和归结为以下所述:任何法都产生于按照通用的、不是完全确切的用语被称为习惯法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任何法开始都是由人民的习惯和信念产生的,后来则仅仅为法律学所产生了;由此可见,它到处都是由内部的不知不觉起作用的力量创造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造的”。^①

萨维尼后来在其名著《现代罗马法制度》(*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中发挥了这个观点。他在这里说:“实在法活在人民的普遍意识中,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人民法……然而这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时理解为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的成员按照他们的个人意愿创造的……实在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成员身上

^①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D.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论我们时代对立法和法科学的使命》(*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s*),海德堡,1840年第3版(1814年第1版),第14页。——作者原注

活跃着和作用着的人民精神创造的,因此实在法并非偶然地而且是必然地成为各个单个人物意识中的同一个法”。^①

萨维尼继续道:“如果我们对自己提出国家起源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像解释一般说来法的起源那样力求高度必然地用内在可塑力的作用来解释它;而且我们不仅一般地谈到国家的存在时这样说,而是谈到国家在每一个别民族那里所采取的那个特殊形态时也这样说。”^②

法也像语言一样是“以看不见的方式”产生的,它不是作为“抽象的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所以,一旦这里有必要,抽象的规则就会“通过某种人为的过程”,以自己的逻辑形式,从这个普遍观念中分离出来。^③

对我们说来这里跟历史法学派的实际意图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这一学派的理论,那么,根据上面引用的萨维尼的言论,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理论是:

(1) 对于十八世纪流行的、认为法由各个单个人物(“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立的那个观点的回应;企图为法的历史找出科学的解释,把这段历史理解为必然的,因而是合乎规律的过程;

624 (2) 企图从彻底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过程:“人民的精神”、“人民的意识”是历史法学派上诉的终审法院。

在普赫塔那里,这个学派的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表现得更为

① 《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14—15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22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16页。——作者原注

突出。

在普赫塔那里,正如在萨维尼那里一样,原始法就是习惯法。然而习惯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常有人说这样的意见,习惯法是生活实践创立的,但这只是对人民概念起源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个别场合。“正确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生活实践只是最后的因素,其中表现着和体现着已经产生的、活在特定民族儿孙们信念中的法。习惯只有在信念由于习惯而变得更自觉和更牢固的那种意义下才会影响信念”。^①

总之,人民对这一或另一法律制度的信念的创立,是不依赖于生活实践的、是早于“习惯”的。这个信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人民精神深处产生的。特定民族那里的这一信念的特定风格,由特定民族精神的特点来解释。这是很含混的,含混得这里连科学解释的迹象也没有。连普赫塔本人也感到,这里情况不太妙,于是他竭力用这样的议论来修补它:“法是通过看不见的途径产生的。谁会主动来仔细观察导致特定信念的产生、导致它的萌芽、它的增长、它的繁荣、它的出现的那些途径呢?那些着手做这件事的人大部分是从错误观念出发的”。^②

“大部分……”。就是说,也还有这样的研究者,他们的出发观念是正确的。这些人关于人民法观点的起源得出了哪些结论呢?

^① 《法制概论》(*Cursus der Institutioner*),第1卷,莱比锡,1841年版,第31页。在附注中普赫塔强烈地抨击力图调和关于法的起源的对立观点的折衷论者,一想起普赫塔这样一些话,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他预见卡列也夫先生会出现么?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在普赫塔时代的德国,那里的折衷论者是足够的:别的怎么样不敢说,这类聪明人却到处和永远都多得不可胜数。——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28页。——作者原注

当然啦,这对普赫塔始终是秘密,因为他除了空洞地援引人民精神的属性以外,没有前进任何一步。

625 上面引用的萨维尼关于法不是作为抽象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的见解,也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不难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萨维尼告诉我们这个有些紊乱的看法。如果我们假定法“作为抽象规则”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那么这样一来,第一,我们会同法律学家们的“普遍意识”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好地懂得人民是多么难以掌握这些抽象的规则,而第二,我们的法的起源理论就会具有极端不可思议的风貌。结果就会是,组成特定民族的人们,在互相加入任何实际关系之前,在获得任何生活经验之前,都给自己制定一定的法概念,并像徒步旅行者储备面包干一样把这些概念储存起来,然后他们才投身生活实践领域,踏上历史的途程。这自然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于是萨维尼便来取消“抽象的规则”:法不是作为一定的概念存在于人民意识中的;法不是现成晶体的集合,而是多少饱和的溶液。“一旦这里有必要”,就是说,一旦同生活实践接触,从这个溶液中就会沉淀出必需的法律晶体。这种手法不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机智,然而不言自明,它丝毫不会使我们接近对现象的科学解释。

举个例子。

在爱斯基摩人那里,用茵克的话说,几乎没有正规的财产;然而如果说得上是财产的话,他计算有三种:

“(1) 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财产,如冬季的住所……

(2) 属于一个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比方夏天的帐篷和一切属于家什的东西,如:灯、大圆桶、木盘、石盆等

等；用来运输所有这些包括帐篷、狗拉雪橇在内的东西的小船或大皮船，……最后，全部冬季食物……

(3) 个人的私有财产……衣服、武器和工具，或者一切个人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被加上同它们的所有者的某种很像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联系的神秘联系。把这些东西借给任何其他人都合乎习惯。”^①

我们力图从旧日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来设想一下这三种财产的起源。 626

既然，按普赫塔的话说，信念先于生活实践，而不是在习惯的基础上生长的，那就应当假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爱斯基摩人住在冬季的房屋以前，甚至在开始建造这些房屋以前，就得出了一旦他们有冬屋它们就会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信念：我们的野蛮人恰恰同样确信，一旦他们有夏天的帐篷、大圆桶、木盘、小船、盆、雪橇和狗，那么这一切就都要成为一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最后，他们对衣服、武器和工具应当成为个人财产，甚至不应当把这些东西借出去，也是同样坚信的。对此我们补充说，大概所有这些“信念”都不是作为抽象规则存在的，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存在的，而后，“一旦这里有必要”，即随着同冬季的房屋、同夏天的帐篷、同大圆桶、同石盆、同木盘、小船、雪橇和狗的接触，爱斯基摩人的习惯法规范就以其或多或少的“逻辑形式”从法概念的这个溶液中沉淀下来了。上述

^① 亨利·茵克博士(Dr. Henry Rink):《爱斯基摩人的传说和传统》(*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第9、30页。——作者原注

法溶液的诸属性就为爱斯基摩人的精神神秘属性所决定了。

这根本不是科学的解释；这是纯粹的废话(Redenstarten)，如德国人所说。

历史法学派的拥护者们所坚持的那个唯心主义变种，在说明社会现象的事业上比深刻得多的谢林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更加站不住脚。

科学是怎样从唯心主义所陷入的那个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呢？让我们听听现代比较法学最卓越的代表之一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意见。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指出原始部落社会生活带有共产主义的烙印，他(请听，瓦·沃先生：这也是“教授”)说：

“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这种制度的真实基础，如果我们想弄清曾经迫使我们的原始祖先、而且现在还在迫使现存的野蛮人坚持或多或少表现显著的共产主义的那些原因，我们就特别要弄清原始的生产方式。因为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要由财富的创造方式来决定。对于这个问题民族学是这样说的：渔猎民族之谋取食物通常是大群大群地进行的……在澳大利亚，猎取袋鼠是由几十甚至几百土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行的。在北方诸国猎取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毋庸置疑，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他需要援助和支持，而联合起来则会大大加强他的力量……因此我们把社会生产以及作为它的必然的天然结果的社会消费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民族学有很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①

^① 马·柯瓦列夫斯基(M. Kovalevsky)：《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52—53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援引勒米尼埃关于私有制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发生的唯心主义理论时继续道：

“不对，事情并非如此。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原始人才想到个人占有用来作为他的武器的、经过砍削的石头或用以遮身的兽皮。他得出这个想法是由于把他个人的力量应用于对象生产的结果。他用作斧子的石头是他用自己的双手砍削的。在他同无数同伴一起从事的狩猎中，他给了野兽最后一击，因此这个野兽的毛皮就成了他个人的财产。野蛮人的习惯法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准确性。它关切地规定，比方说，被追击的野兽落到了两个猎手的共同打击之下，这时兽皮就判给发出的箭深入到靠近心脏部位的那个猎手。野蛮人习惯法也规定在已经受伤的野兽被偶然遇到的猎手打死的那个场合下怎么办。个人劳动的使用合乎逻辑地因之也就产生个人的占有。我们可以通过全部历史仔细研究这个现象。谁种了果树，谁就是果树的所有者……后来，夺得某种虏获物的战士就成了这虏获物的绝对所有者，所以他的家庭对这虏获物已经没有任何权利；同样情况，祭司的家庭对于信徒们奉献的那些牺牲也没有权利，这些牺牲归入祭司的个人财产。这一切同样清楚地为印度的法律以及南方斯拉夫人、顿河哥萨克或者古代爱尔兰人的习惯法所证实。而且重要的恰恰是不要弄错作为运用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某种对象的结果而出现的这种占有的真正原则。实际上，当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同他身边的人们的帮助结合起来时……获得的对象已经不成为私有财

产了”。^①

在上述一切之后就容易理解,最先成为个人占有对象的是武器、衣服、食物、装饰品等等。“从一开始驯化动物的时候起,狗、马、猫、役畜就成了个人占有物和家庭占有物最重要的资源”。^②然而生产组织继续影响占有方式到何种程度,比如这样的事实可作说明:在爱斯基摩人那里,捕鲸是在大舢板上由大队的人群进行的;用于这个目的的舢板是社会财产,而用来运输归家庭所有的物品的那些小舢板则属于各个单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从农业出现以后,土地也成了占有的对象。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是多多少少大规模的血缘联盟。这自然是社会占有的形态之一。怎样说明这种占有的起源呢?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我们觉得,它的原因就在某个时候曾经导致占有大部分动产的同一社会生产中。”^③

不用说,私有财产一旦产生,就会同比较古老的社会占有方式发生矛盾。凡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诸个体的努力”开辟着日益广阔的场所的地方,社会财产就会相当迅速地消失,或者会在可谓残存的制度的形态下继续自己的存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原始的社会所有制的这一瓦解过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按其自然

①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起源和进化的情景》,斯德哥尔摩,1890年版,第95页。在已故的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概述》一书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占有方式为生产方式所决定。——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57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93页。——作者原注

的、物质的必然性，理应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们只要指出现代法学的那个普遍结论：法的概念——即法的信念，像普赫塔会说的那样——到处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谢林当年说过，磁性现象应当理解为“主观的东西”之深入“客观的东西”。为法的历史寻找唯心主义解释的一切企图都不过是唯心主义自然哲学的补充、“Seitenstück”[对应物、补足物]。这依然是对自满自足、自我发展的精神这个题目的那种有时光辉机智然而始终任凭臆断始终没有根据的议论。

法的信念光凭这样一点就不可能产生在生活实践之前：如果它不是从生活实践中生长出来的，那么它的出现就会是完全没有原因的。爱斯基摩人之所以赞成个人占有衣服、武器和劳动工具，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这种占有方便得多，而且是事物的性质本身所暗示的。为了学会好好地掌握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弓或飞旋镖，原始猎人应当适应它，好好地研究它的全部个别的特点，并且尽可能使它适应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① 私有财产在这里比任何其他占有形态都要理所当然得多，所以野蛮人才“确信”它的好

^① 大家知道，猎人和他的武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所有原始部落那里都是存在的。马尔齐乌斯谈到巴西原始居民时说，“猎人不使用任何别人的武器”，同时他还说明这些野蛮人的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那些用气管射击的野蛮人断言，外地人使用这武器，会把它弄坏的，所以他们不让它离开自己的手”。参见《论巴西土著人的法律关系》(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第50页。

“使用这种武器(弓和箭)需要很高的技能和不断的练习。旅行者报道说，凡是野蛮民族使用武器的地方，小孩们已经用儿童用的武器进行练习射击了”。参见奥斯卡·佩舍尔(Oskar Peschel)：《民族学》(Völkernunde)，莱比锡，1875年版，第190页。——作者原注

处：他，像我们所知道的，甚至认为个人劳动的工具和武器同它们的所有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过他的信念是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生长的，而不是产生在生活实践之前，也不应当把信念的起源归因于他的“精神”属性，而要归因于他所接触的那些事物的属性，以及归因于在他的生产力的特定状态下对他说来必不可免的那些生产方式的性质。

原始法中存在着的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明，生活实践在何等程度上先于法的“信念”。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跟着改变了，生活实践改变了，而“信念”却保存其旧日的形态。信念和新的实践相矛盾，于是就出现虚构的东西、象征性的标记和行为，它们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形式上消除这个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矛盾被根本上消除：在新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的信念。

确认特定社会中出现对这些或另一些对象的私人所有制，不足以用来规定这个制度的性质。私有制总是有界限的，这些界限完全依赖于社会的经济。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在野蛮状态下，人占有的只是直接对他有利的事物。多余的东西，即使是他双手劳动所得，他通常也是无偿地让给其他人：家庭的或氏族的或部落的成员”。茵克关于爱斯基摩人所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① 在野蛮民族那里，这些制度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用柯瓦列夫斯基

^① 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 with a sketch of their habits, religion, language and other peculiarities*），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先生的话说,它们应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野蛮人不知道储蓄。^①这个不十分明确的用语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因为庸俗经济学家们过分滥用了它。然而我们这位作者在什么意义下使用这个用语则是明白易懂的。原始民族确实不知道“储蓄”,原因简单,因为他们实行储蓄是不方便的,干脆地说,是不可能的。被杀死的野兽的肉基本上不能“储蓄”:肉会变坏,那时就完全不宜于食用了。当然,如果可能把它卖掉,那么把卖得的钱币“储蓄起来”是很容易的。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钱币还不存在。所以,原始社会经济本身给“节约”精神的发展规定下有限的空间。况且,今天我有幸杀死一头大动物,于是我把它的肉分给其他的人们,而明天(狩猎是不可靠的事情)我空手回来时,我们氏族的其他成员就会把猎获物分给我。这样,作为类似相互保险的某种东西的分享的习惯出现了,没有这种保险,狩猎部落的生存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后不要忘记,在这些部落那里私有财产只存在于萌芽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公有财产;在这个基础上生长的习惯和风俗反过来限制着私有者的个人意愿。信念在这里也是跟随在经济后面的。

洛贝尔图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喜欢引用的那个例子说明人们的法概念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的联系。大家知道,古代罗马著作家们强烈地抨击了高利贷。卡托监察官认为高利贷者比小偷坏两倍(老头子[按:指洛贝尔图斯]也这样说:等于两倍)。在这方面基督教神父们同异教的著作家们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值得

^① 指亨利·茵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话和传说,附及他们的习惯、宗教、语言和其他特征简述》,爱丁堡和伦敦,1875年版,第56页。——作者原注

注意的事情！——无论这些人或那些人都抨击货币资本产生的利息。对于实物借贷和这些借贷带来的暴利，他们的态度就无比的温和。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因为正是货币的、高利贷的资本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骇人听闻的破坏，因为正是这种资本“毁灭了意大利”。法的“信念”在这里也是同经济携手并进的。

波斯特说：“法是必然性或者确切说是需要的纯粹的产物。我们徒然在法中寻找任何理想的基础”^①。如果我们这位学者没有暴露出相当大的和按其后果很有害的概念混淆，我们就会说，这完全符合现代法科学的精神。

一般说来，任何社会联盟都力求制定出这样的法系统：它最好地满足这个联盟的需要，它是特定时期有利于这个联盟的。法设施的特定总和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这一情况，无论如何不会取决于任何什么“理想”或任何什么人的“理想”的属性：它取决于，像我们看到了的，那些生产方式，取决于人们之间那些由这些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法没有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基础，因为法的基础始终是现实的。然而任何特定法系统的现实基础并不排除来自特定社会成员方面的对待这个系统的理想态度。整个说来社会只会从社会成员对待特定法系统的这种态度中
632 获得益处。相反，在社会的过渡时期，当社会中现存的法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生长出来的社会需要时，居民中的先进部分就可能而且定会把比较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设

^① 阿尔贝·波斯特博士(Dr. Alb. Herm Post):《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Der Ursprung des Rechts. Prolegomena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eichenden Rechtswissenschaft*), 奥登堡, 1876年版, 第25页。——作者原注

施系统理想化。法国文献充满着对事物来临的新秩序的这种理想化的例子。

法之起源于“需要”只有在习惯于把需要划入粗俗的物质领域并将这一领域同“纯粹的”、异于任何需要的“精神”对立起来的那些人的观念中才会排除法的“理想的”基础。在现实中只有那种对人们有益的东西才是“理想的”，而且任何社会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都仅仅以自己的需要为指导。这个毋庸置疑的普遍规则中的一些表面上的例外，可以用社会理想往往由于社会的发展而落后于新的社会需要来解释。^①

社会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状况的意识越来越深入现代社会科学，尽管许多学者有不可避免的折衷主义，尽管他们有唯心主义的偏见。“正如比较解剖学将拉丁谚语‘睹爪知狮’提升到科学真理的水平，民族学也可以从特定民族的武装准确地推断出该民族的文明程度”，——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奥斯卡尔·佩舍尔说^②，——

① 波斯特正是属于还远没有同唯心主义断绝关系的人们之列。例如他认为氏族联盟适合于狩猎生活和游牧生活；随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定居生活的出现，氏族联盟就让位于“Gaugenossenschaft”（我们可以说：邻居公社）。一个人不在别的东西中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寻找说明社会关系史的钥匙，看来是明显的？在一些个别场合，波斯特几乎总是相信这种方向正确。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把“活在人身上的永恒的创造精神”看成法的历史的基本原因。这个人似乎是为了使卡列也夫先生高兴而故意创造出来的。——作者原注

② 《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139页。——当我们摘引这段话时我们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从自己的座位上迅速站起来喊道：“我可以对此进行争论：中国人可以用英国的枪械武装起来。允不允许根据这些枪械判断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呢？”很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英国人的枪械推论出中国人的文明是不合逻辑的；从这些枪械推论出的正是英国人的文明。——作者原注

“社会的分化同食物的谋得方式最紧密地联系着。在人与人相结合的一切地方都出现某种权力。在巴西流浪的狩猎游牧人群中社会的束缚最为薄弱。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捍卫自己的领域，而且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军事首领……游牧部族大都处在父权制统治者的权力之下，因为畜群通常是属于一个主人的，与他同部族的人们或者先前独立后来却贫困了的畜群所有者都侍奉他。游牧生活方式多半（虽然不是唯一）习惯于民族大迁徙，像在旧大陆北部以及南部非洲；相反，美洲的历史只知道野蛮的狩猎部族偶然攻击引起他们兴趣的开化民族的田野。整个民族离开自己先前居住的地方以后，只有带着自己的、一路给他们提供必不可少的食物的畜群才能进行大规模的、长时期的远征。此外，草原畜牧本身就促使牧场的变更。跟定居的生活和农耕一起立即出现了利用奴隶劳动的企图……奴隶制迟早就导致暴政，因为有最大数量奴隶的人可以借助他们使最弱小的人们服从自己的个人意愿……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分是社会等级区分的开始”。^①

在佩舍尔那里有许多这类议论。其中一些是完全公正的和很有教益的；对另一些“可以争论”，不是只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人。不过在这里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细节，而是佩舍尔思想的一般倾向。而这个一般倾向同我们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经看到的那个倾向完全一致：他在生产方式中，在生产状况中寻找法的历史，甚至整个社会制度的解释。

^① 《法的起源。普遍比较法科学导论》，第 252—253 页。——作者原注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早就坚决地建议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去做的事情。《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那篇著名序言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全部(读者下面会看到,为什么我们说:不是全部),也就在这里。这篇序言在我们俄国这么不走运,读过它的原本或摘要的大多数俄国著作家都如此可怕如此奇怪地不理解它。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遇到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①

黑格尔讲到谢林时说,在这位哲学家那里,体系的基本命题仍然是没有得到发挥的,而且绝对精神像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地出现。^② 当中等的俄国知识分子听说,在马克思那里,“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基础”(另一些人简单地说:“归结为经济的东西”)时,他感到迷惑,仿佛他耳边突然手枪发射:“干吗归结为经济的东西呢?”——他厌倦而狐疑地问。“当然,经济的东西也重要(特别是对于贫困的农民和工人)。不过要知道,智能的东西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希望上面的叙述已经向读者表明,中等俄国知识分子的狐疑之所以发生在这种场合只是因为他这个知识分子对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智能的东西”总是有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②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译者注

点漠不关心。当马克思说“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找”时，他根本没有想到用突如其来的发射使学术界困惑不解：他只是对于整个世纪以来折磨着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的那些“老大难问题”作出了直率的和确切的回答。

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彻底发挥他们的感觉论观点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具有其全部思想、感觉和意愿的人乃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把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人的学说，理应解决究竟什么东西制约着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的问题。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不善于回答这个问题，从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惯例，回到旧时的、他们如此猛烈指责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说，环境由人们的“意见”所创造。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个肤浅的回答，给自己提出了分析社会环境的目的。他们分析的结果是那个对科学说来极其重要的结论：政治结构生根在社会关系中，而社会关系是由所有制的状况决定的。同这个结论一起，在科学面前产生了一个如果不加以解决科学便不能前进的新问题：所有制状况又取决于什么？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结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不得不用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东西的关于人性的属性的种种看法来避开问题。跟他们生活和活动在同一时代的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谢林和黑格尔——已经清楚地懂得人性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个观点。他们都懂得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应当在人的本性之外去寻找。这是他们作出的巨大功绩，然而要使这一功绩成为对科学充分富有成效的东西，理应指出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

把钥匙。他们是在精神的属性中，在绝对观念的发展的逻辑规律中寻找钥匙的。这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们的根本错误，这一错误转弯抹角地使他们回到人性的观点，因为绝对观念——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无非是我们的逻辑思维过程的化身。马克思的天才发现改正了唯心主义的这一根本错误，从而给予它以致命的打击：所有制的状况，而同它一起的还有社会环境的全部属性（在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不得不承认“所有制状况”的决定性意义），不是由绝对精神的属性决定的，也不是由人性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即在自己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中彼此必然发生的那些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人们常常把马克思比之于达尔文。这种比拟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卡列也夫先生及其同伙产生止不住发笑的心情。下面我们将说明应该在怎样的意义上理解这个比拟，不过许多读者大概无须我们提醒也都看到了这一点；现在，请我国的主观思想家们别介意，我们来作另一番对比。

在哥白尼以前，天文学曾教导说，地球是不动的中心，太阳和其他星球围绕地球旋转。用这种观点不可能说明天体力学的许多现象。这位天才的波兰人从完全相反的方面着手说明这些现象：他假定，不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而是相反，地球绕太阳旋转，于是正确的观点找到了，于是哥白尼以前弄不明白的事情中许多东西开始弄明白了。——马克思以前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从人性概念出发，因此人类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始终不可能解决。马克思的学说对事态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当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马克思说过——而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他也就改变着自己的

本性。^① 所以,对历史发展进行科学解释的事业应当从完全相反的一端开始:应当弄清楚,人通过生产而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这一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按其对科学的巨大重要性来说,可以大胆地拿这一发现同哥白尼的发现相提并论,以及同最伟大的、最富有成效的科学发现相提并论。

老实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比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更加没有坚实的基础。法国人过去和现在都把有关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称作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精神的和政治的科学)^②,以别于“sciences”这个本来意义下的“科学”,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sciences”是唯一确切的科学。同时必须承认,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确切的。当学者们把人的本性看作最高审判庭而向之上诉时,他们就必然要用人们的观点、人们的自觉活动来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然而自觉的活动乃是人的这样一种活动,它必然要被人看成是自由的活动。可是自由活动是排斥必然性概念即规律性概念的,而规律性则是对现象的任何科学解释的必然基础。自由观念排挤了必然性概念,从而妨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谬误的见解到现在为止可以异常明白地在“主观的”俄国作家们的“社会学”著作中看到。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自由应当成为必然性。由于排挤了必然性概念,自由观念本身就变成极端暗淡而且很少令人快慰的东西。从大门赶出去的必然性从窗口飞了进来;研究者们从自由观念出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② 这里的“精神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译者注

发,时时刻刻都碰到了必然性,而且终于只得伤感地承认必然性的注定不幸的、无法抗拒的、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住的作用。使他们觉得惊奇的是,自由原来是孤立无援和不可救药的终身纳贡者,是盲目的必然性手中无能为力的玩具。而且最清楚最高尚的唯心主义头脑有时产生过的那种悲观失望真是令人感动。“已经有几天了,我每分钟都握着笔,——乔治·毕希纳说,——可是写不出一个字。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感到了自己仿佛被令人恐怖的历史宿命论所压倒。我在人的本性中看到叫人厌恶的平庸,在人类的种种关系中看到一般说来属于所有人个别说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个别人物只是浪潮表面的泡沫,伟大只是偶然,天才的权力只是木偶似的恶作剧、反对铁的规律的可笑的企图,这种规律充其量只能认识,却不能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①可以说,就是为了避免其实完全合乎规律的悲观失望的这些发作,值得 637 哪怕暂时离开旧观点和试图放弃自由,以便向这个嘲笑自由的必然性本身求诉;应当再一次重新审查唯心主义辩证法家已经提出的关于自由是不是从必然性中产生,这个必然性是不是构成人类自由唯一坚实的基础、唯一可靠的保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的问题。

我们会看到,在马克思那里这种企图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过我们预先要力求弄清楚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以便我们对这些观点没有留下任何误解。

在生产力特定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

^① 载 1833 年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的注释:这不是曾经宣传“一般哲学意义下”的唯物主义的那个毕希纳;这是他早已故去的兄弟、著名悲剧《丹东之死》的作者。——作者原注

在人们的法的概念中和在或多或少“抽象的规则”中，在不成文的习俗和成文的法律中得到自己的观念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对我们说来已经没有必要了：现代的法科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替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读者尽可以回忆一下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然而不妨从另一方面，即从下述方面看看这个问题。一旦我们弄清楚了人们的法概念怎样由他们的生产关系所创造，我们就不会对马克思下面的话感到惊奇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即决定他们的社会生存形式），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对意识的一个领域，事情确实如此以及为什么如此。接下来我们只要解决，事情是否永远如此，以及如果是的话，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永远这样？暂时我们只讲到那些法概念。

“社会生产力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便同这个社会中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同生产力一直在其内部发展着的所有制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②

638 动产和不动产的社会所有制，其产生是由于它对原始生产过程是适合的，尤其是必要的。它维持着原始社会的生存，它促进原始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人们坚持这种所有制，他们认为它是自然的和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所有制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之内，生产力发展到为运用个人的努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园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8—9页。——译者注

地。现在社会所有制在某些场合变成对社会有害了，它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它就让位于个人的占有：在社会的法设施中进行着或多或少迅速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的法概念中的变革：以前认为只有社会所有制才对头的人们，现在开始觉得在某些场合个体占有更好些。其实，不，我们说得不准确，我们描述为两个个别过程的，乃是完全不可分离的东西，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理应改变，而且这些新的实际的关系表现在新的法概念中。

卡列也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时也像唯心主义一样是片面的。按照他的意见，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只是完全的科学真理发展中的“契机”。“跟随第一个契机和第二个契机之后应该出现第三个契机：正题和反题的片面性在作为完全真理的表现的合题中找到自己的调和”。^① 这将是很有趣的综合。“这种综合会是什么呢？——教授先生补充道，——我暂时不来说。”可惜呀！幸而我们这位“历史学哲人”并不很严格地遵守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这条沉默的戒律。他立刻使人们懂得，这一完全的科学真理是什么以及从哪里生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真理最后将为文明人类所理解，不过暂时只有卡列也夫先生知道。它是从以下的见解中产生的：“每一个人类个体都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过着双重的生活——物理生活和心理生活，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物质需要的肉体，也不是仅仅出现为具有其智力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灵魂。无论在人的肉体那里还是人的

^①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6页。——作者原注

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也就是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而且这些关系都是双重种类的”^①。

说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个“合题”是公正的,不过已经不那么很新鲜了。如果教授先生懂得近代哲学,那么他应该知道,关于它,关于这么一个“合题”,近代哲学史在整整几个世纪的流程中已经说得舌敝唇焦了,却并未能以应有的方式对付得了。而且如果他想用这个合题替他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那么瓦·沃先生本人应当会同意,他的“教授”遇到某种不顺手的事,而且不是卡列也夫先生注定会成为“历史哲学”的斯宾诺莎。

随着引起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全部所有制关系也在变化。不过要知道,基佐早就告诉过我们,政治结构生根在所有制关系中。这一点完全为现代科学所证实。血缘联盟之让位于地域联盟正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产生的变化。多少庞大的地域联盟之融合为被称作国家的机构,也是由于所有制关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者由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新的需要。这一点例如对于东方各大国是很好地弄清楚了的。^② 这一

①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作者原注

② 参看已故的列·梅契尼柯夫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河流》*一书。在这本书里,作者实质上只是总结了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例如勒诺尔芒得出过的那些结论。埃利泽·邵可倡在该书序言中说,梅契尼柯夫的观点构成科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观点不是新的:黑格尔早就以最确定的方式发表过它。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如果彻底坚持它,科学得到的好处将是异乎寻常之多的。——作者原注

* 普列汉诺夫讲的是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著作《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La civilisation et les grands fleuves historiques*),附埃利泽·邵可倡的序言,巴黎,1889年版。苏联“劳动之声”版,1924年。[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请看本书附录四。]——俄文版编者注

点对古希腊罗马各国也是同样好地弄清楚了的。^①而且一般说来,对任何特定的、关于其起源我们有足够知识的国家,都不难指明这一点。这里只需要不有意无意地使马克思的观点变成狭隘的。我们想说的意思有如下述。

生产力的特定状况制约着特定社会的内部关系。不过要知道,这种状况也制约着特定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外部关系。在这些外部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出现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生长出新的机构。如果用肤浅的观点看问题,各个社会的相互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一系列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⁶⁴⁰基础正是经济,经济既决定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实在的(而不是仅仅外部的)根据,也决定这些关系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自己的武装系统、自己的战术、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国际法。自然可以指出,在许多场合下国际冲突同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马克思的信徒中间没有人会想要对这些场合的存在提出异议。他们只是说:不要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要更深入些,要问问自己,特定的国际法生长在什么基础上?某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是什么造成的?——于是您最终要转到经济上。诚然,考察各个个别场合是有困难的,因为参加斗争的往往是经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各个社会。

不过在这里眼光敏锐的论敌们异口同声地打断我们。“好,——他们喊道,——假定政治关系生根在经济关系中。可是

^① 参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一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者原注

一旦有了政治关系,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关系。所以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且除了相互作用什么都没有。”

这个反对意见不是我们虚构的。下面这桩“真实事件”说明“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对这个反对意见珍视到何等程度。

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引用事实说明英国贵族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办妥自己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勾当。在《黑格尔的及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标题下写了“批判的经验”的保尔·巴尔特博士抓住这一点责备马克思陷于矛盾^①:据他说,您本人就承认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而作为相互作用真正存在的证据,我们的博士引证施特尔涅格的一本书,这位著作家为研究德国经济史做了许多工作。卡列也夫先生认为,“可以把巴尔特书中用来批判经济唯物主义的几页指定为应当怎样解决经济因素的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范例。”不言自明,他没有放过机会向读者推荐巴尔特的反对意见和伊纳马·施特尔涅格的权威声明,“声明甚至表述了这样一个普遍的论点: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的根本特点”。应当哪怕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乱七八糟的思想。

第一,伊纳马·施特尔涅格实际上说了什么呢?关于加洛林

^① 普列汉诺夫指保尔·巴尔特在《黑格尔的和马克思与哈特曼以前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 莱比锡,1890年版,第49—50页)一书中向马克思提出的反对意见。——俄文版编者注

时代^①的德国经济史他提出以下的见解：“构成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发展根本特点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可以最确切地进行仔细考察。落到特定民族身上的政治作用，对该民族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对该民族社会设施的格调和制定，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民族固有的内在力量和这个民族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样准确地决定着它的政治活动的手段和方式。完全一样，加洛林辈的政治制度对当时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的影响，并不小于人民的自发力量、他们的经济生活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影响，给它打上了特有的印记。”^②如此而已。不过这不多的话被认为足以驳倒马克思。

第二，现在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法和政治的关系所说的话。

“法的和政治的设施是在人们在生产的社会过程中的实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到时候，这些设施促进着民族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繁荣。”这是马克思的准确的话，我们要问随便哪个认真负责的人，这些话中有没有否定政治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以及提醒马克思注意这个意义的那些人是否驳倒了他？说马克思那里连这种否定的影响都没有以及上述那些人根本

^① 加洛林时代，指加洛林王朝时代。加洛林王朝，指法兰克王国公元751年起的王朝和公元800年起的帝国王朝。第一个国王是矮子丕平。王朝称号取自查理大帝的名字。公元843年帝国解体后，该王朝在意大利统治到公元905年，在德意志统治到公元911年，在法兰西统治到公元987年。——译者注

^② 《加洛林辈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is zum Schluss der Karollngenperiode)，莱比锡，1889年版，第1卷，第233—234页。——作者原注

没有驳倒任何东西,难道不对吗?真的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竟然不得不认为不是是否驳倒马克思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对他理解得那么坏的问题么?而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用法国谚语“世间最漂亮的姑娘也不能提供比她所有更多的东西”作答。马克思的批判家们不可能超越乐善好施的天性准许他们理解的那个限度。^①

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就像卡列也夫先生不理解马克思一样,同样没有疑问。然而相互作用的存在是否禁止我们在分析社会生活的工作上继续前进呢?否,这样想就几乎意味着以为卡列也夫先生暴露的不理解似乎会妨碍我们获得正确的“历史学哲人的”概念。

政治设施影响经济生活。它们或者促进经济生活的发展,或者阻碍这种发展。第一种情况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丝毫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因为特定政治制度之所以创立,正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

^① 马克思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巴尔特推断说,——政治,按照您的意见,对经济完全没有影响,然而您自己就举出种种事实说明……等等——好哇,——卡列也夫先生喊道,——这就是我称之为应当怎样同马克思争论的那种模范!卡列也夫先生的“模范”一般说来显现出令人吃惊的思想力量。“卢梭,——模范说,——生活在等级差别和特权盛行到极点,所有的人都屈从于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制度的社会中;但是,卢梭运用从古希腊罗马那里借用的、理性地建立国家的方法(这个方法,霍布斯和洛克也利用过)来创立以普遍平等和人民专制为基础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同法国现存的制度是完全矛盾的。卢梭的理论为国民公会在实践上实现了;因此,哲学影响了政治,而通过政治的中介又影响了经济。”(前引书《加洛林时期结束前德国经济史》,第58页)这个光辉的论据使您多么高兴,为了这个论据,卢梭,这位贫穷的日内瓦拥护共和政体者之子原来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同巴尔特先生争论,等于反复讲同样的话。不过关于对巴尔特鼓掌的卡列也夫先生,说什么呢?嘿,瓦·沃先生,不好,天哪,您的“历史教授”不好!我们毫无私心地建议您:给自己找个新的“教授”吧!——作者原注

进一步发展(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创立,在这个场合对我们完全一样)。第二种情况丝毫不会跟这一观点发生矛盾,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一旦特定的政治制度不再符合生产力的状况,一旦它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它就开始走向衰落,最后被消灭。不仅这种情况不违反马克思的学说,它还是最好不过地证实着他的学说,因为正是这种情况表明,在怎样的意义上经济主宰着政治,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先行于民族的政治发展。

经济的进化引起法的变革。这一点形而上学者是不容易理解的,他虽然大肆宣扬相互作用,却习惯于一个接一个而且互不相干地考察现象。相反,一个哪怕稍微能作辩证思维的人则不难理解这一点。他知道,量的变化逐渐积累以后,最终会引起质的变化,而且质的这些变化乃是飞跃、渐进性中断的契机。 643

在这里我们的论敌自己已经忍不住了,并且喊出“СЛОВО И ДЕЛО”[暗语,意即“有人造反”]^①:要知道黑格尔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叫嚷着。整个自然界都是这样行动的,——我们答道。

说话容易做事难。运用到历史,这句谚语可以改为这样:故事说来很简单,但事情做起来却极端复杂。要知道,说生产力的发展引起法设施中的变革,这是容易的!这些变革乃是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成员的利益以最奇异的方式聚合在一起。对于一些人说来维持旧秩序是有利的,于是他们使用他们所能用上

^① 在莫斯科罗斯及 1762 年前的俄国,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某某人要造反时,就喊这句暗语。——译者注

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这些秩序。对另一些人说来,旧秩序已经变成有害的和可恶的,于是他们竭尽他们所有的全部力量来攻击这些秩序。而且这还不是一切。革新者的利益也远不是始终相同的:对一些人说来,某些改革更重要,对另一些人则另一些改革更重要。在改革者的营垒中产生了争论,斗争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按照卡列也夫先生公允的见解,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争取最无可怀疑的物质利益的斗争,必然在进行争论的各方面前提出毫无疑问属于精神上的问题:关于正义的问题。旧秩序同正义矛盾到什么程度?新要求同正义适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必然会在斗争者的头脑中产生,不过斗争者并非总是把正义简单地称为正义,而是也许用任何一种类人的或者甚至是类兽的女神的形态把它体现出来。于是,违反卡列也夫先生给它们定下的誓词,“肉体”产生“灵魂”:经济斗争,引起道德问题,而“灵魂”在更仔细的观察下原来是“肉体”:守旧派的正义原来往往是剥削者的利益。

以如此惊人的机智硬说马克思否定政治的意义的同一些人又断言,似乎不论对人们的道德概念、哲学概念,还是宗教概念、或者美学概念,他都根本没有赋予任何意义,他到处都只看见“经济的
644 东西”。这又是造作的废话,如谢德林所说。马克思没有否定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他只是说明它们的起源。

“什么是电?——特种运动。什么是热?——特种运动。什么是光?——特种运动。啊,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您既没有给光,也没有给热,又没有给电以意义啰?在您那里一切都只是运动;概念多么片面,多么狭隘!”正是这样,正是狭隘,先生。您出色地理解了能量转化学说的意义。

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必然引起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一定的集合,也就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结构。而一旦有了社会结构,就不难理解这结构的性质一般说来会表现在人们的全部心理上,表现在他们的全部习惯、风尚、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上。习惯、风尚、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要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适应他们为自己谋得食物的方式(佩舍尔的说法)。社会的心理始终符合社会经济的目的,始终适应社会的经济,始终由社会经济所决定。这里重复着希腊哲学家们早在自然界中就看到了同一种现象:合目的性取得胜利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不合目的的东西因为自己的性质本身注定要灭亡。社会心理对社会经济、对社会生活条件的这种适应,对于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社会说来是不是有利呢?非常有利,因为不适应于经济的、同生存条件相矛盾的习惯和观点,会有碍于维护社会的生存。合乎目的的心理对社会说来同样是有益的,正如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目的的器官之有益于有机体一样。然而说动物器官应当适应动物生存的条件,这是否等于说器官对动物没有意义呢?完全相反。这等于承认器官的极大的、器官的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很贫乏的头脑才会用另外的方式理解问题。至于心理,情况也是完全一样的,先生们,正是完全一样。承认心理适应社会经济,马克思从而也就承认了心理巨大的、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意义。

马克思和例如卡列也夫先生之间的区别,这里归结为后者尽管有其对“合题”的爱好,却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二元论者。在他那里,这边是经济,那里是心理;一个口袋里装着灵魂,另一个口袋里装着肉体。这些实体之间有相互作用,不过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保

645 持自己独立的存在,这个独立存在的起源是无人知道的。^① 马克思的观点消除了这个二元论。在他那里,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乃是人们的“生命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这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斗争中他们由于生产力的特定状况而以某种方式集合起来。争取生存的斗争创造他们的经济;在经济的这个基础上生长出他们的心理。经济本身像心理一样也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且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都在变化:生产力的新状况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也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由此可见,只有在通俗讲话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经济本身乃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函数”。

现在就来详细讲讲注释中承诺过的话。“无论在肉体那里还是在灵魂那里都有自己的需要,这个需要寻求着自己的满足,并且使单个的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界和对其他人们……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依赖于个人的物理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这种关系一方面创造出旨在保障个人的物质存在的各种技艺,另一方面则创造出全部智能的和道德的文化……”^② 人对待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生根在肉体的需要中,生根在物质的属性中,应当在肉体的需要中寻找狩猎、畜牧、农耕、制造业、贸易和货币业务的原因。——按照健全的看法,这自然是如此;要

^① 不要以为,我们在诽谤可敬的教授。他满口赞扬地引用巴尔特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法有独立的、虽然并非不依赖的存在”。就是这个“独立性,虽然并非不依赖性”妨碍卡列也夫先生认识“历史过程的本质”。究竟怎样妨碍,下面正文中马上就要详细讲。——作者原注

^② 引自卡列也夫的文章“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7页。——俄文版编者注

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肉体,我们干吗需要牲口和野兽、土地和机器、贸易和黄金呢?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没有灵魂的肉体是什么呢?不过是物质,然而要知道,物质是死的。要是物质本身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话,它自己是任何东西也创造不出来的。因此捕捉野兽,驯养牲畜,耕种土地,搞贸易和在银行开会,不是物质凭自己的智慧,而是根据灵魂的指示进行的。因此,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所以产生的最后原因应该在灵魂中去寻找。因此,在灵魂那里也有双重的需要;因此,灵魂也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 646 而其结果有点儿很荒谬。而这不是一切。并且还由于下面的原因不由自主地感到“疑惑”。按照卡列也夫先生,结果是在肉体需要的基础上生长出人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态度。但这是否确切呢?只对自然界么?卡列也夫先生也许记得修道院院长吉贝尔怎样诅咒力图使自己摆脱封建枷锁的城市公社,这些“卑鄙的”机关,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是逃避封建赋役的公允执行。这里,在修道院长吉贝尔身上说话的是什么呢:“肉体”还是“灵魂”?如果是“肉体”,那么因此我们又要说,肉体也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而如果是“灵魂”,那么因此灵魂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因为灵魂在所考察的这个场合很少显现卡列也夫先生所说的构成“灵魂”特有特点的那种对待现象的无私态度。这里请把它弄个明白吧!也许卡列也夫先生会说在吉贝尔修道院长身上说话的其实是灵魂,不过是在肉体的指使下说话的,而且在抓捕野兽、在银行开会等等的事务上所发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然而第一,为了指使,肉体也应当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而第二,“粗陋的唯物主义者”可能指出,要是灵魂是在肉体指使下说话的,因此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

一情况就根本保证不了任何东西：也许在整个历史上灵魂只做了在肉体指使下说话这件事？卡列也夫先生对这种假设自然感到气愤，于是开始驳倒“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坚定地确信，胜利会在可敬的教授一边，不过在这场斗争中，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对他的帮助多不多呢？

而且这还不是一切。在卡列也夫先生那里我们读到，在个人精神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神话和宗教……文学和艺术”以及一般地——“对外部世界（还有对自己本身），对存在和认识问题的理论态度”，以及“对外部现象（和自己本身的意念）的无私的、创造的再生产”。我们相信了卡列也夫先生。不过……我们有位熟识的、热心研究制造业技术的工学院大学生，在他那里对于卡列也夫先生所有列举的东西的“理论的”态度并没有显现出来。于是我们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这位朋友莫不是由一个肉体组成的么？我们请卡列也夫先生尽快解决这个折磨我们、也使这位年轻的、极有才干、甚至可能是天才的工学院学生感到受辱的疑问。

647 如果卡列也夫先生的议论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意义就只是：人身上有高级的需要和低级的需要，有利己主义的意图和利他主义的感情。这是最无可争辩的真理，但是完全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的基础。凭着这个真理，您不会比对人性的题目的没有内容的早已陈腐不堪的议论走得更远，它本身无非就是这样的议论。

当我们同卡列也夫先生谈话时，我们那些眼光敏锐的批评家开始抓住我们的自相矛盾，主要是我们同马克思的矛盾。我们说过，经济不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同时我们又断言，社会心理适应社会经济，这是第一个矛盾。我们说，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

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然而马克思本人说,经济是现实的基础,在它上面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这是第二个矛盾。对我们说来,尤其不光彩的是,在这里我们同我们着手叙述其观点的那个人发生意见分歧。让我们解释一下吧。

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说法同马克思的一字不差,可见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所以,如果什么地方有矛盾的话,那就只在社会经济对社会心理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有没有矛盾。

请读者回忆一下私有财产是怎样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处于这样一些生产关系中,在这些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个人占有某些物品对生产过程是比较适合的。因此,原始人的法概念变化着。社会心理适应着社会的经济。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必然耸立起适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然而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一个新步骤使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处于新的、相互的、同过时的生产关系不相符的状态中。这些新的、从未有过的状态必然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使它发生很大的变化。究竟朝哪个方面变化呢?一些社会成员保卫旧秩序,这是些停滞不前的人。另一些认为旧秩序对他们不利的社会成员则主张前进;他们的心理向逐渐取代古老过时的经济关系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方向改变。心理对经济的适应,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在继续,然而缓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①

^① 实质上这是现在欧洲无产阶级经历着的同一心理过程:它的心理已经在适应新的未来的生产关系。——作者原注

这个革命一旦实现,就会建立社会心理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完全适应。那时新经济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新心理的极度繁荣。在某段时间内这种适应是牢不可破的;它甚至会越来越巩固。然而慢慢地出现新的不和谐的幼芽:先进阶级的心理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其生命再次超越旧的生产关系:由于一刻也不停止去适应经济,它重又适应着构成未来经济萌芽的新的生产关系。喏,这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么?

直到现在我们主要是举财产法领域中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法无疑正是那个思想体系,不过是初等的、可以说低级的思想体系。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即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

说经济在这些思想体系的发展中是基础,这意思是指,社会应当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便抽出某一阶层的人,专门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科学的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业。其次,上面引用的柏拉图和普鲁塔克的观点说明,社会中脑力劳动的方向本身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关于科学,维科早就说过,科学是从社会需要中生长出来的。对于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说来,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它的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别基奥伯爵公正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特别证实这个规则:实践永远和到处都先于科学。^①

^① “直到它(政治经济学)在十七世纪刚刚开始萌芽时为止,某些民族已经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取得了成就。后来科学就利用这个经验来说明自己的原理”(《政治经济学史在意大利等等》,卢加诺,1829年版,第11页)。

约翰·穆勒重申:“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实践都长期领先于科学。……因此将政治经济学看作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最近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主题在一切时代都必然是人类主要的实践利益之一。”[中译本参阅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作者原注

当然,这一点也可以在很抽象的意义上加以解释;可以说:“当然啦,科学需要经验,而且经验越多,科学就越圆满。”问题不在这里。⁶⁴⁹试拿亚里士多德或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同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一下,这样您就会看到,在古代希腊的经济科学为一方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科学为另一方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别,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对对象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态度。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差别呢?很简单,就是现象本身变化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不像古希腊的生产关系。生产中的不同关系造成科学中的不同观点。不仅如此,请比较一下李嘉图的观点同无足轻重的巴师夏的观点,于是您会看到,这两人是用不同的眼光观察按其一般性质始终未变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嘉图时代这些关系刚刚才繁荣起来,刚刚才得到巩固,而在巴师夏时代它们已经开始趋于衰落。同一些生产关系的不同状况必然地应反映在保卫这些关系的那些人的观点上。

或者我们拿国家法这门科学来说吧。它的理论是怎样发展的呢?为什么发展呢?贡普洛维奇教授说:“对国家法的科学分析只有在统治阶级相互间就属于它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发生冲突的时候才会开始。例如,我们在欧洲中世纪后半期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斗争、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的斗争、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斗争,给予德国的国家法科学以第一次推动。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并推动对国家法相应部分进行行政论性分析的第二次引起争端的政治问题是关于皇帝选举的问题”^①等等。

^① 《法的国家和社会主义》(*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 因斯勃鲁克, 1881年版, 第124—125页。——作者原注

650 什么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发生的那些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以及在各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种斗争乃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耸立着符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

而且这仍然是思想体系，如果不是初级的，那么无论如何也不是最高级的。比如就哲学，就艺术来说，情况会怎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本题。

爱尔维修从人只是感觉这个命题出发。从这个观点看，很清楚，人将避开不愉快的感觉，而力求获得愉快的感觉。这是有感觉的物质的不可避免的、天然的利己主义。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人身上怎么会产生热爱真理、英雄气概这样一些完全无私的意向呢？这就是爱尔维修本来要解决的课题。他没有能够解决它，为了摆脱困境，他干脆把他保证要算出的那个 X、那个未知数一笔勾销。他开始说，没有任何一个学者会无私地热爱真理，每个人都只把真理看作通向荣誉之路，把荣誉看作通向金钱之路，把金钱看作获得愉快的生理感觉之手段，比如用来购买美味佳肴或漂亮女奴。不用说，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的站不住脚。这些解释仅仅表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无力对付发展问题。

人们把无非是重弹爱尔维修形而上学调子的这种对人类思想史的观点硬加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头上。人们常常大概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对历史，例如对哲学史的观点：如果康德研究了先验美学问题，如果他谈到了悟性范畴或理性的二律背反，那么在他那里这只是一些空话：实际上无论对美学，无论对二律背反，无论对

范畴,他都毫无兴趣;他需要的唯一只是:给他所属的阶级即德国小资产阶级提供尽可能多的美味佳肴和“漂亮女奴”。范畴和二律背反在他看来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上佳手段,他才来“聊起”它们。 651

难道需要使人相信这是十足的废话么?! 如果马克思说,这个理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他绝不是想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善于独立思考的代表人物自觉地使自己的观点迎合自己那些多少富裕、多少慷慨的恩人的利益。

当然,诽谤者随时随地都有,然而并不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理性的进步。真正推动理性进步的人们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当代权势人物的利益。^①

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情感和幻想、观点和概念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以及跟这些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②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的产生过程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人们不是把这个上层建筑看成一时的关系的一时的产物,而是把它看成某种按其固有本质说来天经地义的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在教育的影响下以及一般说来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其观点和情感的各个人,可能对在或多或少狭隘的阶级利益基础上历史地产生的那些观点和那些社会生活形式充满着最真诚的、完全无私的态度。对整个政党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848年法国民主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意向。小资产阶级

^① 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有时候害怕权势人物。例如康德讲到自己时说过:“谁也强迫不了我说跟我的想法相反的话,可是我下不了决心去说我想到的一切”。——作者原注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译者注

当然力求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然而马克思写道：“但是，如果以为小资产阶级自觉地力求维护利己主义的阶级利益，那是目光短浅的。相反，它认为它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乃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生活环境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也就是小资产者由于其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而在实践上得出那些任务和决定。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为一方同这一阶级本身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都是如此。”^①

^① 拉马克在证明生活条件影响动物机体时提出一个意见，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回忆一下这个意见将是有益的。他说：“谁停留在我的话的字面意义上，他就会把错误的观点硬加在我的头上。因为无论生活条件怎样，这些条件都不会在动物的形态和组织上引起任何直接的变化”。由于生活条件中的重大变化，在动物那里出现新的、和以前不同的需要。如果这些新的需要始终不变，或者存在很长时期，那么它们就会导致新习惯的出现。“而一旦新的生活条件……引起动物身上出现新的习惯，即刺激动物进行新的活动，成为习惯，——结果就会是一些器官得到更好的锻炼，而对于另一些器官则完全没有锻炼，成为没有用处的东西”。加强锻炼或者没有锻炼不会不影响到器官的结构，因而影响到整个机体。参见拉马克(Lamarque)：《动物学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 etc)，沙尔·马丁新版，1873年，第1卷，第223—224页。

经济的需要以及从中产生的其他需要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也应当作这样的理解。这里发生着由于锻炼或没有锻炼的缓慢的适应过程；而我们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论敌们认为，似乎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人们在出现新的需要时就会立即故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很明显，在他们看来这是荒谬的事情。然而这种荒谬的事情乃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类似的东西。总之，这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见使我们想起一位神甫反对达尔文的下述得意洋洋的论据：“达尔文说，把鸡丢进水里，它会长出蹼来，我则断言，鸡干脆会淹死。”——作者原注

这是马克思在其论拿破仑第三政变[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的话。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他也许还更好地向我们说明各阶级的心理辩证法。他讲的是个别阶级有时势必会扮演的那个解放者的角色。

“如果不暂时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人们承认它是普遍的代表,把它当作这样的代表来同情;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的权利和要求真正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和要求,而这个阶级本身真正是这个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自己对所有其他阶级进行统治。为了担当起解放者这一角色,从而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靠毅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一个等级成为似乎包括整个社会的等级,就必须使一切社会的仇恨相反地都集中在其他某个阶级身上,必须使某个等级成为引起普遍憎恶的等级,成为一切障碍的化身……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而又反对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①

作了这番预先的说明以后,已经不难弄清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比如对哲学和艺术的观点了。不过为了更加明显起见,我们拿它同伊·泰纳的观点比较一下:

^①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1844年版,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第82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作者原注

这位作者写道：“为了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应当确切地设想他们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那里有最后的解释；那里有决定其余一切东西的最初原因。这个真理为经验所证实。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艺术史上各主要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艺术是同与之相联系的某种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一起出现和一起消失的。例如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就是同在不大的各共和城邦的英雄时代，在伟大的紧张斗争的时刻希腊人之战胜波斯人一起出现的，由于这种紧张斗争，希腊人争得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建立了自己在文明世界的霸权。等到刚强意志的磨碎和马其顿的人侵使希腊人受到异族统治的时候，这种悲剧就同这种独立和这种毅力一起消失了。——同样，哥特式建筑同十一世纪黎明时代封建制度的最后确立一起发展的，这时摆脱诺曼人袭击和盗匪骚扰的社会比较牢固地稳定下来：当十五世纪末多少有势力的诸侯的军事制度趋于瓦解，这种建筑就同由于近代君主政体的产生而从这种军事制度中发源的所有那些风俗一起消失。——与这类似的是，荷兰绘画的勃兴是在这样的光荣时刻，这时荷兰凭着自己的顽强和勇敢，彻底推翻西班牙的统治，顺利地进行着同英国的斗争，成为欧洲最富庶、最发展、最繁荣的国家；十八世纪初，当荷兰退到二等角色，把第一位让给英国，而且简直变成秩序井然、和平安宁和设施完善的银行、商馆，这里的人可以过没有沽名钓誉的打算的、不会经历深沉的情绪激荡的、明智的资产者平静的生活，这时荷兰绘画就衰落了。最后，同样，法国的悲剧也是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即路易十四时代牢固确立的君主制度带来了讲究礼仪的风尚、宫廷的生活、经

过调教的贵族的豪华和文雅,而当贵族社会和宫廷风尚被大革命一扫而空的时候,法国悲剧也就消失了……就像自然科学家研究物理的气温,以便理解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如燕麦或玉米、松树或芦荟的出现,同样也应当研究精神的气温,以便说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如异教的雕塑或现实主义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人类精神的产物和生物界的产物一样,只有用它们的环境来解释。”^①

对于这一切,马克思的任何信徒都是无条件同意的:对的,正是任何艺术作品,就像任何哲学体系一样,都可以用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来解释。^②然而精神和风俗的这个一般状况又用什么来解释呢?马克思的信徒们认为,这个状况用社会制度、用社会环境的属性来解释。同一位泰纳说:“人们处境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③这也是正确的。只是要问,究竟什么引起社会人的处境的变化,即社会制度的变化?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唯物主义者”才同泰纳发生意见分歧。

^①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巴黎,1872年第12版,第13—17页。[中译本参阅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作者原注

^② 后来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中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这样一条重要的思想规律:“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特定时代的心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6页)他把社会意识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高级的叫作“思想体系”(旧译“意识形态”),低级的叫作“社会心理”,有时也简单地称为“心理”,但这“心理”跟现在心理学上所谓“心理”或“社会心理”不是一个东西,而大致相当于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说的“日常意识”。——译者注

^③ 《尼德兰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 dans les Pays-Bas*),巴黎,1869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对于泰纳说来,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是“心理学的任务”。精神和风俗的一般状况在他那里不仅创造各种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创造特定民族的工业、该民族的全部社会设施。这就是说社会环境以“精神和风俗的状况”为自己的最后原因。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说,社会人的心理决定于他的处境,而他的处境又决定于他的心理。这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十八世纪启蒙派绝对无法对付的二律背反。泰纳没有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他只是在好些卓越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光辉的实例来说明二律背反的第一个命题或论题:精神和风俗的状况决定于社会环境。

与泰纳同时代的、反驳他的美学理论的法国人,提出了反命题: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精神和风俗的状况。^①类似的争论可以进行到基督二次降世,它不仅解决不了这个致命的二律背反,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才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从而使争论达到圆满的结局,或者至少使有耳朵听有头脑进行思考的人们有可能圆满地结束这场争论。

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每一特定时代生产力的状况。一旦生产力的状况确定了,社会环境的属性也就确定了,适合这环境的心理

^① “我们受政治环境或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受到物理环境的影响。但不应忘记,如果我们也受到影响,我们同时可以抵抗这种影响,而且你们自然都知道那些难忘的例子……如果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有能力不受环境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使环境本身适应,适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参见斐·伯吕纳提埃尔(F. Brunetière):《文艺复兴时代至今批判的进化》(*L'évolution de la critique depuis la renaissance jusqu'à nos jours*),巴黎,1890年版,第260—261页。——作者原注

理也就确定了,以环境为一方同以精神和风俗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确定了。伯吕纳提埃尔说得完全正确:我们不仅适应环境,而且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你们问,不适应我们周围环境属性的那些需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之在我们身上产生——而且我们说这话时指的不仅是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是人们的一切所谓精神需要——仍然是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历史运动,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发展,因为它,任何特定社会制度迟早要成为不能令人满意的、过时的、需要根本改变的,也许干脆只当报废。我们上面已经拿法设施的例子说明人们的心理如何能够超越人们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 656

我们确信,读了这几行话以后,许多甚至对我们抱好感的读者想起了一大堆例子,一大堆历史现象,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的观点解释。而且读者们已经准备对我们说:“你们是对的,不过不完全:持与你们相反观点的人们同样是对的,但也不完全:无论你们还是他们都只看到一半真理。”不过请等一等,读者,在没有弄清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能够提供的一切道理之前,别在折衷主义中寻求拯救。

迄今为止我们的论点必然是很抽象的。而我们已经知道: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论点具有比较具体的面貌。

既然几乎每一个社会都受到相邻社会的影响,那就可以说,对于每一个社会说来,照样地也存在着影响其发展的、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每一特定社会从相邻社会方面受到的影响,其总和任何时候都不会等于另一社会在同一时间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因此

任何一个社会都生活在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环境可能——而且实际上常常是——很像围绕其他民族的历史环境,然而任何时候不可能、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曾是同后一环境完全一样。这就使得从我们以前的抽象观点看来曾是极端公式化的那个社会发展过程增加十分强大的多样性因素。

例子。氏族联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所有人类社会都固有的社会生活形式。然而历史环境的影响使不同部落中氏族的命运变得十分多样化。这种影响使氏族本身具有这种或那种可以说独特的性质,它延缓或加速氏族的瓦解,它特别使这一瓦解过程多样化。氏族瓦解过程中的多样性制约着取代氏族生活方式的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在此以前我们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原始共产主义的消失。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原始共产主义废墟上产生的私有制的性质,由于每一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变得多种多样。“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表明,从原始公社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公社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①

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自然也会影响该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外国的影响会不会削弱这一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呢?如果会的话,那么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削弱这种依赖性呢?

请把埃涅阿斯纪同奥德修纪比较一下。或者把法国古典悲剧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10页注释。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作者原注

同希腊人的古典悲剧比较一下。请把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同古典的法国悲剧比较一下。您会看到什么呢？埃涅阿斯纪只是奥德修纪的模仿，法国人的古典悲剧只是希腊悲剧的模仿；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是按照法国悲剧的方式和面貌创造的，不过不是出自高手。到处都是模仿，然而把模仿品同自己的原型隔开的那全部距离，也就是产生它这个模仿品的社会同原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存在着距离。同时请注意，我们说的不是加工的精拙，而是构成艺术作品的精神。拉辛的阿喀琉斯^①像谁：像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希腊人呢，还是像十七世纪的侯爵——*talon rouge*^②呢？对于埃涅阿斯纪的剧中人物，已经有人指出，他们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的确，对于十八世纪俄国的所谓悲剧的剧中人物，很难说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当时俄国人的风貌，然而他们的不称职本身就说明俄国社会的状况。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这种状况的不成熟性。^③

再一个例子。洛克无疑是十八世纪绝大多数的法国哲学家的导师（爱尔维修曾称他是一切世纪一切民族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但是在洛克和他的法国学生之间的距离，恰恰就是把“光荣革命”时代英国社会同法国人民“大造反”前几十年间法国社会隔

658

① 阿喀琉斯(Achilleus, 一译阿基琉斯), 原为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的主要角色, 围攻特洛伊人最勇武的英雄之一。拉辛在自己的悲剧中重新塑造了阿喀琉斯的形象。——译者注

② *talon rouge*, 红高跟。——这是十七世纪法国对穿红后跟鞋的贵族的称呼, 后来引申有“风雅人物”的意思。——译者注

③ 指苏马罗科夫、克尼亚日宁、赫拉斯科夫以及十八世纪其他俄国剧作家所写的悲剧。——俄文版编者注

离开来的那个距离。^①

第三个例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直接从法国输入其思想。但是对于这些思想,可以说那上面已经打上了应当在其中传播这些思想的那个社会的烙印。

总之,一个国家的著作对另一个国家的著作的影响是同这两个国家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时,这种影响就完全不存在。一个例子:非洲黑人至今没有亲身尝受到欧洲著作的丝毫影响。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不能给另一民族提供任何东西时,这个影响就是单方面的。例子:上世纪法国著作影响了俄国著作,本身却没有尝受到俄国的丝毫影响。最后,如果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类似,从而也由于文化发展的类似,两个进行交流的民族中间每一个都可以从另一个那里取得某种东西,这个影响就是相互的。例子:法国著作影响了英国著作,反过来自己也受到英国著作的影响。

拟古典主义的法国文学当时大受英国贵族的青睐。然而英国的模仿品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自己的法国原型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英国贵族的一切努力都不可能把法国拟古典主义文学当时得以在其中充分发展起来的那些社会关系搬到英国去。

法国的哲学家们曾经非常欣赏洛克的哲学。不过他们走得比自己的导师远得多。这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法国,在自己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比洛克的哲学著作反映其意图的英国

^①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指英国 1688—1689 年的政变。great rebellion, 大造反,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社会的那个阶级走得远得多。

当(例如在近代欧洲)我们有非常强大地互相影响着诸社会的整个体系时,在每一个这种社会中,思想体系的发展都大大复杂化了,就像它的经济发展在同其他国家不断进行通商贸易的影响下大大复杂起来一样。

这时我们似乎会有一种为全体文明人类所共有的文学。然而正如动物学上的属之分为许多种一样,这个全世界的文学也分为诸个别民族的文学。

<每一个文学流派、每一种哲学观点,在每一个单独的文明国家里,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有时几乎是崭新的意义。>^①

当休谟来到法国时,法国“哲学家们”把他当作志同道合的人欢迎。但是有一次,法国哲学家们的这位毋庸置疑的同志在霍尔巴赫家吃午饭时开始谈到“自然宗教”。他说:“至于无神论者,我不认为他们可能存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自然的体系》的作者反驳他说:“您直到现在都很不走运,您在这里才第一次看到桌旁坐着十七位无神论者”。正是同一个休谟对康德有决定性影响,据康德自己承认,休谟曾把他从独断论的瞌睡中唤醒。然而康德的哲学跟休谟的哲学是大不相同的。正是同一个基本观念导致法国唯物主义者们的战斗的无神论,导致休谟对宗教冷漠态度,导致康德的“实践的”宗教。事情在于宗教问题在当时英国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它在法国所起的作用,而在法国的作用又不同于德国。而宗教问题意义上的这种区别,其原因则是: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

^① 这句话只在第1版中才有。——俄文版编者注

国家里,社会力量不是处在它们在每一个其他国家所处的那种相互关系中。按其本性相同而按发展水平却不一样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结合着,从而使得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有非常特殊的“精神和风俗的状况”,表现在民族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之中。因此,同一问题可以使法国人激动得不得了,也可以使英国人淡然置之。对于同一个论据,先进的德国人可以敬而服之,而先进的法国人则恨之入骨。德国哲学应当把自己的巨大成就归功于什么呢?德国的现实。黑格尔回答说:法国人没有工夫搞哲学,生活把他们推向实践领域。德国的现实比较合理,所以德国人能够心安理得地钻研理论。实质上德国现实的这种所谓合理性不外乎德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使得当时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去作毫无魅力的“现实”的(迎合“实际”的)官吏,就是在理论中寻求慰藉,把热忱的全部力量、思想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然而如果埋头于“实际事物”的比较先进的国家没有把德国人的理论思想推向前进,如果这些国家没有把德国人从他们“独断论的瞌睡”中唤醒,那么这个负面的属性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就绝不会产生这一巨大的正面的结果:德国哲学辉煌的繁荣。

歌德的梅菲斯托费尔说:有理变无理,恩德成罪愆。^①应用到德国哲学史上,几乎可以大胆地说出这样的怪话:荒谬产生理性,

^① 梅菲斯托费尔(Mephistopheles),欧洲一些民间故事中恶魔的形象,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伙伴和诱惑者,要以权力、知识、尘世幸福为代价买取浮士德的灵魂。正文中引用的这句话见《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部,第93页。——译者注

贫乏原来是恩赐。

不过看来我们可以结束我们这部分的叙述了。我们把说过的话概括一下。

相互作用存在于国际生活中,也存在于各民族的内部生活中;它是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然的,然而它本身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为了理解相互作用,应当弄清相互作用着的诸力量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在相互作用的事实中是不可能为自己找到最后解释的,无论这些属性由于相互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我们这个场合,相互作用诸力量的性质、彼此发生影响的社会机体的性质,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来解释的,即由社会机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些机体的经济结构来解释。

我们希望,现在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哲学已经带有稍微具体一些的面貌了。然而它仍然还是抽象的,它距离“生动的生活”仍然还很远。我们应当朝“生动的生活”这一方向迈开新的步伐。

开始我们谈到“社会”,接着转到了诸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要知道,社会按其组成不是清一色的;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导致不平等,导致具有不同的、常常是完全对立的利益的诸阶级的产生。我们已经知道,各阶级相互间进行着几乎不断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时而缓慢时而剧烈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对思想体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极端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我们对这一发展就不会有任何理解。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您愿意了解伏尔泰悲剧的真正原因吗?——伯吕纳提埃尔问道,——首先请到伏尔泰的个性中去找原因,特别是到迫使他既要做出不同于拉辛和基诺做过的事情,同

时又沿着他们的足迹进行的必要性中去找原因。关于浪漫主义戏剧,关于雨果和仲马的戏剧,我可以说,它的定义完全包括在伏尔泰对戏剧的定义中。如果浪漫主义不愿意在舞台上做这种或那种事情,那么这是因为它想跟古典主义反其道而行……在文学上,正如在艺术上一样,除了个人的影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有时我们力求按照我们先辈们自己的风格同他们竞争,这样一来某些手法就得到发展,创立起流派,形成一种传统。有时我们力求创作出跟他们的作品不相同的东西,这时发展便同传统产生矛盾,出现新的流派,使手法得到改造。”^①

暂时把个人作用问题放在一边,我们注意到,早就该仔细想想“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了。在一切思想体系中,发展绝对是沿着伯吕纳提埃尔指出的道路进行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或者跟随自己先辈们的足迹,发展他们的思想,运用他们的手法,而只允许自己同他们“竞争”,他们或者起来反对旧有的观念和手法,同他们发生矛盾。圣西门不是说过,有机时代为批判的时代所取代。后面这个时代特别值得谈谈。

拿任何一个问题如货币问题来说吧。对于重商主义者,货币主要是财富:他们把夸大的、几乎是超常的意义硬加在货币身上。起来反对重商主义者的人们跟他们发生了“矛盾”,不仅纠正了他们的超常性,而且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间最热心的人,也陷进了超常性,而且恰恰是直接对立的极端:货币——这只不过是预先

^① 前引书《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2—263页。——作者原注

约定的符号；它们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比如休谟就是这样看待货币的。如果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用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发达来解释，那么，简单地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得到很大发展来解释他们论敌的观点将是奇怪的。要知道随后的这种发展绝没有把货币变成预先约定的、失去内在价值的符号。休谟观点的超常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跟重商主义者进行斗争、发生“矛盾”这个事实中产生的。他“想”跟重商主义者“反其道而行”，就像浪漫主义者“想”跟古典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一样。因此可以说，就像伯吕纳提埃尔关于浪漫主义戏剧所说的那样，休谟的货币观完全包括在作为它的对立物的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中。 662

另一个例子：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尖锐地和坚决地反对一切神秘主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全都或多或少充满着宗教精神。这种向神秘主义的回归，是什么造成的呢？难道像《新基督教》的作者^①这样的人物具有的“知识”比不上百科全书派么？非也。他们的知识并不比百科全书派少，而且一般说来，他们的观点同百科全书派的观点是很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们最直接地继承了百科全书派，不过在某些问题上即其实是在社会组织问题上同后者又发生“矛盾”，同时，在他们那里出现了要跟百科全书派“反其道而行”的想法；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乃是“哲学家们”对宗教的态度的简单对立物；他们对宗教的观点已经包括在“哲学家们”的观点之内了。

最后，举哲学史为例：在十八世纪下半期的法国，唯物主义高

^① 指圣西门。参阅《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0—204页。——译者注

奏凯歌；站在它的旗帜下的是法国第三等级的极端派。在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受到旧制度的保护者、贵族、专制政体拥护者的喜爱。这里的原因也是明显的。复辟时代英国贵族与之发生“矛盾”的那些人，都是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跟这些人“反其道而行”，反动派不得不走到了唯物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旧制度的保卫者拥护宗教，极端革命派则站到了唯物主义一边。人类思想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而且所有这些例子都证实着同一个道理：为了理解每一特定批判时代的“精神状况”，为了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时代的过程中，正是这些学说而不是另一些学说获得胜利，应当预先熟悉前一时代的“精神状况”；应当了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什么学说和派别。没有这一点，无论我们对它的经济了解得如何清楚，我们也根本不会懂得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

同时不应当像俄国“知识分子”习惯于抽象地理解一切那样理解这一点。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在所有人类知识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上同自己前辈们进行全线的斗争。^① 十九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在许多人类学观点上同百科全书派完全一致；复辟时代的英国贵族在许多问题上，比如民法等问题上完全同意他们所憎恶的清教徒。心理的领土划分为省，省分为县，县分为乡和村社，村社是各个个人（即各个个别问题）的联合。当“矛盾”产生时，当斗争爆发时，斗争的热情通常只发展到个别的省，如果不是个别县的话，只有反射的作用才发展到邻近的区域。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前一时代领导权所属的那个省份。只是慢慢地“战争的灾

^① 普列汉诺夫这里提出了一条新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译者注

难”才扩大到最近的毗邻地区，扩大到被攻击省份最忠实的同盟者身上。因此应当补充说，在说明任何一个特定批判时代的性质时，不仅必须了解前一有机时期心理的一般特点，而且也要了解这个心理的各种独有的特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领导权属于宗教，在另一时期内则属于政治，等等。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相应的批判时代的性质上，其中每一个时代，根据情况，或者继续形式上承认旧的领导权，而把新的、相反的内容放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中去（例如第一次英国革命），或者完全否定这些概念，于是领导权转到新的思想省份（例如法国的启蒙文献）。如果我们记住，为了个别心理省份的领导权而进行的这些争论也扩展到与它们毗邻的地区，而且在每一个别场合以不同程度朝不同方向扩展，那么我们会懂得，在这里，正如在所有的地方一样，是多么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论点上。

“这一切也许都对，——我们的论敌反驳说，——不过我们看不出这里与阶级斗争有什么相干，而且我们强烈地觉得你们虎头蛇尾。你们自己现在就承认，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同经济规律，或者同你们老在我们耳边唠叨的那种生产力发展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赶紧作答。

至于人类思想发展中，确切些说，人类概念和表象的结合中有其特殊规律，这一点，据我们所知，“经济”唯物主义者中间没有一个人否认过。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把例如逻辑规律同商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然而这一派唯物主义者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在思维规律中寻找人类精神发展的最后原因、基本动力。这正是“经济唯物主义者”胜过唯心主义者，特别是胜过折衷论者的地方。

只要胃里有一定数量的食物,胃就会按照胃液消化的一般规律开始工作。然而可不可能借助这些规律来回答为什么您的胃里每天都有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进去而我的胃里食物却是稀有的客人这个问题呢?这些规律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却死于饥饿呢?看来说明应当到某个别的领域去找,到另一类规律的作用中去找。就人的精神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一旦人处于某种境况,一旦周围环境给他提供某些印象,他就会按照某些一般规律把这些印象结合起来(而且在这里,由于得到的印象多种多样,所以结果也是极其多种多样的)。然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处于这种境况呢?什么东西制约着新印象的涌现和性质呢?这就是任何思想规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次。请设想一下,有弹性的球从高塔上落下来。它的运动按照众所周知的和很简单的力学定律进行。可是球遇到了斜坡。它的运动按照另一个也是很简单的和众所周知的力学定律而改变形态。结果我们就得到折线运动,对折线运动可以而且应当说,它起源于上述两个定律的联合作用。然而球所碰到的斜坡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无论第一个定律,还是第二个定律,或者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无法解释的。就人的思想来说,情况完全一样。使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规律的联合作用的那些情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不论诸个别的思想规律,还是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说明不了的。

制约着思想运动的种种情况,应当到法国启蒙派曾经寻找过的那个地方去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停留在启蒙派未能“逾越”的那个“界限”上了。我们不仅说,带有自己全部思想和情感的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力求理解这个环境的起源。我们说，这个环境的属性是由处在人之外并且迄今为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某原因所决定的。人们的事实上的相互关系中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必然引起“精神状况”中的变化，引起观念、情感、信仰的相互关系中的变化。观念、情感和信仰按照自己特殊的规律结合着。然而这些规律是由于跟这些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种种外部情况而发生作用的。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影响的地方，我们除此以外还看到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那些处在更深层位置的相互影响；在他只是说出现了矛盾，人们想跟他们的前辈反其道而行的地方，我们补充道：人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的现实关系中出现了新的矛盾，是因为已经不可能像旧时代的人们那样过生活的新的社会阶层或阶级走到了前台。

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知道浪漫派想跟古典派发生矛盾的时候，勃兰兑斯却力求用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地位来说明他们对“矛盾”的爱好。例如请回忆一下他谈到复辟时代和路易·菲力浦时代法国青年的浪漫主义情绪的原因时所说的话。^①

当马克思说“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的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时，他也在揭示一条特殊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不过这条规律只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里才起作用 and 才能够起作用；在既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里它不起作用，也不可能起

^① 例如参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译者注

作用。

让我们仔细想想这条规律的作用。当某个等级在其余居民心目中成为普遍的奴役者时,在这一等级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这些居民看来自然就是只有奴役者才会有的观念。社会意识便同它们“发生矛盾”;它热衷于相对立的观念。不过我们已经说过,这类斗争任何时候也不会全线进行:始终有某一部分观念同样地既为革命者也为旧制度保卫者所承认。最有力的攻击指向成为特定期腐朽制度最为有害的诸方面的表现的那些观念。在这些方面,革命思想家不可遏止地想同自己的前辈们“发生矛盾”。而对于其他的、虽然也是在旧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观念,他们常常依然是完全漠不关心的,有时则按照传统继续持有这些观念。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进行了反对旧制度的哲学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斗争(即反对僧侣阶级和贵族君主制度的斗争),却几乎没有触及旧的文学传统。诚然,就是在这里狄德罗的美学理论也是新社会关系的反映。不过这里的斗争很微弱,因为主要力量集中在其他战场。^① 在这里,起义的旗帜只是后来而且是由热烈同情被革命推翻的旧制度的那些人举起来的,那些人看来本应同情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所形成的那些文学观点。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奇怪的现象也可以用“矛盾”的原理来解释。不管您怎么想,比如沙多布里昂曾同情旧的美学理论,而伏尔泰——可恨的、恶毒的伏尔泰!——曾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之一。

^① 大家知道,在德国,文学观点的斗争进行得更加有力得多,不过在这里改革者的注意力并没有被政治斗争所转移。——作者原注

黑格尔说：“矛盾引导着前进”。思想体系的历史似乎再一次证明，这位老“形而上学家”并没有弄错。看来它也证实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不过我们请读者不要为此伤心，且听我们把话说完。

前面我们讲过，一旦有了社会生产力，就有了社会的结构，从而也就有了社会的心理。根据这一点，也许可以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即从特定社会的经济状况可以准确地推出该社会的观念的性质。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每一特定时期的思想体系总是同前一时期的思想体系有最紧密的——正面的或负面的——联系。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状况”，只有同前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当然，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热衷于跟它的意图相矛盾的那些观念。每个阶级虽然不自觉地但总是很好地使自己的“理想”适应自己的经济需要。不过这种适应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为什么它这样进行而不是那样进行，这不是单拿某个阶级的状况解释得了的，而是要用这个阶级和跟它对抗的阶级（或诸阶级）的关系的全部细节来解释。随着诸阶级的出现，矛盾不仅成为推动的因素，而且成为形成的因素。^①

然而个人在思想体系史上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伯吕纳提埃 667 尔认为个人具有不依赖于环境的巨大意义。居友断言，天才总是创造某种新东西。^②

① 表面看来，例如像建筑这种艺术的历史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建筑史同阶级斗争有紧密的联系。参看爱德·柯罗爱依：《哥特式建筑》（*L'architecture gothique*），特别是第四部分：“市民建筑”（*L'architecture civile*）。——作者原注

② “他把新的典型引进观点和情感的世界。”参见《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巴黎，1889年版，第31页。——作者原注

我们说,在社会观念领域天才之超越其同时代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比他们更早地理解新的、产生着的社会关系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说天才不依赖于环境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才发现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当然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然而社会环境在任何伟大发现的历史上的作用,第一,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准备工作上,没有这些知识任何一个天才根本做不成任何事情,而第二,表现在天才把注意力的方向放在这个或那个方面。^① 在艺术领域内,天才给特定社会或特定社会阶级的基本审美倾向提供最好的表现。^② 最后,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内,社会环境的影响都表

① 其实,在这里只是表面上存在着影响的双重性质。任何特定的知识总量之积贮,正是因为社会需要促使人们去进行这种积贮,使他们的注意力朝向相应的方面。——作者原注

② 任何特定阶级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判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经济状况,这一点,《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的作者[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知道了。他说,美是生活,而且用这样的见解说明了自己的思想:

“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饱,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看来,‘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概念在内: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叫人烦闷的。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这照普通人理解,就是美的第一条件。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结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会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而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就是一种疾病,是体格‘虚弱’的标记,人们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会有纤细的手足——我们的民歌里就不歌咏美的这些属性。总之,民歌中对美人的描写,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经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骼也越来越小;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当然是纤细的手足——它们是社会上层阶级觉得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大(续下页注)

现在给个人天才的发展提供或小或大的可能性上。

当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用环境的影响说明一个天才的全部特性,不过这还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弹道学能够解释炮弹头的运动。它能够预见它的运动。但是它任何时候也不能告诉您这个弹头恰恰炸裂成多少片而且每一个别的碎片恰恰飞向何处。但是这丝毫不会削弱弹道学得出的那些结论的可靠性。我们没有必要在弹道学中站到唯心主义的(或折衷主义的)观点上:对我们说来力学的解释完全够了,虽然——谁去争论呢?——这些解释仍然没有使我们弄清楚个别碎片的“个体的”命运、大小和形式。

命运的奇怪的讽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像抨击“形而上学家”黑格尔无聊的虚构那样如此热烈地加以抨击的那个矛盾定律本身,似乎使我们“同我们亲爱的朋友兼敌人接近起来。”如果休谟否定货币的内在价值是为同重商主义者发生矛盾;如果浪漫派创造出自己的戏剧只是为了同古典派所做的“反其道而行”,那么客观的真理就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我,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梅

669

(续前页注文)手大脚,这或者是她长得不好或者是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标志。……不错,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贵、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然是有魅力的;然而病态、柔弱、委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苍白、慵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静,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不知有物质的匮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却因为无所事事和没有物质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赖,寻求‘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这些东西能赋予他们那本来很单调的、没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魅力。然而强烈的感觉和炽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如果美人的慵倦和苍白是她曾经生活得好的标志,他怎么会不为她的慵倦和苍白而着迷呢?”——作者原注

歇尔斯基公爵等等说来是真理的东西。真理是主观的，所有满足我们认识需要的东西都是真理的。

否，不是这样。矛盾定律并不破坏客观真理，而只是引导我们走向客观真理。诚然，它迫使人类所走的道路完全不是笔直的路。然而在力学中大家知道也有失之于距离而得之于速度这样的场合：按摆线运动的物体，从一点走到下面的另一点，有时比按直线运动来得快。“矛盾”出现在而且只出现在有斗争、有运动的地方；而在有运动的地方，思想便会前进，不过要通过迂回的道路。同重商主义者的矛盾曾使休谟得出错误的货币观。然而社会生活的运动，从而还有人类思想的运动并不停留在它在休谟时代所达到的观点上。它迫使我们同休谟“矛盾”，其结果就产生了正确的货币观。而且这个正确的观点，作为全面考察现实的结果，已经是任何往后的矛盾都无法排除的客观真理。穆勒著作注评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兴奋地说过：

一度为生活所取得的東西，
命运无法从我们身边夺走……

应用到知识上，这无条件是正确的。无论哥白尼的发现，还是能量转换的发现，无论物种可变性的发现，还是马克思的天才发现，任何命运现在都无力从我们身边夺走。

社会关系在变化；与此同时科学理论也在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最后出现对现实的全面考察，从而出现客观的真理。色诺芬具有不同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经济观点。萨伊的观点在色诺芬看来大概会是荒唐的；萨伊曾宣布色诺芬的观点为荒谬。然而我

们现在知道,色诺芬的观点从哪里来的,萨伊的观点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片面性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已经是客观的真理,而且任何“命运”已经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最后发现的正确的观点。

——然而人类的思想难道会停留在你们称之为马克思的一种或诸种发现上面么?——当然不会,诸位先生!它将作出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将补充和证实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正如天文学中的新发现补充了和证实了哥白尼的发现一样。 670

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是最大的荒谬。然而任何荒谬都有其充足的原因,而且我们、一位伟大人物的微不足道的追随者,可以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知道这个荒谬的充足原因。下面就是。

“主观方法”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是“学派天使”,即不是《历史书翰》的作者第一个发现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信徒们早就遵循这个方法,就是这位布鲁诺·鲍威尔生出了《历史书翰》的作者,就是这位《历史书翰》作者生出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

“历史学家的客观性,像任何客观性一样,无非是纯粹的空谈。而且完全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客观性是无法达到的理想。对客观性,即对大多数固有的观点,对群众的世界观,历史学家只能低首下心。而一旦他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创造者,他就是为薪资工作,他就成为自己时代的雇佣。”^①

^① 舍利加(Szeliga):《人类劳动组织和施洛赛尔、盖尔文奴斯、达尔曼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编纂艺术》(*Di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der Menschheit und die Kunst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schlosser's Gervinus's, Dahlmann's und Bruno Bauer's*),沙尔洛登堡,1846年版,第6页。——作者原注

这几行话是施利格写的,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狂热的信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一书中曾如此尖刻地嘲笑过他。在这几行话中,请用“社会学家”代替“历史学家”,把对历史的“艺术创造”换成社会“理想”的创造——于是您就会得到“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

请好好想想唯心主义者的心理。对他说来,人们的“意见”是社会现象基本的、最后的原因。他觉得,据历史叙述,在社会关系中往往是最荒谬的意见实现了。他议论说:“为什么不实现我的意见,这种意见,谢天谢地,一点都不荒谬。既然存在着某种理想,就至少存在着从这种理想的观点看来合乎愿望的社会改革的可能性。至于通过什么客观的尺度来检验这个理想,那么检验是不可能的,因为类似的尺度并不存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可能成为真理的尺度。”

671 总之,有某种改革的可能性,因为我的理想号召改革,因为我
认为这些改革是有益的。我之所以认为它们是有益的,因为我愿意认为它们是这样的。撇开客观尺度,我这里除了我的愿望没有其他标准。别妨碍我的脾气!——这就是主观主义的最后论据。主观的方法是自然沿着折衷主义道路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个寄生虫所侵蚀的哲学“好好先生们”的一切错误都倾注在这个寄生虫的头上。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不能把个人的“主观”观点同作为某种客观东西的“群氓”、“大多数人”等等的观点对立起来。群氓是由人们组成的,而人们的观点始终是“主观的”,因为这些或那些观点都是主体的属性之一。客观的不是“群氓”的观点,客观的是反映

在这些观点里的、自然界或社会中的那些关系。真理的标准不在我之内,而在存在于我之外的关系中。正确地表现这些关系的那些观点是符合真理的;歪曲这些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地把握自然现象相互关系的那种自然科学理论是符合真理的;正确地说明存在于他所描述的时代的社会关系的那种历史描写是符合真理的。凡是历史学家不得不描述诸种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的地方,只要他没有变成干巴巴的书呆子,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情这种或那种力量。在这方面,他将是主观的,不管他是同情少数还是多数。然而这种主观主义并不妨碍他成为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只要他不去歪曲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据以生长的那些现实的经济关系。“主观”方法的信奉者则忘记这些现实的关系,而因此他除了自己可贵的同情或极大的憎恶之外便什么也做不了,而因此每当他的论敌们告诉他这还不够时,他就大喊大叫地谴责他们侮辱道德。他感到自己不能洞察现实社会关系的秘密,因此对这些关系的客观力量的任何暗示,在他看来都是对他自己的无能为力的侮辱、嘲笑。他力图使这些关系淹没在自己的道义愤慨的空话中。

所以,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理想原来常常是各式各样的:既有卑劣的,也有高尚的,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符合经济现实的理想是正确的。听到这句话的主观主义者们以为,如果我开始使我的理想适应现实,那么我就会变成“欢呼雀跃的人”^①可怜的

^① “欢呼雀跃的人”一词,语出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片刻的骑士”(一译“称雄一时的人物”):“为了爱的伟大事业,请把我从欢呼雀跃的、空话连篇的、两手沾满鲜血的人们那里领进那正在毁灭的人们的阵营!”[中译本参见《涅克拉索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俄文版编者注

仆从。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想,仅仅因为他们作为形而上学者无法理解任何现实的双重的、对抗的性质。“欢呼雀跃的人”依靠已经腐朽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之下生长着新的现实、未来的现实,为这个现实服务也就是促进“爱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读者现在可以看到,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赋予理想以任何意义的看法是否符合“现实”。这个看法原来是“现实”的直接对立物。如果在“理想”的意义上说,那就应当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所曾有过的、最为理想的理论。而且这无论对它的纯粹的科学任务还是对它的实践任务说来都是同样正确的。

“如果马克思不理解自我意识的意义及其力量,请问怎么办?如果他如此低度地评价自我意识认识到了的真理,请问怎么办?”

这些话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信徒之一还在1847年就写下的^①,虽然现在已经不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语言说话了,但是责备马克思忽视历史中的思想和情感因素的先生们至今并没有比奥比兹走得更远。迄今为止他们全都深信马克思非常低估人类自我意识的力量;他们全都以不同的调子反复说同样的话。^②实际上马克思认为解释人类的“自我意识”乃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

^① 《群众的英雄。性格描写》(Die Helden der Masse Charakteristiken),特奥多尔·奥比兹(Theoder Opitz)出版,格伦堡,1848年版,第6—7页。奉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一读这本著作。他在那里会遇到自己许多的原创思想。——作者原注

^② 其实,不,不是所有人:还没有任何人想过用说明“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来打败马克思。卡列也夫先生有双重的原创:第一,他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过;第二,他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从这个注释中瓦·沃先生可以看出,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教授”以应有的评价。——作者原注

他说：“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迄今为止都是，它仅仅在客体的形式中，或者在直观的形式中，而不是在具体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中，不是在实践形式中，不是从主体方面考察现实，考察对象的、为外部感官所把握的世界。因此，能动的方面，和唯物主义相反，迄今为止都是由唯心主义发挥的，不过是抽象地发挥的，因为唯心主义自然不承认具体活动本身。”^①先生们，你们是否仔细考虑过马克思的这些话呢？我们来告诉你们它们是什么意思。

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信徒们竭尽全力来证明用唯物主义解释自然的可能性。甚至对天赋观念的否定也没有使得这些唯物主义者超越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看作有感觉的物质 (*matiere sensible*)。他们没有试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说明人的历史，而如果他们企图这样做了(爱尔维修)，那么他们的企图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人只有在历史中才会成为“主体”，因为只有在历史中他的自我意识才得到发展。局限于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意味着局限于把他看作“客体”，忽视他的历史发展，忽视他的社会“实践”，忽视具体的人类活动。然而忽视这一切，意味着使唯物主义变成“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歌德)。不仅如此，这就是要把它变成——这也是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宿命论的东西，从而注定使人完全从属于盲目的物质。马克思看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甚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于是给自己提出了纠正它的任务。他的“经济”唯物主义乃是对人的“具体活动”怎样发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译者注

展、他的自我意识怎样由于这种活动而发展起来、历史的主体方面怎样形成这一问题的回答。当这个问题即使部分地解决了的时候，唯物主义就不再会是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它就不再把说明人类存在的能动方面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唯心主义。那时它就会摆脱它固有的宿命论。

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之所以愤怒反对马克思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把它的第一句话当成最后一句话。马克思说：在解释主体时我们看看人们在客观必然性的影响下会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中。既然已经知道这些关系，就可以弄清楚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下是怎样发展的。客观的现实帮助我们弄清楚历史的主观方面。正是在这里，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通常便来打断马克思。也是在这里，通常重复着同恰茨基跟法穆索夫^①谈话惊人类似的言论。——“人们在自己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遇到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生产关系。”——哎呀，老天爷，他是宿命论者！……在经济基础上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说什么！而且说的和写的一样！他完全不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请仔细听完，哪怕一次：要知道，从以上的话中可以得出，——不听，受制裁！受积极进步人物的道德制裁，受主观社会学明显的监视！

大家知道，斯卡洛茹布的出现挽救了恰茨基。在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同他们严格的主观评价者之间的争论中，迄今为止事情具

^① 恰茨基、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都是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名著《聪明误》中的人物。——译者注

有相反的另一性质。斯卡洛茹布捂住了恰茨基的嘴,这时候主观社会学的法穆索夫们从耳朵里抽出手指,带着自己的优越意识说道:他们本来就说得扼要了;他们的观点现在依然是完全没有说清楚的。^①

黑格尔早就说过,任何哲学如果局限于简单地重复它的基本论点,都可能变成毫无内容的形式主义。然而这样的过错马克思是绝不会犯的。他没有局限于重复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全部历史运动的基础。很少思想家像他那样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基本论点。

——然而究竟在哪里,他在哪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呢?——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数落着,号叫着,大声喊着和言说着。——请看看达尔文吧,要知道他有一部书,而马克思那里连书也没有,于是不得不去重新建立他的观点。

不用说:“重新建立”是不愉快也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没有“主观的”材料来正确理解从而“重新建立”别人的思想的人而言。不过重新建立没有必要,而且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哀痛其缺乏

^① 在新版中普列汉诺夫曾打算把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而故意弄得含糊的地方说清楚。保存在档案里未被利用的、对此处的增补中有以下一段札记:“斯卡洛茹布就是书报检查。用同一个别尔托夫、《文集》、《新语》和《开端》的故事来说明。”

这个名单包括受到书报检查迫害的出版物:普列汉诺夫(别尔托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该书第1版很快卖完,同时被从图书馆没收,十年之内未能再版,直到1905年;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说明我国经济特点的材料》,刊印于1895年,在书报检查机关积压了一年半以后,除了偶然保存下来的几本以外,全部被焚毁;《新语》杂志1897年12月即已被查封;《开端》杂志,继《新语》之后于1899年创刊,出了5期,被查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几乎被剥夺了合法的论坛,同时民粹派却完全自由地利用了这个论坛。——俄文版编者注

的书早就有了,甚至有几本书,一本比一本更好地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第一本书——这是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的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请熟识一下这本有趣的书(自然,“**刘易士的东西**”在这里是少了点):它会告诉您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为什么**必定要出现**,它回答了直到这时为止尚未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第二本书——这是《**资本论**》,正是这本《**资本论**》你们全都“读过”,你们全都“同意”,但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解它,仁慈的先生们。

第三本书——这是从1848年开始即从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675 问世时起的欧洲事变史。请费些力气钻研一下这本巨大的和有教益的书的内容,只要你们“主观的”心中还有公平的话,请把手放在胸口告诉我们:难道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给他提供惊人的前所未有的预见事变的能力么?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反动的、停滞的或进步的空想主义者那里现在剩下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一碰到**现实**就化为灰尘,这灰尘又跑到什么污泥中去了呢?要知道这灰尘甚至连痕迹都没有留下,而马克思说过的话却实现了,当然是大体上,而且每天还将始终不渝地实现下去,直到他的**理想**最终实现。

似乎这三本书的证据足够了吧?而且似乎不能否定它们中间任何一本的存在吧?你们自然要说,我们从那里读到的并不是那里写了出来的?究竟是什么,请说出并证明这个;我们迫不及待地期望你们的证明,而为了使你们对这三本书不致感到头脑很紊乱,

我们先向你们说明第二本书的意义。

你们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但是否定他的历史理论,——你们说。应该认识到,这说明很多问题,正是:这说明你们既不理解他的历史理论,也不理解他的经济观点。^①

《资本论》第1卷说的是什么呢?那里说的,比如关于价值。那里说,价值是社会生产关系。你们同意这个吗?如果不同意,那么你们就否认自己本人关于同意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话。如果同意,那么您就是承认他的历史理论,不过显然并不理解它。

既然你们承认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着的、背着他们起作用的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以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的形态,如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等等,反映在他们头脑中,那么你们从而就是承认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必定生长着一定的、符合它的性质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在这种场合,你们改变信仰的事情就完成了四分之三,因为你们剩下的就是运用你们“自己的”即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观点分析高级的思想体系范畴:权利、正义、道德、平等以及诸如此类。

或者也许你们只同意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先生,他们“承认马克思”只是就他写了一封所谓的给米海

^① 在未发表的增补中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地方作了这样的说明:“他们不懂得,不能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而又否定他的历史观点:《资本论》同时就是历史研究。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理解《资本论》第3卷的命运。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都歪曲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洛夫斯基先生的信而言。^①

676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在自己的报纸《新莱茵报》和当时其他定期刊物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来评价例如 1848 年到 1850 年法国历史事变的观点是错误的么？多么可惜，你们没有费力说明这个观点的错误性；多么可惜，你们的观点是处在未开展的形态中，而且由于缺乏资料甚至不可能“重新建立”这些观点。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用来评价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哲学学说的意义的那个观点是错误的么？^② 可惜，在这个场合你们也没有驳倒马克思。也许你们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到过这个对象吧？喏，在这种场合，我们不想拯救你们摆脱困境；要知道你们拿来发议论的

① 说的是卡尔·马克思 1877 年末就《祖国纪事》杂志编辑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的卡尔·马克思》（该刊 1877 年 10 月号）所写的致该刊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了这封信已经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了。它曾刊登在《民意通报》1886 年第 5 期和合法的《法学通报》1888 年第 10 期上。通常都把这封信错误地说成是写给米海洛夫斯基的，虽然马克思在信中只是用第三人称说到他。〔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26—131 页。〕

在信中马克思驳斥对他的观点的歪曲，驳斥这样的愿望，即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一切民族，无论他们处于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都必然注定要走上的普遍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民粹派抓住了信中的这个地方，认为它证实自己寄托在俄国特殊道路上的希望。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 7 卷，圣彼得堡，1909 年版，第 327 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一章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58—170 页；第 3 卷，第 271、478—484 页。〕——俄文版编者注

“对象的文献”，你们应该是知道的；要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都有平凡的和非凡的科学吹鼓手的称号。诚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妨碍你们主要研究“非正式的”科学：主观社会学、主观历史哲学等等。

——可是究竟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写出这么一本书，其中用他的观点叙述从古至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并且考察发展的一切领域：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领域？

一切有教养的头脑的首要标志就在于善于提出问题，在于知道哪些回答是可以向现代科学要求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可是，尽管马克思论敌们的非凡性，有时甚至他们的平凡性，而其实正是由于这个性，在他们那里这个标志似乎没有出现。难道你们以为在生物学著作中有这么一本书，其中用达尔文的观点叙述了动植物界的全部历史么？去同任何一个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谈谈这个问题吧，那么他会预先嘲笑你们孩子气的天真，然后告诉你们，用达尔文的观点来描述全部漫长的物种史——这是现代科学的理想，现代科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这个理想；现在已经找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物种的历史只有用它才能理解。^① 在现代的历史科学上，情况也完全一样。

“达尔文的全部工作是什么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问 677

^① “现在相互隔离得还很远并且从最不不同的各种经验的认识源泉出发的所有这些各式各样发展史领域，由于增长着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联系的意识，从今以后获得更高的发展。它们沿着最不不同的各种经验的道路行进并且依靠着最各式各样的方法，总是奔向同一个目的，奔向包罗万象的一元论的发展史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参见爱·海克尔(E. Haeckel):《现代发展史的目的和道路》(*Ziele und Wege der heutig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耶拿,1875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道——几个有概括力的、互相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把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顺利地综合起来的思想。马克思的相应的工作在哪里呢？这工作是没有的……而且不仅马克思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尽管它内容极其渊博，传播非常广泛，也没有做这项工作。无数次被当作公理加以重复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至今仍然是相互间没有联系而且事实上未经检验，这在依据物质的、可感知的事实并具有主要是‘科学’尊号的理论、原则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①

说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本身仍然相互间没有联系——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只要读一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可以看出这些原理相互间的联系何等严整何等紧密。说这些原理未经检验，——这也是不对的：它们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在《资本论》中，而且完全不是“特别”在“原始积累”一章中，^②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的那样，而是毫无例外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所有各章中都利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检验过。如果这个理论仍然没有一次联系“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叙述过，这一点，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见，对于把它区别于达尔文理论是不利的，那么这里又是一个误会。利用比如包含《物种起源》一书中的那个事实材料所证实的主要是物种的变异性；至于某些个别物种的历史达尔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只是假定式地提及：据他说，这个历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5—106页。——作者原注

② 1892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俄国思想》第6期第90页上写道，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在《资本论》第六章一个质朴的标题‘所谓原始积累’中有所阐述”。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21页。——俄文版编者注

史可以这样进行,可以那样进行,——有一点无可怀疑:有过历史,物种曾经变化。现在我们请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需要向马克思证明,人类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社会形式在变化,人们的观点互相在新旧更替,——一句话,是否需要本应证明这类现象的变异性呢?自然,不需要,虽然,为了证明,堆积整整十座山的事实材料是容易的。对于马克思说来究竟本来应该做什么呢?社会科学和哲学先前的历史积累了“堆积如山”、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马克思就用像达尔文的理论一样由“几个综合的、彼此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理论解决了这些矛盾。当这些思想出现了的时候,事情就清楚了:用这些思想可以解决困扰先前思想家们的一切矛盾。马克思需要的不是把他的前辈们收集的实际材料堆积如山,而是主要利用这些材料、用新的观点着手研究人类的现实历史。这一点,马克思也做到了,他着手研究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结果出现了《资本论》(我们且不说像《雾月十八日》这类的专著)。

然而,在《资本论》中,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讨论的只是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就是在这些期限内,对象自然甚至连大概也没有研究完。”这是对的。不过我们要再次提醒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教养的头脑,第一个标志在于懂得怎样的要求可以向科学人士提出来。马克思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包罗一切历史时期,完全同样的,达尔文也不可能写出一切动植物物种的历史。

甚至在对待一个历史时期的方面,对象也研究不完,哪怕只是个大概。——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连大概也研究不完。然而第一,请告诉我们,达尔文把什么对象研究完了,哪怕只是大概,

而第二,我们现在向你们说明在《资本论》中问题怎样和为什么没有研究完。

按照新理论,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导致经济关系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业都必须从研究特定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关系状况开始。然而不用说,研究不应停留在这一点上;研究应当指明枯燥的经济骨骼怎样为生动的社会政治形式的肉体所包裹,然后指明——这是课题最有意义、最为诱人的方面——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情感、意图和理想所包裹。可以说,到达研究者手里的是死材料(这里,正如读者看到的,我们多少是用卡列也夫先生的文体说话的),从他手里出去的应该是充满生命的有机体。马克思能够解决的——而且自然只是大概地——仅仅是主要涉及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的物质生活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去世时不很老。如果他再活二十年,那么他大概还会继续(也许除了再写几部独立的专著以外)解决同一时期物质生活方式的种种问题。这又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生气。他双手叉腰,开始训斥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你怎么会这样呢,老兄?……只有一个时期……而且不完全……我不能,不能赞成……你学学达尔文的榜样吧!”。可怜的《资本论》作者只有用深深的叹息和令人伤感的承认回答整个这一长篇大论的教训:“艺术是长久的,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迅速且威严地转向马克思的信徒们这些“群氓”:在这种场合你们干吗看着,为什么没有支持老头子,干吗不去详尽地研究一切时期?——信徒们深深地鞠躬,拿着帽子走向一旁,回答道:我们没有工夫,我们忙着别的事,我们进行了反对

沉重压在现代人类身上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斗争。别见怪！不过顺便说说，我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等着吧——我们还会做得更多。^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变得稍微温和些：这么说来，你们自己现在也看出来，不完全吧？——怎么会看不出来！要知道就是在达尔文主义者那里也还是不完全的^②，甚至在主观社会学中也不完全哩，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一提到达尔文主义者，我们这位作者心中的气愤便重新暴发——你们干吗拿达尔文来纠缠我呢！——他喊道。上层社会的绅士们都迷恋过达尔文，许多教授都赞同过他的见解，可是谁同马克思走在一起呢？一些工人，以及没有人公认的、科学上业余的饶舌者。

这种严厉斥责具有如此有趣的性质，我们不由自主地要继续注意它。

“在《论家族等等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顺带地说，马克思的 680
《资本论》遭到有行会习气的德国经济学家‘沉默’的对待，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指出，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们从一开始主要转向工人们，而且在他们那里遇到了在官

^① 普列汉诺夫想在这个地方作个增补：“关于‘没有工夫’。用阶级斗争说明。”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有趣的是达尔文的论敌们很久都反复重申，而且至今还在反复地说，他的理论正是缺乏“堆积如山”的事实证据。大家知道，微耳和在1877年9月于慕尼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就讲过这个意思，海克尔回答他时曾正确地指出，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没有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实所证明，那么任何新的事实就根本说不出于它有利的话。——作者原注

方科学代表们那里不曾预料的很强的理解力。这些事实正确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的意义怎么样呢？首先，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长时期的‘沉默’甚至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我们的科学生活和文学生活十分缺乏和极其微不足道的情況下，现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有为数众多的大学，普遍识字，有各派无数的报纸、传单，有不仅报刊言论而且口头言论的影响的德国，这就更加不可能。而且如果德国某部分官方的科学祭司开始时曾用沉默对待《资本论》，那么这未必能够用想‘避而不提’马克思的著作来解释。比较正确的是假定，沉默的动机在于因疑惑而犹豫，与此同时迅速增长的既有热烈的反对，也有达到极限的尊敬，其结果，《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很迅速地在公认的科学中已经无可争辩地占住了很高的位置。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也包括《资本论》中所具有的关于未来方向的那些远景的命运就完全不是这样。经济唯物主义，尽管存在了半个世纪，对各个科学领域至今并没有产生多少明显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中却很迅速传播开来。”^①

总之，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反对的立场迅速地生长出来了。这是对的。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副教授，如果他承认哪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也得不到教授的头衔；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甚至最没有才能的编外的副教授，只要他能够想出哪怕是两个明天所有人都会忘记的反对《资本论》的意见，就可以指望迅速晋升。对的就是对的：很热烈的反对立场。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5—116页。——作者原注

还有达到极限的尊敬……这也正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的是尊敬。恰恰是中国人今天应该用来看待日本军队的那种尊敬：说打得好，不过受它的打击是不愉快的。德国的教授们在对《资本论》的作者，过去是而且至今仍然满怀这样的尊敬。而且教授越聪明，他的知识越多，在他那里，这样的尊敬就越大，他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他驳不倒《资本论》。这就是为什么官方科学巨擘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攻击《资本论》。巨擘们宁愿派遣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需要晋升“编外饶舌者”的人去进行攻击。 681

在那不需要聪明人的地方，

您派列阿特去吧，

我在看着哩……

有什么可说的：这类尊敬是伟大的。而另一类尊敬我们并没有听说过，而且在教授身上也不可能，因为在德国不会让满怀这种尊敬的人做教授的。

然而这种尊敬究竟证明什么呢？它证明下面一点。《资本论》所囊括的研究原野正是从新观点，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观点已经耕耘过的那片原野。对于这片原野，论敌们不敢攻击；他们“尊敬它”。而这对于论敌们说来自然很好。然而需要有“主观”社会学者的全部天真才会惊讶地问，为什么这些论敌至今都没有着手凭自己的力量用马克思的精神耕耘毗邻的原野。“瞧，您想要什么，亲爱的英雄！这里就是用这种精神耕耘过的这么一块原野，不让活啦！已经对它叫苦连天了，您却想让我们按同一个体系还去耕耘毗邻的原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事物的本质理解得很差，

因此他也不理解“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他不理解的还有德国教授们对“未来远景”的态度。当现在从脚下滑走的时候，老天爷，未来在他们就来不及想了。

不过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在德国的教授都这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精神和“科学”条理性的精神。要知道有些专家除了科学什么也不去想。和没有一样，也有这样一些专家，当然也不是在一个德国。然而这些专家——正是因为他们是专家——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对象上；他们耕种着自己不大的一小块科学原野，他们对任何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都不感兴趣。关于马克思，这些专家很少有什么观念，而如果有的话，那大概就是给某人和某地制造麻烦的讨厌的家伙。你们怎么希望他们用马克思的精神写作呢？在他们的专著里通常根本没有任何哲学精神。然而这里发生着某种类似如果人们默不作声顽石也鸣不平的事情。研究者专家们本人根本不懂马克思的理论，可他们取得的结果却大声宣布说它胜利了。而且没有

682 有任何一项政治关系史或文化史方面的严肃的专门的研究，没有这样或那样地证实这一理论。许许多多惊人的例子都说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精神在何种程度上迫使专家们不自觉地站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是历史理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上。读者上面已经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例子：奥斯卡尔·佩舍尔和日罗·泰隆。现在我们举第三个例子。在自己的著作《古代市民公社》（*La cité antique*）中，著名的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说出过这样的思想：宗教观点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一切社会设施的基础。看来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诸个别问题时也应当持这个思想。然而涉及斯巴达衰落问题时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却发生这样的事

情。结果在他那里衰落的原因纯粹是经济的。^① 涉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时他的态度呢——他又是再次乞援于经济。^② 于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各个别场合一个人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而如果您称呼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大概会摇晃双手，对此卡列也夫先生会难以言状地感到高兴。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彻底的始终一贯，请问怎么办？

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打断我们说，——让我从自己方面也举几个例子。“请把注意力放到……布洛斯的书上^③，我们看到这是一本很值得称颂的著作，但是上面完全没有历史科学中根本变革的特殊痕迹。从布洛斯谈到阶级斗争和经济条件中（比较起来很少），还得出他把历史建立在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身发展上：叙述 1848 年事变时避开经济条件甚至是令人费解的。从布洛斯的书中把称颂马克思是历史科学中变革创造者的话，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某些千篇一律的词句删去，您就不会想到您遇到的是经济唯物主义的信徒。谈到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时历史内容写得好的个别几页，不用经济唯物主义的标签也能说过去，因为事实上其中考虑的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

① 参看他的书《论斯巴达的所有权法》(Du droit de propriété à Sparte)。书中包含的(顺便说一句)对原始所有权史的观点这里对我们说来完全不重要。——作者原注

② “对于每一个根据事实的具体详情(正是具体详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原文研究事实的人说来,十分明显的是恰恰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是真正的动因”等等。参见《古代法国政治设施史。封建制度的起源》(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Les origins du système féodal),巴黎,1890年版,第94页。——作者原注

③ 指 B. 布洛斯的《1848 年德国革命史》一书。1922 年版书名为《德国革命。1848—1849 年德国运动史》。——俄文版编者注

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线占优势。”^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显然牢牢地记住了谚语：“既然叫做蘑菇，就应让采食”。他这样议论：如果你是经济唯物主义者，那么你就应该考虑经济的东西，而不要“涉及社会生活全部总和，虽然经济的弦线占优势”。可是我们已经报告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任务正在于从“弦线”开始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他怎么会要他们放弃这个任务的同时仍然做马克思主义者。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来不曾想要深入思考这项任务的意义，不过对此有过错的自然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我们懂得，在我们不放弃这项任务的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常常要陷入很困难的境地：在读到“历史内容好的几页”时他常常远离这样的思想（“不会想到！”）：它是“经济”唯物主义者写的。这正是十分狼狈的境地。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陷入此种境地是马克思的过错么？

主观学派的阿喀琉斯[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以为“经济”唯物主义者只应谈论“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我发展”。这个“自我发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深思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果您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生产形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您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社会生产关系呢？这是人们的关系。没有人们，这些关系怎么发展呢？要知道凡是没有人们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生产关系！化学家说：物质是由结合为分子的原子组成的，而分子结合为更复杂的化合物。一切化学过程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7页。——作者原注

行的。从这里您突然得出结论说,按照化学家的意见,全部问题都在规律中,而物质——原子和分子——可以完全不运动,也绝不会因此妨碍化学化合物的“自己发展”。大家都明白这种推论的荒谬。可惜,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把个人同社会生活规律、把人们的活动同他们社会生活形式的内在逻辑对立起来这种按其内在价值完全相似的做法的荒谬性。 684

我们重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新历史理论的任务在于用您所说的经济弦线,即事实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弦线”——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基础(我们已经解释过,正是在什么意义上),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徒然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像格·伊·乌斯宾斯基《波德卡》中一位人物^①一样“只靠弦线为生”。

彻底坚持一个原则来说明全部历史过程,这是困难的事情。然而请问怎么办?科学一般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这不是“主观的”科学。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许,在涉及思想体系发展的问题上,最深知“弦线”的人,如果不具有某种特殊天赋即艺术感的话,有时也会无能为力。心理适应经济。然而这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为理解适应的全部过程,为了使自己和别人明显地了解这一过程正是怎样进行的,不止一次又不止一次地需要艺术家的天才。请看,例如巴

^① 在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波德卡》中一个靠供应小型流浪乐队弦线为生的老人。他骄傲地说,他的弦线都是珍贵的,“没有任何恶劣的废物”,因为他不能不这样:“只要我还靠弦线活命,我就要让它有完美的声音。”——俄文版编者注

尔扎克就做了许多工作来说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心理。^①我们在易卜生那里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这样的人还少么?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懂得“弦线”运动的“铁则”,另一方面又能够理解和说明在“弦线”的基础上,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运动,怎样生长出思想体系的“生动的服装”。你们说,凡是牵涉到富于诗意的想象力的地方,都不可能没有艺术自由和悟性虚构的地位。当然是这样!事情也不能不这样。这也是马克思很好地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说,应当把特定时代的经济状况(这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确切性来规定的)和这一时代的思想状况严格加以区分。对我们说来,这一领域还有许多、非常之多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过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对唯心主义者会更多,而对折衷主义者则尤其多,他们其实任何时候都不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的⁶⁸⁵意义,他们以为,他们永远可以靠着赫赫有名的“相互作用”来对付任何问题。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对付得了任何东西,而只是躲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背后。迄今为止,用马克思的话说,具体的人类活动完全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试问结果怎样呢?令人满意的解释多不多呢?我们关于人类

^① 1888年4月初,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明巴尔扎克创作的特点时写道:从巴尔扎克长篇小说中他“所学到的……甚至在经济细节的意义上也比这个时期所有的专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的书籍要多”。[中文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2页。]

此处普列汉诺夫有这样一条注释:“格·伊·乌斯宾斯基在这方面可以大胆地同巴尔扎克相比较,他的《大地的权力》。参看我的论文《格·伊·乌斯宾斯基》,载《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参见《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这篇论文登载在中译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上]。——俄文版编者注

“精神”活动的判断,就其根据不足而言,很像古代希腊哲学家关于自然界的判断:充其量是些天才的假设,要不就只是些机智的假设,由于缺乏任何支撑点来作科学证明,要证实、证明这些假设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得不理应将社会心理同“弦线”联系起来的地方,才做出了某种成绩。可是,当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从而建议不要放弃已经开始的企图时,当他说,应该永远以“弦线”为指导时,人们却责备他看法片面和思想狭隘!这里公道何在,也许只有主观社会学家们才知道。

请讲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挖苦我们说:——你们的新词句“50年前就说过了”。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差不多。然而更可悲的是您至今都没有理解它。科学中几十年或几百年前就讲过但至今仍然是千百万对科学漠不关心的“人物”不知道的那些“词句”还少么!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了一个霍屯督人,并试图让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霍屯督人对太阳和地球有自己“独创的”理论。他很难抛弃它。于是他就挖苦起来:你们用新词句跟我说话,可是你们自己就说它已经有几百年了!霍屯督人的挖苦证明什么呢?只不过霍屯督人就是霍屯督人。可是要知道这是无须证明的。

其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挖苦所证明的比霍屯督人的挖苦能够证明的要多得多。它证明我们这位“社会学家”属于数典忘祖一族之列。他的主观观点是从布鲁诺·鲍威尔、施利格以及年代学意义上马克思的其他前辈那里继承来的。所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从年代学上说也比我们的“新词句”古老,而且古老得多,因为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唯心主义

重新回到了前一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①

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困惑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了经济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出现了美国人摩尔根论‘古代社会’的书，^②而且完全不依赖于经济唯物主义”。对此我们要指出：

第一，摩尔根的书并非“不依赖”于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原因很简单，因为摩尔根本人正是站在它的观点上。就像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了他指出的这本书是容易相信这一点的一样。不错，摩尔根不依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走到了经济唯物主义观点，然而这对他们的理论岂不更好。

第二，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过了许多年”被摩尔根的发现所证实，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确信，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发现证实这个理论。可是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确信相反的东西：“主观的”观点不会为任何一个发现所证实，不管是五年之后，还是五千年之后。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的一篇序言^③中获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即恩格斯]及其友人马克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是“不充分的”（恩格斯本人的说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感到欢欣雀跃，说：总之，正是四十年代产生的

① 至于运用生物学来解决社会问题，那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就像我们看到了的，按其“类型”起源于本世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是很可尊敬的老者！其中“俄罗斯的智慧和俄罗斯的精神”真正是“反复地背诵和双倍地说谎”！——作者原注

② 摩尔根的这本书出版于1877年。——俄文版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译者注

全部“经济唯物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充分的根据上面的。这是只有俏皮的四年级中学生才会得出的结论。成年人都会懂得，运用到科学认识上，正如运用到一切其他认识上一样，“充分的”、“不充分的”、“小的”、“大的”诸词，均应取相对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布新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活了整整几十年；他们勤奋地研究了经济史，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鉴于他们的非凡的能力，这一点是特别容易理解的。由于这些成就，他们以前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自然就是“不充分的”了，不过这还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达尔文论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仅仅过了10年，达尔文就认为他发表自己这部著作时所拥有的知识是不充分的。从这里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下述话题也有不少的讽刺：“对于自认为有能力阐明全世界历史的理论说来，在宣布这一理论之后过了40年（即似乎直到摩尔根的书问世为止），古代希腊和日耳曼的历史仍然是未解之谜”。^① 这种讽刺的唯一根据就是“误会”。

希腊史和罗马史的基础是阶级斗争——这一点，仅仅由于下述简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末是不会不知道的：希腊罗马的著作家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实了。读读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吧，读读罗马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吧，哪怕是梯特·李维的著作也好，不过李维在描述事件时总是常常转到“主观的”观点，——那时您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坚信，经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乃是当时社会内部历史的基础。这一信念在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8页。——作者原注

他们那里具有简单地确认简单的、众所周知的生活事实的直接形式,不过,比如在波里比阿那里就已经有建立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某种类似历史哲学的东西。不管怎样,事实却是大家都承认的,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果真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读古书”么?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像对于一切科学界人士那样,不解之谜始终是有关希腊、罗马和日耳曼部族史前生活形式的问题(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一样)。摩尔根的书回答了这些问题。难道我们这位作者真的认为,达尔文写自己那本名著时对他说来当时生物学中就不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么?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道:“必然性范畴是如此普遍和不容争议,它甚至包括最愚蠢的希望和最无益于事的担忧,它的使命看来是同它们进行战斗。从必然性观点看来,希望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不是愚蠢,而是必然性,完全一样,卡西莫多^①不是畸形人,而是必然性,该隐和犹大^②不是恶人,而是必然性。一句话,在实践生活中单单以必然性为指导,我们会陷入某种虚幻的无边无际的空域,那里没有观念和事物,没有现象,只有观念和事物单调的阴影。”^③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甚至任何畸形现象也像最正常的现象一样都是这样的必然性产物,不过从这里完全得不

① 卡西莫多,是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他有着丑到极点的相貌: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驼背。——译者注

② 该隐,圣经神话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是个种地的人。他出于妒忌,杀死弟弟亚伯(牧羊者),因此受到上帝的谴责。犹大,新约中使徒之一,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基督,转义为叛徒。——译者注

③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113—114页。——作者原注

出犹太不是恶人,因为把“恶人”概念同“必然性”概念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可是既然您阁下,一个劲地想当英雄,(而任何主观的思想家,ex,professo^①,都是英雄),那就请费力证明一下您不是“精神失常的”英雄,您的“希望”不是“愚蠢的”,您的“担忧”不是“于事无益的”,您不是思想上的“卡西莫多”,您没有邀请群氓“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为了证明这一切您得求援于必然性范畴,可您不会运用这个范畴,您的主观观点排除这类运用的可能性本身;由于这个范畴,现实对您说来变成阴影的王国。于是在这里您就陷进死胡同,在这里您就给自己的“社会学”签下贫困证书,在这里您就开始反复重申“必然性范畴”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它似乎说明的东西太多了。理论上贫困的证书是您提供给您那些“寻找安身之处”的信徒的唯一文件。少了点儿,少了点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山雀保证说,它是一只英雄的鸟,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燃烧大海。当人们请它说明它燃烧大海的计划是根据什么物理规律或化学规律时,它便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它开始用忧郁的和模糊不清的腔调嘟嘟啾啾地说,听人讲,“规律”起的作用本来就这样,实质上规律什么也说明不了,而且不可能根据规律建立任何计划;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上,因为大家早就知道,对罪过你用棍棒射击,不过一般说来理性最终会胜利。多么肤浅、多么讨厌的鸟啊!

我们拿马克思的英勇的惊人严整的历史哲学同山雀这种模糊不清的喃喃声比较一下。

^① 按照专业技能。——作者原注

我们的类人的祖先,也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处在自然界的
影响下。他们的全部发展都是完全无意识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通过
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而适应他们周围的环境来决定的。这是肉体上
的必然性的黑暗世界。那时连意识的曙光,因而也就是自由的曙光
都没有出现。然而肉体上的必然性使人走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
这个阶段上人逐渐从其余的动物世界脱颖而出。他变成了制造工
具的动物。工具是人利用来作用于自然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
种器官。这是使必然性从属于人的意识的器官,不过开始的时候这
689 种从属只是在很微弱的程度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零星地、
间或地从属。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统治自然的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决定于人们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属性。这
样,自然界本身给人提供征服自然的手段。^①

① 对于这句话以及下文关于社会制度归根到底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等论断,均应联系上下文和本书前面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全面地进行分析、理解。有各式各样的“决定”,例如“西半球缺乏适于驯养的动物以及东西半球植物区系中特有的差异,在两半球居民的社会发展行程中造成了巨大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5页)换言之,在特定历史时期东西两半球社会制度发展行程的不同是由两半球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又如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两个世纪欧俄南部草原空闲地区的大量存在,与同时期西欧的情况不同,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始终只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垦殖国家的历史。(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3页)这和一般说来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没有“决定”性影响,是不相同的两种“决定”。前者讲的是特定的具体的情况对特定具体情况的决定作用,是特殊规律。这一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特定的地理条件可以决定特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可以决定特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这一点,在包括本书附录四在内的普列汉诺夫许多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历史事例可作证明。后者讲的是普遍情况、一般规律。不能一看到说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或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就断定是地理决定论。——译者注

然而人不是孤立地同自然作斗争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同自然进行斗争的是社会人（der Gesellschaftsmensch），即或多或少有相当大规模的社会联盟。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时间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社会联盟的整个制度都依赖于这种发展水平。因此这一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性的地理环境的属性来决定的。然而一旦产生了某种社会关系，它们往后的发展就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规律进行。这些规律的作用加速或延缓制约着人类历史运动的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由直接变为间接。地理环境通过社会环境影响人。而因此，人对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成为极其变动不定的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新的阶段上，这种关系都不会是它以前的那个样子。地理环境对恺撒时代不列颠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①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解决十八世纪启蒙派无论如

^① 孟德斯鸠说过：有了地理环境，就有了社会联盟的属性：在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专制制度，在另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不大的独立共和制社会，等等。伏尔泰反驳说，不对，在同一种地理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没有影响：整个问题都在于人们的意见。——孟德斯鸠看到了二律背反的一个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看到了另一方面。通常只是借助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但它同时用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这种相互作用。启蒙派充其量只会把它束之高阁的这个二律背反，很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辩证的理性在这里原来也比启蒙派的健全的思想（“悟性”）要无限地更为强大。——作者原注

何也对付不了的那些矛盾的。^①

690 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自己固有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也像地理环境的属性一样很少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人通过生产作用于自然界,这样就产生人的依附关系的新方式、人受奴役的新形态:经济的必然性。而且人控制自然的力量越是增长,人的生产力越是发达,这种新的奴役状态就越会更加巩固:随着生产力

① 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中写道:“孟德斯鸠喜欢用‘纯地理因素’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就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而言,他无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不忽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它只是更好地说明地理因素怎样影响‘社会人’。它指明,地理环境保证人们有或多或少的可能性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从而多少有力地推动他们沿着历史运动的道路行进。孟德斯鸠是这样议论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制约着人们一定的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而这些属性则造成这种或另一种社会制度。辩证唯物主义揭示,这种议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首先而且最强有力地表现在社会关系的性质上,而这些社会关系本身比如同气候比起来,又无限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观点、他们的习惯,甚至他们的生理发展。现代地理科学(我们再回忆一下梅契尼柯夫的书以及埃利泽·邵可倡为该书写的序言)[按:参看本书附录四]在这种场合同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这种唯物主义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不过它对历史的说明比其他的‘诸个别场合’所能做到的要充分些、全面些。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

霍尔巴赫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整整一个世纪内都取决于权势人物大脑中胡作非为的一个原子的运动。这也是唯物史观。不过它对于说明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有任何帮助的。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就卓有成效得无法相比。它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但却恰恰是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那种个别场合。霍尔巴赫唯物主义的软弱无力表现在它的拥护者们回到了唯心主义:‘意见支配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现在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阵地上驱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10—811页)

这里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提出了广、狭两义的“唯物史观”概念。广义的“唯物史观”指凡是从“物”出发解释全部或部分历史现象的观点,如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决定论”,等等。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它们最终都“回到了唯心主义”。狭义的“唯物史观”则指马克思的“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史的另一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与前述的那个基本观点,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对先行的种种历史观的革命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是紧密结合着的。——译者注

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这一过程的进程完全逃脱了他们的监控,生产者原来是自身产物的奴隶(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然而正如人周围的自然界本身曾经给人提供第一个可能性来发展人的生产力,从而使人逐渐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一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通过自己发展的固有逻辑使人认识到他之所以受经济必然性奴役的原因。这就有可能使意识重新彻底地战胜必然性,使理性重新彻底地战胜盲目的规律。

生产者(“社会人”)认识到他之受到自身产物的奴役,其原因在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后,便来组织这一生产,进而使之服从自己的意志。那时必然性的统治时期就会结束,而本身原来即是必然性的自由就会驾临。人类历史的序幕就会降落,历史就会开始。^①

^① 我们希望,在所有说过的话之后,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的关系就清楚了。达尔文成功地解决了动植物物种在生存斗争中怎样发生的问题。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在人们争取他们的生存斗争中怎样产生的问题。从逻辑上说,马克思的研究恰恰是在达尔文的研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动物和植物处在物理环境的影响下。物理环境通过社会关系的中介对社会人发生影响,这些社会关系是在最初依据物理环境的属性而或多或少迅速地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达尔文不是用动物机体似乎天赋的发展趋向来说明物种的起源,像拉马克早已做过的那样,而是用机体对处在机体之外的条件的适应来说明物种的起源;不是用机体的本性,而是用外部自然界的影晌来说明物种的起源。马克思不是用人的本性,而是用社会人作用于外部自然界时产生的人们之间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属性来说明人类的历史发展。研究的精神在两位思想家那里是全然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运用于社会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道理(我们知道,按时间先后顺序说,情况并非如此,但这不重要)。而且这是达尔文主义的唯一科学的运用,因为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从达尔文主义中作出的那些结论不是科学地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研究社会人的发展,而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是内容很丑恶的道德说教,就像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从事内容漂亮的说教一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引证达尔文,实际上向自己的读者介绍的不是达尔文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达尔文所讨论的那些动物的野兽本能。马克思和达尔文走在一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则同达尔文研究过的野兽和牲畜走在一起。——作者原注

691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像论敌们归咎于它的那样,企图使人相信,起来反对经济必然性是荒谬的,反而它第一个指出怎样对付这种必然性。这样就会消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固有的、必不可免的宿命论性质。因此它同样也会消除彻底的唯心主义思维——如我们所看到了的——必然导致的那种悲观主义的任何根据。格奥尔格·毕希纳说过,个别人物只是波浪表面上的泡沫,人们服从只可加以认识而不能使之听命于人类意志的铁的规律。马克思回答说,不对,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个铁的规律。推翻这个规律的桎梏就取决于我们,使必然性变成理性顺从的奴仆就取决于我们。

唯心主义者说,我是虫。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反驳说,当我无知的时候,我是虫;然而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神。我知道多少,就能做多少!

这个理论第一次切实地论证了人类理性的权利,第一次开始把理性看作不是偶然性手中软弱无力的玩物,而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有人却以似乎被它践踏的同一理性的权利的名义,以似乎被它藐视的理想的名义,起来反对这个理论!而且有人胆敢指责这个理论是无为主义,指责这个理论企图同周围环境妥协,几乎在阿谀奉承周围环境,就像莫尔恰林^①之阿谀奉承所有比他职位高的人一样!真可以说,这里是嫁祸于人。

^① 莫尔恰林,是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阿·谢·格里鲍耶陀夫诗体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是逢迎巴结的典型。——译者注

辩证唯物主义^①说：人类的理性不可能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一旦有了这个产物，它就不应该，而且按其天性本身也不可能听命于先前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它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面貌来改造这个现实，使之变得合理。 692

辩证唯物主义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说：

Im Anfang war die That! [行动在先!]

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合乎规律的活动)向唯物主义者一辩证论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②唯物主义者一辩证论者的整个实践哲学正是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当主观思想家说“我的理想”时，他这里说的是：盲目的必然性的胜利。主观思想家不善于根据现实发展过程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因此在他那里，在微乎其微的理想小花园的围墙外面立即展开偶然性的、因而也就是盲目必然性的广阔原野。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可以用来使所有这广阔原野变为百花盛开的理想花园的那些手段。它只是补充说，实现这种转变的种种手段就潜藏在这个原野的本身的内部，只要去发现它们和善于利用它们。

① 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这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特点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唯物主义者一形而上学者。他们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作过斗争。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给了辩证的唯心主义，后者反过来被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一词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作者原注

② “社会生活主要是实践生活。一切神秘的东西、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会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作者原注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像主观主义那样限制人类理性的权利。它知道理性的权利也像理性的力量一样是广阔和无限的。它说：一切在人类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即一切并非幻想而是对现实的真实认识的东西，一定会转化为这个现实，一定会把自己一部分合理的东西放到这个现实中去。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意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① 他们远没有把这个作用归结为零，他们在个人面前提出的任务，用通常的、不过也是不正确的话说，应当承认是完全、非常理想主义的。既然只要认识必然性自身内在规律，只要用必然性自身的力量去打败必然性，人的理性就可以战胜盲目的必然性，那么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物最伟大、最高尚的任务。Licht, mehr Licht! [光明，更多的光明!]——这就是首先需要的。

693 然而如果早就有人说过，谁也不会为了藏入密室，弃之不用才点上灯火，那么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补充说：不要把灯火留在“知识分子”狭窄的书房里！只要存在着这样一些“英雄”，他们以为启发自己固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就足以随心所欲地把群氓带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氓当作黏土，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这时理性统治的时代就始终是漂亮的空话、高尚的幻想。只有当“群氓”本身变成历史行动的主角，当他们这些愚昧无知的“群氓”身上发展出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自我意识时，这个时代才

^① 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专论，该书新译集补本已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注

会开始一日千里地逼近我们。我们曾经说过，发展人的意识吧。我们现在补充说，发展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吧！主观哲学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有害，正是因为它把群氓和英雄对立起来，以为群氓不过是一堆零，其意义仅仅取决于那站在首位的英雄的理想，从而妨碍知识分子去促进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

民间谚语有句粗话：有沼泽就有鬼怪^①。主观主义者说：有英雄，对他们说来就找得到群氓，而且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就是主观的知识分子。对此我们回答说：你们把英雄和群氓对立起来，乃是纯粹的自命不凡，因此也是自我欺骗。而且你们始终会是纯粹的……空谈家，直到你们懂得，为了你们那些理想的胜利，应当消除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本身，应当在群氓心中唤醒英雄主义的自我意识。^②

法国唯物主义者说过，意见支配着世界；我们是意见的代表，因此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是英雄，群氓只有跟着英雄走。

上述观点的这种狭隘性是同法国启蒙派地位的独特性相适应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力求消除阶级；而且它是在消除阶级已成为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出现的。因此，它向应当成为最近历史时期的主角的生产者呼吁。因此，从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以来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来第一次发生科学同劳动者接近的现象：科学赶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自觉运动中依靠科学的结论。

^① 意思是：坏环境必然产生坏人；有漏洞就有人钻。——译者注

^②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作者原注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的论敌所指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们说的一切只涉及预言领域;这一切只是些猜测,仅仅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戏法才具有几分结构整齐清晰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你们是形而上学者的道理——主观主义者们的回答说。

我们已经说明了,只有对“三段式”没有丝毫概念的人才会把它扯进我们的争论。我们已经说明了,在黑格尔本人那里三段式从来没有起过论据的作用,它根本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具有区别性的特点。我们也说明了,我们敢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引证三段式,而在于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放下这个反对意见,不予任何注意。但我们以为记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著作史中下面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对读者将不无益处。

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在评析《资本论》时曾指出^①,《资本论》作者在自己的(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猜测中仅仅依据形式上的彼此协调,他的论据只是不自觉的概念游戏。下面就是已故的尼·齐别尔对这个责难的回答。

“我们仍然确信,物质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是先于他的著作的形式方面的。我们认为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更仔细更公正地读完了马克思的书,那么他本人在这一点上就会同我们一致。那

^① 尤·茹科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文章中(载《欧洲通报》,1877年,第9册)评析了《资本论》。——俄文版编者注

时他无疑会看出,正是通过对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物质条件的研究,《资本论》作者证明,人类给自己提出的只是能够解决的一些任务。马克思沿着资本主义生产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引导读者,他分析了构成资本主义的一切因素,使我们懂得它的暂时性。”^①

“我们拿……工厂工业,——尼·齐别尔继续说,——及其每一道工序都不断更换人手,及其几乎每一天都把工人从一个工厂投入另一工厂的狂热运动来说吧;难道工厂工业的物质条件不是为社会结构、社会协调的新形式所准备的环境么?难道周期性地重复着的经济危机的活动不是朝着同一方向进行么?市场紧缩,工作日时间的减少,各国在公共市场上的竞争,大资本战胜规模不大的资本,难道不是追求同一目标么?……”接着尼·齐别尔在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极度迅速的提高后再次问道:“或者这一切都不是物质的改造,而是纯粹形式的改造么?……难道,比如说,资本主义生产把种种商品定期地堆满世界市场,并在消费品过多时迫使千百万人忍受饥饿的那种情况,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实实在在的矛盾么?……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者(顺便要指出,他本人也乐于承认)在许许多多的人失去工作的同时又埋怨工人人手不够,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占有者把减少工作的手段,如机械的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和完善,变成工作日延长的手段,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

^① 尼·齐别尔:“对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几点评论”(载《祖国纪事》,1877年11月,第6页)。——作者原注

主义主张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却剥夺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使大批大批的居民仅仅靠计件工资生活,难道不是实际矛盾么?难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仅仅只是形而上学,而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么?然而只要拿出任何一期英文《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就足以立即相信相反的东西。总之,现存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放在预先设想好的、形式的、辩证的矛盾中:光是些现实的矛盾就绰绰有余地够他忙一辈子了。”

齐别尔的回答就其内容而言是令人信服的,按其形式说是温和的。随后来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方面的、对同一位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回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这位可敬的主观主义者到现在对他当时曾捍卫过的那本著作还是理解得极端“狭隘”,如果不说是片面的话,并且甚至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片面理解恰恰是他的正确评价。自然,这种人不可能是《资本论》的可靠的捍卫者。因此他的回答充满着最幼稚的滑稽可笑的东西。例如下面就是这类东西之一。茹科夫斯基先生之责备马克思为形式主义,为滥用黑格尔辩证法,主要靠引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的一个地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马克思的这位论敌在这篇序言中“公允地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反映”:“如果马克思只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篇序言,那么茹科夫斯基先生就会是完全正确的”^①,即,就会证明,马克思无非是个形式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在这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成功地驴唇不对马嘴,如此程度地“用尽”类似的攻击行为,以致你不由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6页。——作者原注

自主地要问自己：我们这位当时还有希望的作者是否真的读过上述序言？本来还可以举出几个类似的和滑稽可笑的东西（其中一个下面要作说明），不过现在问题不在这些东西。无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解得多么不好，他毕竟立刻看出了，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形式主义”是“说走了嘴”；他毕竟明白这类废话乃是无礼的简单产物。

“如果马克思说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这样的，即它自身本能地否定自己先前的状态，随后又否定这个否定，把所通过的诸阶段的矛盾调和于个人财产和公社财产的统一中；如果他说过这个话，并且仅仅说了这个话（哪怕有许多页），那么他就会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从自己的精神深处建立种种规律，并且满足于纯粹形式的即不依赖于内容的种种原则。然而要知道，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他说过的不只是这一点。”用米海洛夫斯基的话说，从马克思似乎勉强塞进黑格尔公式中去的经济内容那里取消这个公式，就像从手上取下手套或者从头上脱掉帽子同样轻而易举。“关于已经经历的经济发展诸阶段这里甚至任何怀疑都不能有……同样无疑的是过程的进一步进展：生产资料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对于未来，自然可以有怀疑。马克思认为，既然资本的集中伴随劳动的社会化，那么劳动的社会化就构成新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生长于其上的经济基础和道德基础（这个劳动社会化怎么会‘构成道德的基础’呢？而且就‘形式的自我发展’而言又怎么样呢？——格·

瓦·[即普列汉诺夫]注^①)。茹科夫斯基先生有全权称这个理论是可疑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权利(自然是道义的权利。——格·瓦)完全不提马克思赋予社会化过程的意义。”^②

“全部《资本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都是用来研究已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加强自己的典型特点,使生产方式的发现、发明、改善,使新的市场,使科学本身服从自己,同化(?)它们,迫使它们为自己效力,以及最后,这个社会形式怎样不能经受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③

在马克思那里,“正是对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对么?——格·瓦)与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即与使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存在越来越不牢固的生产力,——不对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格·瓦)的关系的分析,永远会是著者的逻辑体系和巨大博学的纪念碑。茹科夫斯基先生有道德勇气断言,马克思回避这个问题。这里已经毫无办法。只有惊讶不已地注视翻着跟头给观众取乐的批评者继续做惊险的操练,一部分观众无疑地立即明白这个勇敢的杂技演员会在他们面前摔得粉身碎骨,而另一部分的确善良的观众则赋予这一值得惊异的场面完全不同的意义”。^④

总结: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有形式主义,那么这一责备,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乃是“由一系列小谎言组成的

① 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叙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者原注

②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3—354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357页。——作者原注

④ 同上书,第357—358页。——作者原注

一个大谎言”。

这一判决是严峻的，然而完全公正。而如果它在对待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它在对待现在所有说马克思的“猜测”只是根据黑格尔三段式的人的态度上也是公正的。而如果这一判决在对待所有这样的人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请费力读完这段摘录：

“他(马克思)用事实的内容充实空洞的、辩证的呆板公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像从碗上取下盖子一样从这一内容上拿掉这个公式，而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损伤，只有一点例外，诚然这是极重要的一点。正是：关于未来，社会的‘内在’规律完全是按辩证方式提出来的。对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而言，说跟随‘否定’之后应该是‘否定之否定’就够了；而与黑格尔式的智慧不相干的 698 人们对此是不能满意的：对他们说来辩证的结论不是证明，而且使非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这结论的人应当知道，他恰恰只是使非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而不曾使他信服。”^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身的判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意识到，他现在重复着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马克思论据的“形式性”有利于“猜测”的话。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甚至担心论文读者可别不合时宜地想起它。因此他一开始就装出样子，似乎他现在说的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说过的一样。带着这个目的，他重申，“辩证的呆板公式”可以拿掉，“像盖子”一样等

^① 《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51—151页。——作者原注

等。随后“只有一点”，在对待这“一点”的态度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悄悄地离开读者，同尤·茹科夫斯基先生走到一起。不过这“一点”也是成为揭露茹科夫斯基先生“杂技职业”的理由的那个“极重要的一点”本身。

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关于未来，——即正是关于“极重要的一点”，——并未限于引证黑格尔。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得出限制了结论。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以惊人的“逻辑体系”，以“巨大的博学”说明了“特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怎样“不能经受”自己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这里说的正是“极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马克思对这一点说过多么多令人信服的东西，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显露过多么多的逻辑力量和多么巨大的博学。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茹科夫斯基不提马克思通过引证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实现的劳动社会化来证实自己的猜想表示了惊讶。这也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硬要读者相信，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按照辩证方式”猜测的。1877年“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不只是说了这个”。现在成了——“只是这个”，而且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未来的信心“完全靠黑格尔的有三个角的链条的末端来维持”。^①上帝保佑，多大的转变啊！

699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人的判决，并且意识到他宣布了这判决。

^① 《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66页。——作者原注

然而,为什么这使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忽然想要把自己归入他本人宣布的无情判决的作用之下呢?难道这位先前热情地揭露文坛上的“杂技演员”的人到老年自己感觉到了对“杂技艺术”的喜好?难道这样的转变可能么?任何转变都是可能的,读者!而且对发生类似转变的人们给以一切谴责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不来替他们辩护。不过对他们也应正所谓按人道方式对待。请记住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深刻人道的话:当一个人行为不端时,那么这里常常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请记住同一位作者关于尼·阿·波列沃依的文学活动说过的话:

“尼·阿·波列沃依是库辛的追随者,他认为库辛是善于解决一切深奥难解的问题的人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库辛的这位追随者不可能同黑格尔哲学调和,而且当黑格尔哲学传播到俄文著作时,库辛的学生们就成了落后的人,而且,他们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并把智慧运动上超过他们的人说过的话称为荒谬,这一点从他们方面看来决不是道德上的犯罪行为;不能因为另一些有天赋、精力更充沛而且更刚毅的人超过了某个人就责备他,——另一些人是对的,因为他们更接近真理,但这个人并没有罪过,他只是犯了错误。”^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生都是折衷主义者。按自己智慧的全部结构,按自己先前的——如果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这么说的

^① 《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圣彼得堡,1892年版,第24—25页。[中译本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6页。]——作者原注

话——哲学教育的全部性质，他不可能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调和。当马克思的思想开始传播到俄国，他起先试图捍卫这些思想，不过当然不会没有许许多多的保留，也不会没有极大的“误会”。他当时以为，他可以在自己折衷主义的磨坊中把这些思想研碎，并且用这种办法使自己的精神食品更加多样化。后来他看出了，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适于装饰被称为折衷主义者的世界观的镶嵌细工，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威胁着破坏他喜爱的镶嵌艺术。于是他就起
700 来抨击这些思想。自然，在这里他立即成了落后的人，不过，说实话，我们觉得他并没有罪过，他只是犯了错误。

——不过要知道这一切并不证明“杂技职业”正确！

对，我们也不是证明它正确，而只是提出情有可原之处：由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完全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样的境地，要从这种境地脱身出来只有靠“杂技职业”。不错，也还有出路，但只有充满真正英勇精神的人才会决心走上这条路。这条出路就是：收起自己折衷主义的武器。

结 论

701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叙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主要考察了从理论的观点对马克思提出的反对意见。现在对我们有益的是认识一下至少他的某一部分论敌的实践理性。在这里我们使用比较的——历史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考察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实践理性”怎样迎接马克思的思想，然后再回头讨论我们亲爱的和受尊敬的同胞们的理性。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著名的卡尔·海因岑^①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论战。论战马上具有很激烈的性质。卡尔·海因岑竭力企图，正所谓，嘲笑自己的论敌的思想，并且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精明，丝毫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回敬了他们。^② 也不会没有尖刻的词句。海因岑称恩格斯是“轻率肤浅、粗鲁无礼的小学徒”，马克思称海因岑是

① 恩格斯这样描述过卡尔·海因岑：“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的小官吏，早在1844年就曾幻想过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幻想过一部聊胜于无的德意志宪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8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刊登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时代》报上的一些文章。在这里属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属于马克思的一篇文章是“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322—356页。]——俄文版编者注

“粗俗文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3页]的代表，恩格斯则宣布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①。论争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呢？海因岑把什么观点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头上的呢？下面就是。

海因岑硬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一个充满稍微高尚意图的人在当时的德国是无可作为的。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海因岑说，“应该首先开始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应该大量制造出工厂无产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开始行动。^②

702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考虑到由34个德国吸血鬼造成的那个无产阶级”，换言之，即除工厂工人以外的全体德国人民（“无产阶级”一词在海因岑那里只表示这个人民的贫困状况）。这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似乎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更好的未来，因为它身上很显眼的“只是压迫的烙印，而不是工厂的图章；在德国没有成为英国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忍受饥饿，并且死于饥饿。工厂是人民为了有权争取改善自己处境而预先通过的学校。”^③

任何一个稍微熟悉德国历史的人现在都知道，海因岑的这些指责多么荒谬。任何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闭眼无视德

^① 引用的恩格斯这句话在以下的原文中：“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3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伯尔尼，1848年版，第21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22页。——作者原注

国人民的贫困状况。任何人都懂得，硬说他们有当德国没有成为英国时一个高尚的人就无事可干这样的思想是否公正：似乎这些人已经做了某些事情，并未等待自己祖国类似的转变。可是为什么海因岑把这一胡说整个加在他们头上呢？难道是由于心术不正么？不，我们再说一次：这里不是他的罪过，而毋宁是他的不幸。他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因此在他看来这些观点是有害的，而既然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就抨击了这些似乎对这个国家有害的观点。然而不理解在争论中乃是糟糕的顾问和很不可靠的帮手。这就是为什么海因岑陷进最荒唐境地的原因。他是一个很机智的人，可是没有理解，单靠机智是走不远的，而现在“发笑的人”不在他那边。

像读者看到的，由于完全类似的争论，不得不拿我们这里应当用以看待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种眼光来看待海因岑。而且光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么？要知道所有那些把决心为柯卢帕也夫和拉佐瓦也夫^①——他们的名字不可胜数——服务的意图硬加在“学生们”[指马克思的学生]头上的人都是，——要知道他们全都重复着海因岑的错误，要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过一条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意见不是几乎五十年前曾经作为海因岑的论据出现过的。如果这些反对意见中有什么独创的东西，那就是这样一点：对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并非独创这件事天真的无知。

^① 自由派民粹主义者责备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喜欢农村资本主义化，欢迎伴随着困难的农民丧失土地，和决心千方百计地促进同农村的富农和剥削者，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在讽刺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描写的“原始积累”的英雄们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相勾结的这一过程。——俄文版编者注

他们全都希望为俄国发现“新道路”，而由于他们的无知，“贫乏的俄罗斯思想”走上了充满坎坷、早已被抛弃的、欧洲思想的老路。703 这是奇怪的，如果拿“必然性范畴”来解释这个似乎奇怪的现象，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该国知识分子头脑中“必然”要产生某些荒唐的想法。

下面一个例子说明海因岑在同马克思争论中的处境何等可笑。他穷追自己的论敌们，要求他们说说对未来的详细“理想”：请说，他问他们，按照你们的意见，财产关系理应怎样建立？以私有财产为一方和以社会财产为另一方的界限理应是怎样的？他们已经回答过他，在每一特定时刻，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于该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因此只能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倾向，而不能预先制定任何确切规定的法案。现在已经可以说，由现代工业造成的劳动社会化应该导致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是不能说，在怎样的界线上，比如说经过十年，就可以实现这种国有化：这依赖于小工业和大工业、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等等那时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喏，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理想，——海因岑推论说，——好的理想只有以后将由机器制造出来。

海因岑站在空想主义的观点上。空想主义者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就像我们知道的，总是从某个抽象的概念例如人性概念出发，或者从某个抽象的原则例如某些个人权利或“个性”原则出发，等等。一旦有了这样的原则，就不难从它出发十分确切地、极其详细地规定比如人们的财产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空想主义者对那些告诉他说不可能有与地点和时间的种种情况无关的本身自然好的财产关系的人，

抱着惊讶的神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觉得这样一些人完全没有任何“理想”。如果读者不是完全不注意跟踪我们的叙述,那么他就会知道,在这种场合,空想主义者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理想,而且是很确定的理想:使必然性服从自由,使盲目的经济力量服从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从这个理想出发,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自然不在于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在于发展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成为自己产品主人的生产者本身的自我意识。 704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点不“关心”德国变成英国,或者就像现在我们这里所说,不“关心”替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就是没有他们效力也发展起来了,而且本来就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即没有这样的社会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这样做也会是多余的,因为旧的经济制度归根到底不比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好,而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如此陈旧,以致成了对一切人有危害。不过不可能停止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并不曾使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德国人失去为德国人民的福利效力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有自己少不了的伴侣:所有那些在经济必然性驱使下而实际为它的钱袋服务的人。这些迫不得已的服务者的意识越是发展,他们的处境就越轻松,他们对抗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的力量就越强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就是发展这种自我意识:他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一开始就在自己面前提出了充分、纯粹理想主义的任务。

经济的现实就是理想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过。就是根据这句话,人们怀疑起他们有某种经济上的莫尔恰林作风,准

备给经济上的弱者抹黑，而巴结讨好经济上的强者。这些怀疑的根源就是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经济现实一词。当形而上学者听说社会活动家应当依靠现实时，他以为人们劝他同现实和解。他不懂得在任何经济现实中存在着对立的因素，同现实妥协意味着只同现实诸因素之一和解，同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因素妥协。辩证唯物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指出了和现实的这个因素相敌对的另一个因素，指出了未来成熟着的那个因素。我们要问：依靠这个因素，拿它当作自己“理想”的标准，——这是否意味着替柯卢帕也夫辈和拉佐瓦也夫辈效劳呢？

然而如果经济的现实应当是理想的标准，那么，理想的道德标准之不能令人满意并非因为人们的道德情感应当受到忽略或蔑视，而是因为这些情感还没有向我们指出在为我们邻人利益服务的事业上的正确道路，就容易理解了。对于医生说来同情自己的病人的处境是不够的：医生要考虑机体的生理现实，依靠这现实同它作斗争。如果医生忽然想起满足于对疾病的道德愤慨，那么他就应当受到最严厉的嘲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嘲笑了自己论敌们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敌们却以为他嘲笑的是“道德”。“人类的道德和意志在本人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意志的人们心目中是没有价值的”，——海因岑感叹地说。^①

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俄国反对“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人们一般只是——不自觉地——重复自己德国先辈们的论据，那么他

^① 《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第22页。——作者原注

们毕竟在某些局部性上使自己的论据多样化。比如德国空想主义者对德国“经济发展规律”没有醉心于长篇的议论。我们这里，这类的议论却具有真正吓人的规模。读者记得，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开始，瓦·沃先生曾许诺发现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①。的确，瓦·沃先生后来开始有些害怕这种规律，不过他自己在这里表明，他只是暂时害怕它，只在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发现很好的和很吉利的规律之前。一般说来瓦·沃先生也是乐意参加关于俄国是否应该通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无休止的争论的。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马克思的学说就被扯进了这些争论。

我们这里这样的争论是怎样进行的，塞·克里文科先生最近的话可以说明。这位作者在反驳彼·司徒卢威先生时劝告自己的论敌更好地仔细想想“资本主义的必须性和良好后果”。^②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该通过的发展阶段，如果在这个历史必然性面前只有低头，那么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只能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的到来，以及相反，是否不应当力求减缓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和用一切努力使资本主义制度最快到来，即力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和一般地把

^①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瓦·沃(即瓦·彼·沃龙佐夫)给其1882年出版的论文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沃龙佐夫说明再版自己以前的论文的理由时说，他希望“唤起我们有学问的和宣过誓的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论家去研究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国家生活所有其余现象的基础。没有对这一规律的知识，系统的和成功的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俄文版编者注

^② 《俄国财富》，1893年12月，第2部，第189页。——作者原注

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逼进工厂呢？”^①

706 塞·克里文科先生在这里其实提出两个问题：1)资本主义是不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阶段？2)如果是，那么由此产生怎样的实际任务？我们且说第一个问题。

塞·克里文科先生正确地把这个问题表述为这样的意思，即一部分、而且是最大的一部分我国知识分子正是用这样的形态提出了问题：资本主义是不是注定的、必不可免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当通过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候人们以为马克思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为此非常伤心。当马克思似乎写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封著名的信^②公布^③的时候，人们惊讶地意识到，马克思没有承认这个阶段的“必须性”，于是人们幸灾乐祸地得出答案：喏，他使自己的俄国学生们丢了丑！然而幸灾乐祸的人忘记了法国一句谚语：最后笑的笑得好。

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论敌们对这场争论从头到尾都完全陷于最“不合事物自身规律的废话”。

事情在于，谈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时，人们忘

^① 这段话引自塞·尼·克里文科的文章“论有文化的单干者”。——俄文版编者注

^② 在这个起草的、并未得到最后加工的详细概要中，马克思这封信不是寄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而是寄给《祖国纪事》一位编辑的。〔该信全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时马克思用的是第三人称。——作者原注

^③ 1884年，弗·恩格斯把卡·马克思未发出的信的抄本寄给维·伊·查苏利奇。他在3月6日的信中给她写道：“随信寄去马克思的手稿（抄本），或许对你们有用。我不知道他是在《新语》还是在《祖国纪事》上发现了那篇‘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的文章。他写这个答复，显然是为了在俄国发表，但是他因为担心他的名字会使那个刊登他的答复的杂志受到生存的威胁，所以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3页。〕——俄文版编者注

记了一件小事：忘记了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俄国主观主义者因此而曾陷入的那个窘境，才真正好极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过（如果读过的话）叙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于是他断定，这无非是黑格尔主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真正有大象在的地方没有看见大象，他开始左顾右盼，他以为他最后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章中看见了要找的大象，这一章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而完全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任何过程在它存在的地方都是绝对“必须的”。例如，既然火柴燃烧了，火柴的燃烧对火柴就是必须的；既然燃烧过程完结了，火柴就“必须”逐渐熄灭。《资本论》中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于有这一发展的那些国家说来是“必须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在《资本论》上述一章中有完整的历史哲学，于是断定，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资本主义生产对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是必须的。^① 这时候他开始对那些俄国人之流的困难处境发出低沉的呻 707

^① 参看“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审判前”一文，载《祖国纪事》，1877年12月。“《资本论》第6章中有一节，标题是‘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初诸发展阶段的历史概要，不过他提供了某种更多得多的东西——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我们再说一遍，这完全是荒诞的想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几个概括性的、相互间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思想”的形态叙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不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过这是顺便的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在涉及资本主义过程对西方的“必须性”时也竟然会不理解马克思。他在工厂立法中看到了对历史过程注定不可违反性的“修正”。他以为，按照马克思，“经济的东西”没有人们的任何参与也会自行起作用，所以他认为人们在自己生产过程的进程中的每一次干预都是修正，便是合乎逻辑的。他不懂得的是，按照马克思，这种干预本身在其每一个特定形态中都是特定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请同如此引人注目地一贯不理解马克思的人们进行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吧！——作者原注

吟声,而且——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在呻吟声中充分重视了自己的主观渴望以后,便傲慢地转向茹科夫斯基先生说:您瞧,我们也会批评马克思,而且我们并不盲目遵循导师说过的话!不用说,这一切一步也没有向前推进关于“必须性”的问题,然而马克思在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呻吟以后,本来打算去帮助他。他以致《祖国纪事》一位编辑的信的形式起草了自己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文章的评论。当马克思去世后这份草稿刊登在我国刊物上时,至少给了俄国人之流以正确解决“必须性”问题的可能性。

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马克思能够说什么呢?一个人陷入了不幸,把马克思理论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当作他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对马克思来说首先需要把这位寄予希望的俄国年轻著作家从不幸中挽救出来。此外,这位年轻的俄国著作家曾抱怨马克思判决俄国要走向资本主义。应向这位俄国著作家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给任何国家判决任何东西,它不会指出在任何特定时期对一切民族都共同的和“必须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始终依赖于该社会内部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人说来,不要猜测也不要呻吟于某种以幻想为基础的“必须性”,首先应当研究这种相互关系;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说明对特定社会而言什么是“必须的”和什么是“不必须的”。

这一切马克思也都做到了。首先他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误会”：“在论原始积累的一章中,我想描写西欧资本主义制度

从封建经济制度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因此在其中追踪着那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的历史事件进程,在这进程中,生产者变成了雇佣工人(词的现代意义即无产阶级),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在这个历史中,每一次转变都构成一个时代,成为资本家阶级发展的杠杆;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剥夺土地占有者。在本章末尾,我说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我断言,资本主义的最高成就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些结语中我没有举出任何有利于上述断言的证据,简单的原因是,这断言本身不过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冗长的一系列议论的一般结论。”^①

为了更好地弄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历史理论的地方当作这个理论的那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古代罗马的例子。一个很令人信服的例子!实际上如果所有民族都“必须”通过资本主义,那么对罗马又怎么样,对斯巴达怎么样,对印加人^②的国家怎么样,对其他许多已经离开历史舞台,没有实现自己这一虚假的必须性的民族怎么样呢?马克思对这些民族的命运并非不知道,因此他不可能谈论资本主义过程的普遍必须性。

马克思说:“把我对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概述变为一切民族历史道路的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论,对于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历史存在的条件怎样,都是宿命地预先决定了的,这对于我的批评者是方便的。不过我请大家原谅:这种解释对于我,同时既是不胜荣幸,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译者注

^② 印加人,古代生活在秘鲁的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译者注

又是“不胜羞辱。”^①

喏，岂不正是如此！要知道类似的解释把马克思变成了早在自己同蒲鲁东论战^②时嘲笑过的那些“套公式的人”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把“进步的公式”硬加在马克思头上，马克思则回答说：不，太感谢您了，我不需要这个好意。

709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他们是怎样看待历史发展规律的（请读者记住我们关于圣西门说过的话）。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在他们那里曾具有神秘主义的形态；人类所走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事先已经预定了的，而且任何历史事变都不可能改变这条道路的方向。有趣的心理谬见！在空想主义者那里，“人的本性”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这个本性的发展规律，在他们那里立即具有神秘的性质，它们被转移到人以外和人们的实际关系以外的某个地方，转移到某个“超历史的”领域。

① 按问题的实质，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村社“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1版序言中曾说过这个意思。更早以前恩格斯在1875年发表于《人民国家报》上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答复特卡乔夫的“公开信”的文章中也说过这个思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623页。〕

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已经知道，俄国的村社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压迫下正迅速解体。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这一点，如《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0年）、《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欧洲能够裁减军备吗？》（1893年）等等。最后1894年，他在“答特卡乔夫”一文的“跋”中写道：“这种村社是不是还能保存到那种程度，以致在必要时，正如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期望的，将能配合西欧的变革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呢？关于这一点我不去下判断。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要想这种村社保存下一点什么东西，首先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要有俄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0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198页。——俄文版编者注

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也把问题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从而使问题具有全新的面貌。

辩证唯物主义者“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我们已经解释过应当怎样理解这句话。然而什么是经济呢?这是在人们的生产过程中构成特定社会的人们的实际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不是不动的形而上的本质。它们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以及在特定社会周围的那个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永远变化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一旦给定,从这些关系中就注定要产生一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运动是合规律的,而且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更好地说明了这一规律性。然而既然每一个社会的经济运动由于该运动在其中进行的种种条件的“独特性”都具有“独特”的面貌,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包括过去的和预言未来的一切社会经济运动的“进步公式”。进步的公式——这是一种抽象的真理,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的话说,形而上学者是如此地热爱这种真理。不过他又公正地指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种种情况,而如果一切都依赖于这些情况,那就是说,人们应当研究这些情况,等等。

“为了能够有把握地判断现代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学会了俄文,并且在几年内研究了官方和其他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登载在刊物上的种种文献资料。”^①

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在这一场合是忠实于他的。自然,在他们中间的某个人那里,经济知识可能更广博一些,在另一个人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译者注

710 那里经济知识可能差一些。然而这里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知识的规模，而在于观点本身。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不是以主观理想为指导，也不以某种“进步公式”为指导，而是转向自己国家的经济现实。

马克思关于俄国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如果俄国继续按照它在 1861 年以后所选择的道路行进，那么它就会失去历史进程给予人民的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一切波折的那些最方便的机会之一。”稍微往下马克思补充说，近几年来俄国沿着上述道路行进“已经相当费力了”。从这封信写好的那时起（我们自己补充一句：即从 1877 年起），俄国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

从马克思的信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三条结论。

（一）他这封信不是使自己的俄国学生们感到羞耻，而是使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感到羞耻。这些先生对他的科学观点没有丝毫概念，他们企图按照自己本身的形象和面貌改造马克思，把他变成一个形而上学者和空想主义者。

（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对这封信不感到羞耻，原因简单，因为他们信守自己的理想，并不理解这封信。

（三）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想同我们讨论俄国怎样和往何处走的问题，那么他们在每一特定时刻都应当从分析经济现实出发。

研究这个现实使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得出了有条件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沿着从农民解放时期开始就走上的那条道路行进，那么它就会成为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在这以后，既然陷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下，它就不得不和其他民族这些门外汉

一样服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的规律。这就是一切。”^①

这就是一切。不过希望为自己祖国的幸福效力的俄国人对这个有条件的结论不能满意,他必然产生一个问题:俄国是否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呢?是否有材料让人希望俄国不走这条路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重新回头研究国家实际状况,分析该国现时的内部生活。马克思的学生们根据这种分析断言:是的,将继续!没有材料让人希望俄国会迅速离开1861年以后它已经走上
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一切! 713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学生们”错了。他们应当借助同一个俄国现实提供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学生们”说:俄国将继续沿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行进,不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外在力量、某种神秘的规律推动它走这条路,而是因为没有任何实际的内部力量能够使他离开这条路。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有这样的力量,那就让他们说明它在哪里,让他们证明它的存在。我们将很高兴地倾听他们说话。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关于这个问题任何明确的意见。

——怎么没有力量,我们的理想算什么?——我们亲爱的论敌们高声说。

唉,先生们,先生们!的确,你们天真得非常令人感动!要知道问题在于怎样实现比如你们的任何理想,哪怕它们是某种真的相当不协调的东西?这样提出问题的确非常没有诗情雅兴的性质,然而只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你们的“理想”就只会有“理想的”意义。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译者注

把一个善良的青年投进囚禁的石堡，放下铁插销，周围是严密的警卫。善良的青年人只是付之一笑。他拿起事先准备下的一小块黑炭，在墙壁上画一条小小的船，他坐在船上，于是……他告别牢狱，告别严密的警卫，年轻人重新在光天化日之下踱来踱去。

好一篇童话！然而……只是童话而已。在现实中画在墙上的小船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任何人送到任何地方去。

自从废除农奴法起俄国早就明显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自己就断言，旧的经济关系在我国以惊人的、越来越快的速度瓦解。不过这没有什么，他们互相说：我们把俄国放在我们理想的小船上，于是船就会从这条路上漂流到遥远的地方去，漂流到极远的国家去。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是善于讲童话的人，不过……“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然而要知道这非常不够，而且任何时候童话还不曾改变人民的历史运动，就像还没有任何一只夜莺靠寓言养活一样，这是由于同一个最没有诗情雅意的原因。

714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采取了一种奇怪的分类，把“俄罗斯人”分成两种：一种人相信有可能坐着主观理想的小船漂流，他们被认为是好人、真正关爱人民的人。而那些说这种相信根本没有任何依据的人则被说成是怀有某种不合事物自身规律的恶意，想饿死俄罗斯农夫。在任何一部传奇剧中，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恶人，而按照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的意见，彻底的俄国“经济”唯物主义者理应是这样的人。这个令人惊讶的意见是如此地有充分根据，就像读者已经熟悉的、硬说马克思思想使德国人民“挨饿和饥饿而死”的海因岑的意见之有充分根据一样。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问自己：为什么正是现在出现了一些先生，能够“心安理得地”使千百万人注定要饿死和贫困？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以为，既然彻底的人已经确定，在俄国，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免的，那么他只有“力求……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和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驱逐出去”。塞·尼·克里文科先生如此认为只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彻底的”思维。

海因岑至少承认马克思对身上盖有“工厂图章”的劳动者的热爱。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看来不承认“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那里甚至会有这个小小的弱点：据说他们彻底仇视整个人类的一切子孙。他们想使人类全部饿死，也许商人阶层例外。实际上如果克里文科先生容许“学生们”身上对工厂工人有某些善良意图的话，那他就不会写出刚才引用过的几行话。

“力求……一般地把多余的农夫从乡村驱逐出去”。上帝保佑！为什么要力求呢？要知道新的工作人手流入工厂会导致工资降低。喏，要知道甚至连克里文科先生也明白，工资降低对工人不可能是有利的和愉快的。为什么彻底的“学生们”会力求给工人造成损害，做出工人不愉快的事情呢？显然这些人只是由于自己仇视人类才是彻底的，他们甚至也不爱工厂工人！也许他们爱，不过是以特殊的方式：他们爱，因此他们力求造成损害：“爱得要死，便使劲摇晃。”奇怪的人！奇怪的彻底性！

“力求……发展富农经济，破坏村社，使居民失去土地。”多么可怕！但是为什么力求做这一切呢？要知道发展富农经济和使居民失去土地会影响到居民购买力降低，而居民购买力的降低会使

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即使工资下降。不,彻底的“学生们”不爱劳动的人!而且是否光是劳动的人呢?要知道居民购买力的减少甚至危害雇主们的利益,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确信,雇主乃是“学生们”最温柔的关怀的对象。不,不管怎么说,这些学生都是些怪人!

“力求……使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毫不“顾忌地收购农民的土地,开办小店铺和小酒馆,进行其他龌龊的活动……”但是为什么彻底的人们要做这一切呢?要知道他们深信,资本主义过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因此如果企业,比如小酒馆,是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小酒馆的出现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设想小酒馆现在不存在)。克里文科先生觉得龌龊的活动一定会加速资本主义过程的运动。不过我们再说一遍,如果资本主义不可避免,“龌龊事”就会自行出现。马克思的彻底的“学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力求”去干它呢?

——在学生们那里理论已经在道德情感的要求面前默不作声:他们看到龌龊事不可避免,由于这个不可避免性,他们非常喜欢这种事,并且从一切方面急忙帮助它,据说没有我们,不幸的、不可避免的龌龊事不会迅速完成。

是不是这样,克里文科先生?如果不是,那么您关于“彻底的”学生们的一切议论就毫不管用。如果是,那么您个人的彻底性,您本人的“认识能力”也毫不管用。

随便您拿什么比如小手工业生产资本化来说,它是两方面的过程:第一,出现了把生产资料积攒到自己手上的人们;第二,出现了实际使用这些生产资料以取得一定报酬的人们。假定龌龊事是第一类人的特点,那么受雇为他们劳动的那些人看来可以避免道

德发展的这个“阶段”了？如果是这样，如果我把我的活动贡献给 716 第二类人，如果我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那么我的活动中会有什么龌龊的东西呢？也许克里文科先生说，这样的活动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会。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例子告诉他，在那里这样的活动不仅不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却是加速这种发展，而且使当地某些老大难问题的实际解决更加接近了。

或者拿破坏村社来说吧，这也是双方面的过程：劳动的份地聚集在富农手中；先前独立的田主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变成无产者。自然，这一切都伴随着利益冲突、斗争。“俄国的学生”来到这议论纷纷的地方，对“必然性范畴”高唱简短而充满感情的赞歌，并且……开办小酒馆！最“彻底的”人这样做；比较温和的人则限于开办小店铺。是不是这样呢？克里文科先生？为什么“学生”不站在乡村贫苦人一边呢？

——然而如果他想站在乡村贫苦人一边，他应该会力求妨碍他们失去土地么？——喏，假定应该力求。——而这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会延缓。相反，甚至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主观主义者先生说来，一切似乎是村社“自身”倾向于过渡到某种“高级形式”。他们错了。村社唯一现实的倾向——这就是倾向瓦解，而且农民的处境越好，村社就瓦解得越快。况且瓦解可能在对人们多少有利的条件下发生。“学生们”应当“力求”使瓦解在对人民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

——那么，为什么不预先防止瓦解本身呢？

——那么，为什么你们没有预先防止 1891 年的饥荒呢？不可

能么？我们相信你们，而且如果我们仍然只是把这类与你们无关的事件归因于你们的道德，而不是用逻辑的论据来驳倒你们的观点，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的事业输掉了。不过为什么你们用另一种尺度报答我们呢？为什么你们在同我们争论时把人民的贫困说成似乎它是我们的事业呢？因为在拿不出逻辑的地方，有时就拿出空话、特别可怜的空话。你们未能预先防止1891年的饥荒么？谁会担保你们能够预先防止村社瓦解、农民失去土地呢？就拿折衷主义者如此喜爱的中间道路来说吧：假定在某些场合你们能够预先防止这一切。而在你们的努力结果失败的那些场合，违反你们的努力，村社还是瓦解，农民还是失去土地的那些场合，——面对命定的过程的这些牺牲，你们将怎样行动呢？卡戎只把那些出得起渡资的人渡过斯提克斯河^①。你们是否打算只把现实的村社社员接到你们的小船上，以便渡过到主观理想的王国去呢？你们是否打算用桨击退乡村无产者呢？你们自己大概会同意，先生们，这会是很“龌龊的”。而既然你们同意这一点，那么，你们在对待乡村无产者方面就必须完全像——按照我们的意见——一切正派人应该行事的那样行事，即不开设小酒馆向他们出售曼陀罗^②，而增加他们抵抗小酒馆、抵抗酒馆老板、抵抗一切曼陀罗的力量，历史送给或将送给他们的只有这种力量。

或者，也许现在我们开始讲一个童话故事？也许村社不会瓦解？也许人民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土地？也许我们虚构出这个其唯

^① 卡戎(Charon)，希腊神话中冥河上把死者的灵魂送到阴间的门口去的摆渡者。为了准备酬劳渡手，人们把钱币放入死者嘴里。斯提克斯河即冥河。——译者注

^② 曼陀罗，一种酒精类的麻醉剂。——译者注

一的目的就是使至今享受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的农民陷于贫困？然而请打开你们的同志们的任何一种研究作品，它都会告诉你们，早在任何一个“学生”开设小酒馆或着手办小店铺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你们跟我们争论时，你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人民已经生活在你们主观理想的王国，而我们按照我们固有的对人类的仇视抓住人民的双脚，往下拖向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然而事情恰恰相反：现在存在的正是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问自己：怎样同这种单调乏味作斗争，怎样把人民安置在哪怕稍微接近“理想社会”的状况下？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回答得不正确，但是为什么要歪曲我们的意图呢？^①要知道，确实，这是“齷齪的”；确实，这样的“批判”连“苏兹达尔人”^②也觉得不体面。

然而怎样跟单调乏味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呢？这个资本主义不顾我们的努力和你们的努力已经存在着。你们有一个回答：即“巩固村社”，加强农民和土地的联系。我们则回答你们说，这是只有空想主义者才做得出来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抽象的回答。按照你们的意见，村社永远和到处都是好的，而按照我们的意见，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

① 对这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曾打算做如下的增补：“在这里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消灭过时的生产方式如家庭工业的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民主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用倍倍尔在（1895年）布列斯拉夫里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简要地确定：‘我总是自问，这种办法会不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会，我就反对它……’”（《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9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苏兹达尔人”是个比喻词，用来象征粗糙、拙笨。这个词导源于苏兹达尔地方手工圣像画家的一种古老的手工艺。这些画家中许多人画法拙劣，但他们所做的圣像价钱便宜，因此有很大的销路。——俄文版编者注

和地点的种种情况。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村社可能有益于全体人民；大概现在也有些地区，村社对农耕者是有利的。并不是我们起来反对这样的村社。而在整整一系列的场合村社都变成了剥削农民的手段。我们起来反对这样的村社，就像反对一切对人民有害的东西一样。请记住格·伊·乌斯宾斯基那个“白白”付款的农民。^①按照你们的意见，对他该怎么办？把他转移到理想王国去，——你们回答说。很好，同上帝一起运过去。不过暂时他还运不过去，暂时他还坐不上理想的小船，暂时小船还没有驶近他，而且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船会开来，这时避免“白白”付款对他岂不更好么？村社保证给他供应的只是完全不生产物质财富的花销，以及也许还得定期到乡公所受鞭笞，不再做村社社员对他不是更好么？我们以为会更好些，而你们却为此责备我们打算用饥饿整死人民。这公正吗？这里没有某种“齷齪的东西”么？或者也许你们实际上没有能力理解我们？难道这是对的么？恰达也夫某个时候说过，俄罗斯人甚至不知道西方的三段论^②。难道这恰恰是你们的情况么？我们假定塞·克里文科先生完全真诚地不理解我们；假定卡列也夫先生和尤沙可夫先生也是如此。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我们看来总是头脑更加“机智”得多的人。

为了改善千百万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命运，先生们，你们

^① “生动的数字”系列丛书中格·伊·乌斯宾斯基短篇小说《真正微不足道的人》中，“白白”地即没有种地就付了款的农民说出了坚定的信念：“白白”付款比耕种份地要划算得多。——俄文版编者注

^② 彼·雅·恰达也夫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说过这句话。参看恰达也夫：《哲学书信》，莫斯科，1906年版，第11页。——俄文版编者注

想出了什么办法呢？当谈到“白白”付款的人时，你们只会提出一个建议：为了不破坏农民同村社的联系，即使他“白白地”付了款，还是应该的，因为当村社瓦解，就恢复不起来了。自然，这会使“白白”付款的人一时感到不便，不过……“庄稼汉忍耐一下，不是坏事。”^①

由此可以得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把人民最切身的利益牺牲给自己的理想！由此可以得出，他们的说教实际上变成对人民越来越有害的东西。

“做一个充满热情的女人成就了她的社会地位”，——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巴芙洛芙娜·舍列尔说道。^②仇视资本主义成就了我国主观主义者们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处女的热情能给俄国带来什么利益呢？丝毫没有。“主观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仇视给俄国生产者带来什么利益呢？也是丝毫没有。

然而安娜·巴芙洛芙娜的热情至少是无害的。而空想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则开始明显地损害俄国生产者，因为它使我国知识分子对待巩固村社是极其不择手段的。刚一谈到这个巩固，立即就出现一片黑暗，黑暗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而且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殷勤地同“莫斯科新闻”接吻。而且这一切“主观的”精神错乱恰恰有利于“学生们”似乎打算要培植的那个小酒馆。说来可耻，隐瞒却是罪过：资本主义的空想的敌人事实上原来是资本主义最粗野、最丑恶、最有害的形态的走狗。

① 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篇《正门入口旁的沉思》。——俄文版编者注

② 安娜·巴芙洛芙娜·舍列尔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她满腔热情，使她取得了社会地位”。——俄文版编者注

迄今为止我们说到曾经力求或者现在力求想出反对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意见的空想主义者。现在我们看一看喜欢引证某种反对意见的空想主义者过去或现在是怎样行事的。

海因岑——俄国主观主义者们在同俄国“学生们”争论时现在以如此惊人的准确性重复着他的话——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空想主义者。不过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有许多空想主义者属于与此对立的派别。^①

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就一般特点说是这样的。

一方面资产阶级迅速地发展了，它迫切需要德国政府各式各样的接济和支持。著名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曾是它的整个事业，而且拥护关税同盟的宣传鼓动不仅通过“请愿”进行，也利用或多或少科学研究的手段：我们想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②。另一方面，旧经济“基础”的崩溃使德国人民在对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处于没有自卫能力的境地。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充分地硬拖进资本主义运动过程中，这样，这一过程的一切不利方面他们都感同身受，在过渡时期他们的感受特别强烈。不过那时劳动群众还很少能够进行抵抗。他们还不可能给资本的代表以多少显著的回击。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就说过，德国同时既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又受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之苦。在四十年代它受资本主义不够

^① 对这句话普列汉诺夫曾想加以说明：“即我想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页）——俄文版编者注

^②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时代德国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曾把发展个别国民经济的生产力提到首要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认为国家的协助是必要的（例如对工业品的保护关税）。——俄文版编者注

发达之苦还要严重些。资本主义摧毁了农民生活古老的基础；以前德国盛行的家庭手工工业现在不得不经受它无力胜任的机器生产的竞争。家庭手工业者贫穷了，每一年都陷入对收购商人越来越沉重的依赖中。而同时农民不得不为地主和国家负担整整一系列这样的赋役，这些赋役在以前也许可能是不繁重的，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则变得更加沉重，以致这些赋税越来越不符合农民生活的实际条件。农民的贫困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富农成了乡村绝对的主宰；他们往往购买农民尚未收割的庄稼；而农民靠打短工过着赤贫的生活。当时的研究者们都指出，村社中几千户家庭里只有几百户不过赤贫的生活。在另一些地区——事情几乎完全不可思议，不过德国的报刊曾及时指出确有其事——农民吃动物尸体为生。他们离开乡村之后在工业中心找不到足够的工作，而且报刊曾指出日益增长着的失业现象和失业引起的移民。

下面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关刊物之一对农民的境况所作的描写^①：“在拉文斯堡区和德意志祖国其他地区的几万纺织工人已经不可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说的主要是家庭手工业者）。他们寻找工作和面包，两者均无所得，因为除了纺织，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最微薄的工资工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竞争。”^②

^① 《社会明镜》(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第1卷，第78页(威斯特法里亚通讯)。——作者原注

^② 引文出自1845—1846年爱北斐特出版的《社会明镜》杂志。这份杂志上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文章。该杂志的纲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明镜》上据说刊登的几篇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没有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堕落了。与旧经济关系崩溃相适应的是旧道德概念的衰落。当时报纸杂志上充满着对工人酗酒、淫乱、讲究穿戴、挥霍这样一些在工人中间随着工资减少而发展起来的现象的抱怨。在德国工人中间还没有出现新道德即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引起的新的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个道德的标志。群众的解放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群众暗中不满的情绪只是偶尔表现在没有希望的罢工、没有目标的暴乱和毫无意义的捣毁机器上。然而在德国工人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出现了认识的火花。在旧秩序下是不需要的奢侈品的书籍，在新秩序下成了必需的东西。读书的热情开始控制了工人。

这就是德国知识分子中间思想健全的一部分人（有教养的人——如当时所说）理应考虑的那种情况。怎么办，如何帮助人民？排除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回答说。这时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受到了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愉快的欢迎，把它们当作有利于必须排除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据。“与此同时，自由派政治家先生们吹起了李斯特保卫关税的喇叭，力图使人相信。……他们关心工业的高涨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他们的论敌、热衷于自由贸易的人，则力图证明，英国之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典型国家完全不是由于保护政策——非常及时地出现了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本卓越的书，摧毁了最后的幻想。^①大家公认，这本书是新时代最杰出的著作之一……它用一系列最

^① 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于莱比锡问世（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俄文版编者注

无可辩驳的论据说明,以私人企业主(对这些人说来钱就是神)的个人贪婪、自由竞争为其推动原则的社会会急急地跌进深渊。”^①

总之,应当排除资本主义,否则德国会跌进英国已处在其底层的那个深渊。这是恩格斯所证明的。谁来排除资本主义呢?知识分子——有教养的人。德国的特点,用这些有教养的人之一的话说,恰恰在于德国排除资本主义是德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然而“在西方同资本主义斗争得更多的是工人”^②。德国知识分子怎样来排除资本主义呢?通过组织生产(劳动组织)。为了组织生产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呢?1845年科伦出版的“*Allgemeines Volksblatt*”[《人民总汇报》]提出了下列措施:

(一) 促进国民教育,组织平民讲座、音乐会等等。

(二) 设立大的作坊,在这里,工人、手工业者和家庭手艺人可以为自己工作,而不是替企业主或采购商人工作。《人民总汇报》希望这些手工业者和家庭手艺人逐渐自行组成联合会。 722

(三) 创立货栈,以出售家庭手艺人 and 手工业者以及国民作坊提供的制成品。

这些措施把德国从资本主义祸根中拯救出来。而采取这些措施是更容易的,引用过的这页书补充说,因为“到处都已经开始建立常设的货栈,所谓工业集市,在集市上手工业者可以展示自己的

① 《社会明镜》,第1卷,第86页(简讯和通报)。——作者原注

② 参看赫斯(Hess)在同一本厚厚的杂志同一卷上的一篇文章,第1页及以下各页。再比较《新趣闻》(*Neue Anekdoten*),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出版,达姆施塔特,1845年版,第220页。在德国,和法国相反,同资本主义的斗争由少数有教养的人进行,并“保证战胜资本主义”。——作者原注

出售商品”，拿它们作抵押还可以立即得到某种贷款……往下接着描写从这一切中产生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的利益。

排除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地方看来是最容易的。因此，德国空想主义者常常喜欢强调德国还不是英国这一情况。海因岑甚至直截了当地准备否定德国工厂无产阶级的存在。然而因为对空想主义者主要问题在于向“社会”证明组织生产的必要性，所以他们就不费力气地和不知不觉地有时转到了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上：他们断言，德国资本主义由于它固有的矛盾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居民购买力在下降，占领国外市场很少可能，因此在制造业中做工工人的人数必定会越来越减少。在路·布尔有意思的小册子《论劳动阶级之贫困以及论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联盟之任务》（*Andeutungen über die Noth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über die Aufgabe der Vereine zum Wohl derselber*）。（柏林，1845年）问世后，我们不止一次引证过的杂志《社会明镜》，当时德国空想主义者最主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

布尔问自己：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而成立的联合会能不能担当起自己的任务？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现在工人阶级的贫困从何而来？

723 布尔说，穷人和无产者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穷人不想或不能工作；无产者寻找工作；他有能力工作，但没有工作，于是他陷于贫穷。这种现象先前时代是完全不知道的，虽然始终有穷人，也始终有被压迫者，例如农奴。

无产者从哪里来的呢？竞争造成了无产者。竞争打碎了把生产联系起来的旧桎梏，唤起了工业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竞争迫

使企业主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因此企业主们力求减少工资或工作人手的数目。后面这个目的通过机器的改良达到了,机器的改良把大量工人抛向街头。此外,手工业者经受不住机器生产的竞争,也在变成无产者。工资越来越降低。布尔举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还欣欣向荣的印花布生产为例。当时工资很高。优秀的工人每周能挣到 18 到 20 塔列尔^①。然而出现了机器,同时出现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于是工资便大幅下降。在自由竞争原则占统治的地方,这个原则便始终和到处都这样起作用。竞争引起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则引起失业。而且大工业愈完善,失业现象便愈增长,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便愈少。这的确如此,下面的情况可以证明:上述灾难只发生在工业国家,农业国家则没有。然而自由竞争造成的事态对社会是极其危险的,因此社会不能依然漠不关心地对待这事变。社会怎么办?在这里布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说处于首要地位:某个联合会一般说来能不能根除工人阶级的贫困?

柏林的地方联合会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提出的目的是“与其消除现存的贫困,不如说阻止将来产生贫困”。现在布尔转向这个联合会,他问:你们怎样预防未来产生贫困;为此你们怎么办?现在工人的贫困起源于缺乏对劳动的需求。工人需要的不是施舍物,而是工作。联合会从哪里得到工作呢?为了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应当扩大对劳动产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由于劳动群众工资的减少而减少。或者也许联合会会开辟新的市场?布尔也不认为这是

^① 塔列尔,德国旧时货币名,1塔列尔等于3马克银币。——译者注

724 可能的。他得出结论说,柏林联合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是“善良的幻想”。

布尔建议柏林联合会在同工人阶级的贫困作斗争之前更好地深入思考一下贫困的原因。他不认为治标的办法有意义。“劳动交易所、储蓄所和退休金储蓄所,以及诸如此类,自然可以改善少数个人的处境,但是不会拔掉罪恶的根源。”协会也拔不掉这个根源:“协会也摆脱不了竞争的沉重的必然性。”

布尔本人在哪里看到了消除罪恶的手段呢——这很难从他的小册子中确切地得出来。他似乎暗示,为了救治罪恶,需要国家干预,但是他又补充说,国家干预的后果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无论如何他的小册子对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且完全不是在使人失望的意义上。相反,人们在其中看到了劳动组织的必要性的新证据。

下面是《社会明镜》关于布尔的小册子所说的话。

“著名的柏林著作家路·布尔用‘贫困’等等的标题出版了著作。他以为——我们也同意他的意见——工人阶级的灾难是从生产力过剩中产生的:这种过剩是自由竞争的后果,也是物理学和力学中最新发现和发明的后果;回到行会和同业社团就像阻碍发现和发明一样的有害;因此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书评作者加的着重点),没有现实的手段可以帮助工人。假定现代自私自利的私人企业主的关系依然不变,应当同意布尔说的,任何联合会都没有能力消灭现存的贫困。不过这一假定完全不必要;相反,曾经可能产生而且现在已经产生其目的在于以和平手段消除新社会上述自私自利的基础的联合会。需要的只是政府不要妨碍联合会的这种

活动。”

显然，书评家没有理解或者不愿理解布尔的思想，不过对我们说来这不重要。我们转向德国只是为了利用德国历史提供的教训，更好地深入分析现代俄国的某些思潮。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运动本身包含着许多对我们足资借鉴的东西。

第一，布尔的论据使我们想起尼·-逊先生的论据。他们两人开始都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劳动需求降低的原因，因此也是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原因。他们两人都谈到国内市场饱和和由此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减少的必然性。布尔看来不承认德国人夺取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尼·-逊先生坚决不承认俄国工业家有这种可能。最后，他们两人都始终完全没有研究过国外市场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出有利于自己意见的任何一个严肃的论据。^①

布尔除了在帮助工人阶级之前应该好好仔细思考工人阶级状况之外，他从自己的研究中没有作出别的明白的结论。尼·-逊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的社会面前摆着一个诚然困难、却并非不可解决的任务——组织我们的国民生产。然而如果用我们引用的

^① 对这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有以下备注，“关于尼·-逊。他的基本错误在哪里？不理解‘价值规律’。静态地而不是动态地看这个规律。恩格斯关于司徒卢威和尼·-逊的错误的可能性说过什么……”（《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30—231页）。——俄文版编者注

1895年2月26日恩格斯致普列汉诺夫信中写道：“至于说到丹尼尔逊（即尼·-逊），恐怕对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所属的那一伙俄国人仍然相信俄罗斯，真正神圣的俄罗斯有着与其他不信教的民族不同的自发共产主义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3—394页。]——俄文版编者注

《社会明镜》杂志书评家对布尔观点说过的那些见解来补充布尔的观点,那么得到的恰恰是尼·-逊先生的结论。尼·-逊先生=布尔+书评家。这个“公式”使我们产生下面的想法。

尼·-逊先生在我们这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甚至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可不可可以说布尔和书评家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状况的观点的总和等于马克思对同一状况的观点呢?换句话说,书评家所补充的布尔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当然不是。从布尔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陷入的矛盾,还得出他站在马克思的观点上。他是从很抽象的观点来看待这些矛盾的,而且就是由于这一点他的研究按其精神同马克思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点。听了布尔的话,本来可能以为德国资本主义在自己发展的重压下不久就会窒息而死,它已经无路可走了,小手工业生产彻底资本化了,德国工人的人数迅速减少。这样一些观点马克思没有说过。相反,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有时谈到德国资本主义最近命运时,他说过完全不同的话。只有根本不理解他的观点的人才会承认德国的尼·-逊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① 尼·-逊们在当时的德国是很多的,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派别。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保守派。例如法学额内教授(ordentlicher Professor der Recht)卡尔·福里格拉夫博士在一本标题极长的小册子《论供应居民广泛消费的一切食品生产领域和一切工业领域的竞争——这些竞争超出自然必需的界限或者没有达到这些界限,——论或多或少影响一切阶级的德国普遍贫穷的最近原因,特别论粮食高利贷的原因以及消除这高利贷的措施》(von der über und unter ihr naturnothwendiges Mass erweiterten und herabgedrücken Concurenz in allen Nahrungs-und Erwerbszweigen des bürgerlichen Lebens, (续下页注)

德国的尼·-逊们曾如此抽象地议论,就像我们现在的布尔和福里格拉夫一样。抽象地议论,甚至在从完全正确的原则出发的那些场合也是错误的。读者,您是否知道什么是达兰贝尔的反物理学? 达兰贝尔说过,他根据最无可争辩的物理定律可以证明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现象的必然性。只要依循每一个特定定律的作用,而暂时忘记使其作用改变形态的另一定律的存在,就可以了。得到的结果大概完全是荒谬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达兰贝尔举了几个真正辉煌的例子,甚至还打算闲时写出整个的反物理学。福里格拉夫先生和尼·-逊先生已经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地在写反经济学。他们的手法是这样的。他们抓住某个无可争辩的经济学规律;他们正确地指出它的趋向;然后他们忘记这一规律在生活中

(续前页注文) *als der nächsten Ursache des allgemeinen, alle Klassen mehr oder weniger drückenden Nothstandes in Deutschland, insonderheit des Getreidewuchers, sowie von den Mitteln zu ihrer Abstellung*, 达姆施塔特, 1848 年版) 中就是这样描绘“德意志祖国”的经济状况的,它与《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述》一书中对俄国经济状况描写惊人的相似。福里格拉夫也把事情描述成这样,似乎生产力的发展“在自由竞争的影响下”已经引起在工业中做工的工人人数相对的减少。在他那里比布尔更详细地描绘了失业现象对国内市场状况的影响。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者同时是其他部门产品的消费者,然而因为失业使生产者失去购买力,所以需求在减少,其结果失业现象变成普遍的,于是产生全面的赤贫现象(völliger Pauperismus)……“而因为农民由于过度竞争也沦为赤贫,所以就出现各种事业完全停滞。社会机体在瓦解,它的生理过程导致野蛮群众的出现,而饥饿则在这些群众中引起骚动,国家的惩罚甚至武装力量都无力反对这种骚动。”自由竞争在乡村中使农民所有的土地变少。“任何一家农户的劳动力一年四季都找不到充分使用。这样,在成千的乡村中,特别是在土地贫瘠的地区,几乎完全像在爱尔兰一样,贫苦的农民没有工作无所事事地站在自己家的门口。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无力帮助其他人,因为他们大家所有的东西都太少,他们全都需要工资,他们全都在找活干,又都找不到工作”。福里格拉夫自己想出了一系列同“自由竞争”的破坏性影响作斗争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杂志《社会明镜》的精神。——作者原注

的实现乃是一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他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特定规律的趋向到他们开始写作自己的研究作品时在生活中已经完整地实现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福里格拉夫、布尔或尼·-逊堆一大堆哪怕没有消化的统计资料，并且着手适时或不适时地引证马克思，那么他的“概述”就具有用《资本论》作者的精神进行令人信服的科学研究的面貌。然而这是不多不少的视觉欺骗。

福里格拉夫关于他当时德国“社会机体的瓦解”的预言完全没有应验这一无可争辩的情况说明他，例如，在分析这个国家经济生活时忽略了许多东西。而尼·-逊先生完全徒然地接受马克思的名字，正如尤·茹科夫斯基先生有时徒然乞援于积分学，甚至最可敬的塞·尼·克里文科都不费力气地懂得。

和责备马克思有片面性的那些人的意见相反，这位著作家从来没有撇开特定国家经济运动同在其基础上生长的、本身影响着它往后动向的那些社会力量的联系来考察该国的经济运动（这一点暂时对您还不完全明白，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不过——请忍耐一下！）。有了一定的经济状况，从而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力量，这力量的作用必然要影响到经济状况的往后发展（您不耐烦了么，克里文科先生？下面对您就是显著的例子）。有了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代的英国经济，从而也就有了比如在当时英国国会中参加会议的那些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是特定经济状况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他们活动的方向则受这种状况的属性的制约。有了现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从而也就有了它的现代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影响英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当马克思研究某些人乐于称之为猜测的问题时，他就考虑到了这些社会力量，并不

认为这个或那个仅仅靠自己美好的意图而强大的人物集团可以随意地阻止他们的活动(“随着历史运动的深入,群众的规模将扩大,因为历史运动是群众的事业。”)。^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们的议论就不一样。当他们给自己提出某些任务时,他们指的只是自己国家经济状况令人难堪的方面,忘记了研究从这种状况中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力量。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是可悲的,上面指出的那位书评家曾议论说:因此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但不是无法解决的组织生产的任务。在可悲的经济状况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力量本身会不会妨碍生产的组织呢?友善的书评家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空想主义者从不充分考虑自己时代的社会力量,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用马克思的说法,总是把自己摆在社会之上。而根据同一原因,并且用同一个马克思的说法,空想主义者的一切盘算原来都是“没有主宰者参与而完成的”,而且空想主义者的“批判”无非是完全没有“批判”,即不善于批判地看待他周围的现实。

在特定国家组织生产只可能是该国存在着的那些社会力量活动的结果。为了组织生产需要什么呢?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就其全部复杂性和全部总和的自觉态度。在暂时没有这种自觉态度的地方,只有一辈子始终是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的人们,即使他们五亿次以最大的尊敬提到马克思,才能提出组织生产是最近的社会任务。尼·-逊先生在自己臭名昭著的书中关于生产者的觉悟说过什么呢?根本没有:他指望“社会”的觉悟。如果在这以后可以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译者注

729 和应该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就看不出为什么不能承认克里文科先生是我们时代的唯一的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主要的黑格尔主义者。

不过,是结束的时候了。我们的比较历史法给我们贡献了什么结论呢?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就是以下四条:

(一) 海因岑及其同道们关于马克思由于自己本身的观点被判定为在德国无所作为的这一信念,原来是胡说八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现在我国坚持马克思观点的人们似乎不可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好处,相反,只会损害俄国人民的那个信念乃是同样的胡说。

(二) 布尔和福里格拉夫对德国当时经济状况的观点由于其抽象性原来是狭隘的、片面的和错误的。可以担心,往后的俄国经济史会暴露尼·-逊先生观点中类似的种种缺点。

(三)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把组织生产当作自己最近任务的人们,都是空想主义者。在现今俄国推动组织生产的人们也是这样的空想主义者。

(四) 历史粉碎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俄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嘲笑了前者;我们内心痛苦地预见,资本主义也会嘲笑后者。

但是难道这些幻想不曾给德国人民带来任何利益么?在经济方面根本没有,或者如果您需要更确切的说法,几乎没有。所有这些出售家庭手工制品的集市和所有这些创设生产者协会的企图几乎没有改善哪怕几百个德国生产者的状况。然而这些集市和企图促进了这些生产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

益。德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学校、国民阅览室等等——带来了同样的利益,并且已经是通过直接的而非迂回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德国人民有害的后果只有随着德国生产者自我意识的发展而同等程度地受到削弱或被消除。马克思比空想主义者更好地懂得这一点,因此他的活动更有利于德国人民。

在俄国,情况无疑也是这样。就在1894年10月号《俄国财富》⁷³⁰上,塞·尼·克里文科先生“张罗着”,如我们这里所说,组织俄罗斯人的生产。^① 克里文科先生这番“张罗”,什么也没有消除,谁也没有得到幸福。他的“张罗”是笨拙的、不成功的、无效的:不过如果这番“张罗”,尽管有这一切否定的性质,唤醒着哪怕一个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它们都会是有益的,而且那时得出的结论是,克里文科先生生活在世上不是仅仅为了犯逻辑错误或者不正确地翻译用别国语言写成的、他不喜欢的论文的片段。同我国资本主义有害后果作斗争,只有在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将来得到发展的那个水平上才能进行。而从我们这些话中,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可以看出,我们完全不是“粗鄙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狭隘”,那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我们摆在自己面前的首先是完全理想主义的任务。

现在,再见了,我们的论敌先生们。我们事先预感到你们的反对意见给我们带来的那一切最大的快乐。只是你们,先生们,要照顾好克里文科先生。他写得也许不坏,至少有感情,然而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他并不清楚!

^① 普列汉诺夫指塞·尼·克里文科的论文《论国民工业需要问题》,结尾部分刊登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10期上。——俄文版编者注

附录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

译者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01年3月8日、15日、23日和30日普列汉诺夫连续四次在日内瓦钟表工人学校向瑞士和意大利的工人以及日内瓦和俄国的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用法语所作讲演的记录稿，第一次发表在1926年的法文杂志《社会主义新月刊》上。同年该讲话的俄译文随即在《“劳动解放”社文集》第4集上刊出。整个讲话通俗、概要、系统地叙述了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确切些说，唯物史观从萌芽、壮大到成熟的历史。就叙述这一历史发展时段最长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这个讲话可以说是第一次。这里仅选录了论述中世纪到伏尔泰为止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论述神学史观的第一讲，因为论述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历史哲学到马克思历史观的第二—四讲的内容，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已经有更详细更全面的说明。全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译文是重新翻译的，还对原文作了若干删节。

第一讲

(1901年3月8日)

诸位女士和诸位先生：

关于人类的历史运动和进步的原因的大问题，构成前人称之为历史哲学，而在我看来最好用历史观一词来表示的那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我们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就是说，这是历史学不满足于研究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而希望知道现象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发生。

就像任何对象一样，历史哲学有自身的历史。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各个不同时代，研究历史运动原因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哲学。

你们也许会向我指出，在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的不仅是一个，而是若干个历史哲学学派。我同意这个意见，但同时我请你们注意，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不同哲学学派相互之间始终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看作同一个类的不同的种。自然，它们中间也可以看到过去时代的种种残余。因此，为了简化所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哲学。

在我们的座谈中，我们要介绍其中的某些历史哲学。我从神学的哲学或者说神学的历史观开始。

什么是神学的哲学或神学的历史观呢？这是最原始的观点：它同人类想弄清周围世界的最初努力紧密地联系着。

实际上，人关于自然界所能获得的最简单的观念——这就是

不把自然界看作互相依赖和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现象,而看作由一个或一些同人自己的意志类似的意志的作用所产生的事变。法国哲学家居友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叙述说,一个小孩当着他的面骂月亮是坏蛋,因为它不愿出现在天空。这个小孩认为月亮是有灵性的东西。像这个小孩一样,原始人认为整个自然界都是有灵性的。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而排除对自然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和把这些现象理解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现象则是科学的第一步。在小孩以为月亮不出来是因为它坏的同时,自然科学家却向我们说明在每一特定时刻容许或妨碍我们看见某一天体的所有那些自然条件。

然而当科学在研究和理解自然界方面以比较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候,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科学则发展得缓慢得多。当对自然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早就只会令人发笑的时候,对历史现象的万物有灵论解释还被认为是可行的。在比较文明的环境中,常常甚至在高度文明的环境中,人们认为把人类历史运动解释为一个或几个神灵的意志的表现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样一种用神的意志对历史过程进行的解释,我们就称之为神学史观。

为了向你们提供这种历史观点的两个例子,我现在着重谈谈两个著名人物的历史哲学:希波(今阿尔及尔)主教圣奥古斯丁和莫城(在法国)主教波舒哀。

圣奥古斯丁(354—430年)认为,历史事变依赖于上帝的天命,而且他确信不能对它有别的看法。他说:“请想一想,上帝,这个最高的主宰、一切灵魂和一切肉体的唯一的和万能的缔造者和创世主……他把人创造成由肉体 and 灵魂构成的有理性的生物,上

帝是任何形式、任何美、任何秩序的始因，它决定一切东西的数目、重量和分寸，自然界一切种类和任何意义的创造都是由它发生的，——我要问，能否假定这个上帝遭过难，能否假定地上的王国、这些王国的统治以及它们的臣服完全不依赖于上帝的意志”（《上帝之城》）。

这个总的观点，圣奥古斯丁在自己对历史事变的任何一次解释中都没有背弃过。

谈到对罗马人的伟大所作的解释——这个希波主教详详细细地向我们叙述说，这种伟大似乎是上帝的天命所需要的。他说：“在东方诸王国经过漫长年代的繁荣昌盛之后，天主希望时间上最后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一个西方帝国成为按其庄严伟大和按其幅员辽阔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既然天主有愿望要利用这个帝国来惩罚许多民族，他就把治理该帝国的事务托付给这样一些人，他们热衷于朝拜和礼仪，认为祖国的荣誉就是自己的荣誉，并且始终决心为拯救祖国而牺牲自己，从而为了热爱荣誉这个唯一的缺点而压抑自己的贪求和自己的一切缺点。因为——不需要为自己掩饰这一点——爱荣誉是一个缺点”等等。

谈到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的国势昌盛——登上舞台的是容易解决一切和解释一切的上帝的意志。圣奥古斯丁对我们说：“天主上帝想不让自己忠实的崇拜者……相信没有魔鬼的全力相助就不可能在地球上赢得统治和伟大，于是希望用自己仁慈的光辉照耀不求助于冒牌神灵，只崇拜真正的上帝的君士坦丁皇帝，并且赐给他任何其他人甚至不敢幻想的如此大量的幸福。”

最后，要解释为什么一场战争比另一场战争拖的时间长——圣

奥古斯丁对我们说,天主愿意这样:“正如用种种灾祸来消灭人或者用仁慈来安慰人都取决于上帝,取决于他的审判和仁心一样,——他同样也确定战争时间的长短,根据自己的裁决缩短或延长战争。”

你们看,圣奥古斯丁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可惜,为了找到对历史现象的正确解释,忠实于一个特定的原则仍然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的是这个基本原则经过正确选择,其次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时仔细研究在他想加以说明的现象发生之前和同时的所有事实。基本原则可能和应当仅仅成为分析历史真实现象过程中的指导线索。

然而圣奥古斯丁的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提供分析历史真实现象的任何方法。至于它的基本原则,请你们注意下面一点。圣奥古斯丁如此确信和如此详细地谈到他称之为神的法则的那种东西,以致您在读了它以后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他的上帝难道没有在他面前披露自己的隐藏的秘密么?而同一位作者在始终同样忠实于自己“基本原则”的同时,在同一部著作中以同样的确信对我们说,天主的道路是不可吐露的。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提出研究这些“道路”的徒劳无功的课题呢?而且为什么把这些“不可吐露的道路”当作对人类生活的种种事变的解释加以援引呢?矛盾是明显的,而且因为矛盾是明显的,所以就连有狂热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稍微尊重一点逻辑,只要他们不想硬说不可吐露的即不可说明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说明着一切并使一切成为容易理解的,也都不得不放弃用神学来解释历史。

再来谈波舒哀(1627—1704年)。波舒哀在解释历史方面像圣奥古斯丁一样是站在神学观点上的。他确信,各民族的历史命

运,或者像他所说的,帝国的波动(revolutions des empires)是由天命调度的。他在《论世界史》中说道:“这些帝国是同上帝的民族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上帝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惩罚这个民族;利用波斯人重建它;利用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继承者们保护它;利用著名的安提奥克及其继承者们考验它;利用罗马人支持它的自由以反对无论如何想要消灭它的那些叙利亚国王。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以前都是生活在同一些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当犹太人拒不承认耶稣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一些罗马人虽然不知道这件事,却协助上帝复了仇,把这个忘恩负义的民族消灭了”,等等。一句话,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民族和一切伟大国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同一个目的——基督教的昌盛和上帝的光荣。

波舒哀根据圣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解释的圣灵对他的那个启示,向自己的一个学生宣示上帝对罗马帝国和罗马本身的一次秘密审判。波舒哀就是——启示录也是——这样谈论这一切的:似乎天主的道路不再是不可吐露的,而且——这值得特别注意——历史过程的情景使他产生的只是人间万事皆空的思想。他说:“所以,当您看到,使得全宇宙都发生颤抖的这些伟大帝国——且不说国王们和皇帝们如何在一瞬之间从您的视线前飞逝而去的时候;当您看到古代的和现在的亚述人、米底人^①、波斯人、希腊人、罗马

① 米底人,印欧人种之一,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大概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纪进入伊朗东北部,定居于后来称为米底的高原地区。大约公元前625年以后,基亚克萨里斯将许多操伊朗语的米底部落统一为一个强盛的王国。公元前六世纪米底国亡于波斯。到公元前二世纪又臣属于安息。公元三世纪米底转归萨珊王朝。从此米底人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融于伊朗民族。——俄文本编者注

人如何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您面前并且一个跟着一个地倒下去的时候，——这种惊心动魄的破灭使您不会不感觉到，人没有任何经久不变的东西，无常和变乱是人事固有的命运。”

这种悲观主义是波舒哀历史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且如果仔细地深入思考，就得承认这个特点正确地反映基督教的本质。事实上基督教许诺信徒们会得到安慰，许许多多的安慰！然而它怎样安慰他们的呢？要他们摆脱一切尘世的东西，并且劝他们相信尘世的一切都是空虚的，只有死后人们才可能有幸福。诸位女士和诸位先生，请你们记住这个特点；以后的叙述中它会给我们提供进行比较的材料。

波舒哀历史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自己对历史事变的解释中他不满足于像圣奥古斯丁一样援引天主上帝的意志，——他已经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谓的帝国波动的种种特殊的原因上面。

他说：“因为正是那个创造了宇宙和本身万能的上帝希望建立秩序，以便使如此伟大的整体的诸部分互相依赖，正是这个上帝也希望人类事务的进程有自己的连贯性和自己各部分的协调性。我这是想说，各个个别的人也像整个民族一样都拥有与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为上帝]增光的等级相适应的素质，而且如果不考虑按照上帝的意愿本来只应唯一表现上帝自己的意志的某种特殊事变，各民族的生活中就不会发生在先前各世纪中没有其原因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变动。而且既然一切事务中都有为它们作准备的东西，都有激励人们着手进行这些事务的东西，都有促进它们成功的东西，那么真正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为每一个特定时期确定造

成巨大变动的隐蔽原因,和确定导致这些变动得以实现的那些事件的重要会合。”

由此可见,按照波舒哀的意见,历史中往往有一些事变,其中仅仅体现上帝的指示,或者换句话说,其中有上帝直接的活动。这类事变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迹。然而在大多数场合,在事物通常的流程中,每个特定时期发生的变动都是受先前各个时期产生的诸原因制约的。真正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东西的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原因仅仅依赖于人们的和各民族的本性。

所以,波舒哀在自己的神学史观中为历史事变的自然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地盘。诚然,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他那里是同神学观念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天主上帝毕竟始终不渝地使人们和各民族具有与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为上帝]增光的等级相适应的素质。不过这些素质一旦确定,它们就会独立地表现出来,而且只要它们表现出来,我们就不仅有权,而是像波舒哀断然宣称的那样,我们一定要探求对历史的自然解释。

波舒哀的历史哲学比起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来有个大优点,就是它坚持研究事变特殊原因的必要性。不过这个优点实质上只是承认——自然是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承认——神学概念本身,即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来解释现象的那种方法本身是无能为力和徒劳无益的。

下一个世纪,反对神学的人们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承认。这些人中间最危险的费尔内长老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非常挖苦地说:“没有任何东西像教会在遵循迫使第二性原因促成神的永

恒规律取得胜利的上帝的意愿的前提下怎样建立起来那样值得我们如此好奇。让受到神圣托付的人去从事表示尊敬的神圣事业吧，我们自己所关心的只是历史的事变。”^①

神学的历史观就这样推到一边。伏尔泰只注意历史事变，并且力求用第二性的即自然的原因说明这些事变。然而科学如果不在于对现象作自然的说明又会在哪里呢？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是科学地解释历史的一种尝试。

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个尝试。比如考察一下按照伏尔泰的意见哪些原因造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的衰颓是缓慢地和长期地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造成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的种种灾难中，伏尔泰主要提出以下两种：（一）野蛮人的灾难，（二）宗教纠纷。

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但是为什么，——伏尔泰问道，——罗马人不像马略消灭辛布里人^②那样消灭他们呢？因为当时没有像马略一样的人。然而为什么当时没有马略呢？因为罗马人的风尚已经改变。这种风尚改变的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僧侣多于士兵。这些僧侣成群结队，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去支持或者反对圣子的同性同体。”^③

“既然西庇阿们的后裔变成了好争论的人，而且既然霍尔腾修

^① 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75 页。——译者注

^② 辛布里人（Cimbri），日耳曼部落。由于人口过多，以及海水对陆地的侵蚀，辛布里人被迫从现今的丹麦南迁，与条顿人联合后，于公元前二世纪末多次战胜罗马人，公元前 102 年在韦尔切利附近为马略所败。——俄文本编者注

^③ 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301 页。——译者注

们和西塞罗们作为个人受到过的尊敬,已经转移到了基里尔们、格列高利们和安布罗斯们身上,那么一切就都完蛋了。而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惊异,那就是罗马帝国还苟存了一段时间。”^①

你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伏尔泰的意见,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就是基督教的胜利。不过伏尔泰本人是用他固有的辛辣讽刺的语言谈到这一点的:“基督教开辟了通向天国的道路,却毁灭了帝国。”^②他是对的么?他犯了错误么?这一点我们此刻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确切地弄清楚伏尔泰的历史观点。我们下面就来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

总之,我们看到,按照伏尔泰的意见,罗马帝国是被基督教毁灭了。按人性来说,当然可以问自己:究竟为什么基督教在罗马取得了胜利?

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取得胜利的主要工具是君士坦丁。他根据历史的真实把这位大帝描绘成凶恶的和伪善的君主。然而难道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即使他是皇帝,即使他是很凶恶和很迷信的人,能够独自造成任何一种宗教的胜利么?伏尔泰认为能够。而且在他那个时代,不止他一人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哲学家当时都这么想。作为例子我向你们举出另一位作者关于犹太民族的起源和关于基督教的见解。

如果对历史的神学观点在于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来说明历史的进化,那么对历史的唯心主义

① 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1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译者注

观点就在于用风尚和观念的进化,或者像十八世纪人们所说的,用意见的进化来说明同一历史进化。

秀厄说:“我把一个民族中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总和的结果,把决定该民族的判断、它的尊敬或鄙视、它的爱或恨的结果,把造成它的爱好和习惯,它的缺点和它的美德的结果,一句话,把它的风尚,称之为意见。”

既然意见支配世界,显然,意见就是历史过程基本的、最深刻的原因,所以如果历史学家援引意见作为归根到底决定这一或那一历史时期的种种事变的力量,也就无须感到惊讶了。

而且如果意见一般说来说明历史事变,那么完全自然的是在宗教观念中(例如在基督教中)寻找任何一个帝国(例如罗马帝国)繁荣或衰落的最深刻的原因。所以当伏尔泰说基督教造成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他始终是忠实于自己的时代的历史哲学的。

不过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中间有一些以唯物主义者著称的人。例如著名的《自然体系》的作者霍尔巴赫和同样著名的《精神论》一书作者爱尔维修就是这样的人。假定至少这些哲学家不赞成唯心主义历史观,乃是完全自然的。

但是,无论这样的假定看起来多么自然,它却是错误的。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在其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在历史领域则是唯心主义者。像十八世纪所有哲学家一样,像整个“一伙百科全书派分子”一样,当时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意见支配世界,观念的进化归根到底说明全部的历史进化。

[……]

我在前面说过,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批判这种理论,而是好

好地了解它并且抓住它的本质。现在当我们已经了解它的时候，我们就不仅可以，而是甚至必须对它加以分析。

试问，整个理论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

说没有意识到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能合理地捍卫这些利益，这是否正确呢？这是正确的、无可争辩的。说无知给人类造成了许多罪恶，以及说像封建制度那样建立在人压迫人和剥削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只有在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时代才是可能的，这是否正确呢？

对，完全正确，而且我想象不出怎么能够反驳如此无可怀疑的真理。

一句话，说秀厄规定的那种意义的意见对人们行为有巨大影响，这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凡是对人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说，这也是无可怀疑和无可争论的。

由此是否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历史观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而且我们不能对它有任何异议呢？

我回答说：又是又不是。这里我就想谈谈这一点。

就唯心主义历史观本身中包含部分真理这个意义而言，唯心史观是正确的，对，其中有部分真理。意见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权说，意见支配世界。然而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反问自己：支配世界的意见本身难道不是受什么东西的支配么？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反问自己：人们的意见和情感是否单纯地依赖于偶然性呢？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在否定的意义上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人们的意见和情感完全不依赖于偶

然性。它们的产生,正如它们的发展一样,服从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加以研究的规律。而且只要你们同意这一点——又怎么能不同意这一点呢?——你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它们并不是作为最高主宰支配世界的,而是它们自身也是受某种东西的支配,所以,凡是拿意见做根据的人,是根本不能把历史过程基本的、最深刻的原因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历史观中有一部分真理。但其中还没有全部真理。

为了认识全部真理,我们必须恰恰是从唯心史观中断了真理的那个地方继续进行研究。我们需要试图确切地弄清楚在生存于社会中的人们那里意见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为了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我们的研究,首先我们看一看,意见,按照秀厄下的定义,即人们中间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总和,是不是天赋的,它们是不是与人俱来而且仅仅与人俱灭。这意味着反问自己:是否存在着天赋观念?

过去有个时候,人们坚定地确信,观念至少部分说来是天赋的。而且在承认存在天赋观念的同时还承认这些观念构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观念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点都始终是同一的。

这个当年极为流行的观点被杰出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胜利地驳倒了。约翰·洛克在其题为《人类理解论》的名著中证明了人的头脑中没有天赋的观念、原则和概念。人们的观念和原则是从经验中产生的,而且这无论对于实践的原则,或者对于道德的原则都是同样正确的。道德原则依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当人们谴责任何一种行动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种行动对他们是有害的。

当他们赞扬这种行动时，就意味着这种行动对他们是有益的。

所以，利益（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利益）决定着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的判断。

洛克的学说就是如此，十八世纪所有的法国哲学家都是这一学说的坚定的拥护者。所以我们有权把这个学说当作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的出发点。

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天赋的观念。经验决定思辨的观念，而社会利益决定“实践的”观念。我们接受这个原理，并且看一看从中会得出怎样一些结论。

附录二 让·雅克·卢梭和 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译者按：本文于1912年9月刊登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中译文作为附录曾收入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该书商务印书馆多次重印。作者指出，卢梭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当时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表示不满时，提出了种种接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从而肯定了他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这些问题是：关于生产力是知识、技术进步的原因；关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合规律性；关于特定地理环境对特定社会制度性质的决定作用；关于暴力的历史作用；关于人的本性变化无常；关于国家的起源；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关于反对“法制万能”；等等。作者还分析了卢梭在其《论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关于“划分阶级的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内在逻辑”的论述，指出卢梭对阶级社会中“社会概念和社会风尚的辩证法”以及关于“美德”的学说表明他确实是“辩证法的卓越典范”，如恩格斯所说。所有这些都是对本书相关内容的重要补充。

让·雅克·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最卓越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在他诞生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再一次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过的。但是他的天才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十分自然的问题,在为今年六月的纪念庆祝活动所写的许许多多书籍、小册子、大小论文和短评中,很难找到稍微满意的回答。大多数用书面和口头论到卢梭的人都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同意他的思想,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纪念他,因为这些思想叙述得非常好。这很像有个什么人说过的话:我们尊敬普希金是光辉的诗匠。但是说某某作家是光辉的诗匠,还远不等于说他是伟大的诗人。同样,承认特定时代特定的政论家是卓越的文章家,还不等于承认他是伟大的作家。作家的伟大不是用他们文章风格的美来衡量的。凡是用笔很好地叙述出伟大思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作家,正如凡是用嘴很好地叙述出伟大思想的人都是伟大的演说家一样。况且最好的风格当它不再是一种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内容的形式的时候,也会很快变成矫揉造作的东西,即成为不好的东西。这不但在文学上是正确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正确的,大家知道,艺术作品也有其本身的风格。为什么米开朗琪罗的学生们无论在绘画方面或者在雕塑方面都只能创造极其平庸的作品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天才老师的风格以后,不能提高到使这种风格得以产生的那些深刻的内心感受的境界。因此这种风格在他们那里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滑稽可笑的东西。

西,虽然,毫无疑问,这种风格在米开朗琪罗本人那里是光辉灿烂的。这位天才的佛罗伦萨人大概预见到了等待着他的辉煌风格的命运。他跟同时代那些对他处理材料的技巧感到惊奇的人说过:“我的知识造成一大批无知的人。”这些话初看起来离奇古怪,却表明了对事物的深刻理解。

不过我们回头来谈卢梭吧。下面我们会看到,现今驳斥卢梭思想的绝大多数批评家和政论家,对卢梭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不是由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实践上的担忧。于是我们深信,这些批评家和政论家之所以驳斥这些思想,原因不在于思想的内容,而在于批评家和政论家本身的社会同情。这种信念当然不妨碍我们承认,就纯粹理论上的考虑说,卢梭的许多思想在我们的时代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它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了。这是事实。但是只尊敬卢梭是光辉的文章家,毕竟是非常奇怪的。要知道,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政治论》中发挥的那些思想也很过时了。可是谁会因为这种无可怀疑的情况而想到要假定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的意义现在对我们说来只在于它的文体呢?……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随着特定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体现这些关系的思想也在改变。表现那些已经不再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不能不是过时的。然而就是过时的思想,按其意义说,并不都是一样的。其中也有重大的思想、普通的思想和渺小的思想;有深刻的思想、平庸的思想和完全肤浅的思想。此外也有这样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甚至在当时就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刚产生出来就过时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我们发现过去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定作家的思想是过时的,我们还不能据此确定这

些思想的相对重要性。为了给这些思想以正确的评价,我们必须弄清楚,使我们发生兴趣的那个作家对他的时代来说已经过时的思想究竟是什么。那时也许会发现,这些思想在当时不但是新鲜的,而且也是很深刻的,甚至简直是天才的。那时我们就应该承认,说出这些思想的人是天才的,甚至根本不顾及他的文体。在文学作品中,文体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作家说出了天才的思想,纵然用的不是很好的文体,也还得承认他是天才的。

卢梭的情况正是这样。不用说,他叙述自己的思想时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华,这使得对他抱有成见的读者感到惊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征服了他们。这当然是很大的优点。但是即便根本没有这个优点,即便卢梭的论文和书籍叙述得根本不出色,只要其中表现的思想是卓越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些思想对自己的时代来说是天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纵令卢梭的叙述没有才华,他仍不失为一个天才的作家。

这里应当再补充一点:在分析任何理论著作时——而我们在此地正是讨论卢梭的理论著作——只考虑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的方式是不够的。在这里,还绝对必须考虑某个第三种东西,这就是研究的方法。方法,这是用来发现真理的工具。它所以重要,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利用它可以做出一些结论,正像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工具之所以重要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于利用工具可以得到一些必需的物品。而且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特定工具带来的利益,是由实际使用工具而能获得的那些物品的总和决定的,并不是由单独拿出的其中任何一种物品决定的。同样,在精神劳动领域内,特定方法的优点也取决于应用此种方法的研究者得出的

所有那些正确结论的总和,并非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作家特别有力地显示出自己的天才,恰恰是在他得出错误结论的时候。这种情况,例如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就可以找到。当别林斯基在一篇关于波罗丁周年纪念的论文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的时候,他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家。这类事情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像射手即便使用很好的枪,也并非永远都命中目标。然而,如果用很好的枪射击可能失误,而用弓射击却很可能命中目标,那么由此完全不应该得出结论说,用任何东西射击:用完善的枪或者用太古的弓,都是一样的。和弓比较起来,枪毕竟利害得多。同样的道理:虽然掌握更现代的研究真理的方法可能犯错误,而利用比较落后的方法却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这还是完全证明不了方法的意义很小。和比较落后的方法相比,更现代的方法毕竟更有成效些。如果发现更现代的方法的作家本人,并非始终都善于无误地实际运用此种方法,那么这还是不会取消发现这方法的重要意义。继他而起的人们,不但会依据他的新方法改正他的失误,而且一般说来,他们对科学作出的成绩比他们过去利用成效较少的旧方法所作出的成绩大得多。因此,发现更完善的方法的人,其功绩终究是很伟大的,尽管他有个别错误。因此我才说,分析理论著作时,只评价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方式是不够的,还应当考虑到作者用来得出自己思想的那个方法。方法的正确可以绰绰有余地补偿个别结论的错误以及叙述的平淡无味。

至于卢梭,则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他的光辉的叙述才能决没有引起任何争论。长篇大论地来谈论这一点是完全无益的。而卢

梭借以得出自己的那些虽然现已过时的思想的方法，却不是这样。对于这个方法，过去和现在都很少谈到——几乎完全没有谈。而它却值得给以最大的注意。

这篇文章的任务也就在于从方法论的观点评价卢梭的功绩。

二

要解决任何任务都必须有一定的材料。我到哪里去找这些材料呢？我首先是并且也主要是从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学说入手。这个学说主要是在我们的作者为了回答第戎科学院 1753 年提出的问题而写的著作中加以叙述的，这个问题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

卢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说明，他是怎样思考这部著作的。他上圣日耳曼去过一个星期，在那里全部时间都是在森林中度过的。

“我在那里探求过，我在那里发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大胆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轮廓；我揭露了人间无聊的谎言；我敢于赤裸裸地揭示人们的本性，彻底研究歪曲这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并把人造的人(L'homme de l'homme)同自然人加以比较，指出人的所谓完善化乃是指出人类灾难的真正根源。我的灵魂被这些卓绝的默想所激发，上升到神的境界。在那种境界中，我看到，我的同类由于固执成见而走入迷途，朝着错误、不幸、罪恶的方向行进。我于是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他们喊道：‘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苦难都来自

你们自己!’”^①

十分明显,在圣日耳曼森林里漫步和使灵魂上升到神的境界时,是不能研究原始人的。要了解原始时代人类文化的景象,只有敏感的灵魂的热情是不够的;至少需要有一些关于野蛮部落生活条件的知识。因此再没有比嘲笑卢梭和宣布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最纯粹的虚构更为容易的了。其实,早从伏尔泰时代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伏尔泰就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卢梭使他产生了用四只脚跑进森林去的欲望。不过,实际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有可笑的东西,也有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当然不用说,我们的作者所拥有的关于野蛮部落生活的知识总量是不大的。一般说来,十八世纪的人很少了解这些部落。不过当时对这些部落也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近代伟大的地理发现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游记书籍,作家们说明原始文化时就从这些书籍中吸取材料。但是,当这些作家绝大多数在自己的论述中完全满足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时候,卢梭却是感到历史唯心主义不能令人满意的少数特殊人物之一。

当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用极其精练的形式表述历史唯心主义基本观点的公式,这个公式就是:意见支配世界。何谓意见呢?秀厄回答说:“我所谓的意见是指民族内部流行的全部真理和谬误的结果;这结果决定着民族的判断、民族的褒贬、民族的爱憎、民族的风尚和习惯、民族的优缺点,一言以蔽之,决定民族的性格。正

^① 参看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480页。圣日耳曼是凡尔赛附近的一个风景区。——译者注

是这种意见支配着世界。”^①而这就是说，支配世界的意见的基础乃是“民族内部”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一定的总和，亦即观点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要设想和了解原始文化的历史，首先就应当弄清楚“自然人”的观点是什么。而卢梭懂得，假使认为人们的观点是社会发展最深刻的原因，则这些观点本身的产生还是完全不可能说明的。他说，人们把野蛮人看成人以前，就使野蛮人变成哲学家，他又特别中肯地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所固有的逻辑错误在什么地方。如果原始人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些社会理想而没有别的社会理想就互相约定这样一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用卢梭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原始人利用了本身只是逐渐产生也只是由于社会组织才产生的那种教育来组织自己的社会^②。卢梭发现，研究过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种种问题的作家，完全没有从应有的角度追溯到这种状态。“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设想，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已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何以会有这种观念，甚至也没有说明这种观念对他有什么用处。另外有一些人谈到自然权利，即每个人所具有的保存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权利，但却没有阐明他们对于属于一词的理解。再有一些人首先赋予强者以统治弱者的权力，因而就认为政府是由此产生的，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人类脑筋里能够存在权力和政府等名词的意义以前，需要经过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总之，所有这些人不断地在讲人类的需要、贪

① 秀厄：《文学杂录》，巴黎共和历十二年法文版，第3卷，第400页。——作者原注

②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前言”，国家图书馆法文版，第23、25页。——作者原注

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是把从社会里得来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述的却是文明人。”^①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在卢梭心目中如此重要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对立,在他那里具有怎样特殊的、而且就其本身说是极其重大的、虽然远不是始终正确的意义。不过首先我要请读者同我一起研究一下对“哲学家们”的那些指摘,这些指摘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卢梭方法的特点。

有一些哲学家假定,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保持属于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作者问道,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特定事物之属于特定的人,是以私有制度为前提的。我们有没有权利假定自然状态中有私有制呢?要是有的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人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由于原始人认为它有益,于是这些人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原始人想象为按照自己的理论信念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思想家。同时他们忘记问问自己,在私有制未产生以前,人们怎么能够相信私有制可以带来利益?在讨论自然人时硬说自然人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的那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什么是正义呢?罗马法学家说过:所谓正义就是把属于每个人的东西还给每个人。但是这又使我们回到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卢梭公正地指出:“要把各个人的东西返还给各个人,是以每个人能有一些东西为前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1页。[中译本可参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均指这一版。]——作者原注

提的”。^①最后,体力上的强者对弱者的优越是一回事,而统治者对他们所统治的那些人的政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当然可以有比另一个人更大的体力。卢梭不想否认这种情况。但是,第一,他发现,当研究者们力图了解人们之间体力上的不平等会引起什么结果的时候,他们却描述了以财富为基础而不是以体力不平等为基础的文明社会反映出来的情景,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文明人同自然人混为一谈了。第二,他在这里也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用社会政治概念发展的进程来说明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在人们产生政府和权力的概念以前,是需要经过很多时间的。这些概念从哪里来的呢?很清楚,要产生上面两个概念在人们中间就必须存在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起源不可能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

所有这些完全正确的看法迫使我们的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用到另一条路上去。他坚决否认自然人是用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行为的人。^②的确,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developpement de nos facultes et des progres de l'esprit humain)^③,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但是问题正是在于智慧的进步和能力的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即不是比其他一切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是些什么条件引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3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155页。——作者原注

③ 卢梭说得很好:“如果人类的保存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推理,则人类也许久已不复存在”。——作者原注

起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和人类能力的发展。他在方法论上巨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就这方面说,在十八世纪的著作家中间,他是一个稀有的例外。因为十八世纪的著作家总是完全满足于这个肤浅的思想:意见支配世界,即支配人类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卢梭比谁都更像爱尔维修。爱尔维修也感觉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没有根据。他说过:“可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的事业,不如说是时代和必然性的事业。这仿佛得到所有国家中同样的科学发展过程的证实。事实上,如果像休谟所指出的,所有的民族只有在他们获得善于写诗的本领以后才能学会善于写散文的话,那么我觉得,同样的人类理性发展过程就是某种共同的和隐蔽的(即爱尔维修所说‘暧昧的’)原因的结果。”^①

爱尔维修本人就曾经企图^②确定至少在文化发展最初各阶段上引起人类知识进步的那些原因。这种企图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中一段饶有兴味的插曲。下面我们就用一点篇幅把这个企图同卢梭类似的企图作某些比较。

三

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样,爱尔维修思考过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必然性的意义。卢梭则把引起知识发展的原因称为偶然的。而

^① 《论人》,载《爱尔维修全集》,1818年巴黎法文版,第186页,附释。着重点是爱尔维修加的。另参看该卷第110、196页(附释)。——作者原注

^② 关于这点,请看拙著《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斯图加特德文版(载《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卷)[中译本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作者原注

且他所谓偶然,意思只是这些原因不在人的内部,而在人的外部。因此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和爱尔维修很接近。

跟爱尔维修一样,卢梭认为,知识的进步处处都是由人的需要引起的。例如埃及科学和艺术的起源和传播应该归功于尼罗河的泛滥;在希腊,对于科学和艺术说来,阿提喀多沙多岩的土壤比斯巴达肥沃富饶的土壤更有利些。卢梭说:“北方的民族一般说来比南方的民族较为智巧,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好像自然愿意这样调整事物以使它们趋于平等,在它拒绝把富饶给予土地的地方,便把富饶赐给了精神。”^①

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利用自然现成的赐予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随着人类的繁殖,这些赐予相对地变得更加少了。贫困迫使人们寻找维持生命的新方法。各式各样的发明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沿海和河流的两岸,人们发明捕鱼的器具,从而变成渔民。在森林中,他们设计出弓箭,从而成为猎手和战士。在寒冷的地区,他们穿着被他们杀死的野兽的皮。雷电、火山喷溢或者其他一个什么幸运的机会使他们认识了火,于是他们得到一种同冬季的寒冷作斗争的新武器。起初他们保存火,接着取得火,而最后利用火来煮食物。人对和自己不相似而且互相间也彼此不相似的事物的这种态度,渐渐在人的头脑中产生事物相互关系的观念。于是人就有类似思考的某种东西。有了这种东西以后,人对动物的优越性就逐步增大起来。虽然一些动物具有更大的体力,另一些动物跑得更快,但是人同时成为一些动物的主人和另一些动物的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86页。——作者原注

祸害。最初的这些进步使人取得一种地位,在这种地位上人越来越容易进行新的事业。卢梭说:“智慧越发达,技巧便越趋于完善。”^①人很快就不睡在树下或洞穴中;他学会了做石斧和盖茅舍。在卢梭看来,技术的这种进步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引起了第一次伟大的变革:家庭的产生。而在这种进步之后,其他进步不能不接踵而来。现在很不容易解决的是人们怎样认识了铁和学会了使用铁。很难假定人们之所以知道铁是由于某种幸运的偶然性,因为铁矿通常是在没有植物的不毛之地。按照卢梭的见解,仿佛自然力图不让我们发现使用铁这个非常不幸的秘密。^②最后,我们的作者才又考虑到火山:某个火山突然爆发,喷出正在熔化中的金属物质,才使人的头脑第一次想到可以冶炼金属。但是即便这个假设卢梭也觉得不很可靠,因为观察火山爆发只有在智慧发达的人那里才能引起上述思想,自然人的头脑在还不认识金属时未必会有这种发达的智慧。

无论如何,人是学会了使用金属,而人的这一新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和农耕一起,成了人类相互关系中新的伟大变革的原因,就是说产生了国家。金属的冶炼和农耕创造了文明。亚美利加的野蛮人不从事农耕,也不冶炼铁;他们仍然是野蛮人。其他某些民族知道了这些实际技能中的一种,而不知道其他技能;他们仍然是野人,“欧洲的开化,与其他各洲相比,虽不算早,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较少间断,因此,文明化的程度也较高;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15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121—122页。——作者原注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原因之一,或许因为欧洲不仅是产铁最多,同时也是产麦子最为丰富的地方”。^①

农耕必然会引起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随着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一直到国家制度。卢梭继格老秀斯之后重复说,希腊人称赛丽斯女神为立法者,他们的意思是说土地之划归私人所有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自然权利不同。^②

从这一切议论中可以很好地看出,卢梭所谓知识进步的“偶然”原因,实际上并不在人的本性,而在人的周围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按照他的理论,如一些部落以狩猎为生,另一些部落以捕鱼为生,这种情况就取决于地理环境的特性。同样的特性最后会引起其他的技术进步:金属冶炼、农耕等。如果欧洲的文明程度比其他所有各洲更高更稳定,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可以用欧洲大陆的自然条件来说明。任何特定的地理环境的性质,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落入这种环境的人来说是偶然的。他可能落入——在其他场合下也真正会落入——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的地理环境。但是,用不着说,地理环境的特性本身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特性是特定地区地质史的必然产物,它们对人的影响显然具有必然性的一切特征。人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斗争,而在生存斗争中,他不能不利用特定地区供给他使用的那些手段。要知道,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人在一个地方成为猎人,在另一个地方成为渔人。当然这绝不是说地理环境万能,而人则毫无作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1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123页。——作者原注

用。积极的作用不属于地理环境,而属于人。但在特定的时间里,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利用他居住的地区的自然条件提供给他的那些生存手段。这个范围是由人的智慧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卢梭很好地了解和十分清楚地说明过这个道理。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人在智慧发展道路上每一个新的进步,都是由于技术上在一定程度内预先有一种成就或一些成就所引起的。按照卢梭的理论,这就意味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发展过程具有合乎规律性的、即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性质。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证明,我们这位对唯心主义历史观感到不满的著作家朝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走了很大的几步。在说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方面,卢梭表现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尤其是著名的《古代社会》一书作者美国人摩尔根的最卓越的前辈之一。

在哲学上他是唯物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只要读一读他的《萨伏依神甫的信条》(*Profession de foi du vicaire savoyard*)就可以充分确信这一点。按其哲学观点,他无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不过(正像同一部《萨伏依神甫的信条》所表明的一样),他的哲学唯心主义并不很严整,也没有经过充分周密的考虑。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这位唯心主义者那里,比在敌视他的唯物主义集团“霍尔巴赫派”那里要多得多。我请读者注意,我根本无意于断言,好像卢梭在其对历史作唯物主义解释时是完全彻底的。他有时也常常回到唯心主义。例如,他很难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对立,这种对立在除开谢林或黑格尔这样的大家以外所有唯心主义者的言论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虽然他“大胆地描绘的”人类发展梗概的景象把人类的发展说成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过卢梭喜欢重复说,如果

人们愿意的话,这个过程可能部分地改变自己的方向,或者至少大大地延缓下来。他在重述这种看法时,只有在很少的场合下,才对特定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希望作一种和他已有的行动不同的行动这个问题加上一些不很果断的保留意见。我认为下面就是这种保留意见中最突出的一个。

我们所分析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二部分是从这样一个著名的见解开始的:谁把一块土地从四周挖沟圈起来,然后说“这是我的”,谁就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者。在这个见解之后,卢梭用热情的声调疾呼:“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在这一段可以使人因之认为卢梭不是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热烈的话中,鲜明地表现出他把必然和自由对立起来的那种倾向。我们已经知道,按照他的学说,私有权是作为人的生产力发展(金属的冶炼和农耕)的必然结果出现的。我们记得,卢梭怎样继格老秀斯之后重复说,希腊人不无原因地把赛丽斯女神称为立法者。而现在他却想到,如果某个用心善良的人希望反对私有制度,即如果自由的力量起来反对必然的力量,事情就完全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赛丽斯女神也没有理由颁布自己的法律了。但是接着卢梭对一种力量起来反对另一种力量的可能性立即发生怀疑。他继续说道:“但是,想必那时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①等等。换句话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11—112页。——作者原注

说,想必在当时的条件下,谁也不会想到要反对私有制度,而要是有人想反对它,或事实上有人想反对它,那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战胜它的拥护者。这种观点也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想必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自然会希望建立私有制,这就是说,想必当时人们意志的倾向恰好表现了当时的必然性的力量。同一个思想的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会具有很大的优点,可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伟大的唯心主义者谢林和黑格尔(还有莱布尼茨)正是这样解决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的。不过卢梭并没有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他只是有了可能解决它的预感,而且就是这个在刚才指出的保留意见中如此明白地表露出来的预感,在他那里也是很少见的。大体上说,他不仅保留着尚未解决的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而且是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建立其关于社会继续发展合乎愿望的进程的见解的。在纯哲学问题上,他无论如何不能超出肤浅的唯心主义者之上。但是,当这位肤浅的唯心主义者思索到文化发展的动力时,尽管有个别唯心主义偏向,却是像一个唯物主义者那样进行推理的,而且在自己的推理中,往往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有天才的人。在这方面,十八世纪所有的唯物主义者中间,只有爱尔维修才能同卢梭并驾齐驱,而在思想的力量方面还逊于卢梭一等。

四

唯心主义的偏向,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当然破坏了他的唯物主义见解的严整性。他不善于克服自由和必

然的二律背反,这使得这些见解带有不彻底性的因素。上文引述的关于私有制产生问题的保留意见证明,有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因素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即使排除不了这个因素,至少得削弱这个因素的朦胧的希望。不过使我们的作者在他关于“自然人”的错误观念中最感到麻烦的那个主要困难根本不在这里。

他的“自然人”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独自一个人”(seul)过活,因此他没有丝毫关于任何社会联合的概念。家庭和国家在自然状态中都是不存在的。卢梭对自然人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绝对不是仅有的看法。十八世纪的著作家们继承着十七世纪前辈们的先例,经常总是把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看作文化发展中的出发点。这在极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他们在自己的推理中喜欢援引人的自然状态。既然在这种状态中,按照他们的假定,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联合,于是他们以为只要拿这种状态同“文明”的生活方式加以比较,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社会关系在人类本性的种种特性的发展中所起的那个使他们发生强烈兴趣的作用。有个著名的查理·波恩就《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写过若干批评意见,同时还说,社会生活是人类本性的必然结果。卢梭在回答查理·波恩的时候说道:“我请您不要忘记,在我看来,生活在社会中对人类说是十分自然的,正像老年衰颓对个人说是自然的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老年唯一的来源是人的本性,而社会生活方式则不是直接来自人类的本性,像您断定的那样,而只是由于某些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外部情

况,如我所证明的。”^①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一种信念:人完全不是一生下来就只过社会生活的,因为社会仅仅在人类的老年期才产生。然而正是这个信念使卢梭陷于种种不可克服的理论窘境中。下面就是其中的一种。

语言是人类理性进步虽不充分、但是必要的条件。然而正像卢梭告诉我们的,“自然人”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同类没有任何往来。因此,他既没有语言的需要,也绝不可能进而掌握分节语。然则他从哪里获得这种语言呢?语言的产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卢梭长期劳而无功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他几乎想承认自己对付不了它,他宣称:“语言单凭人类的智能就可以产生并建立起来,这几乎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②。这使人想起德·鲍纳利,他后来(在复辟时代)教导说,语言是神给予人的。如果说,我们的作者在暗示语言起源的某些非“纯粹”人类的原因时指的是和后来德·鲍纳利所作的那种解释相似的某种东西,那么,他由于有敏锐的智慧就不能不意识到,实质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大概就是这种意识曾经迫使他让其他的研究者去解决哪一个更必要:是社会的存在对“语言的建立”更必要呢,还是语言的存在对社会的产生更必要。^③ 有某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解决谁先谁后的问题:

① 对用菲洛波利的笔名反对卢梭的查理·波恩的这个问答,刊载在我引证的那一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附录上(卢梭致菲洛波利的信)。上面这一段话在第184页上。——作者原注

②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95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95页。——作者原注

鸡在蛋先呢,还是蛋在鸡先?只有当生物学掌握了发展的观点以后,这个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但是,卢梭采取的“自然人”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假设,有时使他根本不能了解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记得,正是在发展问题上,即实质上是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原因问题上,特别有力地说明了我们作者的天才,那么 we 应当承认,上面这个假设给他造成了许多很大的不幸。

请注意他究竟得出什么结论。他以惊人的明确性论述社会发展的原因,却不预先说明这些原因怎么能发生作用。这似乎奇怪,但的确如此。他没有说明“自然人”怎么能够在文化领域内迈进任何最小的几步。而且只要认为自然人是像卢梭描绘出来的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话,也就不可能说明这个道理。

非常清楚,在沿海,人们会变成渔人,在森林里,人们会变成猎人。但是当我们现在谈到野蛮的猎人或渔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以为他们过着社会生活。

在我们看来,问题可能只在于人们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①而在卢梭的心目中,社会的产生是人类年老衰颓的

^① 的确,就在现在也可以遇到一些研究者,准备宣布野蛮人是大大的个人主义者。例如卡尔·毕歇尔在其《论国民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就宣布野蛮人是这样的人。不过毕歇尔毕竟是个例外(关于他的观点,请看我的论文《原始民族的艺术》和《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载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家之批判》,圣彼得堡,1906年俄文版)。我之所以必须在那里驳斥毕歇尔把野蛮人看作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是因为这个错误的观点在这位德国学者那里,同另一个同样错误的命题紧密联系着,这个命题就是:“游戏早于劳动,而艺术早于用品的生产。”[中译本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51—399页。]——作者原注

一个特征。因此,只有在我们谈到人类老年期的时候,猎人和渔人的部落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极其低下。这个意见尤其适用于卢梭那个完全正确的猜测:调节尼罗河定期泛滥的必要性引起了埃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事情很明显,尼罗河的泛滥不是由“自然人”调节的,因为按照卢梭的假设,自然人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他们同其他的人们没有任何往来,也不感到有任何必要进行这样的交往。这种泛滥是由“文明人”来调节的,尤其是由从事农耕的“文明人”来调节的。因此,无论卢梭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原因的见解多么富有天才,这些天才见解中任何一个见解都排除不掉最主要的困难,即解决不了在人独自过活的时候文化的进步一般说来究竟是如何开始的根本问题。卢梭本人说,即使这时有所发明,除了发明者以外仍然是没有人知道的,并且会随着发明者的死亡而消灭。“在这种状态中,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一代一代毫无进益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从同样的起点开始。许多世纪都在原始时代的极其粗野的状态中度过;人类已经古老了,但人始终还是幼稚的。”^①

如果自然状态的确是如此,如果它的特征真是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那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状态中断了,换言之,即使是最缓慢的、勉强可以觉察得到的进步是如何开始的。按照卢梭的理论,技术的进步——而且还是很大的技术进步——乃是产生社会的必要前提。因之,如果不可能有技术进步,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人类只有在年代学的意义上才会衰老。在文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6—107页。——作者原注

化方面他应该永远是年轻的,这是因为正像我们刚才看到卢梭说的那样,每一代都是从同样的起点出发的。

五

也许可以认为,由于暴力才朝着走出自然状态的方向迈进了最初的几步。即使“自然”人没有任何相互的往来,但有时毕竟不能不互相接触。当强者偶然碰到弱者时,他可以使弱者服从自己,因而为存在着压迫者阶级和被压迫者阶级、统治者阶级和被统治者阶级的社会的建筑物奠定下第一块基石。大家知道,在很多历史哲学学说中,暴力起着钥匙的作用,拿着这把钥匙几乎打得开一切理论的大门。然而卢梭的眼光十分敏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不能满足于援引暴力。他非常细致地分析暴力概念,而且得出结论说,许多理论家由于想说明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生而援引暴力,但暴力本身只有在这些关系已经存在的时候才会出现。人们之间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差别,在自然状态中无疑是存在的。但是用卢梭的话来讲,这些差别远不如在文明生活方式中那么大。他说:“我们很容易理解,在那些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别中,有许多被认为是天然的差别,其实这些差别完全是习惯和人们在社会中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因此,一个人体质的强弱以及依存于体质的体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是在娇生惯养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取决于他的先天体质。智力的强弱,也是一样。教育不仅能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之间造成差别,而且还随着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

增大存在于前者之间的差别。因为一个巨人和一个矮人，在同一道路上行走，二人每走一步，彼此之间的距离必更为增大。假如我们把流行于文明社会各种不同等级之中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来和吃同样食物、过同样生活、行动完全一样的动物和野蛮人的生活的单纯一致比较一下，便会了解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状态中的差别，应当是如何小于在社会状态中的差别，同时也会了解，自然的不平等在人类中是如何由于人为的不平等而加深了。”^①弱者受强者压迫，这种现象自然状况中有，在社会生活方式中更多得无比。压迫一词表示，一些人进行暴力统治，而另一些人则可怜地认为自己不得不服从他们的一切古怪观念。卢梭说：“一些人使用暴力来统治另一些人，后者呻吟于前者为所欲为的奴役之下，这正是在我们之间我所观察到的情形；但是我不理解如何能据此推断野蛮人也是这样，因为甚至使他们了解什么是奴役和统治都颇有困难。一个人很可能夺取别人摘到的果实、打死的禽兽，或者侵占别人用作躲避风雨的洞穴；但他怎样能够做到强制别人服从他呢？在一无所所有的人们之间从属关系的锁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有人从一棵树上把我赶走，我可以离开这棵树到另一棵树上；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有人搅扰我，那有谁会阻挡我到别处去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但力量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7页。——作者原注

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给我的还要大得多。除此之外,他的戒备会不会稍微松懈一下呢?一个意外的声音会不会使他回一下头呢?我走进树林二十步远,我的束缚就解除了,他一生再也不会看见我了。”^①

卢梭列举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很难奴役另一个人的原因时,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处在野蛮时期低级阶段的人的劳动,其生产能力是十分小的,仅这一点就使得对人的奴役成为经济上毫无意义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事。人剥削人的现象只有在人们拥有的生产力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所以,在所谓低级猎人那里是没有奴役关系的。譬如说他们奴役战俘,即意味着强迫战俘加入他与之战斗的那个血亲联盟。一旦战俘加入(虽然是被迫的加入)新的、从前敌视他的血亲联盟,他就成为这个联盟的平等的成员。因此,在那个阶段上,还谈不到奴役关系,而只能说强迫的合作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卢梭是表露了惊人明确的眼光,他证明,强者对弱者的奴役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或者说,“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② 在这里,他的眼光深刻地洞察到一个社会阶级剥削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秘密。但是,卢梭的眼光越是深刻地洞察到这个秘密,他越是明白地理解到流行的暴力理论的毫无根据,说明最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8页。卢梭说得很对:对于私有制已经存在的那种状态,用“富人和穷人”一词比用“强者和弱者”一词要确切得多。(同上书,第130—131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108页。——作者原注

初的社会联合的产生问题,对他就变得越发困难。不错,他引证社会契约,借以弄清处处掩盖这个问题的那些理论上的困难的症结点。但是,第一,这种引证本身就违反我们的作者希望用来分析人类不平等起源问题的那个方法。它假定了原始人的行为是很自觉的,因此也就重复了卢梭如此中肯地指出过的和如此辛辣地嘲笑过的“启蒙派”的错误,就是说,把野蛮人变成了过去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哲学家”。第二,在我们的作者那里,社会契约只是说明政治联盟的产生,而政治联盟的产生,按照他的理论,是以家庭的出现为前提的。可是家庭从何而来呢?

卢梭详细地驳斥洛克的意见,在洛克看来,子女离开父母就不能生活,这使得男人和女人必须长期同居,从而奠定下家庭的基础。按照我们的作者的意见,男人在自然状态中完全不关心自己后代的命运,而且也不可能关怀到这点,因为男人根本不考虑未来。同时在没有婚姻的地方,也不可能决定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因此男人根本不会想和一个女人长期同居,而女人同样也不会想和一个男人长期同居。卢梭说,洛克的全部辩证法没有能够使他避免霍布斯和其他某些研究者所犯的错误。他们所应说明的是“自然状态”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这个状态中,人们都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没有力求过共同生活的任何理由。但是他们却从现代的观点观察这个事实,而现时代的特点是,人们生活在一起,也有一切理由这样做。^① 在这里,卢梭的话中当然有许多是正确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82页(作者附注“十二”)。——作者原注

的。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实际上是从文明社会的社会关系的观点看待野蛮人的生活的。但是既然卢梭把原始野蛮人设想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对野蛮人的生活也就作了完全不正确的说明。而主要的是他自己本来就不可能找到家庭产生的充分原因。他说，人们学会了做石斧以后便开始用树枝和黏土为自己盖茅舍，这样就产生了国家。但这很不明白。弄不清的是，例如，和卢梭认为是在学会盖茅舍以前人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山洞比较起来，为什么茅舍会更有助于建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其他关系。最后，卢梭在谈到家庭的产生时，重复着（按照他的公正的见解）洛克、霍布斯和其他许多著作家所犯过的那些错误：他用文明人的眼光来看待原始社会中的家庭关系，换言之，他以为一旦产生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长期联系，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立即就会形成。他谈到所有制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他那里，所有制是作为私人所有制一下子产生的。

现时，在卢梭看来原是不可克服的那一切困难，早已被关于人类的科学排除了。今天我们知道，按照路德维希·努阿雷的说法，“语言和理性生活来自为达到共同目的的共同活动，来自我们祖辈们原始时代的工作”；我们知道，用同一个著作家的说法，人类的活动使语言的原始词根获得了内容。^①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祖先们可能进行共同的工作，他们就不应当过孤独的生活，像卢梭假定的那样，而应该过共同的、多少广泛的集体生活。人种学证明，他们的确是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维持其生活

^① 参看《语言的起源》，德文版，第331、369页。——作者原注

的儿童照料,就落在这些集体的成员身上。毫无疑问,家庭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同所有制的发展有着最密切的因果联系,而所有制的发展又是为生产力的增长所决定的。不过原始时代的家庭和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卢梭看来乃是社会生活的第一基础。同样的道理,原始社会存在着的财富关系,跟文明时代产生和发展着的财富关系也是根本两样的。原始时代的野蛮人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读者也许知道锡兰某个韦达族人的故事,这个韦达族人从一个欧洲旅行者那里得到了一块硬币以后,即想把它劈成许多份,数目和他的血亲联盟中的成员人数相等。在卢梭所描绘的“自然人”那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图,因为“自然人”过着孤独的生活,而不是共同的生活。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卢梭在其关于文化发展大概过程的猜测中既然以这一毋庸置疑的原理为指南,他就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有天才的人。不过他对文化发展最初阶段的人类“生活条件”却很少了解。因此他对这种生活条件的观念完全不正确,这样在把自己正确的方法应用于思考文化领域内人类最初的进步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造成了许多困难。

有趣的是爱尔维修并不认为原始人是个人主义者,虽然就其对文化史的观点而言,他比十八世纪任何一个别的唯物主义者都更接近卢梭。他说,作为一种弱小的动物,人应该力求同其他的人联合起来,一则保卫自己不受强大动物的伤害,一则攻击动物来供自己食用。他指出:“由此产生有关渔猎的一切规则。”^①不妨补充

^① 《爱尔维修全集》(法文版),第2卷,第581页。——作者原注

一句,上述思想在爱尔维修那里表现得不够明白。他发挥这个思想时使用的那些说法,也许会让人认为,原始时代人们只有在特定地区的人口达到一定的密度之后才联合为社会。^①对于十八世纪的著作家说来,得到对推动文化发展的原因的正确猜测,比描绘“自然状态”的令人满意的景象要容易得多。

六

卢梭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曾把人类从自然状态引向文明状态的那些道路已经被人遗忘和迷失了”。^②这些道路不可能遗忘,也不可能迷失,道理是非常充分的;因为正像野蛮人完全孤独地在其中生活的那种状态过去并不存在一样,这些道路过去任何时候也是不存在的。毫不奇怪,卢梭纵有一切卓越的才能,也无法重新发现这些道路,和用自己的文化发展的公式来说明这些道路。他假设原始人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这种假设给他自己造成的种种困难他只是避开了,也只能是避开了,而不是克服了。因为这个假设向他提出的任务,一般说来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为了避免这些困难,他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很简单很不清楚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他顶多也只能表现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家。但是一旦他不再徒劳地寻找什么可以从并不存在的完全孤独的状态中把人引导到社会生活状态中去的那些道路,一旦他回到决定

^① 《爱尔维修全集》(法文版),第2卷,附释。——作者原注

^②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6页。——作者原注

社会关系发展的原因上来,他就表露出十分深刻的思想,而且远远地超过了绝大多数和他同时代的人。

十八世纪的著作家大部分都坚决地相信法制是万能的。他们说过:“一切都以法制为转移”。而他们所说的法制,首先是指关于国家制度的政治法制。他们对法制万能的这种信念是和对意见支配世界的信念密切相关的:因为政治立法者的活动,虽然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却是始终自觉的,因为它永远追求着一定的目的,而人的自觉活动是以意见为转移的。信仰法制万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许多表现之一。这种观点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事件深深动摇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懂得,社会思想的进程是由社会关系的进程决定的。因此他们就不再相信法制的万能。基佐说,任何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首先是结果;这些制度本身是从特定社会的状态中产生的,它们本身就依赖于“人们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是和十八世纪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不是用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该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而是相反,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本身是用该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来说明的。而这是更加正确得多的观点。在十八世纪,只有少数杰出的著作家才接近了这个观点。卢梭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虽然有时他也不惜重复说,一切都以法制为转移(他主要是在《忏悔录》中重述这个观点的^①),但是在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表现出是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一个先驱者。他认为私有制的产

^① 不仅在《忏悔录》中如此,在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里,卢梭也说:“无可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人们都会变成政府希望于他们的那个样子。”——作者原注

生先于国家的产生,或者换一句话说,人们的政治关系是用他们之间的公民的、财富的关系来说明的。他说:“政府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是由政府成立时人们所处的那种状态的或大或小的差异而产生的。”^①在这种状态中,越是平等,正在产生着的国家就越接近于民主政体;反之,在这种状态下,越是不平等,国家制度就越是经过贵族政体而接近君主政体。

国家的起源应该归功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而一旦产生了国家,它就会反过来成为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政治制度是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但它也会影响这些关系,成为这些关系进一步变化的原因,扩大贫富之间的距离。卢梭这样说。由此可以看出,他非常了解“政治”对作为其基础的“经济”的反作用。也许还可以说,他有意夸大这种反作用。他用鲜明生动的文字描写文明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增长,他仿佛认为这种现象的增长同政治特权的联系比它同经济关系的联系更要多些。革命前法国的这位作家认为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因为当时的法国,站在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永远只是拥有政治特权的人物。不过这个小小的偏差并没有妨害卢梭很好地了解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内在逻辑。怪不得恩格斯在自己的《反杜林论》中称他为卓越的辩证法家。

在对人的本性的看法上,卢梭跟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的距离也是同样遥远的。他们把人的本性看作不变的东西,并且认为“立法者”越是依从人性的要求,“法制”就会变得越“完善”。十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0页。——作者原注

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看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把关于人类本性的这种或那种思想当作自己体系的基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这样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乌托邦。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才清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他们指出,人的本性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卢梭也了解人类本性变化无常。用他的话说,人的心灵、他的情欲逐渐改变的结果,最后就会获得另一种本性。此一时代的人类不同于彼一时代的人类。假使第欧根尼没有找到人,那只是因为他在自己同时代的人中去找另一历史时期的人。^①“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内心和意向的深处是如此的不同,以致造成文明人至高幸福的东西,反而会使野蛮人陷于绝望。”^②卢梭不相信用抽象的方法解决道德问题的态度,就是对人类本性变化无常的这种信念的必然结果。他说,“哲学家们所不能解决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无数问题”,只有当我们用“事物的缓慢递嬗”的观点看待它们的时候,才能找到答案。这已经是我们熟悉的用存在说明意识的方法了。

也应当说,卢梭的天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关于社会心理学的论断中。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可能说,他的观点过时了。他的这些论断,对于没有完全掌握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观点而又没有完全被唯心主义的偏见所迷惑的人来说,迄今都会是非常有教益的。而这些人名字是多得难以计数的。凡是愿意了解卢梭对社会心理学的种种天才的看法的人,或者更确切些说,凡是愿意了

^① 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6—147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147页。在这方面卢梭又像爱尔维修。比较《论人》一书第四篇“论个人性格中的突然变化”一章,载《爱尔维修全集》(法文版),第209—210页。——作者原注

解卢梭对阶级社会心理学的种种天才的看法的人,除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以外,一定要再读一读他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狄德罗和达兰贝尔著名的百科全书第五卷。这篇文章的内容同政治经济学问题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而且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是很重要的。卢梭主要是研究社会概念和社会风尚的辩证法。社会幸福是国家最高政权的唯一目的。这个社会幸福就是共同意志所追求的目的。对于每一个国家成员来说,共同意志,即全体人民的意志,乃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但是在居民分成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阶层的社会里,要各个个人认识共同的意志并不那么容易。这样的社会仿佛是由许多小社会组成的,而每一个小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之也就有自己的、为这些利益所决定的意志。每一个小社会的意志,对于它的全体成员说来,都是共同的意志;同时,这意志对于更大的社会说来,又是局部的意志:因为它反映的不是更大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小社会的局部利益。因此,从小社会的观点看是完全公正的行为,从大社会的观点看却可能是完全不公正的,一个阶级认为是好人,全体人民可能认为是坏人。祷告上帝的神甫或者英勇果敢的士兵,用卢梭的话说,可能实质上是一个坏公民^①。卢梭深信,利用这些简单明了的原则,可以非常

^① 我所有引证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的地方,均见1839年巴黎出版的《卢梭全集》第4卷。关于英勇果敢的士兵可能实质上是一个坏公民的见解,载该卷第225页。[中译本可参看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6页。]——作者原注

容易地说明阶级社会诸成员的行为中的一切矛盾。如果人的行为就一方面说是完全正当的,同时就另一方面说又是不正当的;如果他蹂躏自己最神圣的义务的同时,又牺牲生命来履行某些极其可疑的义务,则这意味着,他把自己小社会的局部幸福当作更大社会的共同幸福。作者补充说:“指望那些能左右局势的人重视任何一个别的人的利益甚于重视自己的利益是不理智的^①。因此,能左右局势的人在自己的小社会的范围内可能是利他主义的,但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的上,他一定会表现出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经过这一番说明之后,不言而喻:人民的利益将为那些热衷于破坏人民利益的人所破坏。不过人民本身也可能是自己利益的破坏者。只要人民错误地把特定的小社会的局部利益当作更大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当作自己的利益,就会立即出现这种现象。”^②卢梭的这一精辟的见解,把处在上层阶级影响下的下层阶级的心理表露得非常明显。当下层阶级尚未摆脱这种影响的时候,它的意志将照常集中于共同的幸福,而它的行动在“能左右局势的人”的利益的指导下则用于保卫这些利益,即直接违反代表它自己的幸福的共同幸福。这一矛盾只有用提高下层阶级的觉悟才能排除。一旦下层阶级深信“能左右局势的人”的利益在于破坏共同的幸福,它就不会再支持这些人了,换言之,它就不会再破坏自己的利益了。因此在我们这里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下层阶级的阶级觉悟越是增长,它的行动就越符合共同的幸福。对于上层阶级则不能这么说。他们越

① 《卢梭全集》,第4卷,第226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226页。——作者原注

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的行动就越违反整体的利益,他们就越会变成利己主义的人。

七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个别社会阶段、阶层和集团的行为不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矛盾呢?很容易了解!必须排除这些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局部利益同整体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卢梭用另一种说法来表示这个意思,他说:“倘使您愿意执行共同的意志,您就努力使所有局部的意志同它一致吧。”在卢梭看来,一切社会美德在于局部意志和共同意志的一致。因此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执行共同意志的必要条件:“这样行动吧:使美德蔚然成风。”^①对公民们说“你们会是好人”是不够的;应当教导他们做好人,而要教导他们做好人,就不能使他们处于让他们的局部利益继续互相矛盾而且同共同幸福也继续发生矛盾的那种境况下。^②由此可见,卢梭的“美德”首先带有社会政治性质。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的著作者同“霍尔巴赫派”以及一般说来,同十八世纪最先进的法国著作家完全没有分歧。所有这些著作家都是从社会关系方面来看美德问题的,他们大家都坚决地认为,为了改造人必需改良社会制度。所以马克思后来说过,法国唯物主义的结论是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

① 《卢梭全集》,第4卷,第231页。——作者原注

② 参看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页。——译者注

的学说的基础。^① 而根据这一点,也可以判断现在千方百计地散布所谓卢梭的观点和列夫·托尔斯泰公民的观点一致的可笑臆想的那些先生们的思想有多么深奥。卢梭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美德”的学说,完全符合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那一原则。^② 反之,托尔斯泰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那一信念的基础上的。只就下面托尔斯泰(1904年11月18日)拍给《北美人报》(*The North American*)编辑部以答复该报电询俄国解放运动的电报中的一段话,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来:“只有使所有的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都趋于完善,才能取得真正的社会改良。用改变外在形式的办法使各个个人对社会改良产生非常有害的幻想的那种政治宣传,通常会使真正的进步为之停顿——这在一切立宪国家如法国、英

①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参看我翻译的恩格斯的小册子《费尔巴哈论》附录一,彼得堡,里沃维奇出版社1905年俄文版。——作者原注

② 不过这个学说虽然和那个原则一致,却不完全包括该原则。这就说明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宣传自己关于“美德”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同时,却能够采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矛盾,请看拙著《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一章。——作者原注

国、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①只有既不了解卢梭的观点，也不了解托尔斯泰的观点的人，才会把这些观点混为一谈。几乎同样可笑的是这样一些信念，如：“乔治·桑无疑是卢梭最直接的和最有才华的女学生”^②，或者：“这两个才智之士的思想同出一源”，换言之，乔治·桑的思想和卢梭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③乔治·桑只赞成卢梭的某些情绪和某些个别命题，而按自己思想的性质来说，她之接近卢梭未必会甚于接近俄国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这个卡拉姆津，大家知道，也只赞成卢梭的某些个别命题和某些情绪：爱自然、爱“会说笑话的看门人”等等。昂屠阿·居约根据“卢梭和乔治·桑都认为对自然的爱和情感是最深刻的灵感的泉源”^④这样的理由来建立自己关于卢梭的观点和乔治·桑的观点同出一源的思想。卢梭的确爱自然，也很懂得欣赏自然，但是认为他的爱自然的态度构成他的思想的主要特征，却是十分奇怪的。恩格斯更好得多地说明了他的思想的特点，他指出，卢梭和狄德罗都属于十八世纪为数不多的辩证法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运用辩证法分析人类历史运动的原因的一次光辉的尝试。^⑤

“美德”的王国也就是平等的王国。卢梭不相信有可能完全恢复平等。他准备只满足于稍微接近平等。他希望，对于每一个社

① 参看维拉的论文《与托尔斯泰的会晤》，载《现代人》，1912年4月号，第182—183页。——作者原注

② 参看昂屠阿·居约：《卢梭对妇女的影响》，载《生活的需要》，1912年第33期，第1892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1893页。——作者原注

④ 同上。——作者原注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译者注

会成员说来,“工作永远是必要的,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是多余的。”^①在他看来,政府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在于“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的产生”。^②那些认为卢梭是私有制敌人的人,其错误并不比现在使卢梭同托尔斯泰或同乔治·桑接近的那些人的错误更少。卢梭断然地宣称:“的确,财产权是公民所有权中最为神圣的一种权利,而且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自由更重要。”^③稍后一点,他称私有制为社会契约的基础^④。考茨基说得完全正确:卢梭的理论“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纵然在浅薄的批评家看来可能是这样的理论”。^⑤同样,自称是卢梭继承者的那些参加法国大革命的人,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不止一次地宣布过,私有制是神圣的。不错,他们曾经主张没收属于“阴谋分子”,即属于进行反对共和国斗争的保皇党的财产。圣鞠斯特说过,“阴谋分子”的财产属于全体不幸的人。不过在他看来,没收这些财产只是对某些(政治)罪行的惩罚,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某些(政治)罪行的预防措施。

卢梭不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未必会设想过任何一个最小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文化发展的出发点是原始血亲联盟的共产主义。但是像我们看到过的那样,卢梭认为原始时代的野蛮人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不认为像斯巴达这样一

① 《卢梭全集》,法文版,第4卷,第240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237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241页。——作者原注

④ 同上书,第247页。——作者原注

⑤ 参看他的著作《论1789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我引证这本书是根据爱德华·别尔特的法文译本(巴黎,1901年版,第72页)。——作者原注

些古代希腊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他称它们为暴虐的贵族政体。他用足够悲哀的眼光来设想当时欧洲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未来命运。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又必然恶化人民中下层阶级的状况,即便不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①不错,他坚决地请求政府遏制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但是他不可能指望这些政府很乐意地依从这些请求。他懂得,政府的行动是保卫富人利益的。他问道:“难道不是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得到社会财富的一切好处吗?”^②大概他从来就很少研究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学问题。但是他不仅在当时最先进的国家中看到人民经济上的困苦状况,而且如同上文说过的,他也了解一个社会阶级从经济上剥削另一社会阶级的本质。他用下面的“四句话”概括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契约:“你们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因此我们互相商定:我允许你们荣幸地为我服务,而你们则把你们所剩下的不多的东西交给我,作为我对你们的指挥劳动的报酬。”^③这种说法不完全清楚;不过如果把“把你们剩下的不多的东西”一语理解为穷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这样一部分产品:它是满足了穷人简单的需要以外剩下来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剩余产品”的理论。这样一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就归结为,富人由于对穷人的“指挥劳动”而得到取得剩余产品的权利。我们的著作者目光如此深远,以致当我们把这个意义赋予他的关于两个社会

① 卢梭非常了解下层阶级相对贫困的意义,这是现在某些“马克思的批评家”很难掌握的。他机智地说过:“即使什么都没失掉,也可能变得更贫困。”——作者原注

② 《卢梭全集》,第4卷,第249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250页。着重点是卢梭加的。——作者原注

阶级之间的契约的简短公式时,并不那么冒违反真理的风险。而要是这个公式事实上就具有这样的意义,那么这就是以卢梭的观点为一方和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为另一方的新的接触点了。

八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地认识了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本质在于:一旦人类在自己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走了稍微巨大的几步以后,自然状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平等关系就受到了破坏。而在这条道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都导致了不平等的新的扩大。金属冶炼和农耕一方面创造了富人阶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穷人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利益的敌对关系引起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处在富人的掌握中,富人得到国家生活的一切好处。因此,国家是人类不平等扩大的新的源泉。而不平等越扩大,风俗就越败坏,淫佚就越增多,犯罪就越频繁。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又扩大不平等,从而也就加深风俗的败坏。因此,卢梭在和自己的批评者们的争论中不止一次地声明说,科学和艺术,就其本身来看,他是充分尊重的,但是他深信,实际上科学和艺术的传播会使风俗败坏。这也就说明了他对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问题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获得了奖金的征文的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自然状态中去了,已经不可能恢复原始时代的平等关系,最后唯有采取能够延缓不平等现象增长的措施,唯有保持小康状态(*la mediocrite*)。

这个学说本身中包含着卢梭观点中一切最重要的东西。它构

成卢梭观点的核心；它既说明卢梭观点有力的一面，也说明卢梭观点薄弱的一面。凡是没有弄清卢梭的不平等学说的人，就不会懂得他的观点。而既然对这一学说流传着很多误解，则对卢梭的观点至今都理解得很坏，那就毫不足奇了。人们之所以把这些观点同托尔斯泰的观点或乔治·桑的观点混为一谈，是因为他们对这些观点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概念。事情弄到怎样的程度，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

在其不久前出版的《革命的卢梭》(*J. J. Rousseau revolutionnaire*)一书中，阿利贝尔·梅叶这样说明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论断的性质。“论不平等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惶惑和值得惋惜的著作。它同卢梭整个的政治学说不大相符。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还和这一学说矛盾。它是一个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包含这样多卓越思想的理论身上的疣物。”^①这完全等于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他的其他的观点不大相符；这一学说是一个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包含许多杰出的观点的理论身上的疣物。而最滑稽的是，这样一些批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话，竟在英国和意大利流传，英国著名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某些成员制造出这些评语，意大利某些工团主义理论家就鹦鹉学舌。人的天真是浩瀚无边的。

阿·梅叶在下面一段又说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可以使人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明白性产生怀疑，虽然一般说

^① 《卢梭全集》，第4卷，第54页。——作者原注

来,卢梭的政治思想是严谨的和确切的。^①事实上这些思想只有在根据卢梭的不平等学说加以考察的时候才会变得十分的明白易解。

作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作者,卢梭的伟大的理论功绩就在于,他不满意十八世纪盛行的对文明发展过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企图从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的那个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他任何时候也没有表述过这一原理。而且假使有某人把这一原理的唯物主义性质告诉我们的作者,他很可能——甚至非常可能——感到惶惑和生气,从而摒弃这个原理。然而这一原理毕竟是他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论断的基础。卢梭在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得出的所有那些重要的理论上的结论,毕竟彻底渗透着这一原理的唯物主义精神。这些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卢梭作为思想家的光荣应当以这些结论为依据。不过这些极其重要的结论也给卢梭帮了倒忙,因为它们给他的实际方案带来了保守主义的甚至是反动的因素。

他本人曾经说过,他绝没有想到要使现代文明民族回复到原始时代的朴直浑厚中去。他认为自己所能有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制止那些不大的国家的堕落,这些国家由于处在特殊幸运的环境下,还没有来得及在文明和同文明有联系的淫风败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怎样制止呢?卢梭向“立法者”呼吁,可是我们知道,按照他的学说,国家,从而还有立法权,是落在富有阶级手上的。我们

^① 《卢梭全集》,第4卷,第55页。——作者原注

有什么根据可以指望立法机关会愿意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呢？难道这符合富有阶级的利益吗？不。这些阶级的利益在于扩大他们和穷人的距离。卢梭自己就说，“能左右局势的人”绝不会违反自己的利益去行事。他能够指望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只有能够起来反抗可悲的必然性的人类自由的模糊的希望。换句话说，他只有在使他把必然和自由对立起来的那个哲学上的错误中，才能找到安慰。但是哲学上的错误并无助于实际方案的严谨性。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卢梭的实际方案常常是很不严谨的。在自己的《对波兰政府的考察》(*Conside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中，他还劝告波兰人注意农业和“使金钱变成可鄙的和尽可能无用的东西”^①。这种劝告的实际意义当然等于零。卢梭自己也感到这点。他赶紧声明：“我的意思不是要取消货币流通，而是要延缓货币流通，特别是要指明十分重要的一点：好的经济制度不是财政的和货币的制度。”为了说明和证实自己的思想，他引证李库尔，说他“为了在斯巴达根除贪婪心理，并没有消灭硬币，而是使它变成铁币。”^②也不用说，这类劝告和引证并未能在波兰人处境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而当忠于其小国理想的卢梭希望使波兰人相信，失去许多省份会给波兰共和国带来很大利益的时候^③，波兰人可能把他的话当作一种恶毒的嘲笑。最后，在自己的关于波兰农民解放运动的论断中，卢梭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在这个问题

① 《卢梭全集》，第4卷，第473—474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书，第477页。——作者原注

③ 同上书，第443—444页。——作者原注

上,卡列林替卢梭辩护是枉费心机的^①。卢梭劝人逐步地解放波兰农民,而“没有显明的革命”。^②

天才的卢梭尝受了真正的智慧的悲哀。他不满意所谓“理性最后总归有理”的流行的空谈。他需要有理性胜利的客观保证。没有这些保证,他就不能相信理性会胜利。他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主要原因。他也看到,历史的运动要引起和扩大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和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的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他的难能可贵的智慧帮助他发现了这些重要的理论上的真理。不过当时的甚至西欧最先进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还不曾使人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引起和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风俗败坏,但这种发展本身会提出一个社会阶级,能够用根本改造社会制度的办法来恢复平等和淳化风俗。因此,卢梭最后只有反对经济上的进步。他也就这样做了。而反对经济上的进步,并未能使他制定出一种严谨而彻底的世界观。他的观点中有许多对旧思想的让步。著名的《萨伏依神甫的信条》就应该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让步,这本书里反对唯物主义的意见,都是很天真的。

卢梭没有从不平等现象、利己主义和奢侈淫荡到处风行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找到出路。这妨碍了他拟订出多少正确的切实可行

^① 卡列林:《让·雅·卢梭——试论他的社会思想的特征》,圣彼得堡,1894年俄文版,第126页。这本出色的著作的缺点是作者过分偏袒了自己的主人公。他看不到卢梭的弱点。虽然他准备,用法国人的说法:“完全撇开他们的争论”,但他并没有给“霍尔巴赫派”以及一般说来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以应有的评价。——作者原注

^② 《卢梭全集》,第4卷,第495页。——作者原注

的行动计划。不过这个人民的儿子是真正热爱平等的，他对富人压迫穷人的现象由衷地感到愤怒。就其同情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例如在他就种种政治理论问题所写的每一页纸上，都表露出他的热情奔放的民主主义的同情。他的社会契约说，除少数例外，乃是完全革命的学说。^① 难怪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曾经自认为是他的学生，也难怪法国的无裤党人热爱过他。他说到平等时，声音里迸发出奔腾澎湃的革命热情。然而这种澎湃的热情，在现代法国资产阶级的温文尔雅的儿孙们的心灵中，不能得到同情的响应。现在社会里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之不能同情这种热情，就像他们不能同情卢梭对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唯物主义观点一样。对于这些思想家说来，这种热情“已经过时了”。而既然在他们看来，这种热情过时了，那么他们最好的选择就只有赞扬一番卢梭行文时素有的那种令人愉快的风格。

^① 我所谓例外，如卢梭认为，完善的国家里是不能容忍无神论者的。人们说，我们的作者更容易同宗教狂热分子和睦相处，而难同无神论者并容，这是公正的话。这里又暴露出他的世界观缺乏严谨性，因为它本身中就同时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这里，大概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可以看出，卢梭世界观中这种缺乏严谨性的现象，对于他这个不善于指明摆脱他当时那可悲的社会境况的出路的人说来，在精神上是何等的必要。他信仰来世生活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人的正义的行为最后应当受到奖励。然而在非正义注定地占着统治地位的那个社会里，正义怎么能够得到奖励呢？于是只有信仰灵魂不死。而且卢梭不止信仰而已，他还宣布说，凡是不信仰灵魂不死的人都应当予以追究，甚至处死。——作者原注

附录三 奥古斯丹·梯叶里和 唯物史观

译者按：本文，据梁赞诺夫说，是普列汉诺夫“直接用法文写的”，最初登载在1895年11月《社会变化》法文杂志上，后来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中译文首次登载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2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它“部分重复，部分补充”了本书第二章“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内容（梁赞诺夫：《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8卷“编者说明”）。其中补充的重要内容有：（一）“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公”；（二）“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包括奥古斯丹·梯叶里在内的那个法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哲学的“中心概念”；（三）梯叶里关于“征服”和“人性”的观点；（四）梯叶里等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的得失；（五）本文中，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在资本家“被剥夺”的条件下有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六）指出马克思对待先前的历史观的一个基本态度。

奥古斯丹·梯叶里[历史学的荷马,像沙多勃利昂称呼的那样]是复辟时代在法国复兴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优秀团体成员。这个团体没有导师,也没有学生。但是它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派。考察一下这个学派的基本概念是极为有益的。

沙多勃利昂^①曾经称这学派为政治学派。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坚信人民的状况完全决定于立法的十八世纪哲学家们,善于把“立法”仅仅同立法者有意识的活动联系起来^②。这也是一种卓越的政治观。由此自然得出结论:每一个特定民族的民法应当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它的政治结构,归因于它的政府。哲学家们不断地重复这一点。

对于基佐说来,实际上恰好相反。他说:“大部分作家、历史家和政论家都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这个社会特定的状况,说明它的文明的水平或种类。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来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则会更合理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社会在受到制度的影响而开始变化以前创立了制度,不应当根据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来判断这个民族的状况,而应当首先研究这个民族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可能怎样。”^③

① 沙多勃利昂:《历史研究》序言。——作者原注

② 在其他成千例子中间请参看马布利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的“考察”以及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著作。亚伯拉罕的宗教,起初似乎是为改革迦勒底人的迷信而想象出来的一种有神论;亚伯拉罕的有神论则被那个利用它来建立“犹太人的迷信”的摩西败坏。[参看中译本《自然的体系》(下卷),第185页。]“为了使斯巴达的改革不致仅仅昙花一现,他(李库尔)可以说进到了公民的心灵深处,而且在那里窒息了热爱财富的萌心。”参见《马布利全集》,第4卷,伦敦,1789年版,第20页。——作者原注

③ 基佐:《法兰西史论丛》,巴黎,1860年第10版,第4篇,第73页。——作者原注

在这一点上米涅完全同意基佐。他也认为,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决定政府的形式。当政府不再符合民族的状况,它就会消失。所以,当人们需要有封建主义的时候,封建主义事实上还不存在;后来它事实上存在了,就不再符合需要了,因而最后它也就实际上不存在了。公社的解放改变了欧洲社会所有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它使得欧洲的政治进化朝新的方向发展。“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和代议制是它的结果:公社独占统治的地方是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同它无法使之就范的国王建立同盟的地方是专制君主制;诸侯利用公社来限制王权的地方是代议制。”^①

奥古斯丹·梯叶里同样不同意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观点。他说,宪法——这是社会的服装。旧的学派对国王的世系注意过多。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立活动留下余地。“如果整个民族迁徙了,并且找到了新的居留地,那么,用编年史家和诗人的话来说,这是某个英雄要想为了显身扬名而建立帝国;如果新的习俗形成了,这是哪位立法者想出来要它形成的。如果形成一个城市,这是某个王公让它存在的;而人民、公民永远是某个人实现计划的材料。”^②这样一来,叙述每个时代就变成了叙述立法者的出生、教养,叙述他的生和死。这种描写历史的方式对于中世纪的僧侣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僧侣作家们对那些给教会和寺院馈赠最多的人特别有好感。但这种方式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我们现在

^① 《论封建主义,圣路易的制度,等等》,巴黎,1822年版,第83页。——作者原注

^② “论公社的解放”。这一研究是关于第三等级历史的著作的最初概述,刊登在1820年10月13日《法兰西信使》上。——作者原注

所需要的乃是真正的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这一历史会同时给我们提供行动的榜样,并且引起我们在少数完全占据历史前台的特权人物的冒险行为中寻求不到的那种兴趣。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对于像我们一样地生活和感觉的人民群众的命运的依恋比产生对于人们向我们叙述的仅仅是权贵和王公的命运的依恋要快得多,而单单叙述权贵和王公的命运,我们是得不到有益的教训的。人民群众沿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前进对我们会比征服者的进军更加印象深刻;而人民群众的不幸比失去统治权的国王们的灾难更加触动人心。”^①

因此,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公。奥古斯丹·梯叶里怀着暗暗的愤怒谈到无非是十八世纪历史学派不断援引的这些立法者(征服者)。不仅如此,在“公民”群众中,有特权人物和贫苦百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后者的生活上。“我们这些他们的子孙认为,他们什么都配得上,民族中为数最多和最默默无闻的部分应该恢复在历史中的地位。如果贵族过去能够觊觎赫赫军功和军人的荣誉,那么平民也有荣誉——技艺和才能的荣誉。平民训练了贵族的战马,他们联结了贵族铠甲的钢牌;那些以音乐和诗歌给城堡中的庆祝增添欢乐的人们也来自平民;最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这是平民的语言;当贵族的庭院和城堡塔楼里传出日耳曼方言粗野的喉音时,平民创造了现在所说的语言。”^②

奥古斯丹·梯叶里不止一次骄傲地提醒说,他是一个平民知

① “论法国历史的第一封信”,载 1820 年 7 月 13 日《法兰西信使》。——作者原注

② 同上。——作者原注

识分子，是第三等级的儿子。他在一切方面都是这样的人。他站在这个等级一边；他的观点是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也许这不只使一位读者感到惊奇。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把这个概念引进了历史科学。但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以前它就引进来了，它在被沙多勃利昂不确切地称为政治学派并为奥古斯丹·梯叶里所归属的那个法国历史学派中就已经是一个中心概念。

对于基佐说来，全部法国历史都是阶级间的斗争、战争。在十三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法国由两部分人民组成：一部分人民是胜利者——贵族；另一部分人民是战败者——第三等级。在十三个多世纪中，这些战败的人民进行了斗争，为的是摆脱掉胜利的人民所加的桎梏。斗争采取一切形式，运用各种武器；“当1789年全法国的代表们被召集在一起开会的时候，这两部分人民急忙恢复了自己原先的争吵：结束这些争吵的日子终于到来了”。^①“革命改变了这两部分人民的相互关系；以前战败的人民成了胜利者，它也征服了法国。甚至复辟时期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宪章宣布，这个事实有其法律根源，而路易十八签署了宪章就做了新的胜利者的首脑。但是刚刚被战败的人民，也就是以前取得胜利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继续进行自己原先的、十三个世纪来的斗争。而且在议会辩论时提出了问题，就像以前提出过的问题一样：是平等还是特权、是中等阶级还是贵族？它们之间不

^① 基佐：《论复辟时代的法国政府和现时的内阁》，巴黎，1820年版，第2—3页。——作者原注

可能有和平。使它们和解乃是无法实现的意图。使它们达成协议，也会是同样无法兑现的幻想。”^①

这里既不缺乏明白性，也不缺乏确定性。不过基佐善于用更加明白、更加确定的语言说出来。当他的政敌们在他的上述著作刚问世就谴责他煽动内战的时候，他回答说，他指出阶级斗争存在这个历史事实时并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他写道：“我只想简略地叙述法国的政治历史。等级斗争充满，或者更正确地说，构成这整个历史(原文如此!)。关于这一点，革命前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并且谈论过。1789年人们知道并谈论过，三个月以前人们也知道并谈论过。虽然现在有人责备我说了这一点，我却不认为有什么人会记不起这一点。事实不会按照内阁和政党的善良愿望、为了它们暂时的方便而自行消灭。如果德·布伦维列先生回到了我们中间，听到有人否认第三等级曾进行反对贵族的战争，否认第三等级曾为了消灭贵族特权和确立同贵族的平等地位而经常跟贵族斗争，他会怎么说呢？如果那许多被派进议会去保卫或争夺自己等级的权利的勇敢的资产者复活过来，听说贵族并没有同第三等级进行过斗争，并没有看到第三等级成长时惊慌起来，也没有总是阻挠第三等级增强自己的社会力量和巩固自己的影响，它们会说什么呢？”

整个这一斗争——“这完全不是理论，不是假设，这是最纯粹的现实本身，不仅看出这个斗争丝毫不是功劳，而且否认这个斗争也几乎是可笑的。”^②如果贵族的某些拥护者想要忘记它，这是因

① 基佐：《论复辟时代的法国政府和现时的内阁》，第108页。——作者原注

② 前面所引著作最初两版的附录(第三版序言)，第15页。——作者原注

为他们不再认为自己的等级强大得足以经受住公开的斗争,而且在他们看到自己的等级逐渐衰弱时就力图欺骗中等阶级。于是基佐以愤怒的政论家风暴般的力量猛烈地抨击了他们。他大声说道:“统治着辽阔的国家并且迫使伟大的国王们颤抖的那个种族的不肖子孙们,你们背弃你们的祖先和你们的历史!你们感觉到自己没落,就对你们过去的伟大表示抗议。因为我们要求你们今后只做和我们平等的人,所以你们就否认你们曾经是我们的主人这一事实。老实说,如果我作为资产者不得不在这里恢复法国的历史,并向反对宪法上平等的人证明,他们的记忆太差了,我会感到羞耻。”^①

由于作为艺术家,而不是作为战士,奥古斯丹·梯叶里从来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最卓越的政治战士之一的基佐所做的那样使劲地、满怀怒气地鼓吹阶级斗争。但是他很清楚地懂得中间等级当时同贵族进行的斗争的全部历史意义。他在1820年关于约尔登论北美合众国这本著作写道:“当代的贵族把自己的奢望同十六世纪的特权人物联系起来。后者认为自己出身于十三世纪百姓的主人,这些主人又把自己同查理大帝的法兰克人(其系谱上溯到克洛维的西康勃雷人)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否定的只是自然的继承性;政治上的出身是不言自明的。让觊觎这种继承性的人如愿以偿,我们自己也希望有继承性——一种相反的继承性;我们是第三等级的儿子;第三等级出身于公社(自治的团体);公社是农奴的避难所。农奴是征服的牺牲品。于是,从一个形态经过十五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到另一形态,我们就达到应当加以消除的最后一种

^① 前面所引著作最初两版的附录(第三版序言),第8页。——作者原注

征服。上帝保佑,这种征服本身弃绝了自己最后的痕迹,战斗的时钟不会敲响了。而没有这种正式弃绝,我们就不能指望有自由和休息,也将不能指望从那种使居留美洲成为如此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东西中获得什么;这块土地结出的果实,决不会在仍然充满着侵略的残迹的土壤上生长。”^①

资产阶级应当这样或那样地、用和平手段或者通过“斗争”,消灭贵族的特权,或者像基佐说的,而在他以前还有西耶士说过,战败的人民也会变成征服者。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米涅和梯也尔那里找到类似我们刚才引证过的那些篇章。不过这是无益的。现在已经证明,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到阶级斗争时,他们在这里只是效法第三等级最杰出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榜样。而且,当基佐说贵族的代表也像第三等级的代表一样鼓吹过阶级斗争时,他丝毫没有夸大。在奥古斯丹·梯叶里先于他的《墨洛温时代的故事》而写的《法兰西史论丛》中,读者可以找到对1789年以前各种历史体系的相当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旧法国社会分裂成的那些阶级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家们,即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拥护者们的观点。任何一个布伦维列或蒙洛节的语言常常都像基佐的语言或今天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语言那样清晰有力。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鼓吹的阶级斗争不同于今天社会主义者宣扬的阶级斗争的地方,首先是社会战争的理论家们提到的那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不论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关于人民、关于民族、关于公民群众、关于整个第三等级说了多少话,事实上他们

^① 《欧洲的批评者》,1820年4月2日。——作者原注

捍卫的仍然是民族中间小部分人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基佐很懂得这一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到这一点。他写道：“我知道……自行其是的、没有恐惧的、相信会胜利的革命，自然地 and 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自己的、支配着社会的贵族。不过这种贵族将是另外一种，他们的形成将完全与我们见到其残骸的那种不同。”^①如果像同一个基佐说过的那样，认为第三等级对贵族的斗争意味着平等对特权的斗争，那是不对的。实质上，问题在于新的特权取得胜利，也就是在形成上跟基佐和他的朋友曾反对过其残余的那些特权不同的特权取得胜利。对这一点，奥古斯丹·梯叶里大概没有像路易·菲利浦的未来部长懂得那么清楚。而且他的理想也没有超出中等阶级的胜利。例如他这样概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件：“代替各个旧等级，即在权利和社会地位(原文如此!)上不平等的各阶级，形成了单一成分的社会；出现了两千五百万人组成一个唯一的公民阶级，他们生活在一种法律、一种规章、一种制度之下。”^②往后该做什么呢？不外乎保障新社会不受旧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捍卫资产阶级的成果不受在阶级大搏斗中失败了贵族的报复。的确，甚至在1830年以后，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彻底胜利了，奥古斯丹·梯叶里这个圣西门的过去的学生和“继子”还没有像基佐这个工人阶级一切运动的凶恶敌人那样完全站在心满意足的那些人一边。《法兰西史论丛》的作者看来没有完全指责从路易·菲利浦统治的最初几年起就开始出现的那些新的社会倾向和

① 《论复辟时代的法国政府和现时的内阁》，第108页。——作者原注

② 在《墨洛温时代的故事》以前写的《法兰西史论丛》，巴黎，1840年版，第143页。——作者原注

政治倾向。但是他远没有理解这些倾向；他希望社会和平、阶级融合，虽然他在复辟时代鼓吹过阶级战争。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和平不能不是、也不会不是无产阶级顺从于“新贵族”加在它身上的桎梏。^①

不过回忆以下一点将是公道的：在复辟时代和路易·菲利浦时代，甚至工人阶级的理论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还不理解无产阶级将要进行自己的社会战争和夺得自己的政治胜利。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他们在工人问题上也都主张或多或少完全的阶级融合，而不赞成阶级斗争。圣西门——奥古斯丹·梯叶里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历史观念归功于他——就是最热烈地拥护工蜂反对雄蜂的战争的人之一。但是圣西门认为工蜂既是工人同样又是工厂主和银行家。还必须谈一谈圣西门主义者。安凡丹很清楚地懂得地租和资本利润都是无偿劳动的产物。他说：“确认土地属于自己的私有者，通过租金把热爱劳动的人们双手创造的一部分产品据为己有。出租资本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这意味着劳动者支付给某些人，好让他们能够休息，好让他们支配生产材料。”^②

这个话说得好。但什么是把资本用于借贷的企业主的利润呢？它不也是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产物么？安凡丹回答说，不是，企

① “社会和平”也是基佐的愿望。如果在 1848 年以后他出来反对共和国，那么这原因只在于共和国不能保障这个臭名远扬的和平。他在 1849 年 1 月说过，“不言而喻，民主共和国从其最初行动开始就接近于使自己陷入并把我們拖进社会混乱之中”（参见《论法国的民主》，第 42 页）。时代变了。这种语言跟同一个基佐在 1820 年说的话多么不同！——作者原注

② “论动产和不动产租金之递减”，载《生产者》，巴黎，1825 年，第 242—243 页。——作者原注

业主获得利润是靠自己的劳动。利润和工资,对安凡丹说来是同一个东西,而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表明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理解李嘉图,因为这位英国经济学家说:如果利润不下降,工资就不可能降低。^① 这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圣西门主义者也不愿意听到阶级斗争。他们都深信,主人和工人组成统一的阶级,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圣西门主义者只反对“军人和寄生者阶级”;甚至宁愿使它“感动”和“转变”^②。

当十八世纪哲学家大张旗鼓地反对“特权”的时候,他们实质上只是反对封建所有制。土地所有者在他们心目中是对他人劳动的厚颜无耻的剥削者,几乎是强盗。相反,资产阶级所有制被他们看成是完全顺当的。商业利润和工业利润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商人和工厂主劳动的产物:剩余价值的秘密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理论家非常应时地继承了自己前辈们的这一理论错误。如果工人的收入远不像资本家那么大,这只是因为工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工作得像资本家那么多。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把企业主的利润同工人的工资混为一谈,只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的错误。在理论上,工人在对主人的关系上的地位,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的地位,只有在经济科学最后能够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性以后,才会弄清楚,并克服

^① 安凡丹天真地说:“李嘉图所谓利润总是指资本家(安凡丹想说的是,借贷资本)的利息,还说,劳动价格的提高减少不劳动者收入。”参见前注“论动产和不动产租金之递减”,第545页。——作者原注

^② “对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有和平和幸福,如果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停止,如果没有使它们转变和感动,因为应该使它们全都感动和转变。”参见《地球》,第183期。——作者原注

种种迷误。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发现结束了社会主义者在阶级斗争观上的全部错误。现代社会主义者情愿接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十分珍爱的方案——“使之转变，接受自己的信仰”和“感动上层阶级”，不过有一个条件：在他们被剥夺以后来“转变”和“感动”他们。所有懂得“人性”的人都会同意，那时他们比现在要容易“转变”得多。^①

现代社会主义者很懂得，只要问题涉及同贵族作斗争，不管是哪一种贵族，在他们没有被打败和解除武装以前，就谈不到和平，也谈不到休息。

现在的资产者斥责社会主义者在需要安定与和解的地方煽动战争。他们断言，资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我们像基佐曾经答复过贵族的那样答复资产者：“堕落的人，事实俱在，让你们感到羞耻！”

“反革命总是十分懂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它首先关心的应该是普遍夺取政权，以便随后组织和利用政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让国民党也懂得，对它说来重要的不是破坏政权，而是夺取它。”

1820年基佐就是这样写的。当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混为一谈时，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义务只可能有错误的观点。圣西门主义者之一在1830年写道：“至于所谓政治权利，我们看不出它们和群众的福利之间有

^① “一些人由于自己的智慧，良好的行为，为自己创造了资本，走上幸福和进步的道路。另一些不聪明或者懒惰或者腐化的人，仍然处在窘迫和困难的条件下，唯一靠着工资生活。”参见基佐：《论法国的民主》，第76页。——作者原注

什么共同之处”。^① 现代社会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再有误解，他们清楚地看到“所谓政治的权利”怎样同群众的福利联系着。他们懂得，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他们也力求不是像“无政府主义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去消灭政治权力，而是把它夺取到自己手中。

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一直到政治舞台上出现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现代无产阶级以前，都清楚不过地知道这一点，而且没有把它忘记。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怎样给自己解释在原始单一成分的社会里产生出利益对立的那个历史过程呢？——读者已经看到，他们把法国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同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联系起来。一般说来，征服在他们的哲学和现代民族的历史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奥古斯丹·梯叶里叙述说，有一次他为着“充实”自己的政治观点，读了几章休谟的著作，那里的观点像道道亮光一样使他惊讶，他合上书，感叹道：“这一切从征服的时期起便开始了，这一切都以征服为基础。”于是他立即根据这个新观点想出了改写英国革命史的计划。^②

这是 1817 年的事。此后，我们这位作者的新思想成了他的其他许多历史研究的基础；而他那 1817 年刊载在《欧洲的批判者》第四卷中的《英国革命纲要》则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的全部价值和一切缺点。

^① 《地球》，第 183 期。——作者原注

^② 《历史研究十年》，载《奥古斯丹·梯叶里全集》，第 6 卷“序言”。——作者原注

“凡是其祖先曾经征服英国的人都离开自己的城堡，投入国王营垒，在那里占有符合其身份的地位。城市和港口的居民成群地走向对立的营垒。那时可以说集合了两支大军：一支为了闲逸和权力，另一支为了劳动和自由。所有游手好闲的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所有只图生活上享乐而不劳动的人，都站到国王的旗帜下，保卫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利益，相反，以前的征服者的后裔中间那些当时经营工业的人则归附于公会的党派”。^①

十七世纪英国的革命运动就是这样。以前的战败者对以前的胜利者疯狂的反动。初看起来这好像非常近乎情理。但是，当你重读上面摘引的一段话时，怀疑就出现了。那里有以前的胜利者的后裔，他们经营工业，归附于“劳动和自由”的党派。另一方面，国王的营垒里充满了所有只希望“不劳动而享乐”的人。而在他们之中，用我们这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有一切“等级”的人。因此这里就有了利益的分歧，其中“工业”进步引起的经济运动起着重大的作用。可是奥古斯丹·梯叶里本人关于这一点说道：“战争从两方面都是为现实利益进行的。其余一切都是掩饰或借口。保卫臣民的事业的人大部分是长老会信徒，就是说他们在宗教上甚至都不愿意有任何服从。参加反对党的人属于英国国教或天主教；这是因为甚至在宗教领域中他们也追求权力和向人们征税。”^②

^① 《革命的目的》，载《奥古斯丹·梯叶里全集》，第6卷，第66页。——作者原注

^② 同上。——作者原注

因此,事情是十分清楚的。进行斗争是为了政党的经济利益,而权力本身实质上只是这些政党为了自己利益获胜而力求掌握的一种工具。奥古斯丹·梯叶里也像基佐一样很懂得这一点。^①不仅如此。他也懂得诺曼人侵入英国时,在自己面前提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他们想“获得”,正像他转述过去一个编年史修纂者的话时所说的那样。他引证征服者威廉在哈斯汀战役前所作的演说,它告诉我们隐秘的征服内幕^②。为什么在征服远不能彻底说明现象,它本身按其目的,特别按其结果要用胜利者和战败者的社会状况来解释的场合,他还要求助于征服呢?

问题在于奥古斯丹·梯叶里那个学派对人类经济史有十分混乱的看法。

他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唯一符合人性和天意的社会。凡是不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① 基佐:《英国革命史》。作者在序言中很有远见地声称,所谓英国革命毋宁是政治的,而法国革命力图改造政府和社会这种意见是肤浅的和无价值的。他说:“革命的方向是和它的起源一样的。”英国革命发源于“英国人民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中产生的变化,参见《英国革命史》,第1卷,1841年版,第11—12页;《关于英国革命史的演说》,1850年柏林版。——作者原注

^② 他在向自己的朋友呼吁时高喊:“英勇战斗吧,杀掉所有的人吧;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大家都会发财致富,你们全都会得到我获得的东西;如果我有土地,你们也会有土地”(参见《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第1卷,巴黎,1838年版,第352页)。另一方面,受到攻击的人们互相说道:“不管有怎样的危险,我们都要斗争,因为问题不在于承认新的主人……而完全在于另外的东西。诺曼的公爵已经把我们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骑士和所有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已经为了这一点承认自己是他的陪臣。他们全部希望有自己的一份;如果公爵成为我们的国王,他就一定会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他们。”等等。参见《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第347页。——作者原注

在他们看来都是违反自然的,至少也是奇怪的。^① 他们能够很好地说明中世纪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这是自然的运动,因为这运动本来就应该使社会结构变成自然所指派的类型。至于封建制度本身,他们只能把它看成历史运动偏离了它的正常方向。对这种偏离最可能的解释是征服者的暴力。暴力和仇恨在“人性”中也是不多的。到“人性”中去找某种社会组织的基础,那我们就不是放弃“人性”论,而且一箭双雕;我们用人性的好的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力求建立这个制度的整个运动;用人性坏的方面解释在资产者心目中多少有些“奇怪的”封建制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组织的起源。

奥古斯丹·梯叶里完全像基佐和米涅那样认为,他胜过上一世纪哲学家们的历史观点,因为这些哲学家在中世纪只看到人类愚蠢取得漫长而不断的胜利。他自以为对待这一时代的态度要公正得多。

的确,他比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更好地懂得这个时代,不过他所看见的乃是当时市民的解放意图,“第三等级的形成和胜利”,而不是整个封建制度的“性质”。他是从封建制度的瓦解,而不是从它

^① 奥古斯丹·梯叶里这样称呼旧时不列颠部落的氏族制度。按照基佐的意见,“过去和将来到处总是有食利者、企业主和雇佣工人。这些区别完全不是偶然现象,或者说,某个国家所固有的特殊现象;这是任何人类社会中自然地一再发生的普遍现象。而你越是仔细观察,就越会相信,这些现象一方面同我们能认识的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同我们只能预见的人性的命运的秘密,都是紧密联系和高度协调的”(参见《论法国的民主》,第77—78页)。马克思不是说对了吗?他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有这个阶级所有的理论家,只知道两种制度:人为的制度或者天然的制度,他们在这一点上好像神学家,后者也规定两类宗教;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来源于上帝。——作者原注

的起源来理解这个制度的。至于起源,那么“征服”对他说来仍然是谜语的答案。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奥古斯丹·梯叶里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归功于圣西门。圣西门所持的见解,被基佐借用来作为自己的历史观点。无论如何,不可争辩的是:凡认真读过圣西门著作的人都不会在基佐的著作中发现任何历史哲学方面的新东西。例如,圣西门坚决认为中世纪的社会组织比古代民族的社会组织优越,他只是从这种组织使现代“工业”制度自由发展的程度这个角度来估价这些优越性。他认为封建主义无非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制度,无非是征服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制度。^①

无可争辩,封建领主的历史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们的军事职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他们的所有制的军事性质。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为什么在现代欧洲军事职务之受限制与中世纪不同呢?为什么它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呢?因为欧洲社会的经济结构已不是当时的经济结构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需要的满足方式。

不管我们这里所讲到的那个学派的历史学家继米涅之后多少次重申封建主义在它真正实现以前在于其需要,他们仍然很少懂

^① “现代各国历史学家通常互相一致的唯一重要之点不过是一种迷误。他们全都称呼九至十五的那些世纪为野蛮世纪,而事实上它们恰恰是这样的世纪:那时建立了所有曾使欧洲社会在政治上具有胜过以前一切社会的决定性的优点的、积极的制度。”(《论万有引力》,载《圣西门和安凡丹著作集》)中世纪是这样的时代:那时“战争曾经被看作,而且本来就应该被看作民族繁荣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那里,封建领地所有制“按其起源和本性纯粹是军事的”(《组织者》,载《圣西门和安凡丹著作集》,第20卷,第81、83页)。——作者原注

得它的“性质”，就像他们很少懂得社会人的需要的产生取决于其进化的不同阶段一样。他们的历史哲学归结于以下一点：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乃是结果；（这些结构的）根源在于各民族的社会状况。社会状况决定于所有制状况，而在现代各民族那里主要是决定于土地所有制状况。^①最后，说到所有制，则用人的本性，或者用这个本性或多或少地被歪曲这一点来解释。

人的本性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曾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而且被奥·孔德这个形而上学的假敌人变成他的所谓“社会学”的真正本质，其实不过是修辞说法。人的本性不变么？在这种场合它就不可能向我们说明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其总体形成我们所谓历史过程的种种变化。它本身变化么？那就必须找出这些变化的原因。在这两种场合，“人的本性”同样说明不了人类历史运动中的任何东西。

澳大利亚部族的“所有制关系”不像今天西欧各民族中间存在的“所有制关系”。怎样解释这一点呢？是用澳大利亚人具有不同于欧洲人的本性来解释呢，还是用他们违反自然的呼声来解释？两者都不行。他们的所有制关系就是在他们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应有的那种关系。就它们仍然同这种状况相适应来说，它们是自然的。当澳大利亚部族的生产力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时，它们就

^① 米涅：《论封建主义》，第35页。特别是基佐的《法兰西史论丛》。研究土地关系，应该先于研究公民生活；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认识各种不同的社会条件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条件，就必须知道所有制的性质和关系。〔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25页。〕参看圣西门所说的：“形成所有制的法律是最重要的法律。这个法律乃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作者原注

变成反自然的了。

为了生存,人必须作用于外部自然,他必须生产。人对外部自然的作用决定于每个特定时刻人的生产手段、他的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越高,它们作用就越有效果。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生产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的某种变化。这就是被法律语言称作所有制关系的变化的那些变化。既然所有制状况的变化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就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社会的“性质”,而另一方面,既然人是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产物,那就很明显,生产力的发展在改变社会环境的“性质”时也在改变人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

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个观点,即从唯物史观来分析基佐、米涅和奥古斯丹·梯叶里的基本历史概念,那就可以说:

说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这是完全正确的;说为了了解政治制度,必须知道不同的社会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正确的,而为了了解不同的社会条件,必须知道所有制性质和关系,这同样是很正确的。但是所有制的状况具有比我们的历史学家赋予它的意义更大得多的意义。这种状况到处而且不仅仅在现代各民族那里有影响;断言政治制度的性质主要决定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是不正确的;所谓动产的东西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如果在中世纪,大地产的拥有者组成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这种情况是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中产生的。最后,不应当在人的本性中,而要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去寻找所有制形式的历史发展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许多对唯物史观有成见的读者看来似乎相当突然的结论。这个结论归结如下: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斥责先前各种学派的历史观点；它只是使这些观点摆脱掉导致这些观点无法走出迷宫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我们认为同样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断言马克思第一个谈到阶级斗争是不正确的，那么毕竟毋庸置疑的是，他第一个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从而揭示了相继出现于世界舞台的各个不同阶级的“本性”。我们希望无产阶级会好好地利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个珍贵的发现。

附录四 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书

(列夫·梅契尼柯夫:《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

附埃利泽·邵可侣序)

译者按:本文是普列汉诺夫对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列·伊·梅契尼柯夫(1838—1888)的著作《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1889年以法文出版)的书评。写于1889年。1890年2月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文集第1期上发表,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中译文曾摘要登载在《教学与研究》杂志1982年第4期。这里刊登的是全译文。文章一方面指出,梅契尼柯夫在地理特点对古代文明国家社会制度发展进程的影响问题上的某些观点接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特定地理条件可以决定特定社会制度的性质提供鲜明的历史例证,同时也批判了他夸大地理作用的错误。这是普列汉诺夫第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他第一篇真正的哲学著作,对于了解他的地理环境学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定期出版物对已故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这本书守口如瓶。这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不值得注意么？然而无论什么人，只要接触此书作者的观点，都不会看不见其中的内容比我国“主观社会学者们”的全部著作要更为严肃得多。法国文献比俄国那些写得不错的社会科学著作大为丰富，但是就在法国，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这本书也是同样重要的收获。我国的期刊为什么不谈它呢？大概又是书刊检查机关淘气了。大家知道，它有一个时候甚至要把达尔文的书“停止流传”。如果我们的假定是对的，那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对书刊检查机关是奈何不得的。我们大家，俄国的读者和作者，早已习惯于这位老朽乖僻和狂妄的性格了。

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的有害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关于它也许可以而且应当写很多，但这样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一本小书中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分析这位已故的俄国流亡者的历史观点，把它们同社会现象的其他现代研究者的观点进行对比。现在我们不得不局限于说点简短的意见。

如果不对事情作任何夸大，可以说，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涉及历史哲学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出了完全令人满意的解答。此外，它在一些个别的次要的问题上的极其中肯的见解也肯定是丰富了科学，而且为了更加丰富此书的内容，也许只需要用比较系统的形式叙述一下这些见解。如果不是死神如此过早地把他带进坟墓，大概作者也会做到这一点。我们且力求用不多的、然而尽可能确切的言词转述他的思想吧。

人类社会的内部发展是在什么原因影响下实现的呢？为什么一些部落现在仍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变化，而另一些部落则联合

为庞大的国家机体,开始过政治生活,产生了科学、文学、实用的和优美的艺术、更高的生产力——一句话,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一切东西呢?又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文明的代表者是不同的民族呢?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明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特定的一个地点或者特定的诸地点,以便后来占据其领先地位随后又为新的竞争者所争夺的新领土呢?为什么文明的重心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迁移到了希腊和罗马,然后又迁移到中欧,从那里它眼看着又要转移到北美去呢?在文明的这种看起来极其变化无常的进程中是不是有一种规律性呢?最后——这或许也是最有意思的——要知道不是文明诸国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历史的发展是用很大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它(至少暂时是,而且必须意识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会)导致社会之分裂为阶级和等级,导致一小撮特权分子的统治,导致人民群众的受压迫,导致人类个性的遭贬抑,而且常常是导致专制制度种种最丑恶最卑劣的表现。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人类赶进严酷无情的文明学校呢?是什么力量迫使某些人类部落抛弃自己原始的关系,形成为新的政治团体,和承受着残酷的“历史劳役”呢?

自然,要解决这类问题没有比引证神明的天意更轻而易举的了:大智大慧的上帝希望如此嘛。这种回答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在科学中它却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当我们引证神灵的意志时,我们就没有权利谈论现象的规律性。去发现这种规律性乃是科学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严肃的科学从来不可能同宗教和平共存的道理。科学逐渐地从所有的阵地上击退了宗教,现在任何一个对科学思维哪怕只有某种概念的人都不再引证上帝意志,把它当作自

然现象或社会发展的原因。然而要掌握严格的科学思维的一切手段,拒绝引证神明的天意是不够的。在社会科学中我们至今都常常遇到对于事件的种种完全任意的解释,常常遇到对现象的种种完全非科学的说明。作这类说明的时候人们并不总是认为必须讲究逻辑。当提出某一历史现象的原因问题时,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些并不愚蠢的正经人都满足于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只不过用新的表达法把问题重复一遍的那种回答。假定您向“一位学者”提出上述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您问:为什么一些民族以如此惊人的缓慢速度发展着,而另一些民族则迅速地走上文明的大道呢?

“学者”会毫不犹豫地答复您:这可以用种族的属性来说明。您懂得这个答复的意义吗?某些民族发展得缓慢,因为他们的种族属性就是如此这般,使得他们发展缓慢,而另一些民族很快地文明化了,因为他们的种族的主要属性在于他们能够迅速发展。如果您真的把各个不同的文明民族互相比较一下,您马上就会看出,用种族属性来解释他们历史的特点是何等惊人的轻率。在这些高明人物的手里,“种族”成了解决社会科学一切问题的钥匙。由于这个魔怪的字眼的神奇力量,似乎可以指望:同它联系着的概念具有充分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这本书中有一章出色的文字,在那里作者严肃地解剖现代的种族理论。他首先指出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说明社会现象时喜欢引证种族属性的,特别是达尔文主义者,即理论上完全承认特定人种或特定变种的属性乃是他们适应生存斗争的环境的结果的那些进化原则的拥护者。随后列·伊·梅契尼柯夫巧妙地指出

种族概念的种种不确定性和种种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还举出像托平纳尔这样杰出的人类学家作证,托平纳尔断言,由于各种不同的种族长期的混合和杂交,现在已经不可能谈论纯粹的种族了,“当我们说到印欧、拉丁、德意志、盎格鲁、斯拉夫种族的时候,种族一词可能具有的意义只是一个政治术语而已,仅仅表示人类学上不同的分子的偶然堆积”。列·伊·梅契尼柯夫补充说,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是人种上不同的分子很复杂的混合的结果,在这种混合中有时甚至连大致地确定它的诸组成部分的相对意义也不可能。比方很难说什么种族,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对古代埃及的文明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迦勒底人的历史甚至表明,在文明的事业中黑色的种族超过了所有别的种族。因此,那时黑皮肤的学者们可以认为自己的种族最有能力走向进步,并且抱着遗憾的心情看待当时处于停滞和无知状态中的白皮肤和黄皮肤的种族。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白种人站在所有其他种族的前列,而黑种人则落后得惊人。不过即使假定白种人确实比所有其他种族更有发展能力,那也很少能够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的不同。我们还是不会知道“为什么像同属于白种雅利安支的库尔德人和德意志人、盎格鲁人和阿富汗人那样互相间如此近似的人种集团在历史上起了如此不同的作用”(第98页)。显然,他们作用的不同并非决定于种族属性,而是有习惯于把一切都推到种族头上的人们绝少想到的其他某些原因。

然而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因呢?列·伊·梅契尼柯夫回答说,必须在围绕人类社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寻找原因。大家知道,地理环境的属性在不同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受到它的强大的影响的各个种族的命运也就互有差别。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

史命运的影响的思想在科学上远不是新东西。希腊和罗马的著作家早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里特尔和其他许多人都发挥过这种思想。可是人们往往用很不清楚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方式来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命运的影响。某些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更多地从不同种族的心理学或者甚至是生理学中,而不是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去寻找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他们说,特定种族的某某性格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它的性格反过来决定了它的历史。可是不难看出,这种论调又使我们回到同样的种族属性。区别仅仅是,在这个场合,所谓种族属性的起源解释得稍微详尽一点罢了。这派的研究者忘记了,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对他的性格和习惯的影响比自然界的直接影响要强大得多。因此,为了正确地评价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影响,必须考究这个自然环境如何影响直接决定人的性格和意向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特质和属性。列·伊·梅契尼柯夫相当详细地考察了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长江和黄河这些“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对古代东方文明发展的影响。这些文明不仅是古老的,而且也是最古老的。因此很清楚,正确地研究这些文明所得出的结论应当告诉我们,正是怎样的地理环境最大地促进了人类坚决走上文明的道路。按照列·伊·梅契尼柯夫的意见,“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的重要特性就归结为以下所述:“它们所灌溉的国家按照情况来看可以或者成为人们花费几天的劳动就能够取得整整一年的生活资料的粮仓,或者成为到处都是洪水、饥饿和传染病所产生的无数尸体和牺牲者的坟场。为了利用这些河流所造成的特殊环

境,必须有从通常按其成分很不一样,按语言、种族、外貌和习俗也不相同的沿岸居民中征募来的、有严格纪律性的工人的共同努力。长江的运河和黄河的堤坝大概都是比埃及的金字塔和庙宇更多得多的几个世代的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的共同的劳作。在挖掘某条沟渠或维护某段土堤时稍有疏忽,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保护共同的水力资源的事业中所表现的一点点懒惰、自私,在这种独特的环境里都会成为社会灾难的祸根,成为无可挽回的民族不幸的来源。因此,养育人类的河流在死亡的恐惧下迫使所有这些常常是互不相识甚至彼此敌对的人群走向长期紧密的团结;它迫使每一个人去做只有将来才会显露其公益性而其计划又总是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些工作。这就是诚惶诚恐地虔敬地崇拜河流这个上帝的真正原因,这个上帝生杀予夺,使为数不多的特选者相信自己的秘密,而要求普通的凡人盲目的服从”(第 189 页)。的确,马斯佩罗先生翻译的和列·伊·梅契尼柯夫引证的尼罗颂歌使人对这种崇拜的根源没有任何怀疑,“向你致敬,啊尼罗,你出现在大地,平安地降临,给埃及以生命。你这谷物的始建者、大麦的创造主啊,将永世长存……你的劳作使千百万不幸的人得以休息。当你降落时,天上的神明都下拜,人们都死亡……当你上涨时,大地充满着喜悦,所有的凡人都高兴,所有的生物都得到食物,所有的百姓都有了工作……那些牺牲只是为你而献上的”,等等(第 215—216 页)。但是同一个最强大最神秘的上帝,“一切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也创造了古代埃及固有的专制制度,列诺尔曼关于埃及人说道:“任何民族在对王权的尊敬方面都没有走得这样远,都没有把政权的概念提得这样高,都没有把它神化到这种地步。而产生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人民都没有用物质生活条件,用日用品的生产把这种政权的任务和必要性解释得如此清楚”。其实,只要认真看看事实就会发现,迦勒底国王的政权建立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建立在日用品的生产上。这一点看来国王本人也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位国王关于自己这样说道:“我为人们的福利研究了河流的秘密……我把河水引进荒漠,我把它灌满干涸的沟渠……我灌溉了荒凉的平原;我使它们变成了幸福的住所,等等”(第258页)。一般说来,在中国,至少是在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专制政权的经济意义就是如此;“在那里我们又遇到这样的环境,它以慷慨的大手奖赏人的劳动,在毁灭的威胁下迫使人们充分地团结起来,甚至在最不足道的生活小节上也要遵守严格的坚强的纪律”(第353—354页)。最后,虽然在印度,地理环境的属性曾经妨碍过国家统一的出现,但就在那里地理环境也使得专制制度成为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时期还是有益的政治形式。我们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设想那些社会政治关系在印度雅利安人那里曾经存在到他们的专制国家的出现。这些关系的特点特别表现在选举出来的首长所领导的村社的独立性上。按照该国的地理条件,村社只有当印度的雅利安人生活在富饶的克什米尔盆地时才仍然是独立的,“在这里形成了兴都库什邻近地区最古老的梨俱吠陀^①颂歌。充足的

^① Rigveda, 梨俱吠陀, 以宗教内容为主的颂歌集, 印度文学的第一部著名文献, 成书于公元前十世纪的最古老最重要的吠陀本集, 研究古代印度历史和神话的珍贵资料。吠陀, 印度最古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总集, 梵文“知识”的音译。最古老的“吠陀本集”共四部, 其中主要的两部为“梨俱吠陀”(收诗 1028 首, 共约 4 万行)和“阿闍婆吠陀”。——译者注

雨量结合着肥沃的土壤适宜于牧人的生活,促进了为数不多的独立集团用自由的劳动耕耘土地”。如果雅利安人不曾继续前进,把印度住满,他们就可能永远保存自由制度,因之在历史上也就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是他们无可遏止地推进到国家内地,在这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另一种地理条件。“摩奴法典^①中称之为‘中央之国’的广大地区具有适宜于历史发展的那种环境的一切特点”(第303页)。在那里农业继续慷慨地奖赏人的努力,但是如果没有创造了古代文明同时也创造了古代专制国家的那种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和那种劳动纪律,农业要继续慷慨地奖赏人的努力,是不可思议的。在整个恒河流域也是如此。广泛的灌溉系统在那里是完全必要的;在维护这个系统时稍一不慎,就有使全国遭受比敌人最有破坏性的入侵还要可怕的灾难。管理这个系统的中央政权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于是变成了专制制度。

然而古代的东方文明不过是人类在历史发展途中最初的几大步。为了往后的进步还需要有利于另一些社会政治关系发展的另一种地理环境。工艺技术的发展 and 财富的增长使得国际交往和交换成为必要。文明的重心转移到地中海沿岸。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新的活动家: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等,那些像古代埃及人一样由于某些原因不能适应文明生活新条件的民族,便退到次要的地位,趋于衰落了。而善于适应这些条件的那些民族则开始了新的繁荣时期。迦勒底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它初期是纯粹的

^① 摩奴,Manu,印度神话中所传现在人类的始祖。据说重要梵文法典《摩奴法典》就出自他的手笔。——译者注

农业国,后来却在波斯湾这个最靠近欧洲的东部地中海的贸易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国际交往逐渐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地中海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有教养的人类进入到海洋文明时期,这时候居于首位的是最适于发展海洋贸易的国家。

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古代河流文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以辽阔的专制国家占据优势地位为特征的;在我们的作者认为也包括中世纪欧洲在内的地中海文明时期,出现了新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联邦共和国,不过这种共和国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因此始终或多或少是寡头政体的(第44—45页)。最后,现代海洋文明时代按其倾向则是同样既反对专制制度又反对寡头政体的;它力求实现法国大革命宣布的人权,取消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统治,实行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第51—52页)。

总之,在人类生存的特定自然条件下,专制制度、社会分裂为阶级、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以及如此类似的所有的文明的黑暗面,都是文明的发展所需要的。但是这种发展的成功逐渐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出现一个自由而又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新时期的那个时刻就不远了。列·伊·梅契尼柯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大概曾使我国老朽的书报检查机关感到难堪,至于我们,我们自然是全盘加以接受的。我们只是觉得,作者有时表达得不那么确切。在该书第一章末尾他就提出了比方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学的进步——他说——与暴力、强制、权力成反比,而与不束缚意志、自由、无政府成正比”(第28页)。他认为这一点蒲鲁东早就证明过了。这样提问题,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第一,作者提出的原理被他自己写的书的内容推翻了。请把“河流文明”时期形

成的社会制度同原始的人类社会制度比较一下,您就会看到,“强制”和“权力”在前者比在后者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但是能不能说:“在社会主义的进步”这个意义上,“河流文明”比原始社会落后呢?可以给予野蛮人的自由生活以比文明化的专制国家更多的同情。但为什么要使进步一词具有这样随心所欲、违反常识的意义,以致人们觉得,原始部落虽然几乎没有挪动一步,还是比超过自己一长节历史阶段的那些民族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得更远呢?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任何抽象公式都是有害的。的确,由于自己的抽象性,它们总是极端片面的,任何时候都包括不了现实生活和历史的丰富内容。按照“进步”的程度排列不同的社会而同时所考虑的又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这就无异于按照雄蕊的数目来排列植物的种、属、科,或者按照一根头发来排列人种,错误和矛盾立即就会层出不穷。在原始社会里自由比东方专制国家多一些,但东方专制国家在进步的道路上毕竟走得远得多,因为它们的居民比自由的野蛮人具有大得多的控制自然的权力,要知道如果不考察人控制自然的水平,就不可能谈论人的进步。获得控制自然的这种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之点。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如果他控制自然的手段在顺利的条件下没有改进,那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下的人类进步。此外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不应当怀疑历史使人类走向自由平等的结论,但它是不是使人类走向无政府状态呢?能不能说,社会向着蒲鲁东指示的那个方向发展呢?决不能。蒲鲁东的无政府状态充满着这么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以致如果人类什么时候抱着蒲鲁东式的观念,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以任何原则为

基础的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更不用说以自由平等的原则为基础了。当然,在现今文明人类看来都要采取的那些社会形式中,既不可能有专制制度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最后也不可能有现时在某些国家支持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统治的那种外表上民主的政权的地位。难道社会不会保存对自己所固有的生产力的权力么?它不会保存对组织这些阶层的权力么?当然会的,因为如果拒绝这种权力,对它就等于去自杀。不过在此种情况下这个社会便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无政府的意思就是根本不要权力,不是给没有组织便不可思议的那种自由、而是给排斥任何组织的个别人的任性腾出无限广阔的地盘。一般而言,我们要指出,对无政府的看法相当严重地损害了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的价值,因为它妨碍了作者系统地发挥那些根本上完全正确的和有益的思想。有时他好像担心自己的结论会同无政府主义观点背道而驰,于是他开始用违反他的学说的各种限定语来缓和这些结论。这就是许多例子中间的一个。他十分清楚地指出,在古代埃及,除非利用专制政府的权力,否则是无法安排生产的。但是他认为必须缓和一下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引证埃利泽·邵可侣,按照邵可侣的意见,地理条件让尼罗河盆地的居民可以在专制制度和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协作之间进行选择(第227页)。的确,我们的作者立即指出,如果古代埃及人能够从自由协作开始,进步和进化两词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这样,那就是说,对于古代埃及人出路就只在于专制制度一面,因之也就不能像列·伊·梅契尼柯夫那样说什么“甚至一开始,尼罗河盆地所提供的环境就没有把专制制度硬加在居民的身上”,而只

是“建议他们团结起来”。再说一遍,列·伊·梅契尼柯夫只是用这一类的限定语破坏了自己的科学结论的意义,而他之所以喜欢这些限定语,我们以为正是由于对“无政府”的某种爱好。爱好无政府还在另一个意义上损害了列·伊·梅契尼柯夫:它妨碍他在自己的书中彻底地贯彻唯物史观。无政府主义学说是再唯心不过了。无政府主义者大谈其自由、人权、一切政权都有害以及诸如此类,但他们完全不考虑人类发展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不仅不是人的意志创造的,相反地,它的影响本身就决定着人的意志和活动的方向。现代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科学时的任务恰恰在于指出人类的发展怎样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生存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实现的。换句话说,现代唯物主义站在同整个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精神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一个人即使部分地同情无政府主义,即使稍微认真地接受了这个学说,有时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唯心史观,即使如此,按照自己的基本观点来说,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例如列·伊·梅契尼柯夫历史哲学最主要的原理就完全是唯物主义的。不过他在一些细节上却往往偏到唯心主义方面去了。这样的细节几乎在他的书的每一章中都可以遇到。在“印度河和恒河”一章中他说道,印度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的任务,“她用可恶的种姓制度开始了权利的历史”(第281页)。他之所以给予种姓这样大的意义,是因为他认为种姓限制了在“河流文明”的其他中心是无限的那种王权。“在古代,唯有印度能够实行这样的社会制度:它通过其不依赖于个人专权的强制手段的那种内部结构进行调节。为了解决世界历史的这项任务,印度把处处都有的那些阶级区别夸大到荒谬绝伦和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一切之所以带有更

强烈的唯心主义气味,是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印度的种姓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作者又怎样把它们的生产同地理环境的属性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种姓在列·伊·梅契尼柯夫所设想的那个形态下,它们是否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格-斯·迈恩、一位谁也不会否定其权威的著作家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流行的舆论,好像印度社会可以分成许多横向的阶层,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构成特殊的种姓。这是根本错误的。非常可疑的是,婆罗门关于一个种姓高于另一个种姓的种姓理论曾经是否公正……甚至可能,现时比古代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这种理论最为重要。实际上印度只存在一个种姓,即祭司,他们在某种虽说很有限的意义上被认为高于所有的人……种姓是手艺和职业的通称……”(《东方和西方的古代村社》,圣彼得堡,1874年,第32—33页)。我们不想争论格-斯·迈恩是否正确,虽然我们觉得他是对的。不过读者会同意,列·伊·梅契尼柯夫无论如何不应该在预先没有指出迈恩的观点错了之前就谈论印度的特殊历史任务。我们的作者为了同他的历史理论的主要原理风马牛不相及的唯心主义偏见而忽视批评的要求。

在指出他的另一些类似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前,我们注意到,一般说来,在我们所分析的著作中,这位地理学家给历史留下的地位是极少的。这原因也许是作者没有时间考虑用适当的比例进行叙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缺点是他这本书所固有的。河流文明的国土的地理特点,书中讲的如此之详细,简直应有尽有。但是一谈到这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叙述就很是简略。当作者涉及地理河流两岸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内部发展时,叙述就变

得·过·分·的·简·短。我们可以说,列·伊·梅契尼柯夫这个理论的缺点是某种地·理·公·式·主·义。有人可能向我们指出,现代科学可以用来全面研究古代东方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发展的材料暂时还嫌太少。这是对的;但毕竟应该利用所有已有的那些材料,这一点,列·伊·梅契尼柯夫却没有做到。由此可见,虽然一般说来他这本书并不怀疑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通过·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经·济·关·系·的·中·介。但问题的经济方面他在这本书中毕竟解释得很少。如果他更多地注意到了经济,书中也许可以找到对于他不得不用历史上某个民族单纯的“衰·败”,用他们生命的“精·华”的亏损等等来加以解释的那些现象的说明。人类从一个文明时期向另一文明时期过渡的必然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不同时期的特征属性显示得越清楚,这些特性的起源就越容易理解。我们觉得,既然列·伊·梅契尼柯夫谈到了例如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他本该对这些特征通过·经·济·的·中·介·而·起·源·于·地·理·环·境·的·属·性·哪·怕·作·些·暗·示。现在人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文明是寡头政治的,像他所称呼的那样,换言之,为什么它们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同样,作者本来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有什么根据和在什么范围内拿中世纪大陆欧洲的生活方式同腓尼基、迦太基、雅典等等这样的共和国的生活方式进行类比呢?光是对群众的奴役还不足以进行这样的类比。而且奴役群众在地中海的文明中是有自己的历史的。为了说明这段历史,一般地指出地中海的作用是不够的,必须探讨地中海沿岸那些社会内部的经济史。列·伊·梅契尼柯夫说,实行农奴法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不过是像迦太基、雅典或罗马这类城市共和国的农村附属物(第50页)。但要知道,农·村·的·意·义·主·要·是·农·

业,而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按照列·伊·梅契尼柯夫自己的理论,海是没有意义的;农业民族甚至常常离开大海,“对它向之以背”,而不是寻找大海。地中海怎么能够对中世纪农业的欧洲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有决定性的影响呢?很明显,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进程。当然,环境有自己的作用,但是在它的影响下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常常可以甚至同环境的要求相矛盾。在现代欧洲历史上,也和在任何其他历史上一样,可以举出这类矛盾的若干例子。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而且主要是研究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无论如何不应当少于研究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这两类研究是互相补充的,而在它们的联合努力下,历史最隐蔽的秘密也会逐渐揭开的。为了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最近四十年来,特别是马克思学派做了许多工作,而不能不非常遗憾的是:几乎它的所有结论列·伊·梅契尼柯夫都没有加以注意。归根到底,以及一般而言,他的著作达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得出的同样的结论。不过如果他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对自己的结论进行过校正的话,他的结论在严整性和彻底性方面就会得益很多。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随便举出已经引用过的列·伊·梅契尼柯夫关于历史的发展会导致社会关系按照自由和平等的意旨进行改造的见解就足够了。这个见解有什么根据呢?就根据这样一条普通的理由:人们将来应该学会组织自己的劳动,不要专制君主的皮鞭,也不要企业主贪婪的监督。这个理由本身就有很大的或然性;这个或然性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这位作者实质上没有任何必要借用自然现象领域的类比来加强自己的理由,因为所有这种类比通常都是很牵强很任意的。但是不

管列·伊·梅契尼柯夫的理由多么或然,它毕竟还只是或然的。只有当他即使用不多的话证明了现在文明国家内部关系的逻辑怎样导致他指出的目的时,他的理由才会获得无可怀疑的性质。马克思学派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以应有的方式注意到现代生产力的规模和性质,注意到这些生产力同现代生产力关系的矛盾。马克思证明了,社会主义在怎样的程度上必不可免地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可惜,列·伊·梅契尼柯夫没有发现必须考虑马克思的学说。这个学说会使他的进步论具有更大的严整性和可靠性。马克思学派在我国也有自己的信徒。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纲要》一书对列·伊·梅契尼柯夫的研究就很有用。

但是,说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批评容易,艺术可难哪!而且甚至最欣赏作者、最同意他的观点的批评家也不可能对之提出某些异议和责难的那种著作是少之又少了。我们也要记住,不能把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看成是十分完善的著作,死神使他未能对它进行应有的加工润色。但是即使像现在这个样子,本书仍然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我们断然地建议我国读者中那些对法语有足够知识的人们读读这本书,或者最好是说,去研究它。

附:一段重要的异文

现代研究者们同样承认,“气候”最不一致的部落,其原始劳动工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在地球的最不相同的区域,未开化的各部落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上甚至宗教信仰也大体相

同……显然，“气候”，一般而言地理环境，对人们的习惯和思想方式的直接影响完全不像孟德斯鸠和他的学生们所以为的那样巨大。间接的影响，即地理环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关系按其本质说在原始部落那里到处都是相同的。

然而第一，它们远不是以相同的速度发展；第二，它们也不总是朝相同的方向发展。这里就表现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科学越来越多地说明了这种影响……诚然，地理环境把人类社会赶去服繁重的“历史劳役”以后，便使得某些关系形式成为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同一种“历史劳役”会增加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发展他的生产力和经验，从而使他走向另一种存在形式，使他有可能从自己的道路上排除种种过去是不可战胜的障碍。……

（摘译自《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第1卷，第26页）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出生于俄罗斯唐波夫省利茨佩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一个破落贵族地主家庭。祖先是鞑靼人。父亲是退職上尉。母亲是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近亲的后裔。他中学时代就在语言、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显示出浓厚兴趣和卓越才能，被同学们誉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课余则发奋钻研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他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19岁参加革命民粹派组织，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1880年底，为逃避沙皇政府搜捕，亡命西欧达37年之久。

流亡的最初几年，普列汉诺夫接触了西欧的工人运动，认真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于是就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从巴枯宁式的唯心史观信奉者变成了唯物史观的拥护者。与此同时，他还像学生似的在日内瓦大学，后来又在巴黎的索尔朋听教授们讲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地质学、有机化学、解剖学、动物学的课和人文科学著名学者的讲演，或者一清早就上图书馆阅读各类科学书籍，做了几十个笔记本的读书摘记和听课记录。他通晓德、英、意、保、波等各种欧洲语言，尤精法语，能够流利地用法语写作

和演说。这对于他踏实学习和深入研究先进的西欧文化以及顺畅地同各界人士交流思想都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1883年9月,他在日内瓦组织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劳动解放社”。在这个小团体中普列汉诺夫是公认的思想领袖。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并把它们秘密运往俄国散发。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哲学、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美学、文艺评论和历史等方面的论著,捍卫、论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批判了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康德主义、经济主义等俄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潮,分析了俄国革命提出的种种政治、经济和理论问题,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革命骨干,为联合国内外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它还建立并且加强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同欧洲(主要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牢固联系,交流了彼此的革命经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这些活动,普列汉诺夫成了第二国际的著名领袖、国际工人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据说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过普列汉诺夫:他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又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大14岁。他不仅是思想上帮助年轻的列宁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而且是帮助他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导师之一,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把列宁引入第二国际领导层的推介人。也正是由于他的引

荐,列宁才很快结识了第二国际各国著名领袖。

1900年8—9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通过艰巨而曲折的谈判,达成了共同编辑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协议。同年年底到1903年10月,是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并肩战斗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最光辉的岁月。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劳动解放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实行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而且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打下基础并一直领导党的理论家和著作家”,他们“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列宁全集》,第4卷,第203、226、292页)。

1903年11月,刚刚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即“少数派”)。作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的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采取退让妥协的政策,并且自己很快就走向了孟什维克一边。在组织问题上,他反对列宁“集中主义”建党路线,认为这种路线会破坏党内民主,容易导致对党员的专制。随后由于发生了1905年革命,又在策略问题上采取了同布尔什维克尖锐对立的立场。他认为来临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而农民则具有两面性,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他们具有革命性,作为私有者则具有保守性,甚至反动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可能建立牢固的战斗联盟并实行革命专政等等。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策略观点给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不过列宁又认为从1903年11月到1914年8月这段时期,普列汉诺夫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这个时期的总的特点就是动摇性,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摆来摆去。所以列宁称他是一个“特殊的孟什维克”,说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所谓特殊立场的意思,不仅是指他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好多次脱离过孟什维克,不仅是指他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抨击了取消派,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战斗联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捍卫了党和革命,而且,与此密切联系的,是指他作为“孟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在哲学上坚持了“正义的事业”。列宁特别高度赞扬了他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进行哲学“整顿”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比之为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在法国,或者像康德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在德国所起的那种启蒙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主张按照马克思的榜样,在战争中力求区分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找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德、奥等同盟国侵略者,保卫祖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俄国,继续鼓吹俄国进行卫国战争,号召工人阶级团结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周围,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四月提纲”。他不同意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赞成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区域所实行的一种政策。他显然认为,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资本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善于自我调节的社会制

度。他援引马克思的重要原理说,“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以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俄国经济相当落后,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他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前提条件是雇佣工人构成国内居民的多数和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长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等等。所有这些条件当时俄国都远不具备。因此他继恩格斯之后警告说,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但是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拒绝了白党分子要他出来领导反动政府的建议,没有参加反对新政权的活动。因为他认为自己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了四十年,即使这个阶级走上了错误道路,也不愿和不能站在它的对立面,进行反对它的斗争。1918年5月30日,这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物资匮乏、病情加剧、孤独凄凉中与世长辞。

普列汉诺夫1917年2月回国至1918年1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团结报》、《我们的团结报》上(前译《统一报》、《我们的统一报》,应予改正),共发表了146篇文章和演说。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在祖国的一年》(有中译本)。据说列宁晚年,一次布哈林去看望病中的列宁,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此书,连忙惊问:您怎么看这本书?列宁回答说: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见费希尔著:《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

作为政治家,普列汉诺夫不是强有力的。他不具备超凡脱俗的领袖气质。他背后没有忠于他的铁杆部队。他领导的“劳动解放社”不过五六个人,而且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从事组织工作。所以他最终都未能成为强大政党或派别的领袖。

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名垂青史,主要是作为博学的著作家、思想家、理论家。自从1890年第一次发表历史哲学专论《评梅契尼柯夫的书》直到1917年出版《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哲学上他始终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1903年以后也仍然如此。这特别表现在对马赫主义、造神派、寻神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以及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大量美学、文艺论著上。但综观他的全部哲学著作,可以说理论上富于创见、实践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大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如《黑格尔逝世60周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唯物主义史论丛》、《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没有地址的信》等。其中尤以《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为最。这本书代表了他一生所达到的理论水平的最高峰。1903年以后,在哲学原理方面虽然也写出过像《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这样的优秀著作,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然而在运用现成的原理分析宗教、文艺,特别是俄国哲学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方面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卷帙浩繁。按照列宁的指示,1923—1927年苏联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全集》24卷。后来苏联学者整理并陆续编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若干遗著、手稿和书信,如《普列汉诺夫遗著》(8卷,1934—1940),《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3卷,1973—1974),等等。1956年为了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100周年,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了5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6—1958年,中译本则出版于1959—1984年)。这套取材于《全集》和《遗著》的著作是迄今为止他的哲学著作的最好

选本。

从内容看,普列汉诺夫著作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哲学、多个领域的思想史、美学、文艺评论、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政治思想、政论等等。其中许多领域,他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提出了不少的创见,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至今不仅保持着战斗的意义,而且仍然是人们开启智慧的源泉之一。

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流畅优美,旁征博引,极爱论战,文风清新明晰泼辣,兼具法国式的奔放风趣,德国式的深邃思辨和俄国式的渊博简洁的特点,是著名的俄国散文家。他的一些文句被人们视为典范的俄语收入权威的俄语辞典。他翻译和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奠定了现代俄语的马克思主义语汇的基础。这些,也都是他的一项毋庸置疑的不朽的文化功绩。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学术功绩和历史地位曾经有过两条基本的、纲领性的评价。一条说: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另一条说:他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巨人,他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齐名的“大俄罗斯”进步“民族文化”的卓越“代表”。

人名索引

(人名后的页码指《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正文边码,即俄文原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的页码)

三 画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 546, 548, 549, 602, 605, 606, 607, 608, 610, 611, 613, 621, 633, 634, 635, 636, 637, 639, 640, 641, 642, 644, 645, 647, 648, 650, 651, 652, 654, 655, 665,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4, 695, 696, 697, 698,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4, 715, 719, 721, 726, 727, 728, 729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国牧师,经济学家,“人口论”者。537, 543, 544, 545

马尔齐乌斯,卡尔·弗里德里希·菲利浦(1798—1868), 德国自然科学家,旅行家。612, 629

四 画

贝克莱,乔治(Berkeley, George, 1684—1753), 英国主教,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510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 Гавриловиу, 1828—1889),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 经济学家, 文学家。546, 575, 576, 667, 669, 709
- 日罗-泰隆(或译吉罗-特龙), 阿尔列克西斯(Giraud-Teulon, Alexis, 生于1839年), 原始社会的历史学家, 日内瓦的历史教授。620, 621, 682
- 牛顿, 伊萨克(Newton, Issac, 1643—1727), 英国数学家, 力学家, 天文学家, 经典物理学创始人。578
- 孔德, 奥古斯特(Comte, Auguste, 1798—1857), 法国哲学家, 实证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提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人类智力进化三阶段, 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的唯心主义理论。539, 540, 560, 561
- 孔多塞, 让·安东·尼古拉(Condorcet, Jean Antoine Nicolas, 1743—1794), 法国启蒙哲学家, 数学家, 社会学家, 社会活动家, “百科全书派”分子。532, 533, 536
- 孔西得朗, 维克多(Considerant, Victor, 1808—1893),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傅立叶的学生。536
-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ederic, 1801—1850),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649
- 巴尔扎克, 翁诺尔·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 法国作家, 巨著《人间喜剧》的作者。684
- 巴扎尔, 圣阿曼(Bazard, Saint-Amand, 1791—1832),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的学生。527, 528, 531
- 巴尔特, 保尔(Barth, Paul, 1858—1922), 德国哲学家, 社会学家。640, 642, 645
- 乌斯宾斯基,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Успенский, 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1843—1902), 俄国作家。607, 684, 714
- 尤沙可夫, 塞尔盖·尼古拉也维奇(Южакову,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9—1910), 俄国政论家, 自由派民粹主义者。718

五 画

卡贝, 埃蒂耶纳(Cabet, Etienne, 1788—1856), 法国政论家, “和平共产主义”

- 的空想家。535
- 卡列也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Кареев,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1850—1931),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马克思主义反对者。547,548,549,617,619,622,624,632,635,638,639,640,642,643,644,645,646,647,672,679,682,718
- 卡罗宁,斯·(Каронин,С·,1853—1892),原名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尼古拉·耶尔皮吉福罗维奇,俄国民粹主义作家。571
- 卡托,指老卡托(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古罗马作家,公元前195年任执政官。631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法国民主义启蒙思想家。520,583,584,585,586,587,588,642
-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99—前55),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594
- 尼古拉-逊(或尼·-逊)(丹尼尔逊的笔名),尼古拉·弗兰泽维奇(Николай-он,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1844—1918),俄国文学家,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555,556,557,725,726,727,728,729
- 弗林特,罗伯特(Flint,Robert,1838—1910),英国社会学家。539
- 弗列泽尔,亚历山大·肯普贝尔(Фрэзер,Александр Кэмпбелл,1818—1914),英国哲学史家。599,600
- 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纽马·德尼(Fustel de Coulange,Numa Denis,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历史科学中进化倾向的代表。682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27,531,536,537,538,539,540,541,542,550,554,555,557,559,563,661
- 司徒卢威,彼得·别尔恩加尔多维奇(Струве,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九十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者”。705
- 布洛斯,威廉(Blos,Wilhelm,1849—1927),德国历史学家,政论家。682
- 布尔,路德维希(Bule,Ludwig,1814—?),德国政论家,黑格尔派。722,723,724,725,726,727,729
- 布哈尔采夫(Бухарцев),562,563

六 画

- 达兰贝尔,让(D'Alembert, Jean, 1717—1783), 法国哲学家, 数学家, 启蒙思想家。726, 727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 英国自然科学家, 生物进化论奠基者。578, 588, 608, 609, 611, 618, 635, 652, 674, 676, 677, 678, 679, 686, 687, 690
- 达尔曼,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Dali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 德国历史学家。670
- 齐别尔,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 俄国经济学家, 马克思学说通俗宣传者。545, 571, 627, 694, 695
- 安凡丹, 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1796—1864),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最亲信的门徒之一, 同巴扎尔一起领导了圣西门学派。540, 543, 544, 545
- 考茨基, 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 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683
- 伊兹雅斯拉夫, 姆斯基斯拉维奇(Изяслав, Мстиславич, 约 1097—1154), 基辅大公(1146—1154)。449
- 伏特, 亚历山大罗(Volta, Alessandro, 1745—1827) 意大利物理学家, 生理学家, 流电理论创始人之一。600
- 伏尔泰, 弗朗斯瓦·马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 (真姓阿鲁埃 Arouet),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启蒙思想家。516, 523, 584, 587, 588, 660, 661, 666, 689
- 休谟, 大卫(Hume, David, 1711—1776), 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不可知论者, 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反对者, 货币数量说早期代表。659, 661, 662, 668
- 仲马, 亚历山大(Dumas, Alexandre, 1802—1870), 大仲马, 法国长篇小说家。661
-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 de, 1773—1842), 瑞士经济学家。522, 523, 524

米涅, 弗朗斯瓦·奥古斯特·马丽(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 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525, 526, 527, 531, 538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 俄国社会学家, 政论家, 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反对者, 社会学中主观方法维护者, 《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辑之一。509, 546, 547, 553, 556, 561, 562, 563, 568, 571, 575, 576,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99, 600, 601, 603, 617, 619, 632, 633, 635, 637, 669, 670, 672,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6, 707, 708, 714, 729

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 430—前 354),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649, 669, 687

刘易士, 乔治·亨利(Lewis, George Henry, 1817—1878), 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生理学家。579, 674

吉贝尔特, 诺维根修道院长(Гиберт, 1053—约 1124), 法国神学家, 历史学家。646

伊纳马-施特尔涅格, 卡尔·特奥多尔·冯(Inama-Sternegg, Karl Theodor von, 1843—1908), 德国经济学家, 历史学家。640, 641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前 322), 古希腊大思想家, 哲学家。573, 649, 687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也维奇(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9—1910), 俄国作家。718

毕希纳, 格奥尔格(Büchner, Georg, 1813—1837), 德国剧作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 路德维希·毕希纳的哥哥。558, 637, 691

毕希纳, 路德维希(Büchner, Ludwig, 1824—1899), 德国生理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家。509

七 画

阿尔诺·弗朗斯瓦(Arno, François, 1721—1784), 法国作家政论家, 法国科学院院士。533

- 阿基米得(Archimedes,公元前 287 左右—前 212),古希腊数学家和机械学家。615,617
- 阿尔希塔斯(Archytas,约公元前 428—前 365),古希腊哲学家。毕达戈拉斯学派代表。615
- 阿芬巴赫,雅克(Offenbach, Jacques, 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奠基人之一。588
- 麦克伦南,约翰·弗格森(McLennan, John Ferguson, 1827—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著有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620,621
- 伯吕纳提埃尔,斐迪南(Brunetière, Ferdinand, 1849—1906),法国批评家,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655,660,661,662,665,667
-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启蒙派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588,666
-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579
- 别基奥,朱则佩(Пеккио, Джузеппе, 1785—1835),意大利法学家,经济学家,648
- 贡普洛维奇,路德维格(Gumplowicz, Ludwig, 1838—1909),波兰社会学家,法理学家。649
- 伽伐尼,路易治(Galvani, Luigi, 1737—1798),意大利解剖学家,生物学家,电学创始人之一。600
- 沃·瓦,即沃龙佐夫,瓦西里·巴夫洛维奇(Воронцо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1847—1918, В. В. 为其笔名),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民粹派理论家。516,547,548,575,626,639,642,672,705
- 邵可侣,让-雅克·埃利泽(Reclus, Jean-Jacques Elisee, 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社会学家。639
-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论者。699
- 克里文科,塞尔盖·尼古拉也维奇(Кривенко,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7—1907),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自由民粹派代表,马克思主义反对者。705,706,714,715,716,718,727,729,730

-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 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 庸俗经济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579, 581, 587
- 李特列, 爱米尔 (Littré, Emill, 1801—1881),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语文学家, 用第四阶段(技术阶段)补充孔德人类发展三阶段论。539
- 李佩尔特, 尤里乌斯 (Lippert, Julius, 1839—1909), 奥地利文化史学家, 民族学家。621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宣扬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719, 721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wid,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 古典政治经济学著名代表之一。543, 544, 545, 547, 649
- 李维, 提图斯 (Livius, Titus, 公元前 59—公元 17), 罗马历史学家。687
- 秀厄, 让·巴蒂斯特·安都昂 (Suaud, Jean Baptiste Antoine, 1733—1817), 法国批评家, 新闻记者。515, 534
- 沙多布里昂子爵,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e, vicomte de, 1768—1848), 法国作家, 国家活动家, 外交家。666

八 画

- 波列沃伊, 尼古拉·阿列克塞也维奇 (Полевой,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6—1846), 俄国新闻记者, 作家, 历史学家, 699
- 波斯特, 阿尔贝尔特·赫尔曼 (Post, Albert Hermann, 1839—1895), 德国理论民族学家, 法学家。631, 632
- 波里比阿 (Polybius, 约公元前 200—前 120), 古希腊历史学家。687
- 恺撒, 盖·尤利 (Caesar, Gaius Julius, 公元前 102/100—前 44), 罗马统帅, 独裁者。689
- 拉辛, 让·巴蒂斯特 (Racine, Jean Baptiste, 1639—1699), 法国剧作家, 十七世纪古典主义作家。661
- 拉采尔, 弗里德里希 (Ratzel, Friedrich, 1844—1904), 德国地理学家, 民族学家。612, 613
-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573, 575, 621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Lamarck, 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1744—1829),法国自然科学家,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先驱。652,690

拉莫特·勒瓦耶,弗朗斯瓦(Lamot Le Waie, François, 1588—1672),法国怀疑论哲学家。521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民粹主义思想家,折衷主义哲学家。604

征服者威廉一世(William the Conqueror, 约 1027—1087),1035年起是诺曼底公爵。1066年在英国登陆并在黑斯廷斯击败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二世的军队而成为英国皇帝。530

范-德尔-海文,约翰(Ван-Дер-Гевен, Иоганн, 1801—1868),荷兰自然科学家。562

孟德斯鸠,夏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启蒙派思想家。520,537,689

居友,让·马丽(Guyau, Jean Marie, 1854—1888),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667

雨果,维克多·马丽(Hugo, Victor 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661

雨巴,尼科里亚·古斯塔夫(Гюббар, Николая Густав, 1828—1888),法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539

果戈里,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俄国作家。551,575,699,709

佩舍尔,奥斯卡尔(Peschel, Oskar, 1826—1875),德国地理学家,理论民族学家,政论家。629,632,633,644,682

易卜生,亨利克·约翰(Ibsen, Henrik Jouhan, 1828—1906),挪威剧作家。684

九 画

勃兰兑斯,格奥尔格·柯亨(Brandes, Georg Cohen, 1842—1927),丹麦文艺评论家,实证主义美学代表。665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557,631

- 茵克,亨利·约翰(Rink, Hinrik Johan, 1819—1893),丹麦地质学家,民族学家,旅行家。625,630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经济学家,摇摆于货币名义说和货币金属说之间。512,515,532,565,588,657,658
-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约前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615,648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602,672,673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571,600,601
- 柯罗爱依,爱德华·朱理(Корруайе, Эдуард Жюль, 1837—1904),法国建筑工程师和作家,有许多建筑史著作。666
-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著有论原始制度史方面的著作。626,627,628,630,633,637
-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36,551
- 哈维,威廉(Harvey, William, 1578—1657),英国医生,生理学创始人之一,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569
- 茹科夫斯基,尤利·加拉克提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545,546,694,695,696,697,698,707,727
-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670
- 施利格,即茨赫林斯基,弗兰茨(Щелиг,即 Цхлинский Франц, 1816—1900),德国青年黑格尔派。670,685
- 威尔逊,丹尼尔(Wilson, Daniel, 1816—1892),加拿大历史学家,考古学家。609
-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687

十 画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

- 家。653
- 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约公元前497—前406),古希腊诗人,悲剧作家。653
- 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
- 哥白尼,尼古拉(Kopernik, Nikola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创始人。635,636,669,670
- 格里姆,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尔(Grimm, Friedrich Melchior, 1723—1807),法国文学家,外交家,百科全书分子。516,533
-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家。722
- 高尔塞,亨利(Горсе, Анри),笔名达莫特,克劳德-马丽-亨利(Дамота, Клод-Мари-Анри, 1818—1884),法国政论家,政治经济学教授,傅立叶主义者。536
- 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 Ernst Heinrich, 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代表,无神论者。579,676,679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理论家。701,702,703,714,719,722,729
- 海格尔,路德维希(Гейгер, Людвиг, 1848—1919),德国历史学家,歌德研究者。614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579,581,582,583,584,585,587,588,606,607,617,618,619,620,621,639,670,680,685,686,687,701,702,704,721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剧作家。567
- 泰纳(一译丹纳),伊波利特(Taine, Hippolyte, 1828—1893),法国文学家,哲学家,文化史学派创始人。653,654,655
- 爱迪生,托马斯·阿尔瓦(Edison, Thomas, Alva, 1847—1931),美国发明家。615
- 爱夫多克斯·克尼茨基(Эвдокс, Книдский, 约公元前408—前355),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615
-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etius, Claude Adrien, 1715—1771),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513,516,521,532,535,537,552,559,564,565,611,650,657,673,691
- 诺任,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43—?),俄国启蒙运动者,讽刺作家,新闻

- 记者。561,562,563
- 莱布尼茨,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591,592
- 莱伊尔,查理(Lyell,Charles,1797—1875),英国学者,地质学家。568
- 莱纳尔,吉约姆·托马·弗朗斯瓦(Raynal,Guillaume-Thomas François,1713—1796),法国历史学家,启蒙运动者,接近百科全书派。586
-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Friedrich Albert,1828—1875),德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新康德主义者。535

十一画

- 笛卡尔,勒奈(Descartes,René,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512,573,588
- 勒米尼埃,让·路易·艾任(Лерминие,Жан Луи Эжен,1803—1857),法国法学家,自由主义政论家。627
- 勒诺尔芒,弗朗斯瓦(Lenormant,François,1837—1883),法国历史学家。639
-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513,519,573,589,650,651,659
- 菲里波夫,米哈依尔·米海洛维奇(Филиппов,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1858—1903),俄国文学家,曾一度依附“合法马克思主义”。599,600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Bacon,Francis,of Verulam,1561—1626),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588
- 基诺,菲力浦(Kino,Philipp,1635—1688),法国诗人,戏曲作家。661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1787—1874),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524,525,527,528,529,532,538,639
-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Thierry,Jacques-Nicolas-Augustin,1795—1856),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525,526,527,529,530,531,537,538
- 梅契尼柯夫,列夫·伊里奇(Мечников,Лев Ильич,1838—1888),俄国地理学家,政论家。639
- 梅歇尔斯基,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Мещерский,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1839—1914),俄国政论家,作家,保皇主义者。699

- 盖尔文奴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政治活动家。670
- 盖格尔,路德维希(Geiger, Ludwig, 1848—1919),德国历史学家。614
- 维科,卓万尼·巴蒂斯特(Vico, Giovanni Battista, 1668—1744),意大利社会学家,曾试图确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523, 525, 648
-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冯(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 1779—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代表。622, 623, 624, 625
-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代表。543, 550, 590, 669
- 萨尔梯柯夫(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米哈依尔·叶夫格拉伏维奇(Салтыков [сар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цхац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笔名恩·谢德林(Н·Щедрин),俄国作家。549, 571, 599, 644

十二画

- 奥比兹,特奥多尔(Opitz, Theodor),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政论家。672
-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14),公元前27年前名屋大维;公元前27年起为罗马皇帝。恺撒之甥孙及养子。657
- 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Гросла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152—1187),加里茨基公爵。549
- 蒂耶盖姆,菲利浦·旺(Tieghem, Philippe van, 1839—1914),法国自然科学家,植物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582, 583
- 葛德文,威廉(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国作家,政论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537
-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美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609
- 普赫特,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Puchta, Georg Friedrich, 1798—1846),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624, 626, 629
- 普鲁加文,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Пругавин, Виктор Степанович, 1858—1896),俄国经济学家,自由民粹主义者。556, 557
- 普鲁塔克(Plutarchos, 约46—125),古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

- 家。615,617,648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36, 551,553,556,557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518,523,535,541,566,569,571,572,573,574,575,576, 578,579,581,582,583,584,585,586,587,590,596,598,599,600,601, 602,605,606,607,608,612,626,634,635,639,643,653,659,666,668, 674,694,697,698,699,706,729
- 斯巴达克(Spartacus, ?—公元前71),意大利奴隶起义领袖。617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著名代表之一。544,545,649
- 斯巴索维奇,弗拉基米尔·但尼洛维奇(Спас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Данилович, 1829—1906),俄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571
-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论者。560,578,621
-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588,591,639
-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589,590,594,598,600,626,629,634,635
- 谢德林,见“萨尔梯柯夫”条

十三画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654
- 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 1773—1850),1830—1848年为法国国王,波旁王朝奥尔良幼支后裔。551,665
- 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652,676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540,708

微耳和,鲁多尔夫(Virchow,Rudolf,1821—1902),德国细胞病理学创始人,社会活动家。679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激进派,著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许多作品。602,604,605,606,670,672,685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Edgar,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602,603,604,605

福里格拉夫,卡尔(Фолльграф,Карл),726,727,729

福克斯,查理·詹姆士(Fox,Charles James,1749—1806),英国辉格党激进派领袖。526

十四画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599

赫里奥加巴尔(Heliogabal,约203—222),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皇帝,218—222年在位。519

赫斯,莫塞斯(Hess,Moses,1812—1875),德国社会学家,新闻记者。721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Johann Wolfgang,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566,567,660,673,692

十五画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1818—1881),美国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617,621,639,685,686,687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Jakob,1822—1893),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家,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任教。509

十六画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Holbach,Paul Henry,1723—1789),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510,513,516,520,532,

559, 659, 673, 691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英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642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英国经济学家, 实证论哲学家。537, 546, 648, 669, 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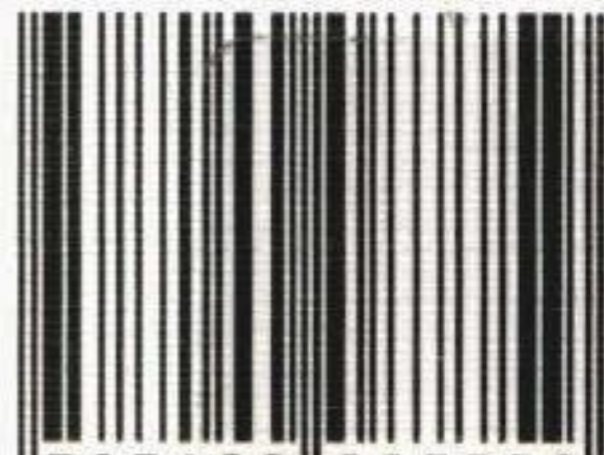
十七画

魏逊格伦, 保尔 (Weisengrün, Paul, 1868—?), 德国经济学家。617, 619



<http://www.ep.com.cn>

ISBN 978-7-100-08775-9



9 787100 087759 >

定价：32.00 元